

#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教·研·参·考

求实出版社

#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求实出版社

#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 下 册

[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著

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

\*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1印张 288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231·78 定价 1.15元

(内部发行)

# 目 次

## 第二编 斯大林主义的极盛时期

|                               |        |
|-------------------------------|--------|
| <b>第五章 革命与势力范围</b> .....      | ( 1 )  |
|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 ( 2 )  |
| 失败了的革命 (法国) .....             | (10)   |
| 失败了的革命 (意大利) .....            | (35)   |
| 未经允许的革命: 对法、意<br>机会主义的批评..... | (59)   |
|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           | ( 75 ) |
| 疑问与推测.....                    | (116)  |
| <br>                          |        |
| <b>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b> .....       | (156)  |
| 卫星国的革命.....                   | (156)  |
| 共产党情报局与苏联的“新策略” .....         | (164)  |
|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             | (171)  |
| <br>                          |        |
| <b>第七章 南斯拉夫打破缺口</b> .....     | (179)  |
| 官行警察专政在卫星国的建立.....            | (179)  |
| 离经叛道的革命.....                  | (185)  |
| 审判.....                       | (210)  |
| 西方共产党的反铁托主义运动.....            | (229)  |
| <br>                          |        |
| <b>第八章 东方接替</b> .....         | (252)  |

|                         |              |
|-------------------------|--------------|
| 中国革命与“大同盟” .....        | (254)        |
| 革命战争还是“全国统一”？ .....     | (259)        |
| 中国“铁托主义”的幽灵 .....       | (263)        |
| 中苏同盟 .....              | (268)        |
| <b>第九章 新的世界均势</b> ..... | <b>(280)</b> |
| “和平战士” .....            | (280)        |
| “冷战”中的僵持 .....          | (289)        |
| 对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评价 .....      | (292)        |
| <b>结束语</b> .....        | <b>(304)</b> |

## 第二编 斯大林主义的极盛时期

### 第五章 革命与势力范围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

1925年

\* 引文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62—363页。引用者把原文秩序颠倒了一下，把原文中第一段变成了第三段。——译者

##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sup>〔1〕</sup>之间的四个年头，是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大战的主要战场——欧洲和亚洲。到1945年底，在这个刚刚经历了巨大动荡的世界上，在苏联国界之外有1,400万有组织的共产党人，而在战争前夕至多有100万人，在苏德条约期间还要少得多（虽然不能举出一个确切数字，但党员人数下降是很厉害的，特别是在欧洲）。<sup>〔2〕</sup>在这次普遍增长中，有些党显得很突出，只有美国是显著的例外。这些党日后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除苏联党（近年还有越南党和古巴党）之外的一些敏感点。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

中共党员人数在抗日战争时期，由1937年的4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120万人，从而巩固了它作为伟大的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到1947年底，它已拥有党员170万人，就在同年夏季，大约比斯大林决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间略早一点，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转入战略进攻。内战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地平线上已升起了革命胜利的曙光。<sup>〔3〕</sup>

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在后来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有共产党都是秘密进行活动的。除捷克党之外，它们的生存多年来一直是岌岌可危的，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缩减到只有几千个党员。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波兰党几乎被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毁掉了，这种清洗同样也损害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党，虽然程度稍轻一点。可是，到1947年，这些党的党员人数加起来却已超过了700万，政权或者已由它们掌握，或者已是伸手可及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党是两个主要的

党。1943年，意共党员人数为5千人，1946年一跃而达200万人。法共则以较为平缓的速度增加，大战爆发时为30万人（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苏德条约期间保留下来），1946年约有100万人。这两个党都已成为工人阶级中举足轻重的大党，而且把它们的影响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界。它们都参加了1947年解放后的政府。

其他一些党在人数增长，尤其在政治影响方面，赶不上刚才提到的这种水平，但也有些情况值得一提：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七个欧洲小国中（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共产党党员总数由大战爆发时的不到10万人增至1946—47年的大约60万人。甚至连历来就很小的英国党，1939年党员人数总共不过18,000人，到1944年也达到了5万人。<sup>〔4〕</sup>奥、芬、比、丹、挪等国的共产党还参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

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党员1935年为17500人，1945年为72500人），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是由于英国远征军最后在1944年12月进行干涉（这是同年10月斯大林丘吉尔签订的秘密协定所认可的），<sup>〔5〕</sup>革命才未能取得胜利。1946年，希共又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到1947年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同时，这场斗争达到了最高潮。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共产党也在法西斯恐怖下重新建立起来，并支撑着一场强大的游击运动。

在亚洲，印度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943年的16000人增至1948年的9万人。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就已被打入地下，受到残酷迫害，最多只有1千名有组织的党员，而在1946年却赢得200万张选票和5个议员席位，1949年赢得300万张选票和35个议员席位（缺党员人数的统计）。差不多在所有亚洲国家都可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些规模不大的共产党小组发展起来了，在沒有建党的地方建立了党。越南共产党开始进行它的英雄的战斗。在一些中东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共产党的影响也以较小的规模扩展着。伊朗共产党在1946年



曾经短期参加过政府。

拉丁美洲各国的共产党，在1939年总共只有党员9万人，到1947年差不多已接近50万。其中最突出的是巴西、智利、古巴的党，它们的党员人数在1945—47年间大约分别为20万、6万、4万。智利、古巴共产党有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巴西党特别寄予厚望。“巴西也许不久就会成为美洲的俄罗斯”。这是当时大家爱说的一句口头禅。

前面已经说过，在战后最初几年中，美国算是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外。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超级强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难于渗透的。1944年，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决定把该党改组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并准备“谋求合作来确保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仅在这时，小小的美共才有过一次暂短的迅速发展。<sup>〔6〕</sup>不过，即使在美国，虽然在共产党内发生了危机，而在劳工运动中却可以看到一种稍向左转的变化。尽管劳联拒绝参加建立世界工联，但美国无产阶级的另一个庞大的工会集团——产联，却和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集团一道参加了世界工联。

工会的一国规模的团结广泛地恢复了；随着1945年2月世界工联的建立，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工会的世界规模的团结也第一次得以实现。劳工运动激进化的另一个标志，是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势力的增长和赞成同共产党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的加强。

在劳工运动力量和共产党组织得到发展的这个世界性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十月革命所诞生的这个国家和社会，它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威望。苏维埃制度彻底驳倒了托洛茨基的悲观预言，它经受住了巨大的考验，变得更加强大了。全世界舆论一致承认苏联对击败希特勒帝国主义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苏联的军事胜利对各大洲的工人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和十月革命当年那种震撼世界的影响媲美。但也有一个差别。现在，苏联的形象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的体现，它对于与共产主义相距甚远的广大的社会

阶层来说，已经成为维护一切进步事业、民族独立和国家之间和平的至高无上的旗手。各国共产党从苏联这种重新恢复并继续增长的威望中得到好处。除了它们自己在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外，这也是它们能够在这一时期中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产党人以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最激进的工人运动团体，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充满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精神。苏联所显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增添了对社会主义斗争必然胜利的无限信心，不论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国家也好（如中国、希腊），在依靠苏联红军的保护而取得进展的国家也好（如东欧各国），或者在似乎是要走另一条新的道路，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器来夺取国家政权的国家也好（如法国、意大利），情况都是这样。共产党人都深信，任何革命斗争，不管是武装的还是和平的，都一定会得到这个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的坚决支持。诚然，英美合伙干涉希腊起义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征兆，但这支不和谐的插曲还不足以使整个局面黯然失色。大家都了解，南斯拉夫正在帮助希共，而又有谁怀疑站在南斯拉夫背后撑腰的是伟大的苏联呢？国际反动派的一片叫嚣，不也正是如此说的吗？

总之，世界革命在经过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挫折之后，似乎又以不可阻挡之势重新跨上了自己的征程。诚然，它暂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又一次停步不前了（不包括捷克和东德这一小块东方区域）。它所走的道路，又一次和马克思所描述的不相符。但是，难道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那种惊人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内和工人运动内的左翼倾向的继续增强，以及英国工党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所有这不都是社会主义即将闯入资本主义的摇篮的征兆吗？范登堡听到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的消息时，在日记中写道：“据我看，世界都在朝左走哩！”〔7〕

共产主义在这些年中所取得的真正的或者说明显的成功，自然

有助于使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袖们出于辩解而作的关于共产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得到大发展的描述变得似乎有理了。托洛茨基提出的批评看来已经彻底破产了。面对着苏联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英雄主义和战斗素质，谁还能相信苏维埃制度是腐朽堕落的官僚主义制度呢？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战略含义、关于苏共的世界领导作用、关于在任何共产党内必须保持磐石般团结的结构作为提高战斗效率的最重要条件，难道所有这些原理以及其他一些在共产国际时期所信奉的原理没有被“历史的判决”所充分证实吗？难道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举行莫斯科审判，树立斯大林式镇压的先例，签订苏德条约，强使革命运动系统地屈从于一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把共产国际当作祭品奉献给“大同盟”，所有这些不都是天才的斯大林英明地阐述了的“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吗？苏军胜利具有解放的含义，这就足以把渗透于斯大林整个世界政策之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掩盖起来了。

对于斯大林的论点和决策的这种经验主义的“肯定”，给在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共产党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肯定，在意识形态下面给老一辈共产党员提供了新的证据，使他们又可以成功地说明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正确的，从而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党”时期所养成的那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也便于使新党员迅速为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所同化，把传给他们的遗产当作公理接受下来。这样，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中形成的那种缺乏批判精神的教条主义精神状态，就传给了新一代的党员，而这些新党员如前引数字所示，构成了1945年以后各个党的绝大多数。整个世界已在进入原子时代。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殖民地的解放、新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会提出许多新问题来。可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思想却从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来年间那样贫乏。在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教化达到了最高峰。斯大林被神化了，《联

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共产党员的圣经。做一个好党员，无须用心去钻研马列著作，因为斯大林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出来，把一切真正需要了解的东西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写进了这本小书里面，使所有的人们，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能够心明眼亮地沿着这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各族人民的慈文”的这份珍贵礼物，从1945年以来曾以各种语言成百万册地印刷过许多版。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胜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提供出一些新的理由，可用来为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强求一致的作法辩解，但大战和斯大林自己的政策却引起了一些起着相反作用的因素，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追求独立民族生活的愿望，还使他们对任何侵犯他们民族权利的行为都很敏感。共产党既然在反轴心国的斗争中起了作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苏醒过来的民族感情的感染，重新提出民族的目标。同时，斯大林那种实际上以保全“大同盟”为指针的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降低社会革命的目标，甚至完全停止提出这些目标。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各国共产党及其新党员队伍的政治态度中，“民族的”和“爱国的”因素占据了不寻常的比重（不应忘记，新党员很快就在各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中占了大多数），而且常常带有公开的民族主义色彩。

对“民族主义”的这种强调，从逻辑上说，就包含着同斯大林制订政策所依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之间发生矛盾的萌芽，但是，只要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这种结合还能够顺利地保持苏联和那些同希特勒作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同盟时，这个矛盾还是被掩盖着的。一旦共产党例如在中国、南斯拉夫、希腊那样，要把自己的民族愿望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矛盾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革命的民族政策将给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带来麻烦。

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正式得到认可的各国共产党的“民族

化”，逐渐具有某些动摇斯大林的铁板一块的体系的特点。当时，所有的党（其中多数是忠诚的，也有少数是存心玩弄手腕的）都继续认为自己是受莫斯科领导的。它们并不怀疑苏共的领导作用和斯大林的一贯英明正确，但是由于事态发展的驱使，由于各国情势千差万别，它们也不得不按本身的利益行事，采取更多的主动。

不守纪律和“离经叛道”的头一批迹象出现了。中共表面上对斯大林要它和国民党达成协议的压力让步，实际上却继续坚持进行革命战争。1946年末，越共也开始了挣脱法国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这同样是和当时斯大林的政策相矛盾的。法共和意共则开始谈论它们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将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法国式的或意大利式的。在美国，在党内拥有相当一批追随者的白劳德，公开投向改良主义，终于在1946年被革出教门。但是，最使斯大林心神不安的却是他的欧洲营垒中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

从解散共产国际到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形势是复杂的、矛盾的。斯大林式的铁板一块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相辅相成，斯大林和苏共的威望和权威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但与此同时，离心倾向也开始增长，敌对态度也已出现，这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的团结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的反叛，在斯大林铁板一块的世界结构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暴露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各国土生土长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的对抗的性质。从反叛的南斯拉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遭到的彻底孤立，可以看出这种铁板一块的结构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控制仍然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反对南斯拉夫“异端”的斗争，产生的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一度还使这种控制具有更加咄咄逼人之势。

甚至在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在大战中所形成的这种磐石般的团结，就已经经受了一次考验，它的来龙去脉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都较熟悉的。这就是1947年因反法西斯同盟发生危

机而引起的所谓“大转弯”。这次危机暴露了斯大林政策从1941年以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实质——在国际范围内表现为对待“大同盟”的态度；在各国范围内，表现为大多数共产党所奉行的政策。可是，实行这次“大转弯”，并没有让各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一向奉行的政策，对大战的这个决定性阶段和随后阶段的形势，对战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等等问题，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讨论。一切都是由斯大林及其亲近的助手作出决定，然后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而并没有人对这种办事程序提出任何异议，也看不出对苏联的观点和指令稍有偏离的迹象。

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就是这批指令之一。共产主义运动一夜之间就发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中心，而它本身对建立这个领导中心却根本没有参与。一切都是1947年在波兰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有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派的代表参加，并按照斯大林的意旨，建立了由这九个党组成的新机构。<sup>(8)</sup>甚至这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都没有事先讨论过这次会议的议题——新的国际形势、在新形势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及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等等。

在以后章节中，我们将对这次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所引起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在讨论之前，最好分析一下导致1947年“大转弯”的过程。我们得从波兰会议不得不加以讨论的问题开始，尽管那次讨论是掐头去尾的，回避了斯大林的政策这一主要之点，也不愿意公开承认问题的实质，即法国和意大利革命的遭受挫折。不过，即使是抱着半心半意的态度，波兰会议毕竟不得不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避免地导致1947年局势的整个政治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同盟”所激起的美妙的幻觉烟消云散，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冷战，想要在欧洲通过和平的、民主的、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原来也纯粹是空想。

## 失败了 的 革 命 (法 国)

很明显，在1945年的情况下，苏联红军驻在易北河上，只要法、意两国已形成的“革命的可能性”得到实现，那就意味着革命将在欧洲大陆取得胜利，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均势发生不利于美国这个唯一经过大战得到加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急剧变化。因此，这种革命可能性的受挫，对世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和1918—19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后果相比，是不相上下的。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1月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世界将会怎么样呢，如果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1919—20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冲击中没有半途而废的话？如果1918年德国、奥国的革命得到成功，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后，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话？”<sup>(9)</sup>这番话实际上对于1944—45年法、意革命的高潮也同样适用。季米特洛夫当然不会不把那些“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看作是使无产阶级革命冲击“半途而废”的原因。可是，现在又是谁在“半途”阻挡了1944—45年法、意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呢？

当时，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不只是无产阶级，正如陶里亚蒂后来所说的那样：“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以及工人阶级之外的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都站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工人阶级政党一边。这一点使我国的形势也象法国一样，区别于其他西欧国家”。<sup>(10)</sup>换言之，在1944—45年之际，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停止前进，而它们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谁刹了车”，而在于“法共与意共的这种刹车行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着眼究竟是否正当”？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两个党在抵抗运动时期和解放时

期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一番分析，哪怕是浮光掠影的分析也好。现在我们就从法共开始吧！

### 苏德条约和法共

法共是以合法身份进入第二次大战的唯一共产党。它拥有30万党员，在工人阶级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是高举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参战的。希特勒德国，voilà L'ennemi！（这就是敌人）。党把谴责达拉第和法国右派的投降政策，作为反希特勒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极端反动的分子叫嚣要取缔共产党，因为他们把它视为同德国妥协的主要障碍。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苏德条约这颗炸弹突然爆炸了，法共领导人简直震惊得不知所措。（自然，斯大林并没有把别的国家哪怕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放在心上。）法共领导立刻作出的反应是为这个条约开脱，说这是苏联维护和平的最大努力。不过，他们仍然充分支持加强国防，以抵御希特勒的侵略。1939年9月1日，法共议会党团一致宣布“全体共产党人都站到反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第一线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同一天，法共代表投票支持举借战债。<sup>〔11〕</sup>

政府首先封闭了法共报纸，随即在9月26日取缔了法共本身。当时，资产阶级政党虽还没有一心一意准备投降，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法共只要继续坚持抵抗希特勒侵略的路线，并因此而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无能和背叛行为进行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政策和苏联政策之间划清界限，本来是可以利用自己遭到的迫害来恢复它的影响的。

可是，法共很快就无条件地向莫斯科看齐。它刚刚宣布法国应该支持波兰，而且对政府为支持波兰可能进行干涉而要求举债作军费一事投赞成票之后，却又出尔反尔，宣布“地主阶级的波兰不值得支持”，而且还欢迎红军对波兰东部的占领。党还用类似的理由为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辩护。本来这两次行动完全可以说成是



针对德国的军事措施，但法共领导却抄袭了苏联外交官们的掩人耳目的辞令。莫洛托夫把英、法说成是侵略国家，把德国说成是最具有和平诚意的国家。法共竟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这样做不仅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而且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简直等于自杀。法共就是这样给了反动势力一个理想的借口，好让它来把自己打成背叛民族的政党。这使资产阶级得到双重好处：它既可以进一步孤立共产党，以便更易于进行镇压，又可以把自已的投降政策掩盖起来。

当民族陷入灾难，敌人的占领已经开始的时候，党依然坚持这种态度不变。它攻击维希政府，但自己并没有领导民族解放事业，也没有象南共、希共那样组织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它把民族解放的旗帜拱手让给象戴高乐那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苏德条约期间，法共这种一味听命于莫斯科的盲从态度，最终使它处于极不利的情势之下：第一，使它未能利用法兰西国家刚刚开始崩溃时的有利时机，把民族情绪的洪流引导到革命的方向去；第二，把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动权交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第三，由于有上述两种因素，法共更易于遭到镇压。<sup>〔2〕</sup>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党在此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法国当时面临的空前危险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一个革命政党所考虑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1941年3月散发的一份题为《向法兰西人民致敬》的政策文件中，把当时一些无关紧要的斗争说成是在准备着“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战斗，通过这场战斗，将产生人民共和国，产生新的法兰西，一个免于资本家剥削的法兰西，一个全体人民都享有面包、自由与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法兰西”。但是，在希特勒军队占领下的法国，侈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号召进行解放战争，岂非笑话！可是党仍在暗示：只要坚持反对维希政府的斗争，就能从中产生出一个“人民政府”。这份文件只字不提怎样组织反占领者的斗争，却号召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人士

把全部精力投到有条不紊地组织一条广泛的战斗阵线中去，要  
积极准备开展日常行动和群众运动，以便扫除维希那一小撮资  
本家，为我们的人民和人民政府扫清道路。

文件中所载的那个纲领的第一点就暗示，到了此时，民族独立  
可以由人民政府来谈判解决了：

民族解放与释放战俘：为完成此任务，人民政府将采取一  
切必要的步骤和所有民族建立和平的关系。它所依靠的是法国  
人民的信任所赋予的权力，是其他民族的同情，是苏联的友  
谊。

第二点宣称：

建立法、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以纪念法国人民和法国  
共产党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鲁尔盆地，反对一个民  
族压迫另一个民族而采取的行动。

文件根本没有提到要使这种兄弟关系成为可能，就必须推翻希  
特勒政权。党的这种策略，除了意味着承认苏联和当时控制着欧洲  
的纳粹德国之间达成的那种长期的全球性安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  
意义呢？法共这种立场，难道不正好和苏联政府企图加强与纳粹德  
国妥协的立场紧密联系吗？正如我们所知，苏联的这种政策就连苏  
联历史学家也是直认不讳的。最后在这里提出一个细节是适当的：  
原来上引文件乃是多列士在莫斯科拟好了的。（13）

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而奋斗，这无疑是法国处于历史危  
机的形势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应当选定的目标。但法共领导  
却把它当作一块“左”的招牌来掩盖自己执行的政策，即为了避免  
与苏联的政策发生冲突而摒弃了能够使这场危机得到社会主义的解  
决结局的唯一方针，即进行一场反对纳粹占领的民族的、反法西斯  
的、革命的战争。上引文件不仅没有号召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且不  
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它是反对这个方针的。文件中说，法国人民  
“坚决摒弃一切战争贩子的号召，……决不参加另一次帝国主义战  
争。”（14）

## 摒弃社会主义的选择

从纳粹士兵跨过苏联边界的时刻起，法共也跨过了把它和“战争贩子”分隔开的无形边界，把自己摆到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位置上。但很明显，它在采取这一步骤中的迟延和它以前政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使收支平衡表上抹掉它一大笔资产。现在，经过两年“等待”之后，党终于批评了戴高乐总部的过于谨慎，因为该总部总是劝阻人们暂时不要采取武装行动。党号召立即进行武装斗争，并且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去组织这种斗争。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勇气，他们的组织才能，逐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急于要投入战斗的人们，又重新回到党内来了。

不过，从政治上说，党又陷入了与战争刚爆发时所犯错误恰恰相反的错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英、美被说成是法国人民的敌人，而6月22日以后，共产党的宣传立即停止了对现在已成为伟大的民主国家和同盟者的那些国家的一切批评。6月22日以前，戴高乐不过是伦敦的代理人，戴高乐主义被说成是“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和反民主的”运动。它的目的无非是要剥夺法国的“一切自由，如果英国取得胜利的话”。〔15〕

6月22日以后，戴高乐自然成了盟友，对戴高乐主义的“反动、反民主的本质”的批判从法共的文件中消失了，不过党在一个时期中对这位将军仍持保留态度。1942年5月，莫洛托夫在伦敦同戴高乐举行了会谈，为了报答戴高乐保证支持俄国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位将军要求全体法国人民以及法属殖民地人民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的主张。〔16〕随后的几个月里，法共参加了伦敦委员会，并指派费尔南·格勒尼埃担任驻该委员会的代表。戴高乐在1943年1月10日致法共中央的信件中，表示他注意到法共已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法共必须服从戴高乐领导的原则。信中说：

费·格勒尼埃来了，他带来了以你们的名义宣布的法共参

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决定，法共愿意把它创建和培育起来的英勇的非正规部队交给我，让我以法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调遣，所有这些，都是法国团结的象征，……我深信我所指派的代表将看到法共的领导人愿意进行合作以实现你们组织中已经存在的那种牺牲精神和忠贞不二的纪律。

同月21日，《人道报》写道：“我们对这位首先提高了抵抗运动水平的戴高乐将军表示信任，这反映了法国人的感情”。〔17〕2月份，原来被维希政府送押在阿尔及尔狱中的法共代表们就被释放了，而他们在1942年11月11日英美联军攻克阿尔及利亚之后还一直是被关押着的。同年6月——好象巧合似的，这日期正是在解散共产国际之后不几天——当时刚刚成立并把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废除了1939年9月达拉第宣布共产党非法的法令。以戴高乐和吉罗两将军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情况是再反动不过的了。按照杜克洛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编写的《抵抗运动史》的说法，它聚集着一批“由资产阶级派到这里来领取‘抵抗战士’的身份证以便确保其本身利益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法共领导用下述声明来欢庆“民解”的成立：

全体法国人民都指望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动员法国在海外的切资源力量和意志，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正在祖国土地上进行着艰巨而光荣的斗争的爱国志士们，把法国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反希特勒的战争。〔18〕

在这个阶段中，法共把参加“民解”看作是它的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它要求委员会接受一项纲领作为它参加的条件，这个纲领最进步的要求也不过是“推行民主的社会政策，以便调动法国的一切力量，鼓起全体人民参加解放战争的热情”。尽管这种一般性的宣言很难说是要求戴高乐作出什么妥协，甚至还可能帮助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去取得抵抗战士身份证，但戴高乐却拒绝接受任何条件，正如他拒绝让法共自己指派而只能由他来指定法共参加“民解”的代表一样。这无疑是为了表明他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

则。到头来，法共只好在戴高乐没有同意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参加了“民解”。〔19〕

诚然，党在民族阵线中也同时积极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一个由党领导的逐渐积聚了相当力量的联合阵线）。党主张在国内抵抗运动中把一切不同的组织和派别都联合起来。1945年春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联合抵抗运动”把战斗团、义勇军和解放运动（即在地下改组过的法国总工会）联合在一起，并于5月27日成立了代表一切组织和派别的“民族抵抗委员会”。在筹建这个团体的商谈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当时抵抗运动中唯一有组织的政党就是共产党。开始，戴高乐不想让共产党作为这样一个政党派出代表参加“民抗”，但当他看到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时，他又转而寻求其他解决办法。这就是杜克洛的历史著作中所说的：“为了不让共产党成为唯一享有‘抵抗运动政党’头衔的党，〔戴高乐建议〕其他政治团体也应该有代表参加委员会。”把一些旧政党重新建立起来，既可以“加强戴高乐事业在盟国心目中的地位”，又可以“构成遏制共产党影响的唯一有效的障碍”。杜克洛继续说：

不过，这一切动议遭到抵抗运动各方面的激烈反对。维希政权已使许多政客声名狼藉，尽管各政党中也有某些人参加了抵抗运动，但除共产党外，没有其他任何政党能在地下重建起来，……抵抗运动强烈反对这些政党重新出现。

地下报纸《法兰西防卫报》写道：

法共应该派代表参加解放委员会，这是天公地道的，因为它积极从事共同的斗争。但我们很难接受那些旧的政治运动的代表们参加。

这无疑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它提出了这场斗争究竟会有什么结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两者必居其一：要么回到把法国推向民族灾难的传统政治制度中去，要么建立一个以法共为领导的、用抵抗精神武装起来的、崭新的统一力量。这是向党提供的的一个千载难逢的

机会，使党能够把自己摆到这一改革潮流的领导地位，引导它走向急剧变革法国社会的方向去。但是党在天平上把法码加在“过去”那边，支持了戴高乐的建议。杜克洛对这一行动作了如下解释：

事实上，从传统上说，法国的政治生活总是表现为一种兼容并蓄的广阔潮流。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特征。在法国，对政治的冷淡和对党派的谴责，往往成为反动势力手中的武器。鉴于这种情况，也鉴于民族斗争中实现迅速有效的团结的必要性，法共同意在让·莫林提出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民族抵抗委员会。莫林在向伦敦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法共这种谋求团结的愿望表示了赞扬。<sup>〔20〕</sup>

杜克洛之流所说的“特征”，确实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第二个同样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反动势力曾经不止一次地利用了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无能。第三个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在杜克洛的辩解中被忽略了，就是那些传统的政党，“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正好处于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一蹶不振的境地，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反动势力想要否定这些政党，而是新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抵抗运动中产生出来，于是反动势力反而要拼命抓住“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作为一根救命稻草。第四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后来的事态将会证明——是法共支持戴高乐的这个解决办法，实际就是为法国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伦敦委员会对它大加赞扬是理所当然的。在民族斗争中，确实需要迅速地取得有效的团结，但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这场斗争怎样理解，其次也要看斗争的方向。如果斗争为的是导致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复辟，那么，戴高乐所选择的、并得到法共支持的这种“团结”，无疑是再“有效”不过的了。南共如果也接受这种牌号的“团结”，——事实上，斯大林曾试图以此强加于它——那么，就会把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引导到复辟传统的君主制的道路上去。而欧洲唯一不是从划分“势力范围”造成的，而是不理睬这种划分凭自己的力量争取到胜利的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1943年，特别是1944年最初几个月中，统一抵抗运动的基层组织网在全法国有力地发展起来，而法共在其中占据着关键性的位置，从而有机会在组织工作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能否领导好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并把它引向一场在法国获得成功的革命，并不仅仅取决于在抵抗组织中所占据的地位，或者组织武装斗争的能力（法共也如西共过去所表现的一样，已经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这方面的卓越能力），甚至也不取决于在战斗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法共在这方面也同样是堪称表率。（法共确实无愧于“烈士党”的称号，但遗憾的是，它并非同样无愧于“革命党”的称号。）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首先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需要党的领导层对实行这样一种革命变革具有坚强的意志。

全国性起义继之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使夺取政权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法国的大部分，包括巴黎在内，都是由抵抗运动的部队在群众支持下解放的，盟军并未直接干预。各地的解放委员会几乎都已成为权力机关，爱国民兵组织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群众组织。<sup>〔21〕</sup>共产党是这个伟大的人民起义的中坚力量。它的威信和影响，不论在工会和工厂中，在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组织中，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或在抵抗时期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sup>〔22〕</sup>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当时形势是革命的形势。即使当时的事态还没有把这种形势的特点显示出来，但在群众心目中，法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维希政府和占领者的政权一崩溃，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和其他靠工薪收入的广大社会阶层，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法共身上。他们把法共和革命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和苏联联系在一起，而苏联的威望——这是当时形势中的另一个基本因素——在法国人民心目中达到了后来从未再达到过的高度。

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表明的，他很了解“战斗分子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相信法共想趁解放之机，领导抵抗部队夺取政权，而且在很久以后，事实早已证明不是如此，他仍认为法共有此意图。

乘战争混乱之机捞取好处，在民族抵抗委员会中拥有压倒优势（该委员会的成员除已投身于共产党的人之外，也许还有不少人容易受权力的诱惑），利用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迫害、所承担的损失、所表现的勇敢精神而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的同情，利用人民对无纪律、无秩序状态的忧虑来谋取他们本身的利益，最后，还宣称他们已归附于戴高乐将军来伪装自己，就这样，他们打算领头搞一场起义，象巴黎公社那样，宣布成立共和国，保证建立公共秩序和维护正义。而且他们还打算十分谨慎行事，除了“马赛曲”不唱别的歌，除了“三色旗”不打别的旗。（23）

戴高乐归诸于法共的这种计划，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计划。法共手中握有哪些牌和怎么打这些牌的技巧，戴高乐是了解得很清楚的。在这种形势下，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所应该关心的，不是提出一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抽象计划，而是要由抵抗运动，即真正的抵抗运动而不是伦敦或阿尔及尔的抵抗运动，来夺取政权。这并不是说要去直接反对戴高乐，但却可以逼迫戴高乐来反对抵抗运动。这并不是说要去同英美“解放”部队发生冲突，但可以把建立抵抗政权的既成事实摆在他们面前，并且把在解放时高涨起来的民族情绪动员起来，反击对这个政权的任何进攻。在1944年的法国，这本来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戴高乐非常懂得这一点，可惜他不是法共总书记。

戴高乐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于是巧妙地施展手腕。他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政权机构，并限制解放委员会的权力。他看到法共步步退让而并未作出多大反抗，就更有把握地前进了。他终于惊奇地发现，法共原来是伟大的“爱国”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党更能有效地提供合作，以重建“不朽的法兰西”。这个进程发展得很快。

在戴高乐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法共领导由于受到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和党内强有力的革命潮流的压力，奉行过一种模棱两可的政治路线，既想捍卫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组织，又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来支持坚决的群众行动，或提出对法国社会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的基本问题。1944年10月27日，杜克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爱国民兵组织必须继续警惕地保卫共和秩序，同时还应积极组织人民群众的军事训练”。他补充说，在每个地区，民兵组织应该包括成千上万的“公民战士”，并须置于解放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要有常驻的防区，要有武器弹药的储备。

第二天，戴高乐就用签署一项解散民兵的法令来作为回答。两名共产党部长虽然提了抗议，但仍然留在政府中。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了内部指示，要求继续保持民兵组织，不交出武器，并把武器秘密地储藏起来，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发动人民反击这种对抵抗政权的直接进攻，反击戴高乐的这种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意图。<sup>〔24〕</sup>戴高乐玩弄着“先予后取”的把戏。11月6日，一项宣布赦免多列士的法令在政府公报上登出来了。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及这一措施时写道：“多列士多次对我提出了请求。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实行这一赦免。我所想到的是过去的情景，后来出现的事态以及目前的需要。我相信让多列士回到法共领导岗位，实际上可能是利多害少的”。目前的需要是什么？按照戴高乐的描述，就是“剪除共产党的利爪”，“剥夺他们试图篡据的权力和正在显示的武装力量”。他对多列士归国的“好处”的估计是正确的。党的总书记11月27日回到法国。他的第一个主要口号是：“一个国家，一个警察机关，一个军队”。戴高乐评论说：“多列士从回到法国之时起，一直在帮助清除‘爱国民兵组织’的残迹。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篡夺政权的企图和一些过激团体的暴力行为。”<sup>〔25〕</sup>

事实上，多列士一回到法国，党的各个组织就接到了解散民兵和交出武器的内部指示。多列士在1945年1月21日向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公然鼓吹解散民兵和一切“非正规”武装团体。他说：在对希特勒和维希的支持者们举行起义之前和起义之中，这些武装也许是正当的，但现在则应该由正规警察部队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在同一报告中，多列士还鼓吹说，（就象1944年12月14日他在“冬季

赛车場”的一次党组织主办的会议上作报告时鼓吹的那样)地方的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都不应该试图取代文官行政机构的职能。〔26〕

戴高乐选择的赦免多列士的时间，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动机。这位将军正在准备访问莫斯科，如果他在莫斯科出现时，“多列士案件”还悬而未决，那将是十分尴尬的。另一方面，赦免斯大林的这位有势力的门徒，也将是再好不过的一份见面礼。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11月1日公布赦免令，同月27日多列士抵达巴黎，12月2日戴高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这位将军的目的是想同苏联签订一个双边条约来加强他和英、美平起平坐的地位。经过一番吃力的讨价还价，他在这点上获得了成功。如果说赦免多列士使戴高乐和斯大林顺利地达成了协议，那么，法苏条约又使戴高乐和多列士顺利地达成了协议。1945年1月21日多列士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限制新的法兰西国家权力的悬切的议论，同莫斯科谈判的圆满结局不可能毫无关系。〔27〕

### 重建“不朽的法兰西”

党除了有效地进行合作以消除解放委员会的“夺权倾向”和“爱国民兵组织的最后残余”之外，同时还把自己控制的抵抗武装部队，完全交给戴高乐分子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支配，并使之和法兰西的“伟大军队”溶合起来。多列士从踏上法国土地之时起，就热烈地为建立这支“伟大军队”而奔走呼号。换言之，党把抵抗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一笔勾销了。另外，党把抵抗时期和解放时期所创立的新的人民政权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基础加以普遍摧毁的同时，又投入了另一场争取恢复“不朽的法兰西”的战斗，即臭名昭著的“生产斗争”。这是在巴黎解放之后立即开始的。

1944年9月10日，伯努瓦·弗拉雄在对职工会积极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工人们“在更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大工业，保证它的充分恢复”。他解释说：重建工作“不应该使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受益”。但这个问题要“等到有朝一日征询人民意愿选择什么

样的政府形式时”，才能得到解决。到那时，“我们将会就消除托拉斯和以适当的方式把为全民族服务的经济取代托拉斯的统治，提出意见”。但是，就目前来说，工人们必须拼命干活，不必等待谁应该从重建中受益这个问题的最后表决结果。法国总工会的这位总书记也是法共的一位领导人。他建议工人们应该成立“爱国生产委员会”。1945年3月24日，他把这个报告提交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

当时，工人们的工资只得到些微增加，比“法国总工会”处于地下时期所提出的增长百分之五十的菲薄要求还要低，而物价却上涨了。弗拉雄在他的报告中说：“在这个时期中（从解放到1945年），工人们理所当然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如果说工人们虽有这种不满，而罢工实际上并未发生，那完全是由于工人群众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法国总工会及其积极分子们享有威信的缘故”。〔28〕事实确实是如此，党在多列士的领导下，曾经倾注全力向共产党员和参加总工会的工人灌输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在起初阶段，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德国尚未被完全打败，尚须为“战争作出努力”，但事实上，正如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演说中所暗示的，战争的胜负已成定局，而法国的武器生产对战争本来就没有多大影响。当时还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是法国工人的奋斗和牺牲所换来的结果究竟是“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巩固法国资本主义呢，还是建立一种“为民族服务的经济”？所谓“为战争作出努力”，在上面谈到的背景下，只有利于麻痹和瓦解能够强制实行第二种选择的势力。德国的战败并没有使这种“生产斗争”中止，反而使它达到了最高潮。

多列士找到了另一个并不特别新奇的理由，这就是所有社会民主党人象共产党人现在这样，每次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时所惯用的理由。多列士不止一次地说，工人们不应该提出过分的要求和举行罢工，而应该努力增产，因为给一个有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参加的政府制造困难，是符合资产阶级阔老们的利益的。多列士在1945年

1月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比他的社会民主党的前辈和同辈毫无逊色，甚至走得更远。

我们国家的致命危险在哪里？它在生产方面，……托拉斯及其代理人反对致力于重建和生产，这就说明，顶住托拉斯的这种反对，坚持劳动和生产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托拉斯及其代理人”当然并不打算反对工人们“劳动和生产”的愿望，多列士无法向党代会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根据，来支持他指控托拉斯具有这种意图的说法。可是另一方面，多列士作为党的长远目标提出来的“没有托拉斯的民主”这个概念，倒是很难使托拉斯高兴的。但是，托拉斯也用不着为此而过于烦恼，因为这个目标将要在尊重权威与保持稳定的条件下，通过议会的合法手段来实现。多列士在同一报告中宣称：“我们国家最有希望的前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一个具有广泛的民族民主团结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保证为权威和稳定提供最好的条件”。只有这样，“法兰西的伟大”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只有这样，生产才能顺利发展，而用多列士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物质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以及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是今天衡量法国伟大的尺度”。我们人民必须“为生产斗争而锻炼自己，正如过去为解放斗争锻炼过自己一样。我们的任务是恢复我国的伟大，是脚踏实地地争得我国独立的物质条件”。下面这段话，是针对党内外惯于用“革命词句”对党领导奉行的路线妄加批评的人说的：“我们必须同少数宗派主义分子的左倾观点作斗争。这些人认为我们大概已经放弃了革命路线。虽然他们还没有明说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法共中央在卓具远见的多列士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动派试图把工人阶级和民主人士中最先进的分子推向分裂人民的冒险事业中去的计划。多列士在报告全文中凡是提到“革命”、“革命的”这些概念时，都只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他在元月份的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已经发展到了批评人们不该使用这些概念的地步，他转弯抹角地把这些概念和维希

政府曾经用过的所谓“民族革命”的概念划了等号。

我们共产党人暂时还不应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要求。我说这个话，是冒着被嘴上成天挂着“革命”词句的人看成“温吞水”的危险的！他们这种做法是颇为行时的，但是希特勒导演下的为时四年的“民族革命”，已经提醒人们要谨防把某些术语抽掉其实际意义而加以蛊惑性的滥用。

多列士用上了“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样一个词，号召人们“提高警惕，及时揭露和清除党内那些通常用左倾辞令作护身符的挑拨离间分子、捣乱分子、内奸、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29〕

当多列士访问北方省的矿区时，“生产战”达到了最高潮。那里的矿工们不理睬法共和法国总工会发动的生产运动，仍不时举行罢工。多列士对参加罢工的党员大加训斥。他在1945年7月21日瓦齐埃矿区党员矿工集会上发表讲话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现在是把你们当作负责任的人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党中央的名义，以党代会决议的名义，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不赞成哪怕是最小规模 的罢工，上星期日白求恩矿区那种罢工是在撇开工会而且同工会对着干闹起来的，那就尤其不能容许。

罢工结果，损失了三万吨煤，多列士惊呼：“这简直太丢人了，太可耻了。这给工会、给矿工的利益带来了莫大损害！”〔30〕但在“瓦齐埃呼吁”一年之后，多列士却可以为已经取得的成功而暗自庆幸了。

煤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日产量达到16万吨以上，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除苏联外，法国是唯一能以这样的成就而自豪的国家，……我们应该祝贺我们的不辞辛劳的矿工们！〔31〕

（读了多列士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似乎法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工人 们的中心任务只是把已经由他们自己控制的经济推动起来而已。）

同年12月，公用事业工人联合会决定组织一次警告性罢工，为此在“冬季赛车场”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筹备会。会上的发言人，甚至包括法国社会党的发言人，都一致坚持必须举行总罢工。唯独法国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亨利·雷诺表示反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总罢工将是一场灾难。把铁路交通断了，全国都得挨饿。”两天之后，多列士对内阁会议说，如果对这种不能容忍的压力作出让步，那是错误的。他还表示，财政部长的建议只须稍作修改就可以采纳。<sup>〔32〕</sup>1945年这一年，法共是可以现在用古巴共产党的术语把它叫做“生产年”的。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年时，曾说：

至于多列士，他即使在致力于推进共产主义事业，也在某些场合愿意为民族利益服务。他经常号召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最大限度的劳动与生产。我并不想去了解他的为人，只要有人为法国服务我就满意了。<sup>〔33〕</sup>

很快就清楚了，所谓“共产主义事业”并未得到多大进展，而法国或者毋宁说法国资产阶级，确实一直在得到很好的服务。

1946年6月，多列士感到不能不向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所支持的宪法草案在全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而6月2日立法选举的结果又清楚地表明了选民向右转的趋势。）

形势是严重的。法国富有的资产阶级在玩弄权术上经验丰富、本领高超。他们就是为了要造成这样的局势，甚至还想尽量使我们后退得更远，巧妙地轮番使用了他们的各种手段和代理人。在全国解放的时候，资产阶级还不敢直接向人民运动进攻，只是力图把它引入歧途，使之松懈，然后使之瓦解。他们阻挠抵抗力量的联合，并设法逐渐缩小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各广大地区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的影响。<sup>〔34〕</sup>

这番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

（1）解放两年之后，也就是法共参加政府两年之后，在法国真正取得进展的并不是在抵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运动，而是在

解放后恢复了政治影响和增强了经济地位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多列士原来的策略是想让工人们勒紧裤带,更辛勤、更长时间地劳动,来抗击托拉斯,但结果反而使托拉斯加强了。怕危及“民族团结”而对群众运动施加种种限制,并对可能触犯法律秩序的行为决心加以约束,结果却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在法国复辟。怕吓跑中间集团而降低工人阶级的要求,结果反而使这些中间集团摆到右边去了,摆到资产阶级政党那边去了,而现在这些政党倒越来越坚决,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怯懦、软弱恰成鲜明的对照。多列士在他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想仅仅通过赢得议会多数来实现“新民主”的道路,通向的是“旧民主”最恶劣的形式即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复辟。共产党的议会迷也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迷一样,正在自食其果。

法共领导企图把未能在法共和社会党的议会多数基础上组成两党联合政府的失败责任推给法国社会党,这种作法也是徒劳无益的。谁都知道,右翼社会党人除非受到群众运动的逼迫,决不会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而多列士的领导却早已想方设法要把解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了。即使是忠诚地支持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左翼社会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也对这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前景,表示了理所当然的保留。诚然,多列士当时曾几次提到可能要走一条与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法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话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为什么严肃的理论根据所证实。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予以推广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删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即红军和苏联政权的其他工具在这些国家所起过的作用。另外,法共对斯大林和他的教条百依百顺得如此露骨,以至人们很难相信多列士小心翼翼地玩弄异端的游戏,会比作出一种策略姿态有更多的意义。<sup>〔35〕</sup>

(2) 多列士承认“在全国解放的时候,资产阶级还不敢直接向人民运动进攻”,只是“力图把它引入歧途,使之松懈,然后使之瓦解”。这样,他就等于接受了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要求奉行一种进攻性的革命政策,俾使全国起义所造成的强大人民运动和工人

运动得以继续发展下去的论据。如果说，“富有的资产阶级”当时还不敢直接向这个运动展开进攻，那无非是因为他们感到了它的革命潜力。那么，又是谁“逐渐缩小了民族抵抗运动委员会和各个地区和部门的解放委员会的影响”呢？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呢？还是多列士从莫斯科回国以来一直加以鼓吹并强制推行的政策呢？多列士在报告的另一部分再次提到“资产阶级势力的迂迴战术，当他们在1944年8月还无力向人民直接进攻的时候，就用这种战术来遏制人民运动和转移它的方向，但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有了力量，可以公开夸耀他们这种战术了”。<sup>(36)</sup>资产阶级的自夸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共产党的总书记奉行一种与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迂迴战术”如此合拍的政策，而且还赞不绝口，恐怕就不怎么合逻辑了。

尽管如此，多列士还是为解放以来的政策辩护，认为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出了点小毛病，那只是由于某些部门和职工会的工作没做好。多列士以一种世上少有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居然还批评“某些没有摆脱议会幻想的同志”，好象他对此毫无责任似的。但是，从这个报告全文来看，他这种批评的作用，不过是在表面上平衡一下他对左派的真正攻击而已。党内对现行路线的不满情绪已蔓延得如此广泛，多列士也感到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况，虽然想尽量加以缩小。多列士引述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扬恩地区某个党支部送来的一份决议，批评党的领导“一味在政府里讲合作，接二连三地作出让步”。另一个是上比利牛斯地区送来的一份决议，指责党的领导“与反动派合作，支持反民主的法令”。多列士呼吁全党起来坚决反对这种立场。凡是替这种立场辩护的人，都是不懂得“我们已成为一个政府党，他们这样作，是和党的总路线唱对台戏”。为了说服那些不顺从的同志，多列士提出了（就我所知还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下面这样一个不容置辩的特别重大的理由，而且以后许多年还一直用这个理由来为法共在解放时期的政策辩护。他说，批评我们这种政策的同志“甚至没有从美国记者李普曼那里得到教益，李普曼在《费加罗报》上写文章说：如果法共真



的在法国取得政权，英美联军就会进行干涉”。<sup>(37)</sup>我们回头还要再讨论这个初看起来如此颠扑不破的，至高无上的辩护理由。现在暂且以此结束我们对于法共被赶出政府以前所奉行的政策的简略回顾吧。

不论是当时已经形成的“严重形势”，还是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当然，这种不满情绪总归是可以很容易地用思想慑服和行政制裁等传统方法压下去的——都不足以使党的领导对其政策作任何改变。就在刚才提到的这次中央全会后不久，多列士发表了上面引述过的那篇讲话，极力赞扬矿工们用“血汗”换来的煤炭增产成绩，而党甘愿服从政府发布的冻结工资法令，因为它在政府中分享着部长职位。

不过，这个政策的最遭人非议之处，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篇幅中约略谈及的话，应该说是法共对于遭受法殖民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斗争所持的态度。自从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会晤戴高乐时承认了法属殖民地全体人民都应服从戴高乐的领导之后，法共的政策一直是要求殖民地继续留在法兰西联盟之内，但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形式上的独立。在这点上，法共只不过重新采取了它在“人民阵线”时期所奉行过的政策。多列士向党的十大（1945年6月）的报告中，把党的这部分政策表述如下：“要创造条件，在殖民地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和兄弟情谊的自由的联盟”。党维护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有分离的权利并不等于非分离不可”。

这样的殖民政策，是范科尔和其他在斯图加特会议上鼓吹“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第二国际领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的。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党同1947年以来法国历届政府镇压殖民地的所有勾当都牵连在一起了。在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区发生了使成千入丧生的野蛮镇压之后，<sup>(38)</sup>共产党部长们仍然留在政府里，多列士在这次屠杀一个月之后召开的“十大”上，发表了这样

一个声明：

我们讲民主，不能忘记民主的要求之一就是**对殖民地人民采取一种胸襟更加广阔、兼容并蓄的态度**。如同在阿尔说过的一样，我们说我们必须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合法要求，首先是为了这些苦难的人民的利益，其次也为了法兰西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经过上月的惨痛事件之后，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善食物供应，解除戒严状态，撤换维希政权所任命的官吏，惩办那些供养敌人两年之后又挑起一场绝食斗争的卖国贼。我们必须让那些在法国已不属征召之列的阿尔及利亚士兵们、军士们以及军官们复员，并遣送其回乡。最后，我们必须实施1944年3月7日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扩大实施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命令。

结尾加了这样一句话：“民主的法兰西必须帮助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发展。”如此而已。法共并没有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存在。按照多列士的说法，阿尔及利亚人也象摩洛哥人、突尼斯人一样，在他们“形成”民族国家之前，都应该继续留在法兰西联盟之内。“我们曾不断地指出，北非各族人民的利益在于同法国人民结成联盟”（只要想想这个声明是紧接在上面引述的“分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分离的义务”这番话之后发表的，它的含义就更加清楚了）。多列士对不久前镇压叙利亚和黎巴嫩要求独立的人民的行为也表示了遗憾。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利的，但是提醒他们应该注意党对分离问题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列士谈起在这些国家进行镇压时说，“我们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我国在近东的传统威望和利益所遭到的打击。”（39）

接着，1946年末，又出现了越南问题。当法国军队事实上在南越恢复了殖民政权之后（法共对此根本没有组织过抗议行动），法国舰队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发动了对越南人民的殖民战争。法共对此仍然无动于衷，甚至有一段时间——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不知是否应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越南捣乱分子”。不管怎样，反对越南人民的殖民战争居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了六个月

之久，因为推行这场战争政府包括有五名共产党部长，其中之一，就是担任内阁会议副主席的党的总书记。从1947年1月以后的四个月中，担任这个政府的国防部长的也正是一位共产党人。当三月份国民议会就为殖民战争提供军事信贷案投票时，法共的议会党团虽然进行了抵制，但法共部长们为了保持“政府团结”，却投票赞成，他们批准了给政府新任命的就地指导战争的高级专员的指示。<sup>〔40〕</sup>按雅克·福韦的说法，杜克洛为了替保持“内阁会议团结”辩护，使用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他说，四大国（苏、美、英、法）会议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了，“我们的外长将在那里保卫法国的事业”。<sup>〔41〕</sup>至于越南的事业，无妨稍等一等。

四大国会议开会期间，法国军队又用两年前在君士坦丁区使用过的方法，镇压了马达加斯加的起义。<sup>〔42〕</sup>党仅仅提了几次形式上的抗议、并不过要求尊重被监禁的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议会豁免权而已。当时主要问题是要保持“内阁会议团结”，因为皮杜尔要在莫斯科会议上维护“法国的事业”，就必须能够代表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讲话，马达加斯加的事业，象越南的事业一样，也无妨等一等。

多列士和杜克洛如此珍视的“法国的事业”，在这里是具有十分明确的内容的，那就是战胜的法国对战败的德国所提出的要求。法共在和法国资产阶级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而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却十分僵硬。多列士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基于以下“原则”：“德意志民族应为他们追随希特勒进行灭绝其他民族的战争而承担重大责任……它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它必须付出代价”。

可是，其他“重大责任”，似乎都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例如：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容忍凡尔赛和约和那些导致慕尼黑事件的政策的责任；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奉行促成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的政策的责任；斯大林奉行贻误1936年改变欧洲事态进程的伟大时机，使西班牙共和国归于失败的政策的责任，等等。

此时此刻多列士正焦虑不安，因为凡尔赛和约错误地提出向德国人索取现金赔偿，而当时如果要求“以实物，首先以德国劳动力

作赔偿”的话，就会有效得多。法共要求把鲁尔国际化，把萨尔纳入法国经济。鲁尔的煤应该用来帮助法国经济的重建工作。这一切都应该用“对德国的长期占领”来保证。当然，我们也无须言过其实。多列士的爱国主义是很现实的。他解释说：“我们并不反对德国发展某些重工业。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知道不可能把德国降到原始部落的水平，但我们需要得到某种保证”。可是，另一方面，多列士始终坚持使用德国劳动力，毫无灵活余地。还在他巡视北方矿区时，他就建议要让德国战俘干更多的活。1946年12月15日《每日邮报》发表的他接见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尖锐地批评了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英国人对德国人一味心慈手软，不肯叫他们干活”。〔43〕

多列士公开与斯大林的意见发生分歧了，这是他担任总书记以来还未出现过的事。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既与法国国内的革命斗争问题无关，也不是因法共对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任意摆布欧洲各国人民的命运，擅自决定法国应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种横蛮的方式感到震惊引起的。原来分歧发生在鲁尔问题上。在上述接见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多列士公开承认了这点：“我们的苏联朋友说，‘鲁尔应由盟国共管’，我们说‘鲁尔应实行国际化’，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折衷方案。”

这场争论在几个月之前的另一次四大国会议上就已经爆发了。莫洛托夫在会上坚决反对肢解德国和把萨尔置于法国管辖之下。但法共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赢得了莱昂·布吕姆不无讽刺的赞扬：“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十分正当地利用了这次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确实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货真价实的，牢固可靠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如此根深蒂固，甚至经得起这次爆炸性的冲击”。〔44〕其实法共和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在防止德帝国主义复活的方法上有些意见不一致而已，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使在方法问题上，这两种立场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同对待这个问题所应持的国际主义

的革命的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儿子毕竟在涉及民族利益的领域中第一次向老子闹独立性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是丝毫也不会削弱的。这种初露头角的法国“共产”民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的苏联“共产”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小的冲突种子，很快就被远为重要的争论所淹没了。

事情的真相是，“大同盟”实际上已不存在了。美帝国主义已经坚决地着手建立它对全球的统治。它给欧洲资产阶级撒下了美元的甘露，以换取他们的屈从。它还向他们提供了军事保护——当时它是原子弹的唯一拥有者——以防范“赤祸”。所以，当多列士和杜克洛正在作出慷慨的让步——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什么样的让步——以保持“内阁会议团结”，俾使皮杜尔能在“举国团结一致”的支持下去“保卫法国的事业”的时候，法国的这位外交部长却已和贝文、马歇尔就鲁尔煤的问题单独签订了一项协议。为了报答名叫“马歇尔计划”的救命甘露，法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对德国的要求”，并且坚决地投入美国集团的怀抱。但是，美国在慷慨解囊之前坚持要把所有共产党人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中都撵出去。

这件事情干得相当干净利落，没有遇到严重困难。各国使用了不同的借口为执行新主子的命令打掩护，但结果看来倒是相同的。

3月19日，斯巴克组成了一个不要比共参加的政府，5月5日，拉马第把法共撵走，同月30日，加斯佩里改组了他的政府，不要意共参加。

在法国，所用的借口是雷诺工厂的大罢工，当法国总工会和法共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法兰西的伟大”，一连三年推行“生产战”和反罢工政策之后，到这三年的末尾，落得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党和共产党部长们占多数的政府实行工资冻结。这样，工人人们的意识中就不免滋长了这样一种想法：难道他们不可以自己起来干？总工会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其办法是赶紧在1947年3月提出一系列不大的要求，但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劝阻别人不要采取行动。4月25日，雷诺厂的工人们就参加了显然由托派分子

发动的并立即得到社会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会员们支持的大罢工。在政府内部，法共被指责为罢工的煽动者，拉马第向国民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信任问题。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以及尚未参加罢工的工人们不断增长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法共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赞成延长冻结工资，否则就会严重损害它在工人中的信誉，也会进一步削弱已经卷入雷诺厂罢工的法共左翼的地位。正如拉马第想趁此机会以国内压力为借口来执行主子的命令一样，法共也不愿失去这次可以一举两得的良机。一方面它希望在政府中造成一次危机，因为这个政府正向屈从美国政策方面迈出了危险的一步（法共领导认为它的态度将带来一次政府危机）；另一方面，它想刷新一下作为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的形象。

第一个计划落空了。拉马第不过改组了一下他的政府，把法共部长们排除出去就完事了（这就证实了基本问题不是国内政策而是对外政策问题）。但是，法共尽管投票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却并不打算发动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在议会里，杜克洛反而使拉马第消除了对延长罢工的恐惧，他说：“现在只有傻瓜才谈论总罢工”。<sup>〔45〕</sup>法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起劲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政府党”。它仍然认为皮杜尔、贝文、马歇尔关于鲁尔煤的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危险的但并非不可挽回的插曲。甚至到6月下旬莫斯科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后，法共领导还死抱住“大同盟”将会继续下去这个幻想不放。当初亏得这个“大同盟”的赐福，它才当了将近三年的“政府党”。一直到九月底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时，法共还没有认识到已经到了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多列士当时总是不惮其烦地重复法共近三年来一直在抛出来的证据，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党”。他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其他共和党派小看了它的功绩。下面这段话是1947年6月8日说的，可作为例证：

如果战前的总生产指数为100，则1944年为35，1946年底为90。第一次大战后的情况又怎样呢？1919年的生产指数比这

低得多，仅为57，1920年为62，1921年为55，1922年为78，1923年达88。换句话说，多亏工人阶级的努力，国家在两年之内就已经恢复过来了，而在上次大战后，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结果，虽然那时困难要少些。

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敢于把应该说的话告诉了工人阶级。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可是，当我们在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谈论团结的时候，现任劳工部长却说：“团结起来生产煤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吗？”

但是，在1914—18年大战之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与大战前比较，1921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为337，而工资指数为472。这就是说，工资的购买力增长了40%。这种趋势直到1925年金融危机时才发生转变。而今天的情况又怎样呢？1944年10月，物价指数上升到291，工资指数上升到321，而1946年10月物价指数达到了851，工资指数只达到417。这就是说，与战前1937年相比，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已降低了50%。<sup>〔46〕</sup>

换句话说，法共从1944年到1947年在政府里努力进行合作所收到的效果，比1919—21年天蓝色内阁反动政府所干的还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而不利于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sup>〔47〕</sup>只要你想一想工人阶级在1919—21年曾进行多么勇猛的斗争，包括罢工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在1944—46年，却多么温顺地接受了法共灌输的那些反对罢工和努力增产的口号，你就不会对这个鲜明的对比感到奇怪了。法国资产阶级真是大大冤枉了法共。不难理解，年高德劭的加香为什么在法共十一大（1947年6月）提到多列士时要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到底发了什么疯，竟把这样一位政治家撵走？”<sup>〔48〕</sup>确实，只有对欧洲事务一窍不通的美国政客以及对美国政客百依百顺的法国政客才会这样“发疯”。

## 失败了革命（意大利）

就党的总路线而言，意共在抵抗时期、解放时期和战后最初年代所奉行的政策与法共并无重大区别。这是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向各国共产党部署的、并在共产国际最终被解散一事上反映出来的这样一条路线的意大利翻版。当然意共与法共在实施这条路线方面，存在一些重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部分是由于意大利现存问题的客观性质，部分是由于意共及其领导集团的某些特殊风格所决定的。

意共对莫斯科必然也要服从，但从来就不象多列士领导下的法共那样百依百顺。意共是葛兰西和波尔迪加的党，这两位领导人尽管政治见解不同，但他们能团结一致，为在莫斯科中心面前保持该党的个性和自主权而斗争。即使陶里亚蒂把意共拉入了共产国际体系，这个传统，特别是葛兰西的影响，从来没有被磨灭。陶里亚蒂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和复杂的个性，难于适应斯大林的模式。多亏他又具有善于周旋协调和施展谋略的高超个人禀赋，并且凭借他在共产国际中身居的要职，他才能成功地在服从苏联领导、满足（如他所见的）意大利形势需要这二者之间保持难以保持的平衡。在我们所考察的这段时期内，由于斯大林的伟大战略和陶里亚蒂对意大利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协调一致，所以，保持这种平衡还比较容易一些。分歧是后来发生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内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和谐”现象。

苏德条约的签订和意共对共产国际立场的赞同，使它付出了代价，和社会党之间的工作协议告吹了。不过，这对意共的政策和意大利国内局势的影响，比之法共所受的影响要小些。意共已经在几年之前使自己适应于地下工作的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暂时还没有面临德国侵略的问题。在国内政策方面，它的路线一直保持着连续性。法西斯政府就是它的“维希”政府，而党的活动一直是强烈地反法西斯的。当意大利于1940年6月参战时，党指控墨索



里尼政府“把人民出卖给德帝国主义”。1941年5月，党的另一个文件猛烈地抨击德帝国主义，并宣称英国和法国都不是意大利的威胁。党号召废除同德国缔结的条约，要求一切德国军队从意大利撤走。<sup>〔49〕</sup>这就可以看出，意共在对待以德帝国主义为一方和以盟国为另一方的态度上，和同时期法共的态度是不同的。

### 萨莱诺大转弯

苏联的参战，使意共得以迅速恢复它同社会党采取一致行动的协议（1941年10月），并且进而与反法西斯的“正义和自由”团（它不久就改名为行动党）达成同样的协议。1942年这一年，反法西斯的斗争主要在北意大利发展起来。1943年春，都灵的工人首先发难，掀起了强大的罢工浪潮，一直伸展到米兰和热那亚，参加人数超过十万人。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溃败，英、美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以及北部意大利的大罢工，使意大利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清楚地看到，已经到了必须干掉墨索里尼转向盟国寻求庇护的时候了。自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想先发制人，阻止以革命的方法来解决政权危机。所以，巴多利奥政府一上台就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在一份政府通告中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任何群众运动一露头就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军队要以战斗队形行进，就象面临敌人一样，不必发出警告，就可以用臼炮野战炮在一定距离之外开火。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空射击，而要象实战中一样对人射击。无论什么地方发生暴力行为，哪怕是孤立的行为，肇事者都必须立即就地处决。<sup>〔50〕</sup>

但是独裁者的倒台已经扫除了对群众运动的最后约束。一些反法西斯政党公开活动了。官办的工会转到了各地刚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联合委员会所任命的特派员手中，支持释放政治犯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工厂里选出了工人委员会，这是墨索里尼倒台后在意大利最初出现的一种民选团体。

这时，德国在意大利除已驻有七个师外，又赶紧调来18个师，

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而巴多利奥政府却未采取任何防御措施。看来，国王和这位元帅，以及意大利资产阶级阔老们，都希望能够摆脱战争，以便专心致志地用法西斯国家机器来对付国内敌人。他们满以为，不论德国和盟国，都同样关心避免“赤祸”，所以它们大概都会同意采取这一行动。<sup>(51)</sup>但德国人的反应却摧毁了这种希望。巴多利奥政府别无他法，只得逃往南部去寻求盟军的庇护，让德国人去摧毁北部和中部的反法西斯运动。同年9月9日，在宣布同盟国秘密订立的停战协定之后，国王和皇室，以及这位元帅与一大群显要的将军们和大官们组成的扈从队伍，没有作出任何抵御侵略者的安排就匆匆逃离罗马。一个月以后，巴多利奥才对德宣战，他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压力之下，于10月13日采取这一步骤的。意大利便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德军占领区，它直到1944年春季还包括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而到同年夏季，就被压缩到北部一隅去了。另一个是盟军占领区，它的情况恰恰相反，6月初攻占罗马时，它只包括南部地区（前线就紧靠那不勒斯以北），到夏季却开始向中部推进了。

1943年11月以后，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在北部地区开始显出其重要性。皮埃蒙特、伦巴第、利古里亚、托斯卡纳等地都爆发了严重的罢工。在北方意共领导机关的倡议之下，在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包括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和行动党在内）的支持之下，于1944年3月举行了一次席卷整个德占区的总罢工。共产党和社会党发出了联合呼吁书。约一百多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是第二次大战期间在欧洲德占区发生的同类罢工中最重要的一次。都灵的罢工坚持达一个月之久。在开展罢工运动和其它形式的群众斗争的同时，游击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44年夏季，加入各种战斗部队的已有十万人左右。隆哥对北意大利的局势曾作这样的描述：

群众运动已达到如此的规模，许多地区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政权，一方面是法西斯当局，它越来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

反法西斯的行政机关，它是非法建立的，但深得民心。除了这些存在双重政权的地区外，在整个纳粹占领时期，北意大利还有一些地区已完全从德、意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这些地区在游击武装保护下举行了自由选举，产生出民主团体来进行治理。<sup>〔52〕</sup>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前者更占大多数——是控制这个强大运动的核心力量，运动的主力是意大利工业地区的工人阶级，他们的革命精神受到许多非共产党历史学家和事件参与者的称赞。<sup>〔53〕</sup>但是，当这种人民政权在北部工业区开始形成的时候，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新的政权机构也正在南部农业区酝酿筹建之中。

墨索里尼倒台后不久，左翼领袖们曾试图同巴多利奥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以便组织抗击德国占领的共同斗争。但是，国王和元帅跟纳粹明显有勾结，元帅又执行反人民的镇压政策，因此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在放弃罗马之后，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各派反法西斯力量并愿意进行抗击德军的顽强斗争的政府，已成为当务之急。

此时，“三强”已给予巴多利奥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他们1943年10月底发表的《关于意大利的声明》中，泛泛说了几句关于意大利政治制度应该民主化的话之后，就明确地提议要让“一直反对法西斯的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们”参加政府。《真理报》11月12日发表陶里亚蒂的文章（他当时还在苏联，到1944年2月底才动身回国，3月7日抵达那不勒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声明所提出的措施，完全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些措施构成了一个纲领，我国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必须围绕这个纲领团结起来以争取其迅速实现。”<sup>〔54〕</sup>无须指出，由丘吉尔、罗斯福的代表们所签署的这个“纲领”，其要害就是要在意大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各反法西斯政党认为巴多利奥政府是法西斯余孽，这是有道理的。“纲领”却要求这些政党同巴多利奥政府妥协，以开始国家的重建工作。

陶里亚蒂的立场，是紧密遵循“三强”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所

达成的安排的，它明显地不同于国内意共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1943年10月，意大利德占区党的领导机关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有这样的一段话：

工人阶级在目前事态中所担负的使命的职责，是要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以便通过这场斗争在意大利人民中赢得威信，使自己成为创建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力量。这就是党的方针。

文件中提到应该注意避免两个错误。一个是把抵抗运动的目标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陷入“极端主义幼稚病”。

但是，另一个更为严重得多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方面的错误，即低估有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的力量综合体中的政治领导权的重要性，轻易接受巴多利奥和王室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利用被人误解的团结的名义而提出的要求。可以允许这些代表在反对法西斯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担任配角，但决不能让他们担任主角。<sup>〔55〕</sup>

同年12月，莫斯科电台早已广播了陶里亚蒂的立场，这个党内文件居然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党的秘密刊物上，这件事是耐人寻味的。这个时期中社会党的政策决不比意共右。甚至行动党都宣称抵抗运动的目标不限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sup>〔56〕</sup>

在意大利南部，意共、社会党和行动党领导了一场强大的反对国王和元帅的运动。1944年元月底，在巴里召开了各反法西斯党派的联合代表大会，并有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在1943年9月国王和巴多利奥逃跑之后在罗马成立的，它的地下总部设在罗马，直至解放。但它的实际活动是非常有限的）。<sup>〔57〕</sup>行动党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得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支持，也得到“民解”代表的支持。这些措施包括：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建议把这次代表大会建成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议会，直到选出立宪会议为止，并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同联合国联系。可是，自由党人在本·克罗齐的领导之下，巧妙地玩弄手

腕。这位哲学家虽然也承认国王是“法西斯余孽的代表”，但强调行动党的建议只有采取暴力行动才能实施，而在有盟军驻在国内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向国王施加压力，迫使他退位。代表大会犹豫了，最后只是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却没有把自己建成一个全国性的议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发动人民群众。

不过，左翼政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丘吉尔2月22日发表演说，其中嘲笑了巴里代表大会反对王室和巴多利奥的决议。为了回敬，那不勒斯工人号召举行罢工。由于军事当局的反对，后改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只有左翼政党代表发言。大会是3月12日召开的。到14日，即反政府的激烈情绪达到最高潮时，巴多利奥突然宣布他的政府已得到苏联承认，并已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当时西方盟国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步骤）。

这就是陶里亚蒂3月27日抵达那不勒斯时的形势概况。他抵达后就准备实施“三强”对意大利的政策。他对于左翼反法西斯政党，特别是他自己的党所奉行的政策苛刻地评价了一番。这是不足为怪的。许多年之后，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说：当时意共走得太远了，甚至“组织反丘吉尔的集会，并和其它反法西斯政党一道商讨不经政府倡议而由各政党倡议组织一次人民协商会议的可能性”，这样，它就走进了“一条危险的死胡同”。<sup>〔58〕</sup>多亏陶里亚蒂一转瞬间就扭转乾坤，把党从这种难以自拔的被动局面中拯救出来，并把它领上了一条通向成功与民族团结的康庄大道。3月29日南部地区党的领导人开会，陶里亚蒂“挺身而出”，提议“暂且推迟有关政体问题的讨论，等到将来有可能召开立宪会议时再说。当前应当优先考虑的是各派政治力量要团结一致对德作战，也就是说，应立即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同一篇传记中还说：“起初大多数与会者都惊愕失措”，但陶里亚蒂“对他的提议作了如此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解释，以致大家都无法反对了”。<sup>〔59〕</sup>根据其它资料，当时有些老的领导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不过陶里亚蒂除了他非凡

的辩才之外，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威望支持着他。他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谁比斯大林更了解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所在呢？如果说苏联竟然承认了巴多利奥政府，那无疑是我们的事业要求这样做。<sup>〔60〕</sup>

意共政策的大转弯——后来意共历史上称为“萨莱诺大转弯”——使它终于能克服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抵制。国王维克多·爱墨虞限三世屈服于克罗齐和罗斯福的压力，作出了“牺牲”。罗马一解放他就宣布打算退位，并指定他的儿子温伯托担任摄政王。于是，妥协就更加容易了。但事实证明，民族团结政府仍然是十分难产的。在最后一刻，整个行动险些毁在自由党和行动党手里。幸亏陶里亚蒂“在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利扎迪、天主教民主党人罗迪诺和耶沃林诺的支持下，领导了一场反击；而为了找到解决这种局势的办法，陶里亚蒂不得不同意亲自参加这个政府”。耶沃林诺后来说，当然，如果没有提出宗教问题来的话，他本人也可能成了一个共产党人，他很欢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接受部长职位时表现的那种牺牲精神。他当时对陶里亚蒂说：“如果你拒绝参加政府，人们就会说，你把这个政府看作是一群傻瓜组成的政府，所以你才不愿参加”。<sup>〔61〕</sup>他这番话是否指当时反法西斯领导人所热心担任的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还不太清楚。不过，这些领导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谴责国王和巴多利奥是法西斯余孽，还在谴责他们暗中破坏抗德战争，而现在居然同意在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之下，当国王的大臣，所用的名义则是要进行“战争的努力”来抗击侵略者和铲除法西斯的最后残余。那么，人们要求导演这个政治行动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看作是本阶级的代表和苏联的代表的人物，用他自己参加政府的行动来保证这个新政府确实是真诚地抱着民主和反法西斯宗旨的政府（新政府向国王集体宣誓后即将就职），是不为过分的。

受党的官方观点影响的意共文件和历史记载，把巴多利奥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说成基本上是意大利自己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陶里亚蒂指导的行动。但实际上，这是“三强”采取的行动，

而且，据苏联的消息，这个主意的提出应该归功于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说得很清楚：“苏联于3月11日与意大利政府建立了直接关系，由于苏联的倡议，巴多利奥政府于1944年4月22日改组，以便接纳反法西斯联盟的六个政党的代表”。〔62〕

从苏联的观点看，这个倡议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苏联的代表参加了意大利谘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在三强外长莫斯科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真正掌握权力的却是盟国军事委员会（其中无苏联代表）。在外交上承认巴多利奥，就可以使苏联获得直接干预的机会。而巴多利奥政府经过“改组”，共产党人入阁，更增加了这种机会。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不是要叫意共采取一种能用革命办法解决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的战略，因为一旦斯大林看清楚意大利将会被盟军“解放”，他就立即把这种解决办法一笔勾销了。问题是怎样在意大利棋盘上摆上几个能遏制盟国影响的卒子（在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上，意共受到日丹诺夫的严厉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对墨索里尼倒台后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运动缺乏一种全力支持的革命政策，而是由于他们未能阻止意大利加入美国集团）。当然，斯大林的这个改组巴多利奥政府的“倡议”如果得不到英美的同意，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只要想起，当时斯大林为了取悦于丘吉尔和罗斯福正在压铁托与彼得国王达成 *modus vivendi*（妥协），那么，丘吉尔和罗斯福之所以压爱默虞限国王与陶里亚蒂也达成这样的妥协，就不足为奇了。〔63〕双方玩的是同样的把戏。

### 由民族团结到天主教民主党的垄断

“民族团结”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共产党赢得了“革命党”和“秩序党”双重威望的光荣，开始迅速发展。但旧的统治阶级中的新生政治力量也同样迅速地，甚至更加迅速地开始组织起来。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可以充分利用左翼政党所提供的庄严的保证，这个保证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即

宗教麻醉剂，同人们向往自由和民主的清新的愿望，甚至还同社会主义（当然是天主教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新生政治力量迅速发展，不断吸收法西斯余孽、旧的和富有经验的文职官厅阶层、更旧的和更富有经验的教会官厅阶层、旧的国家武装力量，等等。这无疑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发展，因为民族团结的阳光，即 *secondo risorgimento*（第二次复兴）的阳光正普照着所有的意大利人，不问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如何。（只有法西斯分子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他们是罪有应得的，但只要他们乔装打扮一番，也仍然可以重新混进来。）

在罗马解放之后，民族团结政府由博诺米代替了巴多利奥担任政府首脑，借此表白一下它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精神。博诺米青年时代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1911年因持过激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被开除出社会党，1921年他在为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几届政府中，曾担任过一届政府领袖。在陶里亚蒂自己修订过的传记中，对博诺米有过这样一段赞美的话：

时间尽管过去了这么久，在他身上依然可以看到过去时期的痕迹，他当年曾经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深知其中的问题和成功所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他旧时改良的可能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情陶里亚蒂，以及他们二人之间为什么既保持极良好的关系同时又经常发生严重分歧的根源。他的主要过失就在于他过分关心旧的国家机器的命运和过分注重政府的外表形式。<sup>〔64〕</sup>

博诺米确实对旧的国家机器关怀备至，他有计划地用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建造成一个“崭新的”结构。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则漠不关心。他认为工人的职责就是发扬民族团结精神，克己禁欲，支持“战争的努力”。等到一旦敌人被打败了，炮声停息了，选民们说话了，那么，各个政党理所当然地写入其纲领并给以显著地位的 *rinnovamento sociale*（社会革新）目标就会得到



实现。正如陶里亚蒂在回国后第一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工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要做俄国人做过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要打败希特勒德国。而为了胜利地实现这个为陶里亚蒂奉为当时“一切革命任务中最革命的任务”，“我们就必须在盟军的后方保证维持秩序和纪律。”基本的社会问题将在召开立宪会议时研究。至于目前，党已经有了一个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其它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纲领，这些改革只要在“新民主主义”之下认真予以贯彻执行，就可以防止“一小撮贪婪、自私、腐化的人再次把国家的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并用这些财富来压制自由和推行违背民族利益的政策。”陶里亚蒂曾回敬那些指责党“放弃了革命”的人们说：“别来干扰我们吧！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总比你们懂得多一点”。〔65〕当然，要在这方面教训这位曾经是“世界革命党”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人物，未免太不自量了。

应该公平地强调指出，党确实呼吁过要立即采取措施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境况和制止猖獗的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使少数人大发横财而使埋头干活和打仗的人深受其害。但是，主要的投机商正如陶里亚蒂所指出的那样，却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大资本主义的势力，工业家、银行家、地主的庞大组织，都安然无恙。他们未曾遭到法西斯的破坏，他们正在试图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引到这样一个方向去：即不遵循民族团结的精神来为工人阶级服务，而是牺牲人民和民族来增进有产阶级的利益。〔66〕

在国家处于经济崩溃和混乱的情况下，要改善群众的生活境况，就只有对那些缺乏“民族团结精神”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坚决予以打击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正是民族团结政策所不允许做的事。当时职工会迅猛发展，南部出现了强大的农民运动，共产党、社会党和整个反法西斯左派正在日益发展壮大起来。但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就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不得超越某种界限，否则“政府的团结”——还有各阶级的团结——将受到威胁。因此，早在1944年底人民对博诺米政

府的希望显然就已经破灭了。

巴塔利亚和加里塔诺合著的《意大利抵抗运动史》对意共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正确性从未提出过怀疑，但它却记录了大量的事实。该书指出：“在新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中，他们用来诱骗游击队员和广大群众放弃抵抗斗争的论据之一，就是人们对‘哥特线’以南刚刚建立的政府的希望破灭了。”（人们把紧靠佛罗伦萨北面的亚平宁战线叫做“哥特线”，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一直保持稳定。

“新法西斯分子的宣传”系指德占区的墨索里尼傀儡政府“萨洛共和国”的宣传。）该书继续说：

希望之所以破灭，主要是由于政府未能实现意大利人民除旧布新的愿望。博诺米政府应该是一个由“民解”和反法西斯党派组成的政府，用以取代忠于国王的将军们所组成的巴多利奥政府。不过，这些将军们，虽然是出于战败的激愤之情，还是很乐意为抗德的军事努力作出贡献的。但他们在罗马的影响被那些老资格的国家机关官仔们和法西斯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所代替，这些人正在破坏“民解”的团结，并破坏这个政府本身，他们使政府的民主行动陷于瘫痪。<sup>〔67〕</sup>

其实，使政府的“民主行动”陷于瘫痪的，并非全是那些老资格的国家机关官仔们和法西斯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的影响。主要因素是聚集在天主教民主党背后的那些统治阶级。他们得到教会和盟军的整套行政机构的支持，自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加强他们对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政治控制，把广大群众置于更大的压力之下，使之无所作为，这样就可以预防在抵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那股强大的人民力量在北意大利一旦解放时走上政治舞台。

同年11月，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向共产党发起了猛烈攻击，指控它煽动“暴力行动”、“骚乱”和“无政府状态”。<sup>〔68〕</sup>博诺米提出了辞呈。经过一场困难的政府危机之后，第二届博诺米政府组成了。新政府继续执行前政府的政策，但取得的成效更加微小。社会党和行动党都拒绝参加新政府，共产党则同意和自由党、天主教民主党

一道参加。陶里亚蒂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按照他自己传记中的说法，这主要是个荣誉的和象征性的职位。但他认为，这样来解决这场危机是民族团结政策的胜利。他说，人们要了解这一点，只须记住一个事实就够了：制造这场危机的目的，是想组成一个没有“民解”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可是新政府的全部成员没有一个不是来自这些党派的。

他们（反民主的力量）在他们试图发动的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彻底的惨败，而我们则在这个战役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民解”各党派，特别是其中最先进的政党，如果听任别人把自己从政府中撵出去，其结果就会把我们已经赢得的罕有的胜利成果拱手让给别人，就会把新的国家机构交付给保守的反动的势力执掌。

遵循这一方针，“我们仍然忠实地奉行战争、民族团结和建设性民主行动的路线，这条路线将决定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本身的命运。”〔69〕

反民主的势力，如陶里亚蒂在此处描述的那样，是“一些怕见天日的隐蔽的势力”。当然，他们总是披着盟友、神职人员、自由党人、天主教民主党人、国家公务人员（包括文职官僚阶层、武装部队、警察）的外衣露面。他们在这个时期所使用的战术并不是要把工人阶级政党从政府中排挤出去。他们是有这点聪明的，他们懂得如果能有陶里亚蒂这样一位人物，以“荣誉和象征性”的身份在部长们中间出现，就会给予他们一个欺骗人民的绝妙的借口，凭着这个借口就可以继续加强他们在所有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中的地位。他们丝毫也不希望反法西斯政党“抛弃”博诺米如此小心翼翼地维护其完整的国家机构。（博诺米的部长们——也可以说是左翼部长们，因为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都以同样的宗教虔诚对待这个不可动摇的国家机构，尽管他们正在用一些本质上毫无区别的新的成员来使这个机构“恢复活力”——这些左翼部长们因此要么就向这个国家机器的死板的保守倾向让步，要么就让政府的团

结遭到危害，而这种团结乃是神圣的民族团结大厦的基石。）保守的反动的势力的利益所在，正好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党在国家恢复足够的力量，渡过危险的政治危机之前，千万别抛弃这个仍然是属于他们的“新国家”，因此，第一届博诺米政府之所以发生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工人阶级政党和反法西斯左翼必须严格尊重在萨莱诺签订的民族团结的协议才行。但这是一件不好办的事，因为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自发的主动行动，一直是倾向于破坏这个协议的。

需要陶里亚蒂施展出纵横捭阖的全部本领，需要他口若悬河地向意共和意大利人民作出充满辩证法的辩解，需要他利用在政界上层长期活动的全部经验，特别是意共的全部革命威信——它的反改良主义的全部纯洁性——，才能够在满足政府的团结要求（特别是向盟国当局屈服的要求）与巩固同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天主教民主党领导人对意共进行的恶毒攻击，诚如陶里亚蒂传记中所说的，显然是“极大的污蔑”。他们把煽动“暴力行动”、“骚乱”与“无政府状态”等等罪名加给一个经常向人们宣讲必须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党，一个在意大利人民中广泛传布对盟国的信仰，使人深信盟国具有争取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的党，一个在工人群众中努力唤起民族使命感，而且一再阐明这种使命不可与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相混淆的党——把这样的罪名加给这样的党，不仅是“极大的污蔑”，而且看来也实在毫无意义。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并无意要冒犯它的盟友，只不过想要它的盟友对人民群众进一步施加约束而已。譬如说，地方和省一级的解放委员会就已经表现出一种令人焦虑的倾向，急于要扩大他们的权力，事先不和政府商量就采取主动行动，总之，是要创立一种双重政权的局面。但这样做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而不是大家同意的应该在意大利遵循的道路。这种倾向随着北意大利解放时刻的临近而显得日益危险，因为北意大利有一支游击

军，那里的解放委员会和工人政党的力量也非同小可。意共在这次政府危机发生前不久，曾阐明它对解放委员会的立场：

不应该象某些当权者那样动辄把民族解放委员会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应该承认和扩大它的职能。我们应该避免任何双重政权，但必须保证一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力量积极参加到国家需要的有组织的努力中去。〔70〕

天主教民主党对意共的攻击和政府危机的爆发，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在意大利政局的发展过程中，把导致“双重政权”的倾向坚决遏制住，把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加”严格限制在政府划定的框框之内。陶里亚蒂在解决政府危机后立即高唱胜利赞歌，可是，他不久之后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次政府危机的事态意味着争取新型民主的运动受到了一次挫折，而这种新型民主乃是继续进行战争和保持民族团结所必须的”。〔71〕

党为了能够在政府中继续呆下去而作出的政治让步，并不限于在哥特线以南的地区，在哥特线以北地区甚至作出了更加重大的让步。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意大利统治阶级和盟国最担心的事就是德国溃败后在北方可能爆发革命。

第一个旨在摧毁游击运动的行动，就是1944年秋季盟军停止前进，使德国人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得以在整个冬季放手去攻打抵抗运动。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命令游击队在开春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把武器埋藏起来，专心收听盟军总部的无线电广播就行了（这个命令在电台广播多次，德军司令部了解得一清二楚）。〔72〕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简称“北民解”）和游击队总参谋部决定不理睬亚历山大的命令，继续进行战斗。不过，“北民解”还是遵循民族团结的路线行事的（北意大利的意共领导机关已经接受了“萨莱诺大转弯”，尽管社会党和行动党试图在“北民解”内部加以反对，但意共、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态度占了优势）。〔73〕为了与盟军司令部和博诺米政府达成协议，“北民解”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首都，并于12月7日签署了一个叫做“罗马议定书”的文

件。游击队承担了如下义务：在战争的指挥上服从英、美的指示，同意任命一位盟军“秘密军官”担任游击队的军事指挥官，全国解放前，游击队必须执行他的指示。前面引述过的《意大利抵抗运动史》对这件事是这样说的：

解放运动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看来好象被迫作出了重大让步；其实，盟军只不过得到了游击运动“不会发动一场革命”的确实承诺，这场革命显然一直使他们忐忑不安。

这本书的作者继续写道：

其实，这不是盟军的胜利，而是意大利人民的胜利。“北民解”已经看到自己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北意大利的政府。……由于盟军的承认，博诺米也跟着承认“北民解”是自己在德占区的“代表”，于是在两个意大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局势是那些在南意大利已经组织起来的敌视抵抗运动的势力迄今力图加以阻止的。<sup>〔74〕</sup>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民主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民族团结这个强有力的原则的支持之下，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在“彻底击败”那些企图把他们排挤出政府的反民主力量之后，现在只凭“简单地确认”一下他们并无意发动革命这件事，就成功地使自己被承认为北方的“合法政府”。盟军和博诺米政府慷慨地允许他们在攻打德国人和墨索里尼支持者的战斗中行使其“合法政府”的权力，反过来，盟军又给予后者以充分的自由去摧毁这个“合法政府”和它的英勇的游击部队。

有关各方都在努力忠实地执行这个已经达成的明确的默契。德国军队在新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下，接二连三地向游击队发动攻势，而盟军则小心翼翼地遵守着默认的停战协定一直到来年春季。在哥特线以南，博诺米政府和各个反法西斯政党都按兵不动，不发动群众去反对盟军这种通敌的罪恶勾当。北方的游击队和战斗的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在1944—45年漫长而艰苦的冬季中抗击着法西斯的多次攻势。他们在这场考验中，不仅表明了自己确

实是“合法政府”，而且显示了意大利工业区的真正力量。<sup>〔75〕</sup>到1945年4月中旬，德国实际上已经战败，盟军这才在哥特线上转入攻势。游击队和工人阶级领头发起一场总起义，他们把反对当局的军事行动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在盟军到达之前，就解放了所有的大城市 and 大部分国土。当时担任北意大利抵抗运动和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隆哥，对局势作了如下描述：

在4月初，三十多万名游击队员在北意大利打响了战斗，他们在盟军到达之前，相继解放了博洛尼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热那亚、都灵、米兰、维罗纳、帕多瓦等城市以及整个威尼斯地区。游击队抢救了德寇准备破坏的工业设施和交通线，捕获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夺得了相当数量的武器。游击队所到之处，都建立了行使地方权力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处决了主要的法西斯头子。……盟军和盟国当局达到之前，整整十天时间里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直管理着北意大利的全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警察部队也都由未直接参加对德军作战的游击队所接管。<sup>〔76〕</sup>

就这样，在十天之内，北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已经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和大工业企业。他们拥有三十万名战斗员（这个数字还会迅速增长起来），并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缴获来的武器。在东部边界上，有南斯拉夫军队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在奥地利边界上，则有苏联军队。但同时也还有“罗马议定书”，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还有雅尔塔会议。隆哥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部分结尾是很简略的：

当盟国当局带着军队抵达北方时，马上就开始把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的抵抗运动人员从重要的职位上撤下来，代之以旧政府机关的官吏。而罗马政府一俟盟军把全国管辖权移交给它时，也就迅速地把民族解放委员会委任的负责人员一概撤掉，代之以所谓的“专家”，也就是旧政府机关的官吏。<sup>〔77〕</sup>

有位苏联历史学家对当时发生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叙述：

英、美军事当局在北意大利宣布了战争状态。它废除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切民主的安排，解除了所有受人民信任的行政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反动的官吏。它把没收的财物退还给资本家和地主。占领者还解除了游击纵队的武装，进而着手解散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78〕

不过苏联历史学家的叙述删略了一件事，就是当时意大利谘询委员会中有一位苏联代表参加，而就我所知，苏联人不论在委员会内部或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对“占领者”在北意大利的所作所为提出过任何抗议。这位历史学家也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实：即意共是第一个鼓吹要解除游击队的武装的。陶里亚蒂以后提起过这件事。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45年12月）这样说：“我们大家是根据在党派斗争中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而联合起来的。这个协议要求所有的人都解除武装，我们已和游击部队一道为此目的采取了措施，我们是第一个执行这个协议的”。〔79〕

北意大利的起义激发了人民的热情和希望。当时人们都说“南风”受到了“北风”的抵制——“南风”是指在反法西斯烟幕掩护下的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北风”是指千百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强烈愿望。在1945年这一年中，所有左翼反法西斯政党都已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共产党的党员4月为40万人，12月增加到170万人。社会党到年底已有80万人。行动党代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团体的观点，它的党员也约有25万人。即使是天主教民主党——这个党正如陶里亚蒂所说的，是一个合两党为一的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灵魂”的党——其左翼力量也在日益增长，特别是在青年党员中。把工人阶级内部各个政治派别联合在一起的职工联合会，它的会员已迅速发展到了500多万人。在南方，农民和雇工的强大运动正在继续高涨。北方大工厂企业中建立起来的管理委员会，虽然不再被承认是合法的，但在群众起义的保护之下，仍在发挥其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已作好了战斗的精神准备。〔80〕



尽管政府和盟军对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了多次清洗，并准备加以解散，但这些反法西斯联合组织，仍顽强地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左翼力量在地方和地区一级的组织中占据优势。他们不顾强制其缴械的一切企图，把许多武器收藏下来。他们无疑可以在原来游击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大规模的准军事性质的自卫组织。这完全取决于左翼反法西斯力量的意志。另外，当时国家面临的灾难性经济形势，也从客观上提出了要求——如果经济恢复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就至少应该如此——必须紧急实行激烈的结构改革，无情地打击大工业家、银行家、地主们的利益。这里还有个民族因素。新的占领者的殖民主义行径，也伤害了人们在抗击德国占领者斗争中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

这样，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来考虑，反法西斯的工人阶级左翼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同“反法西斯”右翼（即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的妥协政策决裂，转而采取进攻性战略，其中包括发动千百万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来支持一个先进的、具有社会主义内容的民主制度。“北风”象征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即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卫和加强在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得到4月大起义保护的多种形式的新的民主政权。行动党提出的口号——完成“民解”的革命——反映了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心愿，他们是乐意和工人阶级一道前进，为实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努力的。

1945年6月，在“北风”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是由行动党最显要的领袖、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弗·帕里领导的，而意共领导则甚至对行动党人那种空洞的、稍带社会主义色彩的立场也认为过左了，它继续坚定不移地、一丝不苟地坚持萨莱诺大转弯所提出的民族团结政策。但意共如果不参加，要组成左翼联合政府和转向进攻性的战略，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些党员曾要求再来一次转弯，向左转弯，但他们被扣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按照官方的诊断，他们患了“幼稚

病”，一点也不懂得“力量对比关系”。

可是这个时期和以后的意共文件，根本没有对这种“力量对比关系”进行过分析。意共把那种认定意大利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观点，当作形而上学原理或数学公理加以运用（正如法共对待法国资本主义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党的一切政策都是正确的，这些政策无疑都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精确研究之上的。以后我们还要回头来讨论1944—45年间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力量对比关系”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此刻我们只简单地指出，对于陶里亚蒂领导集团来说，这种“关系”要求他们必须接受两项非接受不可的要求，否则就有给工人阶级和党直接带来灾难之虞。这两项要求，一是继续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右翼保持联合，一是避免与盟国发生冲突。（二者是互为条件的，因为如果与盟国发生冲突，就不可能保持同反法西斯右翼的联合，反之亦然。）

自从意共接受这个格局之时起，它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右翼，使自己陷入一种除了施加一点压力之外无所作为的境地。它曾要求过、坚持过、并提出过建议，但它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来发动当时国内正在酝酿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运动。1945年夏季帕里政府成立后，陶里亚蒂写道：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民主革命，工人阶级要“坚持”发挥领导作用：

工人阶级和工人群众要求有机会使当前的民主改革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同时鉴于旧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破产，他们坚持要求在解决民主革命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方面，而且一般地说，要求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发挥他们的决定性领导作用。这就意味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解放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甚至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就要按照人民的愿望，获得一个解决的开端。这应当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sup>〔81〕</sup>

究竟凭什么魔术般的机制，使工人阶级要求民主改革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和坚持要发挥领导作用的做法会得到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的开端（亦即“工人的经济和

社会解放的开端”)呢?陶里亚蒂在这里或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过这个秘密。但到同年12月,他却说明了当时究竟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们的“坚持”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究竟是怎样实行的。他在党的五大的报告中说:

在政府处于瘫痪的这种制度下,简直是寸步难行,因为每当必须在某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时,左翼政党尽管致力于拟定一个合乎逻辑的民主的纲领,但它们总是遭到恐吓讹诈,迫使它们向政府的颀頽无能屈服,甚至迫使它们接受反民主的措施,以求避免使国家陷于混乱的危机。〔8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陶里亚蒂认为“瘫痪”只不过影响了“合乎逻辑的民主纲领”而已;反民主的措施已付诸实施,而民主的措施不过就是左翼政党作出某些决议和由这些政党的领袖们发表某些讲演而已。面对着恐吓讹诈——以联合政府垮台或盟国干涉相威胁——,意共和其它左翼政党都服服贴贴地听命于右翼的反动政策,并且接受了那些难于划入列宁认为革命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妥协。而按照一般社会危机中表现的逻辑规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坚定地站在群众前头的政党,那么,游移不定的中间集团就会滑到右边去。

帕里政府在12月发生了危机。当工人阶级还在“坚持”要发挥其领导作用的时候,资产阶级——它的新、老阶层已经重新联合起来了——在国内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把加斯佩里推上了政府首脑的宝座。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们所撰写的《意大利生活纪实》对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北风’遭到了决定性的挫折。所有的政治争论都集中到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个问题上。4月起义所造成的社会压力被遏制住了。‘北风’和‘南风’达成了妥协”。〔83〕事实上,当时激动人心的争论主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4月以来政治斗争的中心,但各个政党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把那个问题抛开,而优先来讨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既对统治阶级危险要小得

多，又很可以使南方人产生幻想。在这段时间里，摧毁和消灭各级解放委员会和抵抗运动的行动正在系统地进行着。资产阶级和盟国的真正权力中心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所谓“清洗”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共产党的总书记却以堪称楷模的官场才干在那里大当其司法部长。〔84〕

1946年6月2日，选民们投票决定了实行共和制，同时也批准了天主教民主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萨莱诺会议期间，天主教民主党不过是参加巴多利奥政府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政党——而且远非最有影响的政党。经过两年的“民族团结”，它变成了意大利国内的领导党。在就宪法举行全民投票的同一天，也选举了制宪议会，天主教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800万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二）。相形之下，共产党只获得430万票（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社会党只获得470万票（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八）。这800万张选票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一部分工人。这些社会群众之所以投票支持这样一个由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操纵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看不出这个党在社会目标上与各工人政党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这个党却有一个优点，它能够把这些社会目标同教会和宗教协调起来。按意共某位领导人的说法，天主教民主党在制宪议会选举期间以这样一种面貌出现，即“具有一个符合天主教工人愿望的结构改革的社会纲领，而这个纲领实质上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纲领并无二致”。〔85〕陶里亚蒂在选举结束之后也立即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承认共产党和社会党犯了错误，没有充分地把自己同天主教民主党区别开来。当天主教民主党人四处宣称“他们的经济社会纲领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并无区别”时，左翼的态度“仅仅是要求他们明确宣布一下他们拥护共和制就行了。”〔86〕

但这已不是什么新情况了。自从墨索里尼倒台后，在整个1945年内，强劲的“北风”吹遍全国，而意共出于保持“民族团结”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热切愿望，帮助这个统治阶级的新工具大肆进行

蛊惑人心的宣传。意共把自己的“社会纲领”降低到只要求实行完全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改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斗争来争取这些改革的实现。这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党忽视了进行斗争来确立和扩大抵抗运动中诞生的新的民主政权，而这个政权本来是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开端的。换言之，意共的政策使天主教民主党的“经济和社会纲领”可以不必再接受群众的检验了。

诚然，制宪议会选举突出地表明了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合在一起所代表的广大力量。投票支持他们的百分之四十的选民，包括大多数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但是选举之后，这支力量在政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仍然不过是担任出色的配角，而不是明星。欧洲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位历史学家莫里斯·沃萨尔说得很对：“只要三党执政的政策继续保持下去，陶里亚蒂和南尼尽管有时表现不驯服，但基本上是向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人让步”。<sup>〔87〕</sup>所谓“结构改革”再次被推迟了。据这位作家说，反法西斯政党的领导人在选举之前曾达成协议，同意这次制宪议会的职权仅仅限于草拟和投票通过宪法。他补充说：

总之，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好象从一开始两大群众性政党（意共和天主教民主党）就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要让加斯佩里能够顺利地克服他在解放后一定会碰到的两个主要困难：即投票表决和约和表决宪法。尤其困难的是后一表决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拉特兰条约\*，……加斯佩里得到了意共和他自己的党的支持，在议会中占了多数，批准了和约；他还依靠这个多数，击败了社会党、行动党和许多自由党人的反对，使新宪法的内容里包含规定教会权利的实质性的东西，而这是与拉特兰条约不可分割的。这些权利包括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承认宗

---

\* 拉特兰是教廷宫殿名。这里是指1929年墨索里尼和梵蒂冈在拉特兰签订的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承认罗马教廷为自主国，规定天主教会在意大利享有一系列权利。——译者

教婚姻的法律效力，禁止离婚，保障神职人员的年俸。<sup>〔88〕</sup>

“三强”强加于意大利的苛刻的和约条款，激起了舆论界的普遍愤慨。要不是由于天主教民主党严格听命于英、美，而共产党也同样严格听命于苏联，那么，和约的批准很可能会遇到严重困难。但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就好象果真有瓦萨所说的那种明的或暗的妥协一样。很难相信，意共之所以同意在宪法上承认教会的传统的社会作用，以及天主教民主党之所以同意在宪法的“社会内容”上作出让步，不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而达成的一笔交易。<sup>〔89〕</sup>但这并不妨碍意共希望自己从对教会的让步——这是对意大利人民的宗教感情作出的让步，因而是正当的——中捞到好处，它满以为通过这种让步可以在天主教群众中赢得影响。同时这也不妨碍天主教民主党希望从宪法所规定的那些“社会”原则和条款中捞到好处，因为这些原则和条款能把意大利资本主义复辟装饰一番，使它具有一副人民性的、而且简直是社会主义的外表。<sup>〔90〕</sup>

陶里亚蒂在意共五大所作的报告中说：“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在其第一阶段，将选出一个制宪议会。”在以后各个阶段中，应该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国”的体制下来取得走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而这种代议制是要求“一切改革的实施都必须尊重民主方式”的。<sup>〔91〕</sup>但是，制宪议会实际上是象征着意大利统治阶级在推翻墨索里尼时刻已开始发动的一场巨大的政治行动的终结。《意大利生活纪实》谈到1947年新的局势时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革命和‘北风’遭到了遏制。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决地扭转舵把，指引航船坚定不移地朝着右方行驶，这样当然就排除了左翼参加政府的可能性”。<sup>〔92〕</sup>

加斯佩里访问华盛顿之后不久，于1947年5月解除了共产党部长的职务。据陶里亚蒂传记的作者看来，加斯佩里的这个决定是很不公平的，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呆在政府里是“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因素”；

陶里亚蒂当了司法部长，并没有象反动派预言的那样发生

流血事件，而是颁布了一项大赦令，显著地促进了国内的和平安定……斯科奇马罗和佩森蒂当了财政和国库部长，里拉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变得坚挺了。古洛当了农业部长，唯一对他感到不满的是南方的显贵。因为对他们第一次采取了反对大土地占有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是数十年来，即远在法西斯当政之前，人民所迫切要求的，甚至也是某些南方资产阶级所要求的。〔93〕

陶里亚蒂对加斯佩里这一行动作了如下评论：

一个明智的和能干的政敌将不会把我们从政府中撵走。恰恰相反，他会相信我们自己所宣布的目标，而且会用激将法来使我们信守诺言。他会努力创造这样一种局面，使我们在此局面下处于被压倒的少数地位而无法摆脱，如果硬要摆脱，我们只会遭到摧毁性打击。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做到了这一点，就可算是明智的了。但加斯佩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人，甚至比庸人还不如。〔94〕

陶里亚蒂的这番自白对于了解党的目标和宣言来说，确实说明了不少问题。他对加斯佩里的不明智行为破口大骂，未免有失彬彬有礼之风。不过，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当年杜鲁门不进行野蛮的干涉，加斯佩里完全有可能从意共的“民族团结政策”中捞到更多的好处。当然，如果不承认加斯佩里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来实现意大利资产阶级托付给他的任务，那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加斯佩里确实没有辜负意大利旧统治阶级对他的希望与信任。但是，能不能说，当现代意大利遭到空前巨大的民族灾难，当意大利资本主义遭到最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刻，意大利无产阶级对它的代表们所寄托的希望与信任，同样也没有落空呢？尽自己的力量来给创造“意大利奇迹”准备政治、经济条件，是不是一个革命政党应负的历史使命呢？

意大利工人阶级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不容低估的胜利。他们抛弃了法西斯主义而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抛弃了不合时宜的君主制，

而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制订了一部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尽可能先进的宪法，采取了一整套社会改良措施。这些成就有点类似德国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但它却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里窝那分裂？”而在法国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图尔事件？”

## 未经允许的革命：对法、 意机会主义的批评

在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法共和意共的政策受到其他七个党的代表们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政策。杜克洛和隆哥发现自己处于被告席上，审判员们指控他们搞“政府主义”、“议会主义”、“合法主义”以及其他具有“右翼机会主义”特征的种种“主义”。从杜克洛在会议期间的态度来看，法共领导人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另一方面，陶里亚蒂则想必已经猜到会出事。因为他曾嘱咐意共代表团说：“如果有人指责我们没有能够取得政权或者我们被赶出了政府，那么告诉他们，我们不能把意大利变为另一个希腊，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他们苏联人的利益。”〔95〕

事实上，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面临的是这样两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来自南斯拉夫人，他们的批评出自真诚的革命动机。第二种批评来自苏联人，他们之所以恼怒，并不是由于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政策导致了革命机会的丧失，而是由于这两个党已经表现出来被证明无力阻止它们的国家加入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反苏战略体系。斯大林甚至担心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官瘾太重，以致为了重返政府不惜向前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其他政党作出让步。这种担心也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在发生了西方某历史学家形象地描绘为“把共产党部长们



从窗口扔出去”的事件之后，多列士还继续把法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政府党，陶里亚蒂则提出了由左翼政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组成一个新政府的建议。<sup>〔96〕</sup>而斯大林当时所需要的，却是要这些党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把法国和意大利并入美国集团的计划。苏联担任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审判官并不是很合适的。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在“大同盟”时期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那仅仅是因为热情过了头。然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建议要南斯拉夫代表担任主角来批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会主义，原因恐怕不在这里。据卡德尔和吉拉斯后来发表的声明来看，苏联人是“想在南斯拉夫党同法国和意大利党之间造成隔阂”。<sup>〔97〕</sup>以后的事态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怎么说，苏联人采取这个步骤是受到两个更加强有力的动机驱使的。

首先，一切迹象表明需要谨慎。他们对于西方共产主义中这两个大党的领导人的反应没有把握，这些领导人已充分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发生冲突，是决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苏联人正期待着他们在反对美国计划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第二，南斯拉夫党以其模范的革命行动而赢得了威望，因而是担任起诉人的理想候选人。此外，南斯拉夫领导人几乎不需要谁来推动他们这么做。在战争时期以及战争刚结束的时期，他们曾经多次敦促意共改变其政策。意大利革命遭受的挫折，对于南斯拉夫革命构成严重的危险，而同一时期美帝对希腊的干涉也已经在它的南面构成了威胁。

在叙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批评之前，有必要在这里插进来简要地谈谈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战后所奉行的政策的要点，以及它所遇到的来自苏联领导人的阻挠。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个方面的情况，才能更好地理解南斯拉夫的批评的意义，也才能更好地欣赏苏联领导人在玩弄权术方面的

技巧。南斯拉夫人曾经不得不在对抗斯大林的情况下开辟自己的道路，苏联人就利用南斯拉夫人的立场去纠正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机会主义立场，而这种立场却正是斯大林路线的直接产物。当然，这种纠正是朝着斯大林的新的国际政策所要求的方向进行的，而其结果——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是从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此外，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经验（关于后者的经验只能顺便提及），才能圆满结束对意大利和法国革命遭受挫败的原因的分析。

### 成功的革命（南斯拉夫）和 被扼杀的革命（希腊）

从德国占领的第一天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就制订并执行了一项把民族解放同国家的革命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策。<sup>〔98〕</sup>这第二项目标不应推迟到战胜入侵者之后，而应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加以实现。随着每块国土的被解放，人民政权就在当地建立起来，这个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和抵抗战士直接参加下成立起来的各种团体。

这项革命方针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建立这种新的人民政权，而不在于纲领的激进。纲领虽然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但整个来说是温和的，它的近期目标是土地革命，而这项目标随着战线的向前推移就逐步得到实现。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反法西斯的团结是设想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的：它所包括的是所有宣布既赞同纲领的目标，又赞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的一切政党、集团、派别和个人；它所排斥的不仅是同入侵者合作的人，而且还有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甚至还有要求采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政治结构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由于这个原因，解放战争不可避免地同时以反对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内战形式出现。开展这种规模的斗争，就要求具有与其革命胆

略相适应的手段。光靠小股游击队活动，进行局部性的奇袭与同敌人拼消耗是不足以决定革命的命运的。这些只可以起到为大国的军队准备作战条件和支援作战的作用，如同在法国和意大利那样，但不足以使人民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所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建立一支革命正规军的问题，这支军队不仅能击败入侵者，而且还能够赢得盟国的尊重。这项工作虽然遇到了巨大困难，但还是完成了。这是南斯拉夫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sup>〔99〕</sup>

按照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这些人的团结的逻辑来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政策似乎纯属冒险。事实上，这正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也就是南斯拉夫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持的观点。他们说，如果不团结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去反对敌人，岂不就意味着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推到敌人的怀抱中去吗？须知德·米哈伊洛维奇上校以及他手下的切特尼克分子就是这样走上与敌人勾结的道路的，而他们本是“三强”承认的流亡在伦敦的王国政府伸向国内军务的一支胳膊（1942年1月，米哈伊洛维奇被彼得国王任命为国防部长）。这并不是因为这位南斯拉夫上校反对希特勒的决心和爱国心不如戴高乐或者巴多利奥，而是因为南共一开始就为实现法共和意共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其实铁托曾经多次试图同米哈伊洛维奇就反对入侵者采取共同行动方面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必须建立在保证实现群众的革命愿望的政治基础上，这对于彼得国王的国防部长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发生在以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解放部队为一方和以右翼势力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阵线（这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联合运动的名称）陷入孤立。事实恰恰相反，它孤立了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切特尼克分子，他们被迫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即维护旧社会的剥削制度，这正是他们想要以抵抗战士的英勇牺牲为代价而攫取的报偿。如果采取一项萨莱诺式的民族团结政策，就会把这些右翼势力看作是共产党人的同盟者（或者不如说，就会把共产党人看作是他们的同盟者）。

在解放区内，由于革命军队的增强和新政权的建立，迫使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与占领军进行暗中的——有时是公开的——勾结，而这只能使他进一步声名狼藉和陷入孤立。另一个后果是，伦敦的王国流亡政府（资产阶级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归附于它）丧失了它在国内的军事基地。同样，丘吉尔也丧失了地盘。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给“大同盟”带来了麻烦，并且由于这个原因，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盟国的领导人无法想象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竟会不接受莫斯科的指示而执行这样一项政策，因此他们不断地压苏联政府命令铁托向米哈伊洛维奇让步。斯大林试图满足他们的要求。尽管南共领导定期向莫斯科报告了解放部队和切特尼克分子之间存在的内战局势，但是苏联的宣传机构还是把米哈伊洛维奇说成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所有部队的指挥官，而对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阵线的作用以及解放区内出现的新型革命政权则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季米特洛夫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多次电告铁托，敦促他改变政策。下面引的这个例子就是1942年3月5日的一则电文：

在研究了你们送来的全部情报之后，得到的印象是，英国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追随者们怀疑游击运动已带有共产主义性质，其目标是实现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例如，你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突击队呢？肯定地说，当前基本的迫切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反纳粹势力，粉碎入侵者，争取民族解放。

人们怎么来解释关于英国的支持者们正在成功地建立对付游击队的武装部队的说法呢？除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以外，难道真的没有值得你们在反对入侵者的共同斗争中与之联合的其它南斯拉夫爱国者了吗？

说伦敦政府与南斯拉夫政府都站在入侵者一边，这是很难令人同意的。这里肯定有很大的误解。我们真诚地要求你们对你们的策略和你们的行动加以认真的思考，要求你们弄清楚，为了

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有敌人的真正的联合阵线，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驱逐入侵者和自命的征服者，就你们方面来说，是否确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尚未做到，你们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告诉我们。<sup>〔100〕</sup>

他们还要求铁托“不要单纯从民族观点，还要从国际观点，从英、苏、美联盟的观点”来考虑他的斗争。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误解，本来就有两种全然不同的政策。一种是莫斯科的，根据这个政策，反对纳粹的斗争，除了争取民族独立，以及至多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之外，不应该再有别的目的。另一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他们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这种做法使他们的政策同法共和意共的政策相比，不是“民族性”少了，而是更具有民族性了。这就是南共取得成功的原因。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肯定是“从国际的观点，从英、苏、美联盟的观点”看待斗争的。但是这种“观点”不同于斯大林的观点，它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观点。正如他们很快就显示出来的那样，他们能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阴谋诡计采取机智的对策；他们获得了英、美的援助，同时又迫使英、美面对南斯拉夫革命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给伟大领袖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策略课——不过我们将在以后再谈这项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文件，因为它告诉我们的内容要比南斯拉夫问题多得多。

莫斯科施加的另一种形式的压力，是拒绝南斯拉夫战士对武器和弹药的要求。提出的借口是技术性困难。当然这种困难是相当大的，但是，正如后来王国政府的档案移交到贝尔格莱德后所发现的那样，就在他们拒绝向解放部队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同时，苏联人却在向切特尼克分子，提供军事补给品，并表示愿意向他们的司令部派遣军事代表团。<sup>〔101〕</sup>解放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同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他们对解放部队发动了六次大规模进攻——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吉斯林分子、奈迪茨和帕韦利奇的军队，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

进行战斗。

到1942年秋季，解放部队的实力已达到十五万名战斗人员，分为两个军，每个军各辖九个师（总计三十六个旅和七十个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在新近解放的波斯尼亚首府比哈奇开会，并且成立临时政府。莫斯科强烈地反对这个决定。这一次，南斯拉夫人让步了。但是一年以后，他们决定还是要干。1943年10月，当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时，铁托向三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通知它们，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既不承认国王，也不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它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唯一代表，并打算在各个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外长会议无视这份声明，并继续承认彼得国王的政府为南斯拉夫的唯一合法代表。于是，南斯拉夫革命者召开了第二次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全国大会，宣布正式建立新国家，来回敬苏、英、美三国。

当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开始对世界进行大瓜分来确定“势力范围”的时候，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齐集于波斯尼亚王国的旧都亚伊采，宣布废除伦敦流亡政府，判处彼得国王和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成员“永久流亡”

（全国大会一致决定禁止他们以任何身份返回南斯拉夫）。至于选择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制度的问题，留待战后去解决（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盟国面前很善于运用谋略，他们与意大利人不同，他们从巩固新的人民政权着手，把谈判放在以后去进行）。全国大会决定新的国家采用联邦结构，并且选举了临时政府。

当有关这些决定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暴跳如雷。曼努伊尔斯基向铁托发出了一份电报，说“领袖”“极其恼火，认为这是在苏联背后捅了一刀，并且是一种反对德黑兰会议的举动。”原来从苏联领土上广播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立即丧失了自由，无法广播亚伊采会议关于禁止彼得国王回国的决定，由南共驻莫斯科代表起草的广播稿也被扣压了。〔102〕

但是，在同一时间内，伦敦和华盛顿在当地了解到真实的力量对比、米哈伊洛维奇的不光彩行径和无能，以及解放部队的兵力等情况以后，决定向事实让步，并且试图与铁托达成协议。只有到这时候，苏联政府才承认了亚伊采会议的决议。莫洛托夫发表的一项声明把这种态度最明显不过地表达出来。

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业已被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所接受。苏联政府认为这些事件是有助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举动。这些事件表明，南斯拉夫的新领导人已经能够运用卓越的方式去团结国内的一切势力。<sup>〔103〕</sup>

这种“卓越的方式”，实际上同莫斯科在两年半时间内一直企图强加于人的方式毫无关系。

苏联政府同时决定向铁托的司令部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而这也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做了的事情。在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南斯拉夫人终于开始收到苏联的武器，包括少数飞机，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3年底就已经开始向铁托运送武器。不过这种援助是要付出代价的。丘吉尔与斯大林双方，都在增强他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迫使南共同流亡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丘吉尔为了铺平道路，安排了由被认为是“较为民主的”舒巴希奇来替换流亡政府的首脑博集达·普里奇，米哈伊洛维奇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英国政府还宣布中止对切特尼克分子的一切援助。面对来自英国和苏联的联合压力，南共领导人采取了对策。1944年8月，铁托和舒巴希奇达成了一项协议，为流亡政府与在国内建立起来的政府之间的合作进行准备，以便组成一个“混合”政府。铁托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我们之所以决定同意这个协议，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知道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另外，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的规模是我们的对手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sup>〔104〕</sup>

在11月底，斯大林会见了铁托，再一次压铁托接受彼得国王的复辟，并且向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是，他没有能使南

斯拉夫领导人改变态度。斯大林问道：“如果英国在南斯拉夫登陆，你们怎么办？”铁托回答说：“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抗。”斯大林对这个气势豪迈的回答报以冷淡的沉默。

几天以后，举行了著名的丘吉尔—斯大林会晤，在这次会谈中，他们恬不知耻地擅自划分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没有跟铁托事先打招呼，便与首相阁下达成了在南斯拉夫均分势力范围的协议。<sup>〔105〕</sup>在雅尔塔会议上，这项协议不仅得到确认，而且更加具体化了。1945年2月12日，驻在贝尔格莱德的苏联和英国的军事代表团通知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在2月10日的会议上，三国政府首脑已决定向铁托元帅提出以下“建议”：（一）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应立即生效，组成新政府；（二）这个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宣布以下两点：（1）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将吸收那些未曾以任何形式与敌人妥协合作过的南斯拉夫国民会议的成员，由此组成的新的政治团体应命名为临时议会；（2）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颁布的法规须提交立宪议会作进一步审批。<sup>〔106〕</sup>

这些决定，特别是关于承担义务吸收那些在亲轴心的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下选举出来的1938年议会的成员参加临时议会的条款，在各派政治力量中间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又一次巧妙地施展了谋略。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需要把坚定性和谨慎行事结合起来，在实质性问题上不让步，但在枝节问题上妥协，以求赢得时间，巩固革命，首先是加强军队。特别是莫斯科从1944年年底以后对英国远征军发动的反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战争所表现的那种彻头彻尾的消极态度，更突出地道破了斯大林在铁托回答他那“如果英国在南斯拉夫登陆，你们怎么办？”的问题时报以沉默的不祥的含义。因此，南共领导决定“执行”雅尔塔“建议”，但是执行的方式既要使人民的军队无须放弃任何实际权力，又要使丘吉尔和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也能够抱有一点可能恢复旧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应该记住，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客们的一个重要团体（其中不



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接受这个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在英帝国主义的最反动集团的支持下,他们从伦敦公开发出呼吁,要求派遣英美联军去恢复南斯拉夫的秩序。〔107〕

南共领导所采取的策略,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1945年期间,南斯拉夫革命得到了巩固。当舒巴希奇和旧的统治阶级在“混合”政府中的其他代表们——他们还代表着根据丘吉尔—斯大林协议享有百分之五十的势力范围的英国——发现特洛伊木马计行不通时,只好辞去他们的部长职务。这时,英国人和美国人想再用在希腊采用过的办法来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已经为时太晚了。

如前所述,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內,我们不可能给希腊事件以应得的重视。我们只能简要地记述以下事实。希腊的抵抗运动与南斯拉夫的运动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并同样在国内得到支持。在1944年末,它几乎控制了全国,但是希共领导没有用南共那样的坚定性去抵制莫斯科的压力。它对“民族团结”政策作了重大的让步,并且接受了和盟国达成的妥协,这一切都为英国军队干涉希腊抵抗运动创造了条件。1944年10月,斯大林—丘吉尔协议把剩下的事情都给办妥了。丘吉尔在1944年11月7日发给艾登的指示中写道:

依我看,既然我们已经向俄国付出了代价以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那么,我们就应毫不迟疑地使用英国军队去支持帕潘兹雷欧领导下的希腊王国政府。我充分估计到会同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适当的理由,就决不要回避这种冲突。〔108〕

英国军队和抵抗力量之间的战斗,从1944年12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12日才签订停战协定,并且导致了瓦尔基扎协议。这个协议后来被希腊党认为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无异于在英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面前屈膝投降”。〔109〕

12月22日,丘吉尔在英国坦克的保护下进入了雅典,在一次同抵抗运动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他宣称——为了使他们投降——

“英国进入希腊是得到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的同意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当雅典人和英军作战时，他呆在被游击队包围的英国司令部里）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认可了丘吉尔的声明。过了两天，当王国政府和抵抗运动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英国飞机正在向雅典居民进行扫射的时候，苏联政府就任命了一名驻希腊王国政府的大使。在雅尔塔会议上，虽然英国干涉军和抵抗武装之间的战斗刚刚停火，斯大林就赶忙宣布“我完全信任英国政府对希腊的政策”。〔110〕

瓦尔基扎协议被英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利用来重建王国政府，并开始对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在1946年末，希腊共产党和其他抵抗团体决定重新掀起武装斗争，一场内战开始了。英帝国主义感到自己太虚弱了，无法应付这种局势，只好把它所扮演的警察角色让给美帝国主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宣布，美国正在承担义务“保护”希腊和土耳其，以此作为推行“杜鲁门主义”的第一炮。

### 南斯拉夫对法、意机会主义的批评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领导人把美帝在希腊的武装干涉看成是对南斯拉夫革命的直接威胁。他们也同样看待美国插手法、意两国的军事所带来的法意政治局势的逆转。这就是卡德尔和吉拉斯在共产国际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批评法共和意共政策的背景。这些批评的确切内容虽然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但是从后来南斯拉夫人泄露的情况，特别是从1957年出版的雷尔（他和隆哥一起代表意共出席了这次会议）的笔记来看，还是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一个梗概。此外，这些资料还可与已出版的会议报告和文件中间接提到的情节，尤其是与卡德尔关于南共活动的报告对照起来看。〔111〕这些就是我们下面叙述的内容的根据。

南斯拉夫人感到，在反对纳粹的战争期间以及战争胜利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滋长了一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白劳德主义就是这种倾向的最充分的体现。按照这种观点，战

爭的结束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上一个和平发展和阶级斗争缓和的新时代的开始。南斯拉夫人暗示法共和意共的政策就是这种倾向的独特表现。它的出发点是相信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的、合法的和议会的道路去夺取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人所信奉的那种观点的翻版。法、意共产党人把他们所参加的政府看成是人民民主的开端，而按照南斯拉夫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共产党人还在信奉这种观点的时候，把共产党人赶出政府的阴谋却已策划就绪。起初资产阶级感到自己还很虚弱，因此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组成政府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而共产党人本应利用这种形势去占据那些关键职位，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由于他们坚持那种认为同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就意味着人民民主的开端理论，并且认为从这个基础出发，通过合法的和议会的方法，这种人民民主可以得到发展。结果，他们除了解除群众的武装和散布对天主教民主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幻想之外，一无所成。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本应认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蜜月是不可能持久的。这只不过是一场斗争，只有那些最有胆略、最有真知灼见和对议会联盟最不抱幻想的人，以及那些有本领赢得群众的支持去夺取政权的人，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南斯拉夫人说，在战争时期，我们同意大利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曾邀请他们研究我们的经验，研究使我们能够解放大部分国土和建立一支军队的方略。但是他们不愿意走武装起义的道路。他们说，为了避免形成南北分割的局面，必须抑制意大利北方的革命发展。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人只能在一部分国土上取得政权，而这将导致国家的分裂以及统一和独立的丧失。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不是通过建立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包括所有愿意真诚地参加武装斗争和参加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的一切派别在内的组织，自下而上地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而是错误

地自上而下地组成反法西斯阵线。这个阵线的基础是各个不同政党，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在内，都享有同等的代表权，尽管其中有些政党是以限制或者停止武装斗争和阻挠国家的任何真正变革为宗旨的。已经公开发表的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活动的报告文本中，有下面一段话显然是针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

有人断言，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实现人民大众对民主革命的要求，最终将会使某些社会阶层和某些政治集团同反法西斯阵线疏远。南斯拉夫共产党坚决驳斥了这些观点。要是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当初也采纳这些观点的话，它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或者说，人民的大多数就不会自愿拿起武器，象他们已经表现的那样忘我地战斗。他们之所以如此满怀热情地去战斗，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仅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他们对民主和社会的理想而斗争。实践表明，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革命过程的紧密结合，不仅不会削弱全国起义的斗争精神，反而会使起义对大多数人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sup>(112)</sup>

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了法共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允许甚至帮助解除抵抗力量武装和遣散其人员的作法。他们拒绝接受法共领导人关于战争尚未结束，任何反对戴高乐政策的坚决行动都将意味着同盟国对抗，从而就会引起英、美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的论点。南斯拉夫人坚持认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因为对苏联来说，最有效的援助应当是缩小美国在法国人民中间的影响。对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北方起义后几个月内所采取的政策，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卡德尔和吉拉斯还把希腊人的做法和他们自己的做法进行了对比，希腊人甚至在对德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用武力去反对英国人，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则是反对受到盟国支持的彼得国王政府及其切特尼克分子。南斯拉夫人批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抱的总的态度，他们批评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谴责英美的政策，这样就有利于帝国主义恢复他们的阵地。他们也批评了法共和

意共领导人对“民主”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改进”抱有幻想，以及他们在群众中散布这些幻想的做法。

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还因为没有积极支援希腊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势力自1946年年底以来开展的武装斗争而受到指责。南斯拉夫人断言，他们根本就不支持这种斗争，因为这两个党的领导认为，从人民力量的角度看，希腊的内战是一项失败已成定局的事业，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卡德尔说，法共和意共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分子希望在他们国家内制造希腊式的局势，以便找到一个更好的借口来镇压民主势力和工人阶级队伍，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人害怕在法国和意大利引起类似的斗争，因为这对他们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威胁。南共代表团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研究一下向希腊人民的斗争提供积极援助的措施，但是他们得不到支持。

这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法共和意共在1941—47年期间所奉行的政策的批评的实质性内容。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来判断，在与会的其他代表中，似乎只有哥穆尔卡一人的观点与南斯拉夫人相接近。他认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获得解放的时刻，是有机会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性变革的，而他们错过了这个良机。这位波兰共产党人说，“在入侵者被驱逐出去而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同时被摧毁”的阶段，对于“创立新的国家机构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或许“苏联军队所解放的国家比之英美军队所进入的国家”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不过，即使在后一类国家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已经积极地参加组织民族解放斗争，并且掌握着武装游击队的国家”（也就是说法国和意大利），也“很有可能缔造新的国家，实现根本性变革”。〔11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只是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后操纵，他们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即这两个党被驱逐出政府以后，也还是继续采取政府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它们各自政府的亲美政策。其它与会代

表都跟苏联亦步亦趋。他们中间没有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是也没有人来论述这些批评中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当然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从截然不同的观点提出的两种批评，而需要认真对待的只是由斯大林的代言人提出的那种批评。没有必要对于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根本性的分析，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赞同日丹诺夫所建议的“转弯”。隆哥和杜克洛作了点自我批评，泛泛地承认了他们两个党犯了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没有把政府斗争和群众运动充分地结合起来；他们承认没有及时地认识到美国新政策的目标以及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正是华盛顿这种新的反苏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答应积极开展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并且审慎地执行斯大林所坚持的新政策；隆哥和杜克洛作了这些事情之后，日丹诺夫立即结束了这场“讨论”，转入下一个议题。

苏联人在取得这些结果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兴趣去深刻分析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了。其他人也是这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充分理解这些问题，他们知道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暗含着对斯大林在“大同盟”期间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批评，他们也都知道问题的这方面是个忌讳。隆哥和杜克洛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替自己辩护，并且指责南斯拉夫人是想通过批评他们来批评斯大林的政策。但是，他们看到卡德尔和吉拉斯显然是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协调一致行动的，这样的“辩护”反而会使他们自食其果。隆哥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卡德尔和吉拉斯解释说，意大利党在战争期间的政策是听命于莫斯科的。但是在正式会议上，没有人脱离他所扮演的角色而自由行动，<sup>(114)</sup>这就是由一方扮演替罪羊，而由另一方扮演起诉人和法官。

随着“大同盟”的破裂过程的加剧，莫斯科的政策和南斯拉夫革命利益之间的磨擦的根源似乎正在消失。在“三强”之间的蜜月时期，南斯拉夫人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被莫斯科看作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一旦伦敦和华盛顿开始它们的反苏十字军运动，这

种精神就又突然地转变为一项“积极”因素。这个由游击队所掌管的、具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军队而地理位置又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斯拉夫，已成为斯大林开始构筑的欧洲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面对着杜鲁门主义所包含的对南斯拉夫革命的威胁，苏联的保护对于铁托及其同事们似乎也变得更加需要了。

不过，很快就发现这种政治性的结合的基础是脆弱的。南斯拉夫人的不妥协性，仅仅在符合苏联新政策要求的限度内才是对苏联有用的。但是，南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有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与苏联外交的目标并不一致；不仅如此，斯大林关于欧洲前哨基地的计划是与南斯拉夫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相冲突的。不过，在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南斯拉夫人与俄国人还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相反，利益还是一致的。在攻击法共和意共所奉行的政策时，对斯大林以往政策的不指明的批评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如果是有意的话，南斯拉夫人在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就会这么挑明）。这种批评的内容，只不过是客观地说明了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仅仅是斯大林的伟大战略的忠实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而已。

南斯拉夫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批评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避而不谈斯大林在“大同盟”时期所实行的政策这个关键问题。而不分析这个问题，就去阐明法国和意大利未能利用其一度潜在的革命机机的原因是达不到目的的。这项政策已在本书中多次提及，但是每次总是零零碎碎提到一些内容。在前面几节中，我们研讨了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简要地回顾了希腊局势，同时提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和忠告在这些地区所产生的特定的、地区性的后果。我们在探索导致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时，以及在本书第一编的其它章节内，也指出过斯大林这项政策的某些一般性特点。<sup>〔115〕</sup>不过，我们尚未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而如果我们想要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过程有个全面的了解的话，那么，这项工作是不可少的。在下一节内，我们就来进行这种研究吧！

##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是以两项主要战略原则为基础的，这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过。<sup>〔116〕</sup>第一项原则是在俄国革命所开创的世界革命运动受到遏制后，于二十年代后期制定的，它起源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项原则的内容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革命都必须服从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第二项原则是在三十年代德国无产阶级被纳粹主义击败以后制订的，它是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丧失信心的结果。这项原则要求优先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要求一切革命行动都服从于这种做法。第二项原则只不过是第一项原则在西方无产阶级无力发动革命的情况下的具体运用。既然主要目标是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而且认定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似乎都不可能进行革命，那么，唯一可行的方针就只有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角逐了。

按照这两条金科玉律办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斯大林对于西班牙革命和法国人民阵线所采取的政策。不过，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制订其政策时，才对它们加以广泛应用。当时，这些原则被推到了极端，甚至不惜采取骇人听闻的步骤同法西斯签订一项重要条约，而且压制反对这项条约的人民斗争，以便促成这项条约的实施。<sup>〔117〕</sup>在纳粹军队入侵苏联领土之后，仍然是这些原则继续支配着斯大林的所有政策。在设想建立反希特勒联盟的方式方面，在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政治动机方面，在赋予战争的政治目标的内容方面，在给各国共产党布置任务方面，总之，斯大林在“大同盟”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的一切主要方面，都极其严格地遵循这两项原则。

在从1935年的法苏条约到雅尔塔协定的十年期间，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在其含义上也与列宁时代有天壤之别。在三十年代的后五年，它基本上意味着保持欧洲的现状，也就是说，维持凡尔赛和约的体系。到苏德条约时期，它就开始包



括向外扩张领土、修改边界、吞并和夺取“势力范围”等项内容。在反对轴心国的战争期间，这些新内容就完全占据着支配地位——至于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则要到许多年以后，在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才完全暴露出来。这项“至高无上的目标”在斯大林的政策中还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这就是寻求与美帝国主义达成永久性妥协，以便于共同控制世界。

从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开始致力于摧毁纳粹和日本帝国在一系列国家建立起来的、并企图向其他国家扩展的法西斯统治和民族压迫制度的那一天起，这场战争就具有争取自由的进步的内容。而且一旦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发展到同利用法西斯主义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一旦战争把无产阶级卷入到行动中来，或者他们掌握了武装，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的话，它还可能转变为一场革命战争。但是，斯大林的政策，更不用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政策，并没有把战争的这种进步的内容真实地体现出来。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尽管发表过不少关于维护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宣言并作过不少许诺，但他们所追求的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目标（罗斯福的较为开明的立场并不能冲淡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那么，斯大林尽管也有过类似的宣言和许诺，他所追求的则是苏联官僚阶级的目标，这个阶级已经取代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掌握苏维埃国家的领导权。全体俄国人民的新独裁者和以他为象征的保守的官僚阶级，在国内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之后，不可能再将革命带给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不可能鼓励其他国家的人民去争取他们拒绝给予苏联本国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不过是他的对内政策的反映而已。苏联的军队和盟国的军队一样，所履行的解放任务仅仅限于击溃法西斯统治和粉碎纳粹帝国主义，而在同时，他们却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压迫制度。当英国人和美国人来到时，他们所干的是支持资本主义，建立或谋求建立他们的世界统治，以及在不同的形式下继续维持殖民主义。当苏联军队来到时，他们所干的则是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废除

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由工人自己接管生产资料，而是由一个新的特权社会集团重新对工人进行剥削。这个集团的官仔统治的基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蛊惑和诳骗，废除政治自由权利，以及建立历史上最庞大的警察机构。苏联军人随同其武器装备一道带来了实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统治和扩张的计划。列宁所担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重新出现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 大 诳 骗

英美资本家和斯大林官仔集团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取自由和反法西斯的目的，但他们却不得不把“其他的”目的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用最高尚圣洁的理想掩饰最卑鄙无耻的行为的伎俩，同人类历史一样的源远流长；在这方面三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经验，而斯大林的经验正同他的两个杰出的同行一样的丰富。他们立刻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所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分歧同原则毫不相干。他们三个总是在异口同声地颂扬这些原则的同时，又肆意践踏这些原则。他们的分歧来自天赋的贪慾，即想利用新的瓜分世界的手段，攫取最大的利益。当然，只要他们三位之中有一位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就会立刻把原则当作棍棒恶狠狠地挥舞起来，并且指责另外两个人企图违犯原则。但是，当他们达成了三方都满意的协议时，每个人就都用自己显赫一时的威望来证明他的同行们的崇高目的。

在这方面，斯大林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遭到第二次全球性危机期间，他作为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象征，凭着在全世界工人群众中的巨大威信，给帝国主义代表人物帮了无法估价的大忙。在第一次全球性危机中，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不曾有过这样的好运气。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公开干预和苏联对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所订立的协定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千百万人产生了幻想，以为苏联的这些资本主义盟友和帝国主义盟友都是抱着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诚意的。各国共产党的宣

传，除了极少数例外，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些党所奉行的联盟政策也是如此。为了使受害者百依百顺，以便于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集团大肆划分“势力范围”，拿经济、政治和战略上的利益大做其交易，欺骗人民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947年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时宣布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并且把昨日的同盟国说成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他对这样一种急转直下的变化不能不作些解释。而仿佛就在前一天，斯大林还在那里表明他有信心同另一超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谅解。（1946年12月，他把美国同苏联之间的范围广泛的协议说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sup>〔118〕</sup>五年来，苏联和苏共的宣传一直把盟国说成是可以与之共同建立一个正义、民主与和平的新世界的合作者。可现在，世界分成了两个集团，建立新世界的合作者变成了“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者”或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了（后者指社会民主党或欧洲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种情形不可能魔术般地突然出现在1947年的夏天。两个集团的划分和同盟国的这种转化必然是由来已久。因此，斯大林的代言人不得不炮制一种关于“大同盟”时期的新的说法。这种说法同样是骗人的，却透露了一些先前小心谨慎地掩盖着的内幕。现在，那些同苏联结盟的帝国主义强国的真实目的被揭露出来了，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追求的目的却继续被掩盖着。

九国共产党所通过的宣言说，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反希特勒的联合阵营中，在有关战争的目的和规定战后安排世界的任务方面，存在着分歧”。苏联打算向全世界各国人民保证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并把真诚地尊重民族自决原则作为行动指南。而美国和英国的目的却是“从市场上排斥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并建立它们自己的统治”。这些大国企图“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扼杀民主。”<sup>〔119〕</sup>

1947年的这种辩解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说法是矛盾的。当时斯大林坚持认为三强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1944年11月，打败德国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安排世界的问题也迫在

眉睫，亟待解决。这时斯大林提出了下述的论点——这一论点后来成了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在这个决定性时刻的全部战略的关键——就是说，“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同盟，不是以偶然的、暂时的考虑为基础，而是以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为基础的。”〔120〕如果西方两个大国在战争期间所抱的目的果真象共产党情报局宣言中所断言的那样——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斯大林1944年的论点就是错误的，除非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的理解同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宣称的、并在共产党情报局宣言中所重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果不这样假设，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斯大林在1944—45年间，在有关帝国主义列强的真正利益和战争目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还不致于如此粗浅。我们在下面考察他发表这一声明时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斯大林的论点确实说明了当时的现实，也会看到三大国之间的秘密协定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位傲慢自负的战略家的错误在于：他相信这些协定给苏联官厅统治集团同英美资本主义，特别是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建立的同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既然把1944年的国际形势解释为莫斯科的纯洁意图同伦敦和华盛顿的罪恶意图之间的矛盾的结果，那么，共产党情报局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它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群坏蛋竟能如此出人意料地迅速团结那些老资产阶级势力——也就是当年曾经引起战争，并且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在西欧扶植、赞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势力。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巴黎、罗马、布鲁塞尔的共产党部长们竟被轻而易举地撤换掉，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还会有从事新殖民战争的能力。换言之，它必须说明为什么全世界资本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仅仅在战胜法西斯两年之后就能够向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重新发动攻势。按照日丹诺夫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急剧的变化……，全世界资本主义遭受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

工人阶级的威信和影响在人民群众中无可比拟地提高了、扩大了……；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了。”〔121〕但是，如果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被撤职的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部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部长呢？为什么采取主动行动来扩大反法西斯的胜利成果的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不是革命势力呢？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的那样，在共产党情报局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采取的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就是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当作替罪羊。不过，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除了隆哥和杜克洛十分注意分寸地提到盟军的进驻妨碍了他们党的进一步发展之外，谁也没有认真回答这一严峻的问题：为什么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的高潮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击之下，竟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低落了、衰退了。然而，日丹诺夫的报告以及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却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据日丹诺夫说，英美帝国主义者战争期间“不敢公开干涉苏联和民主势力，就是因为它们充分认识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同情完全是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是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局势已在开始发生变化”。宣言在谈到战后时期的情况时说，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给自己“戴上了自由主义与和平的假面具，以便诱骗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落入圈套。”〔122〕但是，宣言在指出这个事实时——没有这个事实，那么1945—47年之间的事态发展是无法解释的——却完全回避了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既然苏联领导人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群众”以及“大大加强了”各国共产党和享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影响的”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么，这些领导人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制止帝国主义势力策划狡猾的报复计划呢？在法西斯主义刚刚被打败的时候，他们又做了些什么事情来阻止反动派利用自由、民主、和平的假面具去欺骗绝大部分群众，以便恢复元气，卷土重来呢？如果有可能引用斯大林在“大同盟”时期的某一句话，或者他的某一项指示，能够说明他曾经打算提醒世界各国人民注意这些帝国主义盟国的真正目的；如果在遵循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中，能够找到有

关这方面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暗示，那么，很显然，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文件中，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一定会强调这一点，并把它当作无可辩驳的依据，证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并且竭尽了一切可能来遏制帝国主义的计划。可惜要找到任何一点点这样的资料，是根本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假面具”是十分重要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把自己装扮为民主的保卫者、法西斯主义的敌人、民族独立和公正和平的支持者，的确十分成功地欺骗了“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和许多自以为有经验的人。在全世界危急存亡之秋，千百万“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身受战争恐怖和法西斯暴行的冲击，都积极起来了，渴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制度。如果各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能提高这些人的政治觉悟水平，引导他们认识社会和政治的现实情况，并且及时让他们看到戴着那著名的“假面具”的势力正在如何追求着同人民大众的愿望完全不同的目的，那么，各国共产党就会在他们中间找到史无前例的革命潜力。然而，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不是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把促使资本主义第二次总危机走向革命的结局这一点作为它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而这样一种战略的决定性的因素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能是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他们的组织程度。这种战略要求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集中全部力量来调动这个因素。至于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或者利用各个国家内部的法西斯势力同“民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固然必不可少，不过，这终究只能作为进一步发展和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和人民力量的辅助手段。斯大林的战略，亦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所必须服从的苏联官僚集团的战略，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战略的基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是绝对地优先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是使人民力量的活动服从于这种要求。在同希特勒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期间，他们这种战略的表现是限制反法西斯的斗争，是把争取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争

取民族独立的旗帜拱手让与那些同德国敌对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在反纳粹的几个强国结成同盟期间，这种战略的表现是限制人民群众的活动，不许越出这些强国所能接受的范围。采取这种态度的结果，必然向人民群众隐瞒英美帝国主义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且同英美暗中勾结以欺骗世界各国人民。

但是，事情还不止如此。苏联领导人的根本目的是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并通过同华盛顿政府达成妥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要向世界各国人民隐瞒帝国主义列强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且还要担保帝国主义列强所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使苏联自己所公开宣称的目的能取信于民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换句话说，这也是证明三大强国的“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唯一办法。由于苏联自己已经开始采用帝国主义的方法，但为了保持斯大林官僚集团赖以护身的神话不被戳穿，又只得不惜一切代价来掩盖这一事实，所以，他们也就有必要谎称英美已经抛弃这种方法不再使用了。

厄尔·白劳德的理论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不久抛出来的。其实，他的理论只不过是把当时苏联和共产党宣传中说得稍微含蓄一些的那套东西，用明确而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从下面引述的一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劳德1944年1月发表的见解同当时其他一些更显要的共产党领袖所阐明的观点，是有着共同的背景的：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向着明天的和平社会携手前进。”

（白劳德）“我们在克里米亚这里所举行的会议已经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在和平到来的时候，必须保持和加强我们的统一目标和统一行动。这种统一已经使联合国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斯大林在1945年3月签署的《雅尔塔宣言》）

“民主主义的大国必须以保证各国人民获得和平与正义的方式来指导全世界的改组工作”。（1946年1月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

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是白劳德过分放肆地说了那些话之后，过

了一年多斯大林才通过杜克洛来谴责他。（特别是有关放弃党这个“工具”的主张，这是他致命的过错）。比这意味更深长的是，这一谴责是斯大林受到罗斯福威胁之后立即（也就是在罗斯福死前不几天）提出来的，当时罗斯福曾威胁斯大林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在波兰政府问题上不肯降低要求，两国关系就会恶化。<sup>〔123〕</sup>

### “势力范围”的划分

人们至今还在议论着：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究竟是雅尔塔会议的决定，还是“三巨头”在此之前的协议，抑或是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并在“冷战”期间正式确定下来的既成事实的恶果。在西方大国公布了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来往信件、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记录等等之后，莫斯科不得不公布的这一系列文件，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事实，只有苏联官方在这样的证据面前，竟然还否认这事。<sup>〔124〕</sup>从目前所占有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大量资料来看，我认为这个尽人皆知的“划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47年初这一阶段中，通过一系列行动和决议而逐渐形成的。在“冷战”时期，欧洲的局势趋于稳定，这种稳定性迄今仍然是欧洲的特点。（第三世界的局势就完全不同。“三强”在那里推行的计划，由于遭到民族革命运动的冲击，大都已经破产了。）这种划分是一种借助于军事行动和外交协商、党派活动和特务工作才得以实施的政策。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时间是从订立德苏条约的秘密条款开始的。纳粹向苏联发起进攻以后，“三强”在相互协商时就立即提出了“势力范围”的问题，而且又同样迅速地开展宣传来掩饰“三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目的。

当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从而解除了苏德条约对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活动的限制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认识到，同斯大林进行竞争，从政治上说已是十分迫切，因为斯大林在7月3日的讲话中宣称：“我们保卫祖国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



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里所谓“美洲”指的是美国）。在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名叫《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宣言中，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导人庄严地宣称：

……他们的国家决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他们不希望看到同有关各国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一致的任何领土变更。

……他们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愿意在其治理下生活的任何政府形式的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把主权和自治权归还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人民。

……他们将恰当地注意到他们当前的义务，努力促使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同等条件下，有更多的机会享有其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贸易和原料供应。

他们还许诺了“这样一种和平，……此种和平将保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自由地度过他们的一生。”

道地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历史学家德波林在几年以后写道：

“《大西洋宪章》所树立的民主标志，是打算用来掩盖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的真实目的的。”〔125〕对于斯大林和德波林之流来说，从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公布之日起，这一点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了。但这并不妨碍苏联政府于同年9月24日发表一份拥护《大西洋宪章》的宣言。姑且承认这只是为了获得美国援助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姿态，承认此时还不到揭露帝国主义真正目的的时候。可是苏联政府完全可以用最友好的方式向它的新盟国建议，即使仅仅为了集结最大多数的盟国去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也应该承认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或者至少应该许下这样的诺言。在当时这很可能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这正符合罗斯福的政策的方向。当然，罗斯福显然不是出于什么反帝国主义的感情，而只是为了使美国资本主义容易渗透到一向被视为欧洲的禁脔的殖民主义世界中

去。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当着世界人民的面来稍稍考验一下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的“民主标志”。1941年12月斯大林同艾登的会见才使我们懂得了苏联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毫无疑问，斯大林把这位英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当作讨论瓜分世界问题的理想的伙伴，因此他并不打算向他隐瞒什么。他向艾登吐露了他对于改变欧洲地图的初步想法：为了补偿俄国所吞并的波兰领土，德国应该把东普鲁士割让给波兰，还有莱茵地区，也许还有巴伐利亚；奥地利可以允许独立；苏台德区将还给捷克；意大利法西斯所取得的“势力范围”应该让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来均分（斯大林希望从土耳其获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如果法国不再作为大国出现，那么，英国不仅可以在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而且也不妨在布洛涅和敦克尔克保留军事基地。斯大林向英王陛下政府作出这样慷慨的让步，却只要求一件事作为报酬——英国应立即承认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签订的划分“势力范围”条约的秘密条款中所规定的苏联边界。他把此事作为他同意签署艾登所提议的英苏同盟条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解释说：英苏同盟条约可以包括两个公开的部分，一是关于战时的军事同盟，另一个是关于胜利后对欧洲诸问题的处置。除开这两个公开文件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秘密的议定书，载明英国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艾登援引《大西洋宪章》来反对这些建议。斯大林回答说：“我原以为《大西洋宪章》是用来反对企图建立世界统治权的人的，但是，现在看来，《宪章》的矛头好象是对准苏联了。”<sup>〔126〕</sup>

安德烈·方丹在他的《冷战史》中评论这一发人深思的场面时说：其实艾登可以提醒斯大林，苏维埃国家所作出的第一批决议就是谴责沙皇的秘密外交，并且公布了沙皇所议定的一些秘密条约。当然，艾登是不会这样不老练的。他对于苏联外交如此直截了当地回到先前那种历史悠久的外交手法上去，只能表示欢迎。这种手法正如马克思多次指出过的，乃是老沙皇的拿手好戏。这是双方达成谅解的首要关键。当时斯大林对《大西洋宪章》的理解，事实上正

好符合《宪章》炮制者们的观点。这个《宪章》是专门用来反对新来的世界统治权的追求者，并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压迫人民，也不反对过去沙皇帝国的人民继续遭受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统治。艾登之所以引用《宪章》，不过是政治论战中的故作姿态而已，其实这位英国大臣完全理解斯大林对《宪章》的严厉谴责，因为他丝毫也不关心芬兰的卡累利阿、波罗的海国家、东部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等地人民不能自由选择自己命运这一事实，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保卫英帝国主义在东欧的传统利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三强”之间关于瓜分“势力范围”的协商从建立“大同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而且是小心谨慎地同旨在伪装这种协商以欺骗人民的公开活动同时进行的。艾登和斯大林对话后不久，联合国宣言就公布了。（1942年1月1日）宣言批准了《大西洋宪章》；当时在宣言上签字的不但有英国、美国 and 苏联，而且还有印度、巴拿马、海地、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其他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名字一列上，就可以雄辩地证明宣言的头两位签名者是忠于这一文件所宣布的原则了。我们这里不打算逐一叙述那些秘密协商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迟疑，三国又怎样对它们进行公开掩饰，以及与这些活动紧密相联的莫斯科所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我们将只限于指出其中的某些重要情节。

1942年5月，为期20年的英苏同盟条约签字了，条约中没有包括英国对苏联1941年边界的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要求，他们不过推迟提出要求的时间罢了。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可能是斯大林暂时作出这种表面上的让步的原因。但他真正的让步是在另一个领域，这可以从印度共产党执行的政策中看得很清楚。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一爆发，甘地和国大党就以如下的声明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印度在她本身被剥夺了自由的时候，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据说是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即令俄国参战以后，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他们乘对英帝国主义不利的形势，加紧民

族独立的斗争。可是，当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这一“列宁主义的”策略时，印度共产党却采取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它宣布支持英帝国主义去反对它的德国对手。1942年夏天，殖民当局开始采取残酷镇压民族运动的政策，他们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禁止国大党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却让共产党合法化，而这个党自从1934年以来一向是处于非法地位的。<sup>〔127〕</sup>

同是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和戴高乐举行了会晤，这件事我们前面已经提过。<sup>〔128〕</sup>为了不但报答英美的援助，而且也报答这位法国将军对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支持，苏联外交部长表示莫斯科将出面斡旋，说服法国抵抗运动和法属殖民地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权。此后不久，法国共产党就开始执行这样一种政策——前面已经考察过了——，即俯首听命于戴高乐，并努力保卫法兰西联盟。

在这一年中，苏联政府始终支持着英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工具，即流亡在伦敦的王室政府和米海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苏联政府对铁托的敌后游击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革命政策，采取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的“民族团结”立场。

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军事方面产生了明显好转的有利形势。这时，斯大林又开始在1941年边界问题上重新施加压力。3月，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同意在卡累利阿、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但他们还是坚持艾登的反对意见。罗斯福表示，他们也许不得不遇事都要作些让步，但必须以苏联的让步作为交换。<sup>〔129〕</sup>美国的新闻界和官员们就公开提出这样的要求：斯大林应该提供更加明确、更加可靠的保证，说明他已经最后放弃了“煽动世界革命”的想法。

具有高度权威的《纽约时报》在1942年11月20日承认，苏联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值得注意的进步：“斯大林提出的口号……并不是敦促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爱国主义、争取自由和保卫祖国的口号”。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认为是不够的。为了激起人们对同盟可能破裂而使朋友变成敌人的忧

虑，《纽约时报》写道：如果今后还继续存在“一个受托洛茨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所鼓动的共产国际”，那么，希特勒德国就可能说服许多国家相信有必要加入反苏十字军运动。

1943年3月9日，恰当地被看作是同苏联合作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如果俄国再次采取托洛茨基那种煽动世界革命的观点，那么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13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苏联人答应了这些要求，而这里也就无须再来重复本书第一编中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分析了。但是，解散共产国际所标志的并不是什么放弃“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观点（美国人把世界革命理论说成是“托洛茨基的”，是为了让收到他们这个信息的那个人更好办事，这是一种狡猾手段），而是放弃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经历的可怕危机引向革命结局的任何打算。当然，这种结局所必需的条件，事先是无法预知的。当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这些条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力量所采取的方向。可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所指出的方向，却意味着事先就把无产阶级和群众的奋斗目标加以限制，使这些目标降低到能为三大国的“永久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容的水平。而为“三强”所允许的具体和实际的规定，则完全是按照他们之间秘密协定的进程而作出的，根本不让人民有起码的表示意见的机会。如果把问题说得更确切些，这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纳粹占领下的许多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则通过英美资产阶级）有相当充分的机会来影响西方两位领导人的决策，而欧洲的无产阶级，更不用说殖民地人民，却无法影响代表他们最高利益的那个人的决定。各国共产党唯一的机会，就是自行采取独立自主的革命政策。可是，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的奴仆，铁托是个例外，但他也只不过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个道理罢了。结果，群众包括一般共产党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渐渐习惯于“大同盟”和“民族团结”的精神，习惯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靠阶级合作，习惯于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同资本主义宗主国进

行协作。

托洛茨基在1936年评论1935年的法苏条约时，申述了列宁的思想。他说：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法苏条约，任何一位严肃的革命政治家都不会否认苏维埃国家的这种权利：为了不受敌人的侵犯，它可以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签定临时协定，以取得辅助性的支持，但是必须公开地明确地告诉群众，这种局部的、策略性的协定在整个历史动力的体系中所占的地位。为了利用两国之间，譬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局面，我们绝对不要把法国这个资产阶级盟国理想化，或者把暂时戴着国际联盟面纱的帝国主义大联合理想化。可是，苏联的外交，还有紧跟苏联外交步伐的共产国际，却系统地替莫斯科那些同床异梦的盟国涂脂抹粉，把它们说成是“和平之友”，利用所谓“集体安全”、“裁军”之类的口号来欺骗人民，从而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的代理人。〔131〕

如果托洛茨基没有被暗杀，他可能会看到三十年代那种把帝国主义“理想化”的做法近乎小孩撒谎，同四十年代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对群众的欺骗程度，也可以这样来类比。“大同盟”，披着“联合国”外衣的帝国主义大联合，还有同欧洲资产阶级结成的那种同盟关系，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仅能够解决击败轴心国的最紧迫的问题，而且还能够用来建立新的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社会正义，等等。这些最抽象的、毫无阶级内容的概念风行一时，以适应“理想化”的需要。

美国各家大报纸对解散共产国际迅速作出了反应，表示欢迎。它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一种“比斯大林格勒和邦角\*的胜利重要得多的外交胜利”。报纸的主笔们高兴地写道：“全世界又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托洛茨基的过时的愚蠢计划被抛弃了，马克思

---

\* 系突尼斯东北部一个小半岛，盟军于此获大胜。——译者

的梦想完蛋了。”《芝加哥论坛报》甚至说，“斯大林已经埋葬了马克思主义的苦行僧，他对那些追求尘世的天国，立志要闹世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们执行了死刑。”美国政府的喉舌《纽约时报》要求美国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紧接着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譬如要求莫斯科放弃对波兰爱国者的支持；要求南斯拉夫敌后游击队承认伦敦流亡政府；要求法国共产党参加“真正的祖国统一事业。”<sup>〔132〕</sup>第一个要求是白费唇舌，因为斯大林不打算在“波兰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至于对南斯拉夫人的要求，西方仅仅在表面上得到了满足，虽然这不能怪斯大林，只能怪铁托。而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参加所谓“真正的祖国统一事业”却满足了美国这家主要报纸及其后台老板的最不可告人的私愿。

历史的列车一旦失去了车头（马克思曾把革命比喻为历史的火车头），“三强”就可以畅行无阻地、平平安安地把它们的“永久的和生死攸关的利益”变成明确的决议了——只要这种野心勃勃的行动是处于那位“伟大的火车司机”的控制之下，情况至少就会是这样。

这个新阶段的第一个里程碑，就是苏、英、美三国外长（还有蒋介石的代表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强调指出，只有保持三大国之间“最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最密切的合作”，才可能在战争状态一旦结束时“维护和平，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福利。”

会议还规定了其他的措施，如规定意大利在推翻墨索里尼之后应该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同时规定巴多利奥政府应该向轴心国宣战。对于“三巨头”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来显示一下他们多么懂得运用《大西洋宪章》所提出的、并得到苏联承认的那些原则。他们一致同意战争一旦结束，就给意大利人民“最后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但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盟军当局不仅在有关军事指挥方面，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掌握着真正权力。在这一时期

中——盟国预料将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事实上也的确持续达两年之久——意大利人民不过保留着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后选择政府的权利，可是盟国当局却行使权利来建立一种使意大利人民适应盟国的意愿的政治结构，从而防止在人民终于能行使其权利时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为了保证政治局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而采取的第一个具体措施，就是不顾主要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悍然决定让巴多利奥继续担任政府首脑。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陶里亚蒂怎样运用他的威望和政治手腕，在促使意大利共产党和整个意大利左翼服从“三巨头”的计划，促使他们走上《纽约时报》所怂恿的“真正的祖国统一”的道路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纽约时报》只提到法国共产党，因为那篇社论是在墨索里尼垮台前夕写的。）

苏联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也和它在“法国问题”上的立场一样（它支持戴高乐并使法国共产党服从戴高乐的领导），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时所作出的选择——其实在他同艾登的会谈中，我们已经可以部分地看到这种选择了。概括地说，他所选择的就是在西欧作出（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让步，以便保全东欧。既然他是以“瓜分”世界作为其战略基础，当然也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推行这种战略的手段是调遣军队，而不是发动人民群众。如果斯大林把欧洲的革命斗争作为一个主要因素纳入他的战略之内，那么，法西斯垮台以后的意大利局势将给这种战略提供最好的机会。例如1943年春季震撼北部意大利的罢工浪潮和那年夏季无法压制的群众运动，就清楚地表明了意大利的社会危机即将转变为一场革命危机。以后几个月中，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巨大影响下，敌后游击运动迅猛发展，敌占区上百万工人举行震撼人心的总罢工，都进一步证实了革命危机即将到来。（133）

以盟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以意大利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唯一真正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这一斗争究竟是象在南斯拉夫那样有助于加强意大利社会危机中的革命因



索，还是相反，冲淡这种革命因素，这主要取决于意大利社会中的进步力量所采取的方向，但苏联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施加巨大影响的。即使斯大林严格遵守联合国的原则宣言所规定的范围，他也可以拿有必要充分调动一切抗德力量作理由，不仅在秘密协商中，而且公开要求立即承认意大利人民——在抗击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作出如此辉煌榜样的人民——享有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主权，要求承认意大利人民有权立即在解放区，并且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在更加广泛的地区，选择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机关，也就是说，运用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权力来选择政府。斯大林满可以这样说：“只有这样，只有当意大利人民知道他们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够把他们在战斗中的士气，把他们的干劲和主动性提高到最高的水平，从而对盟军的军事行动作出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对意大利人民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就会向欧洲其他各国人民表明三大国的诚意，鼓励他们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们可以告诉德国人民，如果他们象意大利人民推翻墨索里尼那样推翻希特勒，三大国将会立即承认新的民主德国的独立和主权。”这样的立场将使苏联赢得意大利真正的民主爱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有助于揭露伦敦和华盛顿政策的欺骗性。这样一种态度对于欧洲其他各国人民也将发生同样的作用。可是，斯大林在“意大利问题”上却帮了盟国的忙，而意大利共产党又帮了斯大林的忙。

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在对待戴高乐的态度和对待解散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上一样，斯大林为自己辩护的主要理由是：为了确保对德战争的胜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盟的破裂。苏联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说法不断重复着这一理由，而西方各国共产党领袖们更是应声虫似地用这个理由同时为他们自己的政策辩护。既然这种辩护关系着斯大林一直到战争结束时的全部政策，那么，还是等到我们逐一揭露了斯大林向他的两大盟国那种帝国主义的反动目的所作出的全部让步之后，再来进行分析吧！

当外交部长们一旦清除了障碍，作好了准备，“三巨头”就可以亲自到德黑兰去举行会晤了。下面是这次会谈联合公报的一部分：

我们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一起审议了未来的问题。我们将谋求一切国家不论大国和小国的合作和积极参加，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和我们自己的人民一样，都真心实意地致力于消除专制、奴役、压迫和迫害异己等现象。我们将欢迎他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参加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

既然斯大林亲自签字作出了这个庄严的诺言，简直可以说已在着手建立一个最终将废除专制、奴役、压迫、迫害异己等现象的和平民主的世界大家庭了，那么，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又有什么理由怀疑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诚意呢？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大同盟”体系中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就有了更强有力的根据。因为只要战败了德国，一切问题都会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所以，当前的主要工作就只是把那些同赢得战争有着切身利益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利害关系——的一切人们的努力汇集和联合起来就行了。这样，在意大利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在盟军司令部的最高指令之下实现统一和集中呢？如果到了战后人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按照预定的安排，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罢了。在人民大众的意志面前，凡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一切利益都将靠边站。不管怎样，这是当时“三巨头”所许下的诺言，又有什么桀骜不驯的资产阶级能够抵挡“三巨头”的主宰一切的意志呢？

“三巨头”在向全世界公开重申他们的大公无私的目标的同时，却在德黑兰会议上秘密地继续完成他们的艰苦的任务——就是详细规定实施这些目标的具体方式。为了向斯大林让步，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把寇松线作为波兰和苏联的边界；为了补偿波兰的损失，于是把德国领土远至奥德河一线划归波兰。斯大林接受了这种让步，不过仍向他的合伙者们表示，他将乐于把柯尼斯堡及其周围的地区据为己有。丘吉尔并不反对这种安排，因为波兰人将会非常乐于用他们的普里佩特沼泽地，换取西里西亚富饶的工业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苏联需要一个不冻港，这是非常自然的、合乎情理的。罗斯福还特别向斯大林指出，他可以重新获得旅顺和大

连。这两个海港本来是沙皇从中国夺来的，后来在日俄战争中又被日本从沙皇手中夺走了。至于被苏联占领的芬兰领土，斯大林则拒绝放弃。丘吉尔毫不客气地提醒他，1917年苏联曾经宣布它是拥护建立一种“不要割地和赔款”的和平的。斯大林“笑嘻嘻地”回答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正在变成一个英国保守党人呢！”〔134〕至于德国，“三巨头”一致赞成肢解这个国家。他们集中讨论了瓜分德国的方法。不过，德黑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表面看来，这似乎纯粹是一个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美国人赞成把第二战场开辟在法国。按照苏联历史学家德波林的说法，这是因为美国想要在西欧树立自己的势力，削弱英国的地位。英国人则建议把战场开辟在巴尔干半岛，因为按照这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人想要保卫他们在这地区的利益，阻止“苏联的侵入”。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坚持他的巴尔干计划，“但是苏联代表团指出这个计划同尽快打败德国人的任务毫不相干，实际上是别有用心”。〔135〕但从德波林本人后来更加详尽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现有的德黑兰会议纪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苏联代表团事实上根本没有提到什么英国人的“别有用心”，他们仅限于从军事效果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他们赞成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所提出的唯一理由，他们得到美国人的全力支持。不过，不论第二战场开辟在法国还是在巴尔干，斯大林始终是以这样一种基本的政治选择作为指导思想，他希望这种选择能一箭双雕：既可以使他在东欧获得行动自由，又能有助于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在打败德国和日本以后，这种矛盾将使帝国主义强国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他希望被战争严重削弱了的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同渴望取代他们的地位来剥削全世界的美国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深。

斯大林为了能在东欧放开手脚地干，在西欧向他的盟国所作出

的一些主要让步中，最伤天害理的莫过于在西班牙问题上的让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贯坚持他们在1936—1939年所奉行的对西班牙的政策。罗斯福在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正当盟军在北非登陆之际，写了一封信给佛朗哥，他在信中把自己称为“你忠诚的朋友”，并且“向他保证他用不着害怕美国。”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策略手腕，而是表明了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丘吉尔1944年5月24日对英国下议院所作的恬不知耻的声明也是这样。声明说，西班牙的内政是西班牙人自己的事情。

从结成反对希特勒联盟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默认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西班牙政策。苏联政府1941年9月24日关于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到西班牙，而且在苏联的任何战时文件和斯大林的任何公开声明中都没有提过。不仅这样，从1941年底斯大林企图着手改变欧洲地图的斯大林—艾登会谈起，经过德黑兰和历次外长会议，直到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三强”间的协商的记录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西班牙：这就是说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一直是动不得的。

然而，在欧洲事务中，斯大林很少遇到象佛朗哥主义那样的问题，在政治上有如此充分的理由足以采取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去对待。这不仅是因为西班牙人民在三年的斗争中是第一个起来抗击轴心国的人民，也不仅是因为佛朗哥主义是轴心国武装干涉的产物，而是因为这样一个极简单的理由：佛朗哥是在同苏联交战，“兰色师团”是入侵苏联领土的敌军的组成部分。所以，苏联向佛朗哥的西班牙宣战，并且坚持要求流亡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应该象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的流亡政府一样，被承认为唯一合法的政府，这样两件事是会赢得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公众的支持的。

但是，在大战期间，斯大林不肯稍许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他丝毫也不想保证在打败法西斯之后，也让曾为此而浴血奋战的西班牙人民得到一点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班牙仍维持着法

西斯独裁政权，这是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最为明显的恶果之一。波茨坦会议在苏联倡议下，通过了把佛朗哥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不值一顾的决议，但这也不足以解脱苏联对这个政权在轴心国垮台之后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所应负的历史责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第二战场的问题吧。1941年6月以来，斯大林一直坚持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把这一点说成是取得对德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确实确实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解散共产国际的直接目的，本书第一编第一章谈到过，实际上就是为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协议铺平道路。斯大林在盟国对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我们分析过，这种让步还掩盖着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计划。1944年5月1日，斯大林发布“五一节命令”，再次坚决声明：只有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才有可能打败德国。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他对“德黑兰会议关于对德联合行动的决议”“准时”付诸实施赞不绝口。斯大林说：“决议贯彻得卓有成效，这是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巩固的显著标志之一”。〔136〕

各国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亦步亦趋，三年来也为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大叫大嚷。毋怪乎共产党的报刊要为盟军登陆大吹大擂：“全人类天天祈求、日日想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137〕1947年以来，“大同盟”垮台后，克里姆林宫为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要求所迫，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事实充分暴露了在开辟第二战场背后的秘密打算），不得不来戳穿自己编造的神话。于是，苏联历史学家获准透露这段历史了，当然他们的批评仍不得涉及可能使人们就莫斯科在“大同盟”时期的政策提出批评的那些难堪的问题。现在还流行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可归结为下列三点：

1. 英、美在欧洲方面军事行动的策略的中心思想，就是尽可能让德国与苏联两败俱伤，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盟国的军事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能以雄厚的实力进行干预，强制签订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对苏的军火和食品援助，严格控制在使德国不能取胜

而德苏决战能拖延到“时机一到”所必需的限度之内。

2. 1943年，英、美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以及1943年春季和夏季苏军进一步给敌军以重创后，德国的厌战情绪日益明显，而苏联却越战越强，武器制造和人力动员方面如此，军队的士气方面也是如此。同时，德占区抵抗运动的规模使英、美领导人惊恐万状。“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再拖下去，战后美国的地位就有大大削弱的危险。英、美领导人深感有大力改变政策的必要。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就这么做了。”<sup>〔138〕</sup>会上，丘吉尔力图保住英国的利益，要求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但美国强迫通过了符合它的利益的决议。决议通过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立即动身去德黑兰。在德黑兰，英国首相又把他的巴尔干计划提了出来，但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态度一致，主张在法国登陆。

3. 1944年头几个月，“已经可以看清楚，苏联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打败纳粹德国，解放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sup>〔139〕</sup>此外，“法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转变为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大起义的趋向，使世界反动派深感不安”。伦敦和华盛顿似乎看到了这种前景，最后拿定了主意，于是盟军抱着“阻挠西欧国家民主化，切断苏军通向西方的道路”<sup>〔140〕</sup>的唯一目的，在诺曼底登了陆。

苏联关于这段历史的说法是以对西方文件的扎实分析作根据的，而且为美帝国主义派军队踏上欧洲大陆之日起执行的政策所证实。苏联历史学家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所以能尊重事实——撇开这种须经“党的审查”的说法必不可免地带有的简单化和宣传的成分不算——，是因为1947年以后，莫斯科毋需继续就这段经历伪造历史了。相反，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倒需要说明真相了。从此，苏联历史学家又能够用上阶级利益这个可靠的工具，说伦敦和华盛顿军事上政治上的决策是受阶级利益支配的。话又说回来，假如认为英、美制定策略是出于有意加强苏联并使欧洲工人政党掌权，那也真是荒谬绝伦了。

1943年底和1944年初，认为苏联只凭自己的力量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力量就能够打败德国和解放欧洲的，不仅仅是苏联人。1943年11月，罗斯福就说过：“俄国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到明年春天就可能没有必要开辟第二战场了。”〔141〕1944年5月，罗斯福的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在一份分析当时力量对比的报告中提出，如果“大同盟”破裂，与苏联打起来，那么，美国是打不败苏联的，至多只能保住英国。“换句话说，我们就会卷入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之中。”〔142〕这里必须估计到这个情况：美国那个时候正处于与日本交战的艰苦阶段，而苏联由于1941年签订了苏日条约，得以使远东战线平安无事。

因此，开辟第二战场并不象斯大林说的那样，是打败德国的必要条件，而是预防西欧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危险的必要条件。这只不过是在欧洲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方面，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斯大林是在“大同盟”开始形成时期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从那时起，他一心想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和苏联的宣传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言论——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无非是鹦鹉学舌——不是向欧洲各国人民说明，他们的解放首先必须是自己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这是他们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道路；不把南斯拉夫建设民族解放军和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树为榜样，鼓励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解放运动走那条道路，而是在人们中散布幻想，说什么英美军队执行的是解放的和民主的使命，助长那种把武装的抵抗运动看作是辅助的、次要的力量的倾向。

这种态度随着战局对苏军有利而更加坚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声明中，语气最坚决的不是1941年，也不是1942年的声明，虽然当时苏军处境最困难。1943年春，恰好与解散共产国际同时，声明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烈，到年底就更强烈了。语气最强烈的声明就是前面提到的包括在1944年5月1日“五一节命令”之中的那一次。在“命令”中，斯大林宣布苏军准备把侵略者从祖国领土上赶出去之后，接着说，要完成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任务，必须“苏、英、美三国共同努力，由我军从东边出

击，盟军从西边出击，一同歼灭敌人”。斯大林坚持认为：“无疑，只有这种联合的打击才能彻底摧垮希特勒德国”。<sup>〔143〕</sup>

这番话等于是盟军登陆前夕向西方各国共产党建议（或者说，发出命令，因为这出自斯大林之口）：抵抗部队的一切行动以及民族的一切政治目标都应服从英、美军队的行动和目标。正是这条戒律——我们看到，法共和意共在实践中是严格遵守了的——导致希腊共产党在瓦尔基扎投降。

一方面斯大林坚决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说这是打败德国、解放德占区的人民所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他又从思想方面找理由，强调他要求欧洲左派服从盟国是正当的。他说：“大同盟”越来越团结一致，“三大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各国人民是可以信任它们的。随着联盟内部的矛盾加剧——日丹诺夫1947年追述过这个问题，苏联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以后也都说明过这一点，而且按理说，既然对德斗争是唯一能使联盟维持下去的有力因素，一旦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斗争胜利在望，联盟内部的矛盾不可能不加剧——，随着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的发展，斯大林加大了蒙汗药的剂量。

1944年10月9日，苏军开始越过苏联国境，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推进。这时，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划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达成协议。一句话，斯大林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愿意怎么办，丘吉尔“悉听尊便”，只要斯大林让他在希腊可以为所欲为，在南斯拉夫可以当半个家。<sup>〔144〕</sup>“各族人民的父亲”慨然接受了这笔交易。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讲话中，把“三大国”的团结一致吹得天花乱坠，而且预言这种团结的寿命是很长的。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最清楚不过地亮出了这个观点：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联盟，不是出于“偶然的、暂时的”动因，而是以“生死攸关的和持久的利益”为基础的。斯大林说：自然，不时会出现些分歧，但是

令人惊讶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分歧是如此之少，而且几乎每



一次三大国照例都能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加以解决。有点分歧无关大局，要紧的是它们并未超出三大国团结的利益所允许的范围，而且最终都能根据团结的利益来加以解决。

斯大林为了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有理，提到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讨论以及新近关于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机构的讨论，接着他又说：

最近在莫斯科与英国政府首脑丘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举行的会谈，是联合国阵线巩固的更为明显的一个标志。会谈是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sup>〔145〕</sup>

这次会谈极其无耻地秘密完成了对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瓜分，斯大林给予丘吉尔出动英国海陆空三军反对希腊人民的“自由”（斯大林11月7日给艾登电报中的用词<sup>〔146〕</sup>）。这种秘密外交中无视一国人民民族自决权的典型事例，竟然被斯大林——选择了十月革命节这样的场合——说成是三大国团结一致的最明显的证据。

英国对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干涉激起英美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主要报纸都表示反对。工会、几乎全体工党议员以及一部分自由党人都谴责这次行动。丘吉尔所提出的信任案，在下院615名议员中，只有279人投了赞成票。根据罗斯福儿子的材料，罗斯福对英国的做法也大为愤慨。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重申美国支持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反对任何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sup>〔147〕</sup>

这一切说明，政治形势特别有利于苏联表态支持希腊民主派。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阶段，象丘吉尔所采取的那种公开的反动行动，只会引起最广泛的反感。而苏联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却享有巨大威望，何况当时的军事形势也是再有利不过的了。10月，苏军已抵达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德军残部不得不撤离希腊半岛，因而半岛就完全处于抵抗部队的控制之下。在比雷埃夫斯登陆的英军仅有一片立足之地。如果没有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秘密协定，一小部分苏军的队伍就可以继续南下，直指雅典，与英国远征军“会师”。这样的军事行动，如果再由莫斯科发表类似斯退丁纽斯

所发表的那样的声明加以支持，一定会粉碎丘吉尔的计划。但是，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一项军事或外交行动来保卫希腊的抵抗运动，不仅在英国坦克与飞机扫射雅典居民的三十多天里一声不吭（这简直是犯罪！），反而还向希腊共产党施加压力，让他们同意在瓦尔基扎投降——这远非力量对比的不可避免的结果。<sup>〔148〕</sup>

正当丘吉尔把大量的坦克和飞机投入反对希腊抵抗运动的小战场时，冯·龙德施泰特在阿登突破了盟军的防线，英美军队面临又一次敦刻尔克撤退的危险。<sup>〔149〕</sup>（英军于12月5日开始向雅典进攻，德军在同月16日向比利时进攻，两次攻势都一直进行到次年1月中旬。）1月6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要求他提前发动原定1月底发动的攻势，以解盟军在主战场之围。斯大林完全可以提出质问，为什么盟军不在亚平宁战线出击，为什么不把在希腊反对希腊人民的装甲师和空军调到亚平宁战线去，盟国在那里展开攻势还可以得到活跃在德占区的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么做，反而立即答复丘吉尔：即使东线气候恶劣，难以动用飞机和大炮，苏军也即将提前发动攻势。斯大林的电文如下：“请放心，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盟国的英勇部队。”<sup>〔150〕</sup>五天之后，苏军果真在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战线出击，根据古德里安将军的回忆录说，终于迫使希特勒“只得在西线转为防御，以便把部队调往东线。”<sup>〔151〕</sup>

苏联官方历史解释说，斯大林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早就知道——希腊事件可作证明——盟军在西欧登陆是为了“完成它们自己的处理德国的帝国主义计划；拯救那支反动的军队，使它不致全军覆没；阻挠西欧国家民主化；切断通向西方的道路。”<sup>〔152〕</sup>斯大林知道，12月8日，即冯·龙德施泰特强大的攻势展开两天之后，英军不是从希腊开往意大利，在亚平宁半岛出击，以解盟军的阿登之围，而是相反，从意大利开往希腊。<sup>〔153〕</sup>斯大林知道，西线已不是对德胜利的必要条件了，从1944年初就不是了；他知道，苏军在欧洲抵抗运动的配合下，完全可以决定最后的命运。但斯大林为了帮助“盟国的英勇部队”，毫不犹豫地让苏联承担更多

的损失。因为在气候恶劣难以动用飞机和火炮的条件下发动攻势，并把西线德军的一部分吸引到东线来，必然产生不利后果。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决定毫不含糊地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使英、美军队能更快地向德国心脏地区推进，同样也使希腊抵抗战士遭到更多的攻击，并让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盟军有更多的行动自由来对付抵抗力量威胁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任何行动。

重复官方说法的苏联历史学家为斯大林1945年11月7日的决策辩护说，苏联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无私地、光荣地、始终不渝地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给盟国以必要的帮助。”〔154〕如果我们抽掉“无私地”和“光荣地”这两个词，那么，辩护士的这段话倒把斯大林行动的真实意图一丝不差地和盘托出了。斯大林确实是“始终不渝地履行”他对帝国主义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同样“始终不渝地”不履行对欧洲革命应尽的义务。

不过，除了象上面所引的这类含混的、寥寥无几的话外，苏联官方历史没有说明促使斯大林1945年1月7日作出决定的直接原因。联系斯大林整个政策——“承担的义务”——来看，一般的原因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当时一定还有些考虑对作出决定也起了作用。苏联历史学家没有透露当时的想法，仅仅有所暗示。他们强调说，德国在阿登展开攻势有其特殊目的，它要以突然袭击来教训盟国，让它们懂得与德国单独媾和是有利的。〔155〕斯大林的“慷慨”行动很可能是为了向盟国表明，与苏联结盟，苏联对英、美实现其在欧洲大陆的计划能提供如此慷慨的帮助，这对它们的好处该多大呵！换句话说，斯大林想避免单独媾和的威胁。我们将会看到，一旦问题涉及到已经商定的苏联“势力范围”，他是不惜孤注一掷的。为了避免单独媾和的可能性，他准备作出让步，不过这种让步只能影响英、美“势力范围”内的而不是他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利益。

当2月初“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谈时，瓜分欧洲的工作早已在

扎实进行着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内容外，1944年就在德国划分占领区的重大问题初步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很容易就为雅尔塔会议所认可。毫无疑问，“三大国”都认为这不过是临时安排，而且符合各自对待德国的长期计划。据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看来，易北河一线满足了苏联安全要求的最大奢望而有余。（恩格斯有过犀利的预见。他在1853年写道：产生泛斯拉夫主义神话的俄罗斯扩张主义不达到它的“自然边界”是不会满足的。这个“自然边界”约莫是从但泽或从斯德丁施特延到的里雅斯特一线。<sup>〔156〕</sup>另一方面，英、美资本家自然也满意了，因为他们抓到了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

关于欧洲的其余部分，虽然“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划定，还必须要解决西方盟国在苏俄控制的地区内“分享部分势力”的问题。斯大林通过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方式，在英、美控制的地区内占有“部分势力”，同样，罗斯福和丘吉尔虽然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在这些国家占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立足点的念头。例如斯大林—丘吉尔秘密协议就有关于“势力范围”和“分享部分势力”的条款。希腊必须成为英、美绝对控制的地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苏联控制的地区。但是，在英、美的附庸希腊王国的机构里，希腊共产党也应有百分之十的“势力”。如果他们当时满足于这个小小的百分比，丘吉尔也就没有必要用炸弹来使他们就范了。一旦协议的条款显示了力量——仅在雅典，人民解放军就有一万三千人阵亡——一旦希腊共产党人在瓦尔基扎协议中同意全国的民族人民解放军解除武装，那么丘吉尔遵守他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并不反对根据协议让希腊共产党在以乔治二世和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象征的民主制度中合法占有分配给它的一席之地。

既然丘吉尔十分严格地遵守答应了给斯大林在希腊占有的百分比，斯大林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里也得照办不误。雅尔塔会议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具体要解决的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对南斯拉夫，“三巨头”仅限于明确建议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应立即付诸实

施。<sup>〔157〕</sup>与以往几次会谈一样，雅尔塔的难题也是波兰问题。

斯大林把波兰看作是保障苏联安全的防御体系的中心环节，因此新的波兰国家必须在一切领域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保证。可是，真正亲苏的力量在波兰十分软弱。苏德条约期间，斯大林把波兰当作敌国，把波兰人民当作敌人。他无所不用其极，因而产生了可以预料到的致命后果，激化了波兰民族主义的、传统的反俄情绪，这种情绪只有波兰人对德国的恐惧感才能与之相比。甚至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团体也没有逃过斯大林的打击。<sup>〔158〕</sup>因此，波兰主要的抗敌力量以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在1939年，这些政党就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西方同盟国承认它是波兰的合法政府。

因此，斯大林为了保证波兰成为一个他所需要的，绝对亲苏的国家——防御体系中的可靠环节——对民主的发展不能作丝毫的让步，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他只得依仗权势，采取措施，建立一部由苏联保安机关严格控制的国家机器，对军队和警察尤其要这样控制。为此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摧毁有组织的抵抗武装。这支武装很强大，为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所操纵。这批领导人由于政治目光短浅，1944年在华沙举行了条件不成熟的起义，这就使斯大林的计谋更容易实现了。德国军队对波兰民族抵抗力量做到了不久之后英国军队对希腊革命力量所做的事。<sup>〔159〕</sup>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波兰人民对波兰进入俄国防御体系持敌对态度这个基本问题仍未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斯大林的“安全”要求准备大大让步，但坚持要在新波兰“分享部分势力”，而且坚决要求波兰应表面上保持民主制；他们两人都受到舆论的很大压力，因为战争一开始，舆论就同情波兰的事业。他们终于在雅尔塔说服斯大林“扩大”在克里姆林宫拼凑而成并由苏军安置在华沙的临时政府，让流亡政府所支持的几个头面人物参加进去。新的临时政府应尽快组织大选，通过大选产生正式政府。

西方“两巨头”一回到各自的首都，立即获悉他们的东方同伙

丝毫不打算实行上述诺言。斯大林坚持只限于同“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愿意真心实意同苏联合作的人”〔160〕商讨组成新的波兰政府的问题。在确定波兰政府成员候选人的思想中对苏联友好和真心实意的程度方面，谁又能比得上斯大林本人呢？斯大林理直气壮地要求他在这方面所提的条件必须得到承认，而这一步就有使西方在波兰的“部分势力”大大小于苏联在希腊的“部分势力”的危险。西方两位领导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最后一批电报中，有一份几乎毫不掩饰地警告斯大林说，任何“把华沙现政权稍加打扮继续保存下去”的解决方案，都可能导致“大同盟”的破裂。〔161〕丘吉尔也同时给苏联领导人发去了类似的电报。

当时恰巧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纳粹与西方同盟国单独媾和第一次大有实现的可能，联盟破裂的危险似乎更加现实了，但斯大林仍不为所动。3月中旬，盟军最高司令部与德军最高司令部双方代表在瑞士秘密谈判。谈判开始之后，西方大国无疑怕对方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随即照会莫斯科，为谈判找个借口，说是讨论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德军可能投降的问题。苏联政府要求参加，英、美予以拒绝，莫斯科就更加疑心了。4月3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罗斯福就波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是4月1日发出的），声称确悉西方通过在瑞士的会谈已经“与德国人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西线德军司令官凯塞林将军将为英、美军队敞开防线，任凭它们往东调动。作为交换条件，英美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战条件。”斯大林接着说：因此，“目前的情况是：西线德军实际已停止对英、美作战，同时，却继续对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162〕

几天之后，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1941年，杜鲁门曾向《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说，他认为德国和苏联两家谁看起来能打赢，美国就应该支持谁。〔163〕因而形势就更加紧张了。但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仍不让步。4月24日他给杜鲁门和丘吉尔的电报中，恬不知耻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三巨头”互不干扰，各自去

决定在它认为对它的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国家里建立怎样的政府：

另一情况应当估计到：波兰与苏联接壤，而不与英国和美国接壤。

……你们显然不同意说苏联有权要求波兰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联不能同意波兰存在一个敌视苏联的政府……我不知道希腊是否建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也不清楚比利时政府是否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成立这些政府时并没有跟苏联商量，苏联也不要求干预这些事情，因为它懂得比利时和希腊对英国的安全有多重要。我不理解为什么讨论波兰问题时就根本不考虑考虑苏联在安全方面的利益。〔164〕

在外交战线上斯大林为在波兰取得丘吉尔在希腊享有的那种“自由”而奋斗，同时他又命令苏军和保安机关开始有步骤地消灭不是共产党组织的抵抗力量。他不惜采用种种卑鄙的方法。例如，苏军当局邀请抵抗力量的主要军政领导人进行友好会谈，答应采取保卫措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是，他们一到预定的开会地点，立即全体被逮捕，并被秘密押送到莫斯科监禁起来。几个月之后，在苏联军事法庭上，他们受到审判，被指控为对苏军进行破坏活动，判处十年徒刑。许多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也都这样遭到逮捕，而且不经审判即被处决。〔165〕

我们将会看到，如果事态发展危及到莫斯科对历史注定属于苏联防御体系的国家的控制，那斯大林就会孤注一掷，即使“大同盟”破裂也在所不惜。但是，与此同时，多列士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解除了抵抗部队的武装，使共产党服从戴高乐的领导，据说是为了使联盟不致有破裂的危险。就是这个借口断送了好端端的抵抗运动，意大利北部蓬勃开展的抵抗运动，也是以此为借口向盟国缴了械；希腊共产党人也因此而同意民族人民解放军解除武装。斯大林为了维护他所控制的苏联防御体系的主权，不怕冒与盟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他同时又坚决认为，英、美“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人，都应该把任何可能引起同样冲突的革

命活动，看成是犯罪行为。如果这种革命活动招来了英、美的武装干涉，那就休想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只要西方干涉不影响到苏联的防御）：希腊就是前车之鉴。

有关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和分享“部分势力”问题，除涉及德国、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外，雅尔塔会议未作详细讨论。

（必须指出，关于德国，会议不仅划定了占领区的边界，而且对肢解德国也已达成协议，并组成“三国委员会”进行研究。）<sup>〔166〕</sup>至于其他欧洲国家，三大国就“他们认为当形势要求”共同进行干预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达成了协议。实际上，会议确认原来一切有关瓜分欧洲的协议都继续有效。

但是，雅尔塔会议讨论的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一份秘密条约草案规定，一俟欧洲敌对行动结束，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日本战败后，“因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而遭到侵犯的一切原属俄国的权利”将予以恢复。苏联要收复萨哈林岛及其邻近岛屿；中国将旅顺港租借给它，大连成为国际港；中东和南满两条铁路由中苏合营。一句话，苏联要把沙皇在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时获得的军事基地和租界全部收回。而且还要添上原来属于日本的千岛群岛。三国外长在雅尔塔也谈到了英、苏在伊朗瓜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讨论了莫斯科想分享一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的愿望。

因而，雅尔塔会议是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掩饰这种瓜分、并把“三巨头”打扮成和平、民主和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守护神的大骗局的高峰。包括几百万共产党员在内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所签署的庄严声明深信不疑。声明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在克里米亚会晤，重申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维护和加强目标与行动的一致，这种一致已经使得联合国在这次战争中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三国政府对我们的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神圣义务，

只有我们三国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继续加强合作，增



进了解，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可靠的、持久的和平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将保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能够免于恐惧，免于匮乏自由地度过一生”。

### 斯大林机会主义的破产

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以后几周内的所作所为，多么出色地表明了他们保持“目标与行动的一致”的“共同决心”，以及他们怎样“继续加强合作，增进了解”，以建立“可靠的、持久的和平”。西方大国谴责斯大林不尊重有关波兰的协议。斯大林谴责西方大国与德国单独谈判。导致紧张局面的新因素与日俱增。丘吉尔表现得特别猖狂。他极力想使美国领导人相信，他本人昨天还吹捧为英勇而忠实的盟友的苏俄，实际上是“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德国投降后第四天，他写信给杜鲁门说：“苏军前线铁幕已经拉下。我们不知道后面在干什么勾当”。他建议罗斯福的继承人逼斯大林作出新的让步，否则美军就不撤出根据雅尔塔协议应包括在苏联占领区之内的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sup>[167]</sup>（由于德军让了路，美军在苏军之前到达，占领了这片土地。）

丘吉尔这种神经质的猖狂态度，反映出当时英国地位的虚弱。英帝国主义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在巴尔干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在中东的利益，的确是面临“致命的威胁”。它威胁到英国对外政策经久不变的前提，即维持欧洲的均势，防止任何一国在欧洲大陆称霸。英国经过战争大大削弱了。它在财政上完全受美国支配。军事上远远不能与其他“两大国”相匹敌。不仰仗美国的保护，英国在苏联控制区分享“部分势力”的愿望就有落空的危险。丘吉尔还怕两个“超级大国”对全世界的安排达成协议，而不考虑甚至损害英帝国的利益。正如同苏、美之间有矛盾一样，美、英之间也有矛盾，斯大林还真指望这一着呢。这就是丘吉尔在外交上不放过最小的机会来破坏苏、美关系的原因。

英国与法国一样，主要希望能保住它的殖民帝国，而强大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目的却是要摧毁一切阻挡它进行世界扩张的障碍。罗斯福理想主义的实际含义不过如此而已。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几个月，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庄严宣布：“今后不再需要什么势力范围、联盟、均势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特殊安排了。在不幸的过去，各国才要凭借这一切来保障本国的安全和促进本国的利益。”<sup>〔168〕</sup>这个开放的，而且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世界，是美国超级资本主义的理想世界：这是它庞大的工业机构——其生产在战时增长了一倍——梦寐以求的市場，也是足以容纳它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的投资場所。不应把世界分成许多个势力范围，只应有一个世界性的势力范围，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罗斯福及其同行把与苏联的合作也包括在他们对未来的设想之中；他们认为，美国工业为苏联的恢复提供帮助，对两国都有利，而且会在苏联的政治教育中有所反映。因为有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支援，“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个国家会顺顺当当地归并到罗斯福的世界中来。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所表示的善意，例如解散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遵循“民族团结”的政策，拉美共产党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等等，这一切鼓舞了罗斯福及其同行，使得他们相信 Pax Americana（美国强制下的和平）是有生命力的。不过，斯大林的 Realpolitik（强权政治）的其他方面与罗斯福的观点是矛盾的。上面提到的斯大林在4月24日文件中提出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原则尤其如此。根据这个原则，“三巨头”对各自认为关系到它安全的那些国家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斯大林从1939年起，就已在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等地实施了这个原则。在这方面，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允许把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墨西哥等国算作例外情况，因为这些国家恰好关系到“伟大的美国民主”的安全。但是，一涉及保障“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或“英帝国主义”的安全的目的，他的理想主义就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了。

然而，美国领导人认为，斯大林的Realpolitik（强权政治）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方面，眼下还不足以构成绝交的理由，甚至也不足以构成放弃同苏联政府达成基本妥协的尝试的理由。他们盘算着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第一，从1943年起，美国领导人明白他们要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了。这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确比美国落后，但在欧洲大陆上显然拥有军事优势。在雅尔塔会谈时，美国将军们知道，一旦与苏联发生冲突，苏军可以直捣大西洋岸。<sup>〔169〕</sup>他们也知道，除军事优势外，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德国战败后，苏联军事力量大部分都不受牵制了，而美国大部分军事力量却还在太平洋作战。1945年初，华盛顿认为有必要把在欧洲作战的部分兵力调往太平洋，因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继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参战即使不是必不可少，也是求之不得的。（美国领导人担心在华作战的日军到时候回师日本，使美军的决战更加困难，损失也更大。）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驱使美国政府要在远东寻求莫斯科的谅解，那就是中国问题。华盛顿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巩固蒋介石政权，因为只有通过它，美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才能得手。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也能本着法共和意共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忠诚和谦让的精神，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继续合作，那么，美国的这番事业取得成功就会顺利得多。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斯大林大力相助。因而在1945年上半年，在原子弹爆炸和日本投降以前，美国政府就在迫切谋求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虽然波兰问题和其他东欧问题使两国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有上述种种因素，杜鲁门及其班子虽然具有反共的本能，却也不得不采取与莫斯科和解的政策。这些因素也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1945年春季和夏季欧洲的全面力量对比多么有利于那些内部条件也很有利的国家采取大胆的革命策略。万一英、美对革命运动进行军事干涉，苏联在军事上和战略上都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可以对革命运动果断地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从斯大林的政策的角度

来看，这两个因素——战略上和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莫斯科承认为英、美“势力范围”的地区内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应当利用来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欧洲的防御体系和它的其他要求（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伊朗北部的势力范围，在土耳其的利益，等等）。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欧洲缓冲区已是既成事实，它在军事上已经无懈可击。不过，斯大林的目的是要美国承认这个事实，使之成为他同美国就全世界的问题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协议的条款，美国信贷和工业得按照罗斯福的班子当年定下的计划帮助苏联恢复经济。但进行这种帮助的条件是要避免苏联在政治上依赖美国，而且要有助于美、苏两家共同主宰世界，不能让美国在政治上一家独霸。

作出不去利用西欧和南欧以及中国所存在的革命可能性这样的决定，在解散共产国际时期，还可以解释为不过是一种策略，现在可是个实质性问题了。现在一看就知道这是货真价实的让步——由于革命已成为现实的危险，这种让步对美国人就更加宝贵了——，是对美国承认苏联的欧洲防御体系和它的其他要求所给予的适当的补偿。斯大林为了能与美帝国主义真正瓜分世界——这就是雅尔塔宣言中所说的“可靠的、持久的和平”的真正意思——，打出了所有这些牌，再加上这位伟大战略家手里总拿着的一张牌，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是这么算计的：一旦日本和德国都打得趴下了，那么在需要进行世界扩张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力求保持昔日殖民帝国的英、法、比利时、荷兰之间，矛盾自然会日益激烈。

7月17日召开波茨坦会议时，战略与军事上的形势仍然对苏联有利，会议的结果仿佛是朝斯大林所设想的方向迈进了一步。美国人大致在波兰问题上让了步——接受了斯大林的无足轻重的让步——而对于苏联圈内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小心翼翼地提了提抗议。

然而，会议前夕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斯大林的设想的客观前提和世界政治的整个发展进程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7月16日，美

国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沙漠试验成功。转瞬之间，美国就不再需要苏联帮助它来对付日本了，广岛（8月6日）和长崎（8月9日）的遭遇即将说明这一点。东京于8月14日投降。根据雅尔塔的秘密协议，苏联至迟在德国失败后三个月必须对日宣战，8月8日是最后的期限。到这一天，苏联并未履行这一义务，但莫斯科对此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雅尔塔协议规定，1905年被日本抢去的基地和租界“归还”苏联一事必须由蒋介石的中国国民政府批准。中国人拒绝批准，到8月8日仍未同意。这一下正好符合斯大林的心愿，因为这样一来，他在与美国谈判时手里又多了一张重要的牌——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态度。但是，广岛事件证明了新武器的威力。于是斯大林不再等待蒋介石批准雅尔塔协议了。8月8日下午五点钟，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不仅雅尔塔会议所规定的领土，而且加上整个满洲以及“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都落入苏联之手。

原子弹的垄断成了华盛顿执行政策时可以利用的一种特权。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宣布，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sup>〔170〕</sup>美帝国主义时来运转，朝世界霸权迈进了。但它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美国将军们心里很明白，原子弹虽然可以使许多苏联城市变成广岛，却难以阻止苏军从易北河向英伦海峡推进。斯大林回答丘吉尔在福尔顿的演说时警告说，“对东欧进行新的军事讨伐”的干涉者不会有好下场，“我们确有把握地说，他们会被打败，就象二十六年前的被打败一样”。<sup>〔171〕</sup>华盛顿认真估量了这次警告，因而杜鲁门并没有听从有些人的主张去向苏联挥舞原子弹，迫使它退回到边界线，而是采纳了凯南的所谓“遏制”政策。

然而，斯大林认为与美国取得谅解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1946年9月，他说，“我不相信真有爆发新战争的危险。我并不认为原子弹真象有些政治领导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有那么大的威力。原子弹是专门吓唬‘弱者’的，它们不足以决定战争的结局”。此外，“垄断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我深信国际合作远不会减少，而只会

增加”。换句话说，原子弹不能根本改变力量的对比，至多也不过构成暂时的优势；因而出路仍然在于取得谅解。

一个月以后，有人问到美、苏关系是不是更紧张了，斯大林坚定地回答“不是”。1946年12月，罗斯福的儿子问斯大林，美、苏有没有可能合作，他回答说：“当然有可能。不仅可能，而且这完全是在属于可能范围内的唯一明智的道路”。据斯大林说，苏联乐意与美国达成包括大力发展贸易和向美国借款在内的长期经济协议。作为苏联方面的主要贡献，斯大林明确提出“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172〕

实际上斯大林认为中国还是他手中一张极其重要的牌。日本投降后，他曾压中共与蒋介石达成协议，〔173〕1945年12月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协议：“有必要以民主力量广泛参加国民政府机构和结束国内骚乱为基础，建立一个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所谓“民主力量”指的是共产党人；“国民政府机构”指国民党及其军队，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将合并到这支军队中去；“国内骚乱”指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这基本上就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民族团结”方式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保证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使国家可以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于是蒋介石倚仗着美国飞机、技术人员和美元在1946年向人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到1946年底，蒋介石及其保护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斯大林与罗斯福儿子谈话中所说的“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这句话，是有非常明确的含义的。这就是说，要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压力，以便能找到一个可满足苏、美共同利益的解决内战的方案。可是华盛顿却以为斯大林在耍两面派。谁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自主的道路呢？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在1946年4月发给中共少数领导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毛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苏、美可能妥协。不过他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他接着说，“反

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根据中文本的注释，毛在这个文件中批评了“一些同志”，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美蒋集团的进攻。<sup>〔174〕</sup>他所说的“一些同志”，我们不妨理解为1945年12月三大国达成协议后支持斯大林路线的人。

在召开波茨坦会议和宣布马歇尔计划之间的两年中，由核保护伞和大量美元所维持的“遏制”政策开始奏效。在希腊，恐怖的镇压迫使共产党人又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法国和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得到迅速恢复，而工人阶级的运动——我们已经谈到过——失去了立足之地。莫斯科不得不从伊朗北部撤军，它要求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海岸建立军事基地一事，并没有如愿以偿。在远东，日本成了美国的保护国，苏联人根本无法插手。不过，西方盟国在德国对苏联计划的打击才是最厉害的。莫斯科没有达到四国共管鲁尔区的目的，否则它就能对西方盟国在它们占领区内的实际权力大加限制，并为苏联进一步扩张“势力”直至遍及整个德国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斯大林过分相信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是软弱的，过分相信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默许的美军短期内会从德国撤走。可是，有了核保护伞的杜鲁门，尽一切力量使西德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堡垒。）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了。它为美国人进入希腊和土耳其、统治中东和东地中海，并接管英国在这些重要战略地区扮演的警察角色提供了口实。华盛顿通过马歇尔计划，为德国经济力量的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使欧洲资产阶级政府俯首就范的任务，而且为美国的工业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巴黎、罗马和布鲁塞尔对这位大施主的命令是迅速服从的。共产党的部长被撤了职，“以民主和议会的合法手段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被粗暴地制止了。华盛顿认为，美元的魅力可能还会使有的人民民主国家上钩。马歇尔计划起初曾大受波兰和捷克政府的欢迎，说明华盛顿的

想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设想斯大林会在这方面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

1947年夏，斯大林发现自己居然落到了苏维埃国家自列宁以来一直力图避免——而且成功地避免了——的境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反苏集团。1947年的情况还多了一个特点，即反苏集团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形成的。这对斯大林所谋求的“和平”，即按苏、美世界性协议认可在全世界划定的“势力范围”的“和平”，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也是那种以在世界范围内放弃革命斗争和进行阶级合作为基础，以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合作保证一国“和平地建设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和平”的彻底破产（1946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观点：“一国建设共产主义，特别是象苏联这样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175〕

战后，斯大林依然实用主义地照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大战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所起的作用来看待新形势。我们指出过，在那两段时期，斯大林战略的基础就是利用这些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革命的可能性，都要服从这个战略基础。从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苏维埃国家利益这一观点看来，这种战略是极其有效的。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性大危机之后，即法西斯主义失败和德、日帝国主义垮台之后，无论在资本主义宗主国还是在殖民地都不可避免地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虽然斯大林的政策加以遏制，大部分共产党也跟着执行这种政策——共产国际的“遗嘱”中所总结的政策——，但这种新的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革命浪潮，仍使各国的资产阶级惊恐万状，驱使它们撇开国与国之间、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联合起来，抵挡革命的威胁。

结果证明，斯大林关于德、日一旦战败，美国与欧洲殖民国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世界事务中占重要位置的预言纯属无稽之谈。斯大林执行强行遏制革命运动的政策并不足以保证大西洋两岸的资产阶级不被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精神所吓坏，却足以挫伤这种精神，以致即使在这种力量最强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国和意大利），



它们也无力使政局发生根本变革，甚至无力阻止这些国家变成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各国共产党屈于从斯大林的策略，终于事与愿违，得出的结果与原来为了说明这种策略正确所作的预计相反——保障苏维埃国家安全的策略反而威胁了它的安全。

## 疑问与推测

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是“自由世界”的卫道士，他们对指出斯大林借以获得卫星国并达到其世界战略目的的种种“诡计”津津乐道，同时又把罗斯福的政策理想化。因此，他们的判断缺乏客观性，而且也是忘恩负义的。如果说“自由世界”在危机中没怎么伤元气的话，这无疑应归功于斯大林。说历史当初可能走上另外的，而非现在这样的发展道路，这种假设确实是无法证实的。说斯大林（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军的总司令）要是把欧洲革命列入了他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之一，那么革命肯定已经取得胜利，争论这种问题是白费唇舌。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斯大林借忠实执行他的政策的西方共产党领导人的具体帮助，对于解决美、英资产阶级领导人从1939年起就面临的难题，即如何在打败劲敌德国的同时，使欧洲资本主义的心脏能避免爆发革命的危险，是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的。

从本书的第一编，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在欧洲造成革命形势。他的这种看法太乐观了。这种乐观主义源出于他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看法，即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能力已经衰竭等等观点。不过，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导致爆发欧洲规模的革命并不是过分的幻想。这倒真有可能，而战争一爆发，资产阶级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可能性并不出自托洛茨基所设想的那种情况，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已达到极限（他在这里重复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错误分析），而是资本主义为“重新调整”其结构、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时所不得不采取的

方法造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是，它同时又引人注目地展示，这个制度作为整体仍具有生命力，在工业、技术和科学结构方面仍有巨大潜力，有操纵群众并使之服从该制度得以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准则、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的能力；在战争中尚且如此，战后就更是如此。这次战争证明，旧的统治阶级有其政治才智和耍花招的本事，这是它们几百年来经验的结晶。正如1914—18年的战争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大规模上表明，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还要继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垂死挣扎而又拖延不死，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获得时间和机会，以便把这种情况纳入人所共知的分期方法的框框之中。它最初宣称，随着1914—18年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病人还活着，便说什么两次大战之间只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之后，随着1939—45年战争的爆发，开始了第二阶段。1960年又断定说第二阶段已经结束，“第三阶段”开始了。究竟还有多少“阶段”呢？）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其生命力，但不排除它还有一些僵化的环节，它们与以德、日、美三强（尤以美国为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发生尖锐的矛盾。老牌的英、法资本主义对大片殖民地和南欧、东欧落后地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三强发挥其扩张的潜力。英、法资本主义的切身利益虽已受到威胁，却并不打算不斗争即让。美国资本主义在近边的拉丁美洲大有扩张余地，它进入英、法殖民地也比较容易，因而，看起来这还不是一个会引起战争的问题。但是，对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说来，唯一的出路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进行战争。

对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争夺市场、殖民地和原料的战争；与第一次大战一样，同时它又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向新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

在新阶段上执牛耳的三大国不仅看中英、法的领土（加上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地），而且还看中苏联的领土。美国试图同它未来的受害国结盟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它的两个强劲对手则想采用军事征服的办法来作到这一点。这对美国来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很大好处，但双方的目标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

经历过1917—20年日子的各国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怕的规律现在又必然发生作用而带来的危险。由于维埃国家、苏联军队和共产国际的存在，这种危险性就更大了。战争爆发时，欧洲的革命运动已经遭到失败，在欧洲大陆的几乎所有国家中，革命运动都只得转入地下，这是事实。但是，群众对这场新屠杀所产生的后果将作何反应呢？幸存的共产党小组难道就不会利用这种形势吗？1917年时，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革命者毕竟也是不多的呵。

各国资产阶级都根据本国形势来看待这些未知数，因而看法各不相同。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一被击败之后，就表现得十分自信。它认为只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采取同样的手段就可以摧毁欧洲其他国家革命的种子。日本资产阶级的看法极为相似，因为它也已经使国内的工人运动处于瘫痪状态了。美国的基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它通过改良主义措施“溶化”无产阶级的程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它是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来迎接战争考验的。英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1926年的大罢工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工党至少还能提供一点算是靠得住的保证。法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它显然是个最薄弱的环节。除了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已经过时外，无产阶级很激进，这从1936年的社会骚动，从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影响又已扩展到大批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之中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法共在人民阵线阶段虽表现出堪称模范的温和立场，然而仍不足驱散资产阶级的疑虑。它们拿不准这是法共的权宜之计，还是党有了根本的变化。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在法西斯统治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资产阶级

的地位是否牢固，却不得而知。看起来，意大利的形势显然不象德国那样稳定，但也不象法国，并没有法国共产主义那样的不安定因素。

除工业资本主义地区外，许多地区都有可能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出现革命危机的形势，如在亚洲的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东欧和南欧的落后国家等。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除苏联参战之外，最严重和最明显的威胁莫过于法国可能在法西斯失败（以及苏联取胜）的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法国革命行将标志一个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过程的开始。英、美资产阶级深知这种危险性，这对它们的全部政策以及战争期间的一切战略计划和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到战争后期，当时已成为欧洲头等军事强国的苏联，摆出一付稳操胜券的姿态，使人感到它无所不在，这种影响就更加厉害了。在这段时期，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意大利显然很可能爆发革命；而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

在两个基本目标上，美国和英国的意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国都认为有必要打败它们的手，而同时又使资本主义和工业的欧洲不致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自然，它们也一致认为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先发制人，阻止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爆发革命，或者把革命镇压下去。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上，它们的意见可能不同，但就目的本身来说，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首先表现在殖民地问题上，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英、美两国在最重大的目标上的共同利害关系，再加上濒于解体的大英帝国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构成了美、英联盟的牢固纽带。麻烦的是，它们的两个主要目标相互矛盾，因为打败纳粹德国是欧洲革命的必要条件，可是，反法西斯战争本身必然会引导欧洲大陆各国人民走向革命。在太平洋战争中，特别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美、英联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在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心目中，远东问题不如欧洲问题尖锐。他们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革命运动成功的机会，是估计不足的。

鉴于有必要防止在欧洲出现革命，美、英政府自然就不得不去谋求与德国妥协。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它们为此曾全力以赴，直到战争爆发。但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它认为，如果能在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取得胜利，就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能把欧洲革命推迟一段时期，又能为将来的扩张奠定经济的和政治的基础。德国帝国主义的计划，对英、美两国来说，是一个威胁，不亚于欧洲可能爆发革命的威胁，甚至比这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美、英联盟为了保护其切身利益，必须打败德国，为此，两国不得不探索另一条道路，以便既能打败德国，又能把法国资本主义保存下来。这条道路就是：与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达成广泛的协议。在人民阵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说明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态度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苏德条约。为了支持这个条约，克里姆林宫曾毫不犹豫地强迫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战略，不过，还不能完全下结论。与德国签订条约，这是苏联处于弱者地位时的行动，不足以预言它处于强者地位的做法，比如说一旦纳粹被打败，它成为强者时的做法。但美、英除与苏联达成协议外，别无选择，虽然它们走这步棋时又非常谨慎地要使苏联在同德国作战当中遭到极度削弱。

我们看到，事件的进程将说明，华盛顿和伦敦所希望的妥协是完全可能实现的。这就使它们能够克服在欧洲的两大目标——即既要打败德国，又要阻止欧洲大陆爆发革命——之间存在的矛盾。它们在亚洲就没有那么顺当了，但这倒不是斯大林的责任。

从1943年起，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四个国家中，显然有可能出现革命的结果。同时看得出来，德国即将战败，而且苏军将在击败德军中起重大作用。1943年夏，苏军又在各条战线迅速展开了全面进攻。这一年，英、美大部分报刊纷纷发出警告，英、美联盟领导人要求解散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明确接受不进行革命的政治路线。这一年，斯大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不影响他的战略目的和政治目的，相

反还可以用作他与盟国进行重要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拒绝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希腊共产党人犹豫不决，到1944年，终于对莫斯科作了让步，后来证明，这种让步是致命的。多烈士和陶里亚蒂无条件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与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观点在人民阵线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向新改良主义的转变恰好一致，而两党的领导集团就是由一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组成的。因此，他们不反对斯大林的路线。从此，法国和意大利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开始受到严重的威胁。形势就象俄国在1917年的情况一样。当时要是列宁的《四月提纲》遭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会通过某种途径巩固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会爆发，而历史学家和革命者就至今仍会在革命的可能性是否真正存在，列宁是否是个左派冒险主义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就象他们对二十五年之后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争论不休一样。<sup>〔176〕</sup>

争论在继续，毫无解决的迹象。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说明，历史研究者看到了这种美好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使法、意资产阶级及其美国保护人在那些年感到恐懼的，并不是一些幻觉。1943年开始的危机，是诞生于 Risorgimento（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迄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是法国从巴黎公社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民族危机。1940年的民族灾难使法国资本主义的虚弱突出地暴露了出来。国家已崩溃，取代它的是为占领者效劳的傀儡政府，战争的灾难由于可耻的失败和被德国人占领而越发深重了。

造成所有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清楚的，这就是过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腐败无能的议会政治，殖民寄生性和技术落后造成的。人们对统治阶级及其政治集团不信任了。应对这场灾难负全部责任的就是他们。但是，在法国资产阶级看来，局势最严重的方面是无产阶级和社会其他阶层明显向左转，这反映出它们看清了危机的原因和责任所在。为什么群众不顾共产党1939——41年期间执行了荒谬政策而仍然迅速地转向共产党呢？为什么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获得领导地位呢？原因就在于：群众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阶层表达了群众

的仍然比较混乱的思想的主要倾向。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根本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

意大利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法西斯政权对民族危机的责任是同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责任密不可分的。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在他们专政的十五年里，表现出没有能力克服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主要弱点与南部的不发达状态，却把国家引入殖民冒险和帝国主义战争。而法西斯专政本身又证明了由复兴运动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无能，以及这种无能所造成的后果。意大利半岛上的统治阶级，组织过两种形式的政府，都失败了；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强大的令人生畏的群众运动明显左倾；共产党的力量有惊人的发展，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趋势，一种要求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趋势，而且比在法国反映得还要尖锐。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如此实在地向资产阶级制度挑战的真正的运动。工人群众、知识分子、整个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发人深省的示威运动，要求建立新经济，新国家，要求新的社会阶级来进行统治。共产党如果没有丧失 *raison d'être*（存在的理由），能不考虑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吗？共产党能放弃这样的机会，不把这次实际的运动以事实进行的批评提高到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的水平吗？

必须把问题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充分研究客观形势与一般的经验，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起对革命变革的明确愿望；制定战略策略，把能够实现这一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做好准备，以达到主要目的：由支持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而不是由共产党来夺取政权。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法国和意大利在1940——45年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个过程是否能以革命的胜利而告终，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没有关系，除了行动过程本身，是无法对它作出回答的。只有行动，再加上其他因素，才能创造有利条件，创造

使决定性步骤即夺取政权成为可能的力量对比。（1917年4月时，谁也不能保证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条件一定会形成，连列宁也不能。四月的政策不是决定十月具备这些条件的唯一因素，但是，没有这个政策，夺取政权的条件不可能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斯大林的直接指导下，身在莫斯科对党的总路线进行遥控的法共和意共领导人，居然在美、英成为苏联的盟国之时，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法、意两国，目的是要恢复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结果。

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放弃共产党人一直认为并继续认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无论从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都需要比较有分量的解释。在战争过程中，他们的理由（包括了不时提出的另一些理由）可归结如下：（1）希特勒德国的胜利意味着苏联的毁灭，意味着欧洲工人运动在一个时期内被压垮；（2）因此，主要目标是必须战胜德国；（3）保证反希特勒联盟的巩固，是保证能打败德国的主要条件；（4）提出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必不可免地会触犯西方盟国，也就会威胁到胜利的可能性；（5）因此，现阶段不可能考虑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推理看起来无可争辩，似乎是一般常识的产物。只有死硬的极左分子、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不可靠的分子（用多列士的话说，就是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才会怀疑这种起码的真理。大多数积极的共产党员，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员，出于什么动机，接受了这种常识范围内的逻辑，上面已经谈到了。开头两个命题当然是不容争辩的，而推论出四、五两个命题的第三个命题的论点，却不是完全不可争辩的。这个命题的论点是：反希特勒联盟——应理解为英、美与苏联的联盟和德国在欧洲的资产阶级对手与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联盟——是胜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观点根本不考虑战争过程中，在苏联和欧洲各国人民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基础上，可能形成新的力量对比，而这种联合是保证能打败德国并能打乱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的。拒绝采取有助于形成新



的力量对比创造可能性的政策，说明 *a priori* (预先) 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苏联官方编写的历史承认，到1943年底和1944年初，这种可能性即将成为现实，盟军登陆也不再是打败德军的必要保证了。盟军登陆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西欧爆发革命。假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采取的不是当时那种政策；假如他们也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那么，这个目的能达到吗？

自1941年以来，南斯拉夫便把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付诸实现了。南斯拉夫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占领者及其走狗，次要打击目标是盟军。当战争还在进行时，盟军就试图为恢复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权，为使该国重新依附美英帝国主义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南斯拉夫的战略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发挥的效果，比起那种试图以简单的常识来论证的战略来，毫不逊色。因为南斯拉夫解放军反对占领者的活动远远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规模。而那种根据简单常识制定的战略，倒是与为它辩护的主要理由大相径庭，并没有在反对占领者的战斗中取得最大效果。为了避免与西方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相矛盾，法共和意共不容许民族解放战争具有革命的内容。这样做，实际上不仅大大方便了盟国和资产阶级去恢复资产阶级制度，而且它们本身也就无法去动员人民中的反侵略力量了；因为这些力量只有有了革命的热情，有了为争取社会解放、争取工人政权而斗争的自觉性，才会行动起来。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法、意两国共产党怎样使自己、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左派力量服从西方盟国和资产阶级抵抗派的领导，而盟国和抵抗派的政策是要把参加抵抗运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说起来，“民族团结”政策更广泛因而也更有力量，但实践证明，比起南斯拉夫在战争中创造的革命的民族团结政策来，它要狭隘得多，软弱得多。

几乎无需解释，对抗的形式以及对抗与一致行动之间联系的方式，将随欧洲和其他地区甚至每个国家战争的发展而异。最主要的，就是斗争应该是政治斗争，尽可能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在对革

命力量不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南斯拉夫人懂得对抗与一致行动的辩证法，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把公开的政治斗争与联合行动结合起来，把对切特尼克分子的武装斗争与跟王室政府和盟国的谈判结合起来，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才智提供了人们学习的范例。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创建革命的军队，同时却能使英国这只老狐狸自以为能通过谈判得到用武力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甚至设法让西方盟国在苏联供应武器之前就对他们供应武器。

对意共和法共来说——姑且假定它们有志于采取革命政策——问题当然不在于套用南斯拉夫的战略，而是要制定出有自己特点的对抗和一致行动相结合的计划。不过，南斯拉夫的例子毕竟指出了这种战略的一些主要条件。第一，就要使工人阶级和左派反法西斯力量形成一个独立的运动，有自己的纲领和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第二，一有条件，就要在反帝斗争中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并鼓励群众直接参加新政权。还有一些方面也很重要，这在有关南斯拉夫斗争一章中已经谈到。难道法国和意大利在当时形势下真的就不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吗？

意味深长的是，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法共和意共的领导人，面对南斯拉夫的批评，连想都没有想要去说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他们回避要害问题，说什么如果他们试图夺取政权，英、美军队定会进行干涉，加以阻止。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南斯拉夫并不是批评他们没有去夺取政权，而是批评他们早在1941年就开始推行一种旨在预先就放弃这个目标的政策，一种确实是为了达到相反的、恢复资产阶级民主的目的的政策，一种屈从于资产阶级盟国的政策。英、美军队干涉的危险性是1944年夏季才出现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法国共产党在前三年采取一种政策，让工人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好准备去进行战斗，以社会主义来结束资产阶级法国的空前危机呢？为什么法共让抵抗运动受戴高乐领导，受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制度的束缚，而不去支持并领导运动中反抗它们的倾向呢？为什么法共眼看着戴高乐恢复他所代表的旧政权而不一

开始就通过抵抗运动来创建以工人群众为主要基础的新政权呢？许多迹象表明了革命潮流的深度（这时群众相信共产党是革命党）。非共产党历史学家承认，尽管那三年法共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解放运动却使工人阶级和人民武装力量在许多地区很容易夺得政权；群众心向共产党，并支持社会党左翼的运动，支持工会和其他组织。现在回头去看，这些迹象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如果前一时期采取了另一种政策，那么，运动的思想水平和战斗精神势必要高得多，实行根本变革的愿望也要强烈得多。但是，即使从解放后几个月内运动所达到的水平出发，当时要把运动引向革命目的，难道是不可能的吗？这正是法共领导人一直回避的问题。对来自左翼的批评，他们总是回答说，纵观全局，当时并不存在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现在依然这样回答<sup>〔177〕</sup>。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党采取了一种蓄意使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根本不可能形成的政策，不仅使共产党、而且使抵抗运动的所有革命派都无法夺取政权。他们的政策好比是消防队在火刚烧着时就立即采取的灭火措施。在解放巴黎和德国投降的时期内（约一年时间），除了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谁也休想阻止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当年戴高乐要解散解放委员会和爱国民兵（抵抗运动创造的双重政权的雏形）时，法共完全可以组织罢工，占领工厂，举行群众性示威和采取其他行动来回敬他。它完全可以鼓励解放委员会转变为工业中由工人权力机构所支持的直接的群众政权机构。当时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推动这样的运动，并鼓励左派在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下团结起来。政权问题只有结合一种旨在加强群众运动、消除对戴高乐主义和盟国的幻想（党自己在前一时期制造出来的幻想）的政策来考虑，才有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法共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它与戴高乐合作来消灭抵抗运动；它对工人阶级说，为了要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勒紧裤带；它压制了（或许比这更厉害）法属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它散布和平道路即议会道路的幻想；它继续美化盟国。

这是法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传统的改良主义与民族主义政策的一种新形式。

在意大利，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用陶里亚蒂的话来说，<sup>(178)</sup>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基础崩溃了，而且爆发了主要由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意大利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这时，共产党要采取一种把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辩证地结合起来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1944年陶里亚蒂在那不勒斯登陆时，就有必要在两种政策之间作出抉择。反法西斯主义与国王、巴多利奥以及盟国之间的冲突，不很明确地把这种必要性反映出来了。一种政策力图使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左派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制、传统的右派和盟国；另一种政策却力图缓和这种矛盾，使左派和右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盟军当局的统一指挥下，打着“首先赢得战争”的旗号，紧密团结起来。前一政治路线可能使葛兰西提出过的新的“历史集团”组织起来，后者即“民族团结”政策则到头来会方便旧的统治阶级去完成它们的任务，最后会导致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恢复和现代化。

能够揭穿墨索里尼垮台后就已很明显的旧的统治阶级诡计的，不是“民族团结”政策，而是“阶级”政策。这个政策会向群众揭示出哪些力量是真正为意大利从社会和政治上获得新生、获得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力量，哪些是抱着让意大利屈从于新帝国主义的目的，而为大工业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卷土重来效劳的力量。“民族团结”政策并不象陶里亚蒂所说的那样，会让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它只给予工人阶级这种幻想。真正的控制权是在别人手里。工人阶级要使自己真正成为领导阶级，必须在行动上把民族解放问题与南部和各岛屿的土地革命问题，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而陶里亚蒂的战略（与共产国际在西班牙革命中采取的战略如出一辙）恰恰在真正的运动、社会政治结构的严重危机与群众的觉醒等因素都趋向于把这些目标结合成一个统一的革命过程时，把这些目标分割开来了。在从盟军登陆到北方起义的两年时间里，意

大利共产党并没有组织农民群众为争取土地而斗争，而且反对在北方伟大无产阶级运动中已经出现的争取导致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倾向。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就是抑制群众运动，以免分裂联合政府并触及英、美军事当局。

具有自己的纲领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群众运动，才是最终能够阻止传统的政权逐渐复辟的唯一力量。盟军驻在意大利自然要求意大利人采用不同于南斯拉夫所采用的，主要是政治对抗的方法。但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左翼，可以把英、美军事当局的驻留以及它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提高由于进行了解放战争而唤醒了的民族意识的生动教材来加以利用。为此他们可以要求意大利的主权得到充分和无保留的承认，要求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政府机构，以及英、美军事当局保证不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

意共没有能采取一种推进土地斗争和其他革命变革的战略，主要障碍并非出自意大利的局势，而是出自意共领导对于莫斯科所制定的路线的屈从态度。要是采取了那样的战略，双重政权的基础就能扩大，盟国和右派在政治上就会更加孤立。这种战略能够开创工人阶级政党和左翼反法西斯力量的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能够把北方的无产阶级大起义和南方的革命运动联结起来。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听从了季米特洛夫于1942年3月传达的斯大林的指示，那么，它也会遇到同样的“障碍”的。

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不止一次地用希腊的例子为他们的政策辩护。可是，只要希共领导人顶住了苏联的压力而不投降，即使斯大林令人震惊地背叛了他们，希腊抵抗运动的这场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们当时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并有一支善战的人民军队作后盾。一年半以后，他们又在更加不利得多的条件下奋起斗争，得到的外援与美国的大规模干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居然坚持三年之久，实际上到1948年才结束。如果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希腊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向斯大林屈服，那么英国远征军的处境就会是

非常狼狈的。

1945年头几个月，德国即将战败，苏军加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的数量可观的队伍（当然还有南斯拉夫解放军），与西欧盟军相比，占压倒的优势。美国给太平洋战争拖住了，很难说还要拖多久。这正是抵抗运动的民主和改革思想深得人心的时候。如果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转为进攻，支持建立工人和整个左派的政权，提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变革的纲领，（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或“苏维埃”纲领）结果会怎样呢？西方会干涉吗？罗斯福和杜鲁门会接过希特勒的衣钵扮演欧洲左派的主要敌人的角色而承担政治后果吗？从军事观点看，他们能试一试吗？（这种危险性不可忽视，正如1917年德军干涉的危险性不可忽视一样，德军的确进行了干涉，并几乎摧毁了俄国革命。很难想象革命会是平平安安的，不遇到任何危险。不过，1944—45年的情况有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当时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军队可能对革命进行干涉，不如说是十月革命举旗人的军队很可能不介入革命。希腊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希腊情况本身就表明，在当时形势下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多么困难。）

对过去可能发生或可能不致于发生什么的推测和疑问就谈到这里吧，雅尔塔会议在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决定了历史。斯大林为各国共产党制定了法律，除了不发达国家中几个未来的离经叛道分子表示反对外，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共产党人的新改良主义跟“大同盟”的步调一致了。

我们开始分析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时，曾经指出过一个对他的战略影响最大的因素，现在回过头来扼要谈谈。苏联官厅制度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它的国内政策。苏联领导人清洗了十月革命最优秀的代表；破坏了无产阶级民主，多年来剥夺了人民政治生活的权利；宣布贫穷和警察专政的制度也就是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苏联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破坏了生机勃勃的革命精神的源泉和国际主义的阶级觉

悟的源泉。他们干了这种种勾当之后，也就无法再说什么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具有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性质了。这种情况与上面分析过的其他理由（出于路线考虑，有利于“大同盟”维持下来等）都挂不上钩，因为无论如何那些理由都是深受国内形势的影响的。因此，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循着这条路子走去，从他们的思想上的骗人把戏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所培养成的那种社会意识出发，只能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卫国战争。希特勒主义首先是胆敢侵犯“伟大的俄罗斯”（苏联新国歌就是这么称呼的）的传统敌人即条顿族的另一副面孔，而不是德国工人运动和西班牙革命的掘墓人。有一次斯大林在接见哈里曼大使时说了句老实话：“他们不是为我们而战，是为祖国俄罗斯而战。”（179）

在几百万思想闭塞的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脑海里，斯大林的神话是与沙皇的神话、与传统的爱国主义、光荣的过去交织在一起的，它是一种复活了的宗教。斯大林和他的党巧妙地、千方百计地利用这种爱国主义移植到新国家中来，总是象宗教仪式那样，在每一个场合都要把列宁抬出来，来提高新的列宁的威信。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从战争的国际主义目的着眼，对于资本主义盟国所宣布的战争目的，即欧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和民主，增添任何新内容。

更确切地说，他们倒是加进了一个因素，不过不象是革命的，甚至也说不上是进步的因素。这就是号召斯拉夫民族团结的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号召除了当时能起到把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反对传统的敌人即泛日尔曼主义的作用外，显然是为将来能建立一个防护地带作好思想上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欧洲又在经历第二次灾难性的战争。这清楚地说明，国家的疆界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和平不能持久，是无休止的敌对冲突之源。1914—18年大战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应为欧洲成立社会主义联邦而斗争，1923年共产国际继承了 this 思想，〔180〕难道不是到了应当号召欧洲无产阶级这样做的时候了？可是斯拉夫思想代替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思想。斯拉夫人必须联

合起来；欧洲各民族可以留在各个国家的疆域之内。

有关斯大林政策的这些方面，其他作者尤其是艾萨克·多伊彻详细研究过，〔181〕这里不再赘述。多伊彻提出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定会结束俄国革命的孤立状态，但斯大林害怕苏维埃制度与工业资本主义地区的社会主义互相渗透所产生的后果。他认为这会使与世隔绝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受到威胁，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与世隔绝已不仅是这种制度受到的客观影响，而且发展成为这种制度得以存在下去、统治阶级得以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了。以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多伊彻的观点。斯大林及其继承者竭尽全力使苏联社会与外界隔绝，不仅与西方，而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隔绝。“俄国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真正接触——自由旅行、自由交换意见——极易成为俄国内部动乱的又一根源。因此，斯大林必须要有两块‘铁幕’，一块把俄国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隔绝，另一块则使它的势力范围与西方隔绝。”〔182〕

我们已经看到，多灾多难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克服许多障碍才能通过四十年代这次大危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能够取得胜利，那是因为缺少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到了五十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需要有一个既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又不受“社会主义祖国”影响的党了。

随着1945年德国投降，为“民族团结”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不存在了，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继续进行合作，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为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及其政治上层建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需要新的理由，而且不能只是或主要不是策略上的理由，来为这种行径辩解了。

原为应付对被苏军解放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政权下定义的急需



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人民民主主义”的学说，便被用来适应这一需要。矛盾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比反动力量组织得好，而且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相比，显然占优势”〔183〕的地方（引自苏联历史学家的话），千方百计地避免了革命的爆发，而在东欧各国，革命却得到了鼓励。鼓励东欧革命与阻止西方革命，为的是同一个国家的 *raison d'état*（国家利益）。防御地带显然是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下一章将论述东欧的革命，革命中产生的学说，以及如何利用这一学说为西欧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辩护的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失败，南斯拉夫的革命，其他东欧国家被苏军解放后开始的革命过程，以及卫星体系的形成，苏联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西欧共产党力量的加强——这一切使共产党员（如本章开始谈到的，当时正做着美梦），而且不仅是共产党员，无法认清欧洲革命的挫折对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严重影响。不久以后的中国革命和旧殖民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作一回顾，那就很清楚，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在它影响最大的当口——也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条件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时刻——退出历史舞台，对以后世界事态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共产国际思想衰败的最糟糕的、最严重的后果，也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遇到危机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

## 注 释

〔1〕俄语“共产党情报局”的缩写，该局成立于1947年9月。

〔2〕这些数字和后文所引的共产党员数目，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来自前几章曾提到过的布·拉齐什著《欧洲的共产党》。该书的材料引自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文件和苏联一批作者合编的《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

史》，这是一本论述国际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专著，由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苏共高级党校曾用作教科书，全书共三卷，这里引用的是1966年版第三卷的材料，时间从1939年起到1955年止。后面再引用这本书时，将用《革命运动史》这个书名。

〔3〕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76页，88页（1937年和1945年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第4卷。

〔4〕按国别来说，增加的数目如下：

|     |               |                |
|-----|---------------|----------------|
| 奥地利 | 16,000 (1935) | 150,000 (1948) |
| 丹麦  | 9,000 (1939)  | 75,000 (1945)  |
| 挪威  | 5,272 (1933)  | 45,000 (1946)  |
| 瑞典  | 19,000 (1939) | 48,000 (1946)  |
| 芬兰  | 1,200 (1944)  | 150,000 (1946) |
| 荷兰  | 10,000 (1938) | 33,000 (1946)  |
| 美国  | 17,746 (1939) | 47,513 (1944)  |

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利时共产党的党员数目，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人数很少，而到了1945年11月，该党却已拥有10万以上的党员了。

〔5〕见本章注〔144〕。

〔6〕引自白劳德1944年1月4日给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引文系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图卢兹版，1945年第3期第27—28页所载雅克·杜克洛：《对于解散美国共产党的意见》。白劳德在1944年5月22日给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学会消除昔日的鸿沟与偏见，使积怨甚深的仇敌亲如兄弟。我们必须跨越政党之间旧有的界线，把过时的阶级对抗抛在身后。我们必须清除新政支持者和旧政支持者之间的积怨，使美国的爱国者比目前团结得更紧。”

（《我们的旗帜》墨西哥版，1944年第7期第33页。）由于执行了这样一条极端改良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才得以使党员人数有所增加——按照美国共产党所提供的材料，党员人数达几十万人——，并对一些大工会有一定影响。1945年4月白劳德路线受到莫斯科的谴责——其原因以后再谈——，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重建美共，但许多党员没有再回到党内来，党很快就失去了在工会中的地位。

〔7〕《参议员范登堡的私人文件》，伦敦，哥兰奇公司，1953年，第219页。

〔8〕所谓“秘密”，就是说没有预先宣布举行这次会议，会议的讨论是严格保密的，讨论的某些内容从来没有透露过。但后来有些参加会议的人同斯大林或者同他们自己的党闹翻了（例如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的E·雷阿尔），把会议的内容洩露出来了。10月初，会议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公报，宣布举行了会议，后来又公布了某些经过适当修改和更正的报告文本。

〔9〕《季米特洛夫选集》，巴黎，社会出版社，第195页。

〔10〕《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社会文化出版社，1951年，第22页。

〔11〕《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1卷第236页（见本书上册第四章注〔117〕）。马塞·加香9月6日给他的参议院全体同事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我们重申，法国共产党人现在是、将来也是站在消灭〔希特勒〕这个穷凶极恶地威胁着和平的罪魁的战斗前列。一切适龄服役的法国共产党议员在莫里斯·多列士的率领下，已经参加部队作战了。”（同上，第237页）。这本书还描绘了苏德条约在党内和在党的最亲密的同盟者中间所引起的混乱和狼狈的情况。例如，皮埃尔·科特在报刊上写道，斯大林“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同盟者……甚至工人们也对他们的共产党员同志埋怨‘苏联的背叛’”。（同上，第231页）。

〔12〕还有两种因素助长了镇压，这就是党在国家 and 地方的政治生活中进行二十年的公开活动之后，缺乏地下活动的准备；而后来战败以后，又由于苏德条约而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也许占领当局会对党的活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宽容。1941年5月，党印制了一种明信片，打算寄给希特勒派驻维希政府的大使“奥托·阿贝茨阁下”，明信片上印好的文字如下：

“阁下：

“法国共产党员议员们，由于反对战争，由于从1939年10月以来一直坚持主张除非经过议会讨论不得拒绝任何一项和平建议，因而被当作德国间谍来惩处，被判处了总计达数百年的徒刑。

“他们中间有下列人员被囚禁在阿尔及利亚的加雷监狱，还面临着被放逐去撒哈拉荒野的威胁。〔以下是被囚禁的议员名单一份〕”

接着，是一份“为了执行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使命，一直被迫处于非

法状态的议员”〔多列士等人〕和因在巴黎桑特监狱的议员的名单。这份材料接着说：共产党议员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二十年来在坚持反对可恶的《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莱茵区和鲁尔区的斗争之后，现在又在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为此而遭受监禁之灾。

“这是可耻的、不公正的行为，必须立即释放他们。

“阁下，请行使您的一切权力，使他们早日获释，这是您的责任。

“如果您办不到，那么人民将奋起反抗，誓必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张明信片的内容无须加以评论，但有一件事特别奇怪，就是居然有人劝说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在明信片上签名并写上自己的住址——这也是根据《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记载。签名的人由于听从了这一劝告，以致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同上，第50页）

幻想德国占领当局会以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党的另一个例子，是企图合法地出版《人道报》。法共党史的有关卷册中对此事曾有详细的描述（第2卷第20—28页）。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企图隐瞒这一事实，直到最近出版了雅克·杜克洛主持编写的抵抗运动时期的党史之后，他们才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解释了企图把《人道报》合法化以及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方面的类似行动，认为这只是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之下，曾经希望看到希特勒占领下的国家能够允许共产党从事合法活动。”（第2卷第23页）。

〔13〕《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59—61页、68页。但注〔12〕中所提到的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时期中的正式党史（《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出版社，1967年），并没有谈到这一文件，也没有谈到《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中所提及的其它一些文件和事实。

〔14〕出处同上。

〔15〕《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60页。

〔16〕安德烈·方丹：《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1917—1950年》，伦敦和纽约，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1968年，第195页。

〔17〕《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34、136页。《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谈到了党同戴高乐的代表早在1942年夏天，即在戴高乐—莫洛托夫会谈后不久，就开始接触了。但这本书没有指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戴

高乐给党的领导的信件虽然公布了，却被删掉了一段话，即戴高乐表示深信共产党对他也会恪守党内生活中那种“忠诚的纪律”的。书中也未提及费尔南·格勒尼埃发表在《人道报》上的文章。

〔18〕《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34—236页。

〔19〕参阅雅克·福韦：《法国共产党史》（前几章提到过此书）第2卷第127—128页。照这本书的说法，党终于参加了政府，但没有从戴高乐那里取得一点哪怕是形式上的让步。《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对让步只字不提，从而含蓄地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如果有过任何让步的话，书中一定会提到的。

〔20〕《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第241—242页。

〔21〕《抵抗运动时期的法国共产党》（286—328页）详细记述了这次全国性起义的情形，清楚地表明法国大部分国土是通过“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人民群众”的战斗而得到解放的（第329页）。艾森豪威尔虽把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支持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战斗中所作的贡献，比作15个师的兵力。这种估算，还只不过考虑了抵抗运动配合盟军反攻的那一部分武装力量，而没有考虑四年来的敌后游击斗争和政治攻势对占领军的士气和实力所产生的日积月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着的。同时，这种估算也不能反映出紧接在盟军登陆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政治反抗行动的作用。

〔22〕雅克·福韦在论述解放前夕法国共产党究竟代表何种力量时说：“党是法国领土上各种抵抗运动中最强大、最坚韧不拔、和唯一力量遍及全国各地的抵抗力量。”（《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59页）。安德烈·方丹谈到解放运动本身时指出：“当时各地的政权已经在它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了。”（前引书第197页）。

〔23〕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团结》，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55年，第292—293页。

〔24〕《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6页曾提到杜克洛的讲话。这部书里对此事的报道是由当时担任重要职务、而又绝非“左倾”观点的党员所写的，报道毫不含糊地表明：当时党的领导承受着许多党员和一般人民群众的强大的压力，他们要求党的政策具有进攻性质。各地解放委员会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坚持要求委员会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1944年10月来自法国南方40个省、区的解放委员会代表齐集在阿维尼翁开会，作了一

个决定，要求地方委员会“在城镇和乡村召开群众爱国大会，解释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行动纲领，并制订适合地方情况的详细计划。地方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活动都须经过人民群众批准。”12月9日和10日，塞纳河区的地方解放委员会在巴黎维勒旅社举行会议，他们响应南方的倡议，建议爱国大会应该筹备一个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大型的政治团体会议。后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但党的领导所执行的总路线却使这一行动夭折了。因为正如我们后来将看到的那样，这条总路线要求解放运动绝对服从法国中央政府的领导。

〔25〕《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251页。据这部书的作者们说，多列士对于戴高乐回忆录中这些说法和许多其它的说法，从未加以驳斥。

〔26〕《多列士全集》第20卷第181—182页，第187—188页。

〔27〕戴高乐对他的莫斯科之行是这样解释的：“为了从共产党那里取得为期一年的喘息时间，以便把局势控制住，我不得不去莫斯科签订一个协定。”（福韦引文，见前引书第148页）。正如福韦十分准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不可能是他去莫斯科的唯一理由，但无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找不到证据来证实福韦这样的观点：多列士在抵达法国时，是赞成加强解放委员会的权力、保留国民军等项主张的，只是在戴高乐会见斯大林之后，他才改变他的路线。事实上，多列士一到法国（甚至在他回国之前在莫斯科电台发表声明时），就为了给旧资产阶级民主国的复辟开绿灯，而支持放弃抵抗运动和解放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权。他回国后，立即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一个国家，一支警察部队，一支国防军”，就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47页）。鉴于当时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精神状态，在这个国家里，小心行事是必要的。多列士虽然一开始盛赞解放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坚持委员会要服从新的国家机关，这就是1944年12月14日他在冬季赛车场集会上讲话的要旨。他借助于戴高乐—斯大林协议，使这条路线更加强硬起来，在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终于以一种明确的最终的形式宣布了这条路线。

〔28〕关于伯努瓦·弗拉雄的报告，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262—264页。

〔29〕见《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57页、100页、118页、127—129页；第20卷第183页。

〔30〕《多列士选集》，1966年，第2卷第399页。

〔31〕《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41页。

〔32〕这是福韦的说法，见《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2卷第172页。

〔33〕见前引戴高乐所著书。

〔34〕《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105页。

〔35〕《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的作者们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又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两党之间关于团结问题的协商是这样叙述的：1944年11月社会党公布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声明：“社会党庄严地重申它在地下斗争时期曾向法国共产党提出过的团结一致的建议。”此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了解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个备忘录，为社会党—共产党的团结作好准备。可是，法国共产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所提出的建议，却表现出一种死板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同他们为了和戴高乐搞好关系并参加法国政府而作出的原则性让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甚至坚持在同社会党订立的团结宪章中应该包括这样一段话：无条件地赞成苏联的立场，并且承认联共（布）拥有最高的权力。总之，他们要求社会党人变成效忠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同上，第2卷254—255页）。

〔36〕《多列士全集》第22卷第207页。

〔37〕同上，第132页。

〔38〕据本章注〔2〕《革命运动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书中所载数字为4万人。该书作者在谈到法帝国主义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没有提到法国政府中有共产党部长参加。

〔39〕《多列士选集》第2卷第351—352页。文中提到的阿尔是指法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战前在这个城市举行的。

〔40〕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4—195页。《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3卷第31页曾提到要让“越南的捣乱分子”对战争负责的打算。众所周知，越南的独立和宣布在全国领土上建立民主共和国，是1945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起义获得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是

在当年夏天开始的。法国军队借口解除日军武装而登陆，重新占领了西贡，并迫使共和国当局转移到农村。1946年整整一年中，法国当局不断进行挑衅，并迅速采取一些旨在复辟殖民统治的措施。炮轰海防造成了6千人的死亡，这就标志着转入了公开战争。

〔41〕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5页。

〔42〕1947年3月29日，为了镇压马达加斯加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挑起了流血冲突。这个岛上的居民在许多地方用暴动来回答殖民者的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几位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四名参加法国国会的议员，被判处死刑。

〔43〕《多列士全集》第21卷第63—64页（1945年6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选集》第2卷第452页；《全集》第23卷第10页、115页。

〔44〕《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9页。莱昂·布吕姆的话，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85页。在同一页上，还提到1946年7月17日《共产主义手册》上的一篇文章，批评社会党人在处理德国问题的态度上竟优先满足“国际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在目前这一时期，首先要从法国民族的立场来解决问题”。

〔45〕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8页。

〔46〕《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121—122页（在法国共产党塞纳区委会大会上的讲话）。

〔47〕引文见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199页。

原文缺注〔48〕——译者。

〔49〕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巴黎，马伯乐书店，1961年，第109—110页。

〔50〕R·巴塔利亚：《意大利抵抗运动史》，都灵，埃瑙迪出版公司，1955年，第83页。

〔51〕参看巴塔利亚和加里塔诺合著：《意大利抵抗运动简史》，罗马，团结出版社，1965年，第36页。

〔52〕隆哥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报告，见《各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1948年，第227—228页（这本书在以后引用时，将名为《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53〕譬如说，可以参考亨利·米歇尔《欧洲地下运动》，巴黎，法国



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47—48页。在纪念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陶里亚蒂谈到这一时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1943年3月，都灵工人为了反对残酷的剥削和法西斯战争政策，开始举行罢工。我提醒你们，这一运动的各个阶段都是由共产党人准备和组织起来的，是由以马索拉同志为首的意大利本国党内核心组织的同志们所领导的。这次罢工对于法西斯政权是一次致命的打击。7月25日，这个政权终于崩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旧基础包括军事组织也随之瓦解了。这时，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就开始了。人民掌握了主动权，把国家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组织、建立了一支军队，选出了领导人，为拯救他们的国家免于毁灭和灾难而进行战斗。不错，当时带头的、站在战斗最前列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老战士和新战士。”（陶里亚蒂：《为自由与社会主义奋斗的三十五年》，见《意大利共产党手册》，国际部，1965年，第14—15页。）

〔54〕陶里亚蒂：《抗德战争中的意大利》，在1943年11月12日《真理报》。原文引自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5年俄文版《陶里亚蒂选集》第1卷第274页。陶里亚蒂在该文中没有提到在三大国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一切真正的权力都将掌握在同盟国军事当局手中。意大利人民须待战争胜利后才能行使民主选举政府的权力。

〔55〕引文见皮埃特罗·塞基亚所著《抵抗运动阶段中菲亚特公司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载《社会主义史杂志》，1964年，第22期。

〔56〕莱利奥·巴索在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墨索里尼垮台前不久在米兰举行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马凯西同志（一位意共代表）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文件，竭力向资产阶级保证社会秩序不致发生任何混乱，（甚至关切地安慰工业家们说，反法西斯政府将赔偿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我对他宣读文件时局促不安的神情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天主教民主党代表听完之后，朴实地评论说：‘我们天主教民主党人现在可比共产党人还要左得多呢！’”（莱利奥·巴索：《抵抗运动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

〔57〕从德军占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时起，意大利就有三个全国性的解放委员会。一个在北方，一个以罗马为基地——它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的权

威，而实际上并不能控制中部的解放运动，另一个在那不勒斯。

〔58〕马切拉·费拉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第339页。这本书是根据陶里亚蒂同作者的谈话和意共的有关文件编写的，并经陶里亚蒂本人校订和改正。因此，书中所述应视为陶里亚蒂对我们所讨论的事件的意见。

〔59〕同上，第340页。

〔60〕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前领导人对陶里亚蒂的论点曾予以某种抵制的事实，是苏联共产党外事部门的官员们在情报局刚刚成立、并在会议上对意共的政策大张挞伐之时透露出来的。

〔61〕见注〔58〕所引书第350页。

〔62〕《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9卷第86页。苏共高级党校所采用的现代史教科书中，对这件事甚至叙述得更加明确：“应苏联政府的请求，意大利问题协商委员会（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组成）通过了一项决定：由巴多利奥元帅组成一个包括所有反法西斯党派代表的政府。”（《现代史》，第二部分，莫斯科，1959年，第582页。）

〔63〕关于斯大林向铁托施加压力的简略情况，见下面关于南斯拉夫革命的部分。

〔64〕见注〔58〕所引书第362页。

〔65〕陶里亚蒂：《共产党人的民族团结政策》（1944年4月11日的演讲），《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24页。

〔66〕陶里亚蒂：《向民主前进！》（1944年9月24日演讲），同上，第74页。

〔67〕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92页。

〔68〕见注〔58〕所引书369页。

〔69〕同上，第369、371—372页。

〔70〕同上，第369页（重点是我加的）。

〔71〕《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见本章注〔54〕）第1卷，第379页。

〔72〕见前引巴塔利亚与加里塔诺合著书，第189页。

〔73〕同上，第91页。

〔74〕同上，第202—203页。

〔75〕敌人利用严冬气候，出动大批军队企图包围高山上的游击队，切

断其与供应基地的联系。游击队决定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向山下平原前进。这种“向平原”（“pianurizzazione”，来自平原“pianura”一词）的战术，效果很好，它增强了可用于工业中心和大工厂武装斗争的部队。

〔76〕隆哥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228—229页。

〔77〕同上，第230页。

〔78〕《现代史》第538页。

〔79〕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7至10月号第66页。

〔80〕“管理委员会”是根据起义前不久北意大利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指令成立的。它是一种代表工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团体，其任务就是协同政府特派员和厂商一道来管理工厂（见注〔76〕所引隆哥的报告）。

〔81〕《再生》1945年5至6月号（重点是我加的）。

〔82〕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99页。

〔83〕马切拉与毛里齐奥·费拉拉合著：《意大利生活纪实（1944—48）》，罗马团结出版社，1960年，引文见1964年《国际研究》第44—45期的该书第7、8两章的法译本，第205页。

〔84〕陶里亚蒂从解放到1946年6月2日选举任司法部长。该部的主要任务是清洗与处罚法西斯活动分子。党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是集中力量打击上层，打击真正的罪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很难这么做到，因为资产阶级势力与盟国千方百计破坏清洗。党对这种破坏也并没有认真去进行斗争。甚至象莫里斯·沃萨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历史学家都指出来了这一点：“如果说清洗是敷衍了事的一—的确如此，特别在南部尤其严重——，那部分地是由于盟军施加影响与右翼自由主义集团进行反对的缘故，但还要归因于被任命来进行清洗的人物，首先是相继担任这项职务的陶里亚蒂和南尼所表现的过度的迁就，他们也许意识到，不管他们的愿望如何，由清洗而空缺的职位，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填补。几次大赦做了剩下的事情，让罪大恶极的民主的敌人，例如瓦莱里奥·博尔杰塞王子和欧洲新纳粹运动领袖之一的外交官安富索，得以重新出头露面。”（M·沃萨尔：《基督教民主主义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56年，第275—276页）。

〔85〕埃米利奥·塞雷尼：《反对派的高峰》，都灵，埃瑞迪出版公司，1948年，第60页。

〔86〕《陶里亚蒂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463页。

〔87〕前引沃萨尔所著书第275页。“三党执政”指的是主要由天主教民主党人、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组成政府的制度。

〔88〕同上，第274、276页。

〔89〕陶里亚蒂的两位传记作家承认，“宪法中加入社会内容是同一部分天主教民主党人士达成协议的结果”（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9页）。

〔90〕意大利宪法中最“进步”的社会原则有：“意大利是一个基于工作的民主共和国”（第一条）；“共和国有义务消除经济与社会障碍，这类障碍通过实际上限制公民的自由平等，妨碍人的充分发展，以及所有工人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第三条）；“工人有按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取酬的权利；无论如何，这种报酬都应能保证他和他的家庭过自由而体面的生活”（第三十六条）。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些载入宪法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意大利旧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指向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第128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是代表意大利上层资产阶级与梵蒂冈的党在迫使共产党部长退出政府之后六个月通过的。对一些条文特别是第一条进行研究之后，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内容”，同1931年的西班牙宪法的情况一样，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的，因为“工作”与“工人”这两个词，不加区别地用于工人与资本家、劳动农民与大地主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1950年巴黎《政治科学全国基金会手册》所载的一组关于意大利宪法的论文，把这种意义不明确的说法很清楚地作了分析。

〔91〕陶里亚蒂：《意大利的复兴》第115—117页。

〔92〕巴黎《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第228页。

〔93〕同上，第227页。

〔94〕见注〔58〕所引书《陶里亚蒂》第388—389页。

〔95〕E·雷阿尔：《与雅克·杜克洛一同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被告席上》，巴黎普隆书店，1959年，第4页。

〔96〕同上，第135页。

〔97〕V·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伦敦魏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社，1953年，第304页。

[98] 以下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与斯大林的干涉的简短分析，主要根据卡德尔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活动的报告（《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41—69页），德迪耶尔的书（《铁托谈话录》），以及费伦茨·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年，第1卷，第66—69页。我也注意到了以本章注〔2〕所提到的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的说法。苏联的说法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旨在改变南斯拉夫革命路线的干涉，但含蓄地承认了南斯拉夫的政策是对的。

1964年出版的《国际研究》第44—45期，是一期研究从解放到“冷战”开始那段时期的专刊，其中载有关于法、意、匈、保、捷等国的论文，但对南斯拉夫一字未提。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法国共产党不愿提及南斯拉夫人民在解放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榜样，它同法共所奉行的政策一比较会太令人难堪了。

[99] 卡德尔在（上面的注所提到的）报告中说，早在1941年末和1942年初，游击队司令部就开始挑选最好的战士和最好的队伍，组成不固定在某一地区而能按照统一的作战计划行动的战术分队。这批队伍以后成了师和军团。这支革命正规军就纪律、作战经验、战斗力与作战方式来说，都有别于游击队，尽管游击队还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两种斗争形式的结合，是南斯拉夫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南斯拉夫人民所面对的敌人，并不比在法国或者意大利的敌人弱。德国人经常动用精锐部队，包括意大利、保加利亚与其他外国军队，为占领者雇用的一些傀儡政权的军队，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

[100] 德迪耶尔：《铁托谈话录》第178页。

[101] 同上，第179页。

[102] 同上，第207页。

[103] 同上，第208页。

[104]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79页；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20—224页。

[105]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情况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2—235页。关于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见下面注〔144〕。

[106] 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237页。

[107] 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83页。

[108] 引文见巴齐尔·达律瓦斯：《希腊：从抵抗运动到内战》，载《国际研究》第44—45期，（1964年）。丘吉尔的电报刊载在该杂志的第268页上。值得指出的是，法共的这份杂志援引丘吉尔关于斯大林让他“在希腊享有行动自由”的说法，而对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一点也没有提出怀疑。

[109] 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该党于1944年和1945年初所犯错误列举如下：

“（1）1944年5月签订的黎巴嫩协定。根据该协定我们作出了不能接受的让步，实质上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富裕的寡头复辟旧制度、阻碍希腊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

“（2）卡塞塔协定。它将希腊武装部队置于英国斯科比将军统率之下。

“（3）党的领导对英帝国主义者及其雇佣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十二月战斗缺乏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准备。

“（4）瓦尔基扎协定，这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妥协，等于向英帝国主义者和希腊反动派投降。”（《希腊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希腊文本，巴黎1961年，第99页）。

[110] 引文见安德烈·凯德罗：《希腊的抵抗运动》巴黎，拉丰出版社，1967年。

[111] 见本章注〔95〕和〔98〕，参见E·雷阿尔所著的书、卡德尔的报告以及德迪耶尔所著关于铁托的书。卡德尔的报告虽未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名，但它捍卫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明显地是对其他各国党的批评。这种间接批评与雷阿尔注中的直截了当的批评，说法基本相符。

[112] 卡德尔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52页。

[113] 哥穆尔卡关于波兰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9页。

[114] 关于杜克洛与隆哥对南斯拉夫批评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日丹诺夫“支持”这种批评），德迪耶尔作了如下的描述：“杜克洛和隆哥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态度的反应是不同的：杜克洛很恼火，并且气忿地拒绝和任何人说话。会后他躲进公园，独自坐在一条长椅上，不停地摇晃着他那两条碰不着地面的短腿。隆哥则相反，他要求见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更加详细

地听取他们的批评。至于意大利共产党战时的政策，他说，那是奉莫斯科之命干的”（《铁托谈话录》第305页）。

〔115〕本书上册第6—16页。

〔116〕见本书上册“作为修正主义者的斯大林”和“人民阵线的经验教训”两节。

〔117〕见本书上册“最后一幕”一节。

〔118〕“文件记录与研究”（《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6页）。1946年12月21日埃利奥特·罗斯福会见斯大林元帅的情况，见1947年1月22日《每日邮报》。

〔119〕九党声明，《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6页。

〔120〕斯大林：（《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时谈话、命令及答外国记者问》1941年7月3日—1945年6月22日），（以下简称《战时谈话》一译者）伦敦，哈钦森出版公司，1946年第112页。

〔121〕日丹诺夫的报告，见《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12—14页。

〔122〕《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第7页和22页。

〔123〕苏联外交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杜鲁门1941—45年的通讯集》伦敦，1958年，第2卷，第202页（斯大林1945年4月1日接到罗斯福私人的密电）。安·方丹提到了罗斯福的这个电报（前引方丹书第236页）。（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一译者）

〔124〕正值戴高乐将军重申他对雅尔塔会议划分“势力范围”的著名立场时，美国国务院于1968年8月2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说克里米亚会议上“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都没有讨论势力范围”。1968年8月25日—26日《世界报》发表了雅尔塔各项协定的全文，想以此来支持国务院的观点。这项协定象三大国所有的公开协定一样，目的是向各国隐瞒这次“划分势力范围”的真相。要达到此目的，协定一方面在明确提到“划分”哪些地方的时候含混其词；另一方面对会上所订的秘密协定不置一词。第一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尔塔协定的正式文本在涉及南斯拉夫的时候，说三大国一致建议铁托和舒巴希奇将他们之间（上面已经提到）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但只字不提这个协定一方面斯大林，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南斯拉夫暗中施加压力后强加给南斯拉夫的，要南斯拉夫接受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商定的在南斯拉夫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的条款。波兰以及其它许多地

方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这样。奇怪的是，共产党人竟会象国务院那样来看雅尔塔的或“三巨头”其他会议的正式协定。例如，塞尔季奥·塞雷在1968年5月4日的《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和E·拉季奥尼埃里为团结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一本涉及“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官方报道的书所作的序言，居然都是这么看问题。

[125] 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61年，西班牙文本，第214页。

[126] 艾登：《估计》，伦敦和纽约，卡斯尔出版社，1965年，第296页；参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79页。

[127] 《国际工人运动史》，苏共高级党校教科书(见注[2])第43—44页。

[128] 同上，见本书第14页。

[129] 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2页。

[130] 引文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子夜出版社，1963年，第433—434页。

[131]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伦敦费伯公司，1937年，第189页。

[132] 引文见前引布鲁埃所著书第434—435页。

[133] 陶里亚蒂关于这一时期意大利群众运动、游击队活动以及国家危机情况的描述，见注[53]。

[134]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188页。斯大林开的玩笑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卷第72页。“各族人民的父亲”不知道他自己说得对。

[13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1页和399页。德波林的描述根据的是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回忆录。据赫尔说，在魁北克会议上丘吉尔主张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苏联人闯入”这一地区会严重威胁“英国和美国的利益”赫尔：《回忆录》，伦敦，霍德与斯托顿公司，1948年，第1231页。

[136]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111页。

[137] 西班牙共产党刊物《我们的旗帜》，1944年6月30日社论。

[138] I. 马斯基：《第二战场问题》，在《国际研究》第9—10期，巴黎，1958年，第239页。



[139]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7卷第181页。

[140]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

[141] 据罗斯福的儿子的记述，总统是在开罗会议上同英国首相的一次谈话（1943年11月22日）中说了这种看法。（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到的》，纽约，迪尤尔、斯隆与皮尔斯公司，1946年，第156页）。

[142] 美国国务院：《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华盛顿，1959年，第539页及以后几页。

[143]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94—95页。

[144] 当然，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一般都适当地考虑了适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条件的外交形式；换句话说，就是用尊重各国的独立、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之类的话来加以装饰。可是，有时也说得直截了当，下面这段话就是这样。这是丘吉尔叙述他同斯大林1944年10月9日的谈话。他说：

“谈事务的时机到了，于是我说，‘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事吧。你们的军队现驻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儿也有权益，使命和代理人。我们之间不应该在小事情上闹矛盾。就英国和俄国来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控制权，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百分之五十，你看怎么样？’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便在半片纸头上写了下来：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 90%

（获得美国同意）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他国家 25%

“我把这半片纸推过去给斯大林，他当时已经听完翻译。稍稍犹豫

了一下，他就拿起蓝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勾，表示同意，又递还给我们。这个问题没等记下来就全解决了。

“……随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用铅笔划过的那半片纸摊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如果我们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显得太随便的话，不会被认为是太玩世不恭了吧？我们把这片纸烧了吧。’

‘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前引丘吉尔所著书，第6卷第19页）。

讨论第二战场时又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英国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在巴尔干半岛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人由于同样可以理解的原因，坚定地反对这一点。双方都提出了取得军事效果的论据，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哪个地区仍要归自己控制。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俄国人从未否认丘吉尔的话。安德烈·方丹指出（见前引书第246页），俄文版的“三巨头”秘密通讯中删去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份电报，此电直截了当地提醒俄国人关于1944年10月商定的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事。但是，俄文版却收有一份丘吉尔1945年4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文中说：“我还要指出，南斯拉夫事件的处理过程不符合按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划分我们两国的利益的协定。”对丘吉尔的这种抱怨斯大林在回电中没有予以反驳。

[145] 斯大林《战时谈话》第111页。

[146] 见本书，第68页。

[147] 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20页。工党为了自己的利益，着眼于即将来临的选举，才反对利用希腊事件。工党击败了丘吉尔之后，在希腊仍然遵循原来的政策。美国领导人已准备把英国人排挤出希腊，以便取而代之。

[148] 解放前夕，民族解放阵线的队伍中，男女合计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方丹描述了雅典战斗之后说：“人民军离胜利只有一发之差了……圣诞节〔丘吉尔〕亲自飞抵雅典，不知这样一来他本人倒注定了人民军暴动的失败。人民军那天确实已准备炸掉大不列颠旅馆——英希军事参谋部和帕潘兹雷欧‘政府’所在地（这个‘政府’最多不过在那个建筑物以外几百平方英尺的范围内有管辖权），接着要利用爆炸引起的混乱发动总攻。由于丘吉尔的到来，也由于他同意同人民军的代表协商，人民军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前引书第216页）。真正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是希腊共产党迫不及待地想要同丘吉尔和解，这样来适应斯大林的政策。

〔149〕据苏联历史学家说，德国的计划是要占领盟军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安特卫普港，切断并打垮盟军的这支精锐部队，以至使盟国的进攻计划落空。

〔150〕《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295页。

〔151〕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将领》，伦敦约瑟夫公司，1952年，第393页。

〔152〕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25页。苏联历史学家当然使用能提供证据证明这实际上是盟国的目的的秘密文件，以及这些事件中英、美的一些主要当事者的回忆录。但是，苏联历史学家把这些材料拿来只不过作为旁证而已。苏联官方历史所作分析实际是基于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战时所熟知的事实与行动，还有当时根据英、美领导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对这些事实与行动所作的解释。例如我们常常援引的德波林与I.崔可夫少将合写的书，就是对官方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见该书的西班牙文本。）

该书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有关于盟军1942年在北非、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作战计划的分析。分析表明，只要把美国报刊查阅一遍，稍作研究，就可以透过这些计划看到这两个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第344页上提到美国在北非登陆之后“支持纳粹德国的走狗法国反动派”。第350页上提到瓦尔特·李普曼1943年的文章，文中提出一个想法，要把“大西洋共同体”作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一个工具。第354页上提到，根据当时公开的消息，伦敦和华盛顿政府公开庇护法国。第395页上把盟国军事当局在南意大利解放区建立的控制描写成殖民地制度。第399页上解释说，苏联代表团之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反对英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计划，是因为计划的真实目的——正如德波林在第337页及以后几页上解释的那样——是要“把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强加给这些民族，并重建反苏防疫圈”。正文中关于盟军在诺曼第登陆的真实目的的那一段引自该书第425页。第474页及以后几页上对英国干涉希腊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反映了“英国军队占领希腊引起全世界民主舆论的极大义愤”的情况。（我们可能注意到这里忽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德波林只字未提苏联报刊和苏联官方文件是如何反映这次普遍的义愤的，如果他能引述这方面情况的话，他是一定会引述的。）

〔153〕斯大林一定知道在意大利的盟军往希腊运送部队的情况，因为雅典有苏联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紧挨着英国远征军司令部。

[154]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5页。

[155] 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481页。

[156]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157] 见本书第67页前引德波林所著书第378页。

[158] 前引F.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57页。这里详细描述了以下情况：“1939年东波兰刚刚被苏军占领，就被迅速而又残酷地纳入苏联轨道：镇压所有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政党；逮捕成千上万的社会党人和农民党党员；除监禁和拘留了二十五万波兰士兵外，还流放了一百二十万波兰公民。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波兰流放者获释，但其中二十万人已失踪了。1941年获释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再次被捕，其中有两个是犹太社会党——崩得——的主要领导人亨里克·埃利赫与维克托·艾德勒。波兰西部被纳粹占领后，这两位领导人一直在东部避难。1941年他们接受苏联政府关于组织一个世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建议，并把一份章程草案呈送斯大林。莫斯科于1941年10月疏散后，他们被送往古比雪夫等候斯大林的回音。12月3日他们被捕，然后被处死。

[159] 前引书第56—57页详细叙述了与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抵抗运动的重要性。1944年8月1日，遵照流亡政府的指示，抵抗运动发动华沙起义，其目的显然是想在苏军（已逼近华沙）到达之前解放首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力机构。起义期间苏军抵达华沙郊区的维斯杜拉河对岸，他们只炮轰德国人而不发起进攻，虽然与抵抗运动的起义共同发起进攻定能将德国人打败。华沙人民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后，被迫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投降。苏联人以技术上的理由来为他们的这种消极态度作辩解。

[160]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47页。

[161] 同上，第2卷第202页；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6页。

[162]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2卷第206页。

[163] 引文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39页。

[164] 《斯大林同丘吉尔等人的通讯集》第1卷第331页。1944—45年冬，比利时的抵抗运动也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65] 见K·S·卡罗尔：《去波兰的签证》伦敦，麦吉本与基出版社，1959年，第82页。

[166] 这是议定书的第3条。该计划后来放弃了。

〔167〕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页。

〔168〕引文见罗伯特·墨菲《行武出身的外交家》伦敦，柯林斯公司，1964年，第259页。

〔169〕见本书，第97—98页。丘吉尔在他5月12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说：“俄国人能够在很短的期间里打到北海和大西洋水域，如果他们想那么办的话。”（前引方丹所著书，第243—244页）。

〔170〕《泰晤士报》，1945年8月10日。

〔171〕斯大林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我们的旗帜》1946年第5期。）

〔172〕《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1951年）》，《法国文献集》，1951年5月5日，第3—7页。

〔173〕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31页；前引吉拉斯所著书，伦敦，1969年，第141页。

〔174〕前引《毛泽东选集》第4卷。

〔175〕《会见斯大林元帅（1945年—1951年）》第4页。

〔176〕1968年巴黎“五月事件”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法共一个党员向《人道报》写信提出他的看法说，如果党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反对和害怕美国干涉而退缩了，1944—45年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见1969年1月24日《人道报》上刊载的马塞尔·韦里尔的文章）。《人道报》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萨特与《明镜周刊》记者谈话时也论述了这个问题，（1968年迪迪埃把谈话记录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发表，标题是《共产党员害怕革命》。）据萨特看，1944—45年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让步，就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发动革命”（第14页）。

1965年在意大利杂志《马克思主义评论》讨论全国人民阵线的政策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有限。莱利奥·巴索决不是一个极端分子，可是他认为雅尔塔协定使革命难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结果。他说，“1945年之后，在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解决办法。直到如今我还认为，假如在抵抗运动以前或以后的时期中，工人运动没有接受一系列使复辟易于进行的妥协条件以保证反法西斯的团结，它是可以从中找到一种使运动大大前进的解决办法的”。（见《马克思主义评论》，1965年7—8月合刊第17页）。

〔177〕法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最彻底的文件是政治委员会1952年10月3日就安德烈·马尔蒂和夏尔·狄戎事件通过的文件（《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10月）。与这两位党的领导人争论，源出对抵抗运动时期以及解放以后所采取的政策看法上的分歧。马尔蒂和狄戎（狄戎曾是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认为党推行了机会主义政策，坐失了良机，这是争论的中心。法共领导用老办法把讨论压了下去，甚至对马尔蒂加以诽谤，把他开除出党。狄戎虽留党内，但政治生命结束了。政治委员会的文件中有如下内容：夏尔·狄戎最近在德朗西的一次会议上说：指控我们想在去年5月28日夺取政权是可笑的，因为1944年本来是可以夺取政权的，但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要信守诺言。夏尔·狄戎这样说，没有解释1944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并不具备这一事实，反而暗示党背着工人阶级和人民许过什么愿。

政治委员会接着作了解释：

“1944年8月，战争尚未结束。联盟可能破裂，资本主义强国可能纠集在一起来对付苏联。在最后一分钟以战士身分来到法国的美国人，由于害怕苏军向西方推进得太远，如果能得到一点借口，就会毫不犹豫与欧洲的希特勒、亚洲的日本结盟，以便纠合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对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法国本身而言，虽然党的影响有很大增长，但若不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而走上别的道路，它立刻就会孤立起来，结果只能是惨重的失败。戴高乐就会找到借口用英、美军队摧毁工人阶级，与贝当达成协议，接过盖世太保的衣钵，干罪恶的勾当。

“党的英明而有远见的政策不允许这样做。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冒险主义者。”接着又说，“各国党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它们是否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合理政策的试金石。”

既然本书目的就是针对这些论点作出回答，因而这里不必多谈。但必须指出政治委员会进行论战的几种手法。

（1）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在1944年8月夺取政权的问题。其实，即使要等到1945年4月才夺取政权，谁也不会着急，因为到那时，联盟破裂的危险不存在了，而且夺取政权还可以与意大利北部的大起义相配合。不过，1944年8月党就应当加强和扩大由于解放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

动，换句话说，为在适当时候夺取政权准备条件。

(2) 政治委员会把问题说成是，要么夺取政权，要么继续打德国人，似乎进退两难。可是，假设夺取政权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这只能是意味着对德战争的结束而不能把对德战争转变为保卫新政权并使希特勒主义彻底失败的人民革命战争呢？而且，最重要的，为了继续领导反对希特勒的战争，难道只能象党的领导作的那样，使自己屈从于戴高乐和美国人的权威，解散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使解放委员会纯粹成为一种摆设，而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3) 政治委员会提到联盟破裂，盟友变敌人的危险，似乎罗斯福与希特勒和日本之间，与戴高乐和贝当之间的联盟，在1944—45年的形势下，已是十分容易办到的事了。这样说，只看到了党有孤立的危险性，没有看到美国人和戴高乐有孤立的危险性。

它说：“对苏联的态度是共产党的试金石”，这倒是无意之中洩漏了它政策的奥妙所在。正是苏联，至少也是斯大林不让多列士去探讨解放以后革命有爆发可能的问题，哪怕稍稍探讨一下都不行。

[178] 见注 [53]。

[179]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R·斯塔罗宾所撰《从共产党方面看冷战的根源》一文中所引，载《外交季刊》1969年7月号，第685页。

[180]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先锋出版社，1936年，第68—73页。

[181] 多伊彻：《斯大林》，第十二章。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未完成的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中说：“蕴含着巨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国际性内战在世界大战内部展开。可是斯大林主义仍死死抱住传统安全、raison d'état（国家利益）和神圣的民族利己主义不放。斯大林主义把这次战争看成是1812年那样的又一次卫国战争，而没有把它看成是欧洲的内战。斯大林主义并没有用国际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对抗纳粹主义。斯大林本人认为这种思想并不象外国干涉时期那样能鼓舞军队的斗志，感染或瓦解敌军。他鼓励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欧洲抵抗运动只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不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第73页）

[182] 多伊彻：《斯大林》，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66年修订版，第549页。

〔183〕巴甫连科与V·克涅任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1962年（俄文版）。引文引自《国际研究》，1964年，第44—45期刊载的该书第十三章，第57页。



## 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

### 卫星国的革命

后来成为苏联防御屏障的东欧五国，在被苏军解放时，彼此情况很不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达，其他四国主要是农业国，而工业比重又各不相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居民虽然都是斯拉夫人，但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很亲俄，波兰人却大都害怕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文化上和种族上与俄国没有多少联系。除亲俄外，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一直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它在抵抗运动期间成为国家的主要政党。保加利亚共产党虽比不上捷克党，却一直也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党员组织了游击活动，起过一定作用，到解放时，已成为最活跃的、组织得最好的一支政治力量。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则仍是在群众中没有多大影响的小党。捷克斯洛伐克经历过二十年的议会民主，而在这期间，其他四国则一直或者部分时间处于半法西斯专政的反动统治之下。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属于战胜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是战败国。还可以在各个方面举出许多重要的差别来。

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几乎是同时（1947—48年）取得政权的，又采取了同一类型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决定它们这样发展的不是国内因素。捷克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在国家解放的同时就取得政权，并立即在基本具备民主条件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H·里普卡说得很干脆：在捷克，不是人为地进行了革命，而是人为地推迟了革命。<sup>〔1〕</sup>保加利亚也有类似情况，它的具体条件不同，本来是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革命的。

波兰由于存在着各派政治力量，当时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左派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争取群众的支持。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苏联完全可以保护这三个国家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使之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便于他们开展活动，而只有他们的活动才能带来体现了人民意志的革命变革。

可是苏军在这三个国家中，以自己的意志取代了群众的意志。它接管了政权，让共产党人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岗位，如指挥军队和警察，掌握通讯工具等，起初以“民主的和议会的”形式掩盖政权的真正性质。拉科西后来承认，国家一解放，“党就完全控制了政治警察——国家保安局，这是我们能完全控制的唯一机构，而且坚决拒绝与按照各自的实力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分享控制权。”<sup>〔2〕</sup>拉科西还说，军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把军队的人数削减到最低限度（只有12,000人，而即使按照停战条款的规定，匈牙利也有权保有一支70,000人的军队），而且把它分散在全国。拉科西说：“原来为了使大部分军队处于共产党影响下，我们必须进行斗争，现在有了红军，这种斗争就不那么重要了……直到1948年，共产党接管了国防部，才开始加强匈牙利军队。”<sup>〔3〕</sup>可是拉科西从来没有解释过，共产党是怎样才能独家控制政治警察的，它又怎样在没有控制国防部并处于少数时（在1945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百分之十五的选票，跟它合作的其他党拥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其中小私有者党占百分之五十七）<sup>〔4〕</sup>实际上就取消了军队的。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共产党在最初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军队。

“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这是斯大林1936年答美国记者问时说的话。<sup>〔5〕</sup>时过两年，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地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就发生了这种“疯狂行为”，而这时又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了。1945年以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成了接受“输出的革命”的典型实例。这种革命是由解放者也即占领者建立的政权从上面来进行的，但并不是说，这个政权没有做许多改造社会的进步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革命的工作（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经济重建工作等等），也正是因为它做了

这些工作，一度曾赢得工人群众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费伦茨·费伊托在《人民民主国家史》一书中写道：

“1945—47年东欧国家完成的改革，可以看作是整个国家在所有民主党派比较积极、比较诚恳的支持下取得的成就。”〔6〕这位作者（不能认为他对共产党有偏心）又说，共产党影响的增长和组织的扩大，不能仅仅用有苏军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共产党员是完成这项工作最坚决、最活跃的力量，是这项工作的主要倡导者。但是当人民越来越看清楚，共产党依赖一个外国的力量，处于莫斯科的掌握之下时，这些功绩也就黯然失色了。一些主要的决定，往往连不那么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莫斯科通过的，而不是在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或索非亚通过的，甚至也不是在布拉格通过的，虽然捷克享有比较大的自治权。

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因而“解放”把爱国主义的感情提到了新的高度。在布拉格和索非亚，人们是把斯拉夫人团结的口号理解为自由和有主权的人民团结。连那些对解放者深表赞同的人，也不会轻易地让一种即使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新的压迫，来代替旧的压迫。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波兰在1945—47年阶段，尤其意识到了这种重新获得独立的重要性，曾经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是如此。保加利亚虽然也属于这一类国家，但由于人民的态度亲俄，共产党又是个大党，因而为莫斯科另眼相待。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除了仍处于军警统治之下，还由于要在经济上交付赔款、负担苏联驻军的给养和其他费用而崩溃了。德国的财产，包括大企业和银行存款，全部转归苏联国家所有。〔7〕

由于共产党人一涉及到苏联的利益时，无法在表现爱国心方面与其他政治集团相比，于是他们就在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争执时竭力表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波兰共产党人要为失去东方领土辩护，不仅成了反日尔曼情绪的拥护者，而且在泰亨（齐钦）地区问题上与捷克人大争特争。捷克共产党人曾被迫把鲁特尼亚让与苏联，但

在这次争端中与波兰人一样毫不妥协，而且在处理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时对匈牙利也寸步不让。（最后只好让住在斯洛伐克的五十万匈牙利人与住在匈牙利的不到五十万，但人数相当可观的斯洛伐克人进行“交换”。）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要为苏联吞并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借德苏条约之机实行的）辩护，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反对（在调整领土中每次都倒了霉的）匈牙利人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多布罗加问题上反对罗马尼亚人，在马其顿问题上反对塞尔维亚人（在铁托被革出教门之后），也抓住机会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莫斯科是这一切争端的仲裁者。这里显然缺乏一种美德——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sup>〔8〕</sup>

东欧变革的伟大“调节者”当然是斯大林的政策，它的目的是把这一地区的国家组成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苏联的西部边境，并扩大莫斯科认为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地区。换句话说，要建立起那种能给克里姆林宫以充分的政治保证的制度。

当时斯大林想要把建立这种制度与试图同美国达成永久性的全球协议的做法协调起来。实权要由苏联信得过的人来掌握。同时斯大林又要在表面上尽量做到遵守雅尔塔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协定等文件中规定的形式民主的原则。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措施是必要的，这不仅为了要铲除那些天生仇视与苏联结盟，尤其是仇视在经济上与苏联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也是为了创造亲苏集团的政权得以维持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但是，斯大林关心的，是使这些措施不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或一般的私营企业的进攻。

除由“大同盟”政策决定的上述因素外，还应提到另一个由苏维埃制度特点决定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制度不允许邻国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由劳动人民来组成并控制政治经济机构。而只有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才能迅速发动群众，教育他们，使他们摆脱旧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建立一道抵御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固屏障，从而给苏联提供最坚强的防御带。可是，无论

是苏联式的官行政治还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各党的领导集团，都担当不了这个任务。南斯拉夫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是个例外，但它从反面证明了这条规律，它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新特点的领导集团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形成了。<sup>〔9〕</sup>

上述种种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们决定了捷克社会主义革命的“延期”，并被哥特瓦尔德称之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所取代。它们决定了保加利亚的现实：政府虽由季米特洛夫领导，政权或多或少也掌握在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手中，但党所确定的任务却是“巩固民主议会制度”，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sup>〔10〕</sup>由于这些因素起作用，“民族民主革命”输送到了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这三个国家里，政权虽真正为共产党所掌握，但是它们缺乏掌权的政治基础，就不得不以虚伪的议会制度来装饰门面。共产党员不得如同过去的反动政党那样，成天忙于选举事务。然而，即使用了这种办法，仍不足以把那些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如匈牙利的小私有者党和保加利亚彼得罗夫的农民党引入“新的民主政体”的主流。需要在苏联警察的专门帮助下制造阴谋，以便理直气壮地镇压这些党派。议会制度很快成了一出滑稽戏，即使在五国中唯一实行议会制度真正象点样子的捷克，情况也是如此。

对共产党来说，东欧各国在被苏军解放后所走的道路，完全是一条新的道路。最为近似的经验——也是被人们看作“人民民主”的第一个例子——就是1936—39年西班牙共和国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是在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非常情况下取得的，除此之外，它还不具备苏联军队在场这个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些年代里用马列主义原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所作的解释根本是一派胡言，因为只要一考虑或一分析苏联军队这个因素的关键作用，必然会对苏联外交不利，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战略“提供”论据。

扼要地说，“人民民主”理论的论据如下：一旦金融和土地寡头的政权被解放所摧毁，而它的经济基础也由于采取没收与国有化的措施而遭到破坏，工人阶级、小农与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中等资产阶级便可能进行长期合作，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国营经济成分继续增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断降低，小农会逐渐地、自愿地采取合作的生产形式，最后整个经济将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阶级斗争仍在进行，但在民主议会制度之内进行，采取的是和平的、渐进的形式。

一旦工人阶级（即共产党）控制了联合政府，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的力量对比又使苏联能够保护走上这种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受帝国主义的干涉，这种发展形式据说就有了保证。苏联理论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同于苏联道路，它是苏联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国家的胜利所创造的“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季米特洛夫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他说：“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19年时〕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现在“在许多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为工人阶级与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合作问题。”〔11〕（“其他进步人士”，自然是指工业、商业和农业资产阶级，它们的政治代表参加了“民族阵线”和“人民民主政府”，即通常所说的“人民政府”。）这是1945—46年苏联和美国有希望达成全球性协议时最权威的观点。

随着“大同盟”和“小同盟”中冷战的开始和幻想的破灭，老季米特洛夫不得不作自我批评，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四十年代如同在二十年代一样需要，并且承认“人民民主”虽不同于苏维埃制度，却同样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12〕不用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按照苏联人的理解，就是取消无产阶级民主的任何伪装，就是共产党的专政，更确切地说，就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专政。“人民民主”与“苏维埃制度”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前者拙劣地模仿议会制，保留着多党制。

法共和意共在原来的策略因德国战败而失去根据之后，接受了这个观点，接受了它在1947年转变之前的最初形式，并用它来从理论上为它们参加大资产阶级政府作辩解。“民族团结”政府被看作是走向“人民民主”的第一步；国有化被看作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打击。一旦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通过普选控制了国家，国有化经济就开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将逐渐扩大。国家便不再为资本主义寡头服务，而转变成人民民主的国家了。这一模式自然与新的世界均势的思想有联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均势，按照雅尔塔精神建立起来的苏美合作终将获胜。如果人民的大多数选举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那么资本主义列强是会被迫尊重人民的意志的。

这样一来，这个在东方似乎是自行建立起来的发展模式，通过抽掉那些使之有可能实现的因素之后，转移到了西方。各国党自我吹嘘，说它们完全靠民主和议会手段赢得了，或正在赢得对国家的控制，而且靠同样的手段保持着政权。

多列士1947年6月8日在法共塞纳省的会上所作的报告，就是一个例子。报告详细论述了这种“新型的民主”。多列士特别提到了波兰和匈牙利，提到了这两个要是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共产党连一天也掌不了权的国家。他声称，在这两个国家里，“人民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保持着“人民政权”，“并有一个根据多少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议会”。〔13〕

很难说西欧共产党领导人只是在欺骗战斗的群众，还是也在欺骗他们自己。不论是哪种情况，反正欺骗不了他们号召来同他们一起沿着新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政治集团。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之所以软弱无力，首先是因为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不符合这个新教条的框框，而且，东欧的事态在工人运动其他改良主义集团中引起的反应使得这种新改良主义越发软弱无力，更不用谈“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反应了。

我们不想在这里从理论上对这些思想进行评论。“冷战”实际上已经对此作了批判，因而这些思想一度不见露面，直到苏共二十

大之后才重新冒出来，而且这一回从理论上作了一番精雕细琢，大有发展了。等我们研究到这个时期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现在只需要指出一点：西方版本的“人民民主”学说，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种能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阶级的活动方面作出新结论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学说是以最为实用主义的方式制定出来的。它所依据的无非是官方理论界对世界力量对比的估计之类的“客观材料”，而这种估计很快就被事件实际发展进程证明是错误的。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被人不客气地赶出了政府，而它们并没有表示反抗。西欧并没有走向人民民主，反而朝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前进了，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在西欧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东方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了。受到超级大国美国鼓励的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手段加紧反抗任何会缩小它的经济基础和增强共产党垄断地位的改革，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攻势，加上马歇尔计划散布的幻想，证实了人们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和解放时期所梦想的田园诗般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比，人民民主国家经济上的脆弱性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西方的贸易。当国家着手重建时，人们就开始感觉到这种依赖的分量了。

例如，在捷克，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期间，从苏联的进口降低一半，对苏出口降低三分之一。同期从美国的进口增加两倍，对美出口增加一半。1947年第一季度捷克对外贸易中，苏联在进出口方面都占第六位。我们看到，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sup>〔14〕</sup>捷克政府根据这些情况，并由于它对国内和国际的发展趋势还存在幻想，因此1947年7月4日他们作出决议，参加为讨论马歇尔计划而召开的巴黎会议就不难理解了。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1945年，苏联在波兰的进出口贸易中，各占百分之九十一和九十三。1946年，百分比分别降为百分之七十和五十。<sup>〔15〕</sup>当然，这种趋势与斯大林设想的卫星



国体系的建立是不相容的。1947年7月8日，波兰政府还正在考虑去不去参加巴黎会议，莫斯科电台就宣布说波兰已拒绝参加。同一天捷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把问题给他明确地摆了出来：由于马歇尔计划的意图是要孤立苏联，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威胁卫星国体系的团结的其他倾向也在这时露头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尽管服从苏联，而且也许丝毫不想怀疑这点，但它们仍打算建立双边联盟，签订同盟条约。南斯拉夫成了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极。南斯拉夫计划建立巴尔干联邦，成立一个版图包括黑海到亚德里亚海地区的国家，由已表现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铁托来治理，这就足以引起斯大林病态性的猜疑了。<sup>〔16〕</sup>

这样，到1947年夏季，卫星国内部和西欧局势的发展以及华盛顿采取的新的公开的反苏路线，要求克里姆林宫彻底修订原来的政策，包括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东西方共产党的政策。有必要“拧紧螺丝钉”了。于是，共产党情报局就应运而生。

## 共产党情报局与苏联的“新策略”

斯大林按自己的逻辑对新的世界局势作出反应。现在他处于荣誉的顶峰，确信自己一贯正确，而且已经习惯于二十年来对苏联的国家和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用专制的方法。因此，他根本不可能考虑把推行了如此之久的政策和产生的新问题交给运动本身去进行批判分析。他站在奥林匹斯山之巔俯视一切，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履行一下手续，召开一次世界会议或代表大会，使预先作出的决议有个集体批准的样子，如同共产国际最后几次代表大会所做的那样。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他认为对他所提出的具体目的有用的共产党代表召来开会。他认为，除了苏联共产党外，再加上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资本主义世界两个主要的党，就可以组成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机构，担当起共产国际时期执行委员会的作用，把苏联领导决定的路线强加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此外，共产党情报

局的组成成份是由两个非常明确的考虑决定的。为了回敬美国的攻势，斯大林的主要路线是使卫星国结成铁板一块，由苏联来控制。因此，卫星国的党被邀请到波兰举行秘密会议。其次，在当时的局势下，斯大林的主战场在欧洲，他要在欧洲达到两个紧密相连的目的：保卫卫星国不受侵犯，使美国无法实现其把包括西德在内的所有西欧国家结成一个由华盛顿领导的统一集团的计划。这就是西欧两个最重要的党出席了波兰会议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个党因为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遭到失败，在会上曾经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来，现在会议给它们一个机会来弥补它们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让它们承担一项特殊任务：打乱美国在西欧的计划。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共产党，甚至连中国共产党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当时正从事武装斗争反对美国干涉的希腊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邀请。

这些党未被邀请的理由很简单。斯大林的目的与当时“自由世界”政治家的看法相反，不是要开展世界性的革命斗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的战略目的没有变，只是策略变了。斯大林采取“强硬”路线，是想迫使华盛顿承认根据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的妥协以保证它们平分天下而划分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为了达成协议准备作出的让步，关系到殖民地世界，特别是远东。至于希腊，他早已放弃给丘吉尔了，如果再把它转到美国人手里，他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这些微妙的问题在日丹诺夫代表斯大林向九国共产党会议所作的报告中都有反映。这个报告对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逝世之前这一段时期所遵循的路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1943年的决议决定了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前各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路线一样，日丹诺夫的报告以及只是概述了报告主要内容的九国共产党的声明，决定了此后五年共产党的路线。1953年以后，共产党情报局实际上已停止活动（虽然它到1956年4月才正式解散），而且可以看出，为了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新转变，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路线又有了变化。

日丹诺夫报告的主要部分根本不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预言——在战后将会出现一个由“两个大国”满怀信心地合作的世界——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而只是说战后世界已分成两大“阵营”：“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的民主阵营”。<sup>(17)</sup>在帝国主义阵营里，“重要的领导力量是美国”，英法两个成员国是“美国的卫星国”。然后是一些起“支持”作用的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得到比利时和荷兰等殖民国家、土耳其和希腊等由反动的反民主的政权统治的国家以及中东、南美国家和中国这一类政治上与经济上依赖美国的国家的支持。”最后，帝国主义阵营还得到“各国反动的反民主的力量”和“昨天的军事对手”（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反帝阵营的基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这个阵营的“拥护者”，印度、埃及、叙利亚是它的“同情者”。“反帝阵营得到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兄弟共产党、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各国的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在这一阵营中，“苏联及其外交政策起着领导作用”。

可以看出，“阵营”一词首先是指由一些国家组成的集团。没有组成国家的社会政治力量只能补点分量，起着次要的作用。每个阵营都是围绕着“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组成的，它有一个由领导国及其直接控制的国家构成的基地，并依靠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反帝阵营“基地”以外的共产党只是起补充作用的力量。它们在贯彻克里姆林宫制定的路线中实际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符合这个定义的。

根据日丹诺夫的表述，两大阵营的战略目标如下：帝国主义阵营要“加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而反帝阵营则要“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和新战争的威胁，加强民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反帝阵营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持久的民主和平”。

无论是日丹诺夫的报告，还是九国共产党的声明，都根本不提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也不联系当前任务把这一斗争作为长期目标提出来。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共产国际解散后第一次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下定义。联系起其他意义深远的重要事情也没有提到来看，这种缄默就更不是偶然的了。中国内战和希腊起义是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正在进行的两个革命行动，最有希望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报告和声明对此只字不提；不分析它们的深刻意义；不把它树为其他国家人民的榜样；也不要求民主力量支持中国和希腊战士。

考虑到美国直接插手中国和希腊的冲突，这种缄默就更是意味深长了。在日丹诺夫的长篇报告中，只有四行字提美国干涉中国和希腊，而且还根本不提两国共产党对此作出的革命反应。相反，他用了大量篇幅谴责马歇尔计划。他说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不援助陷于贫困的战胜国，却援助德国资本家……恢复帝国主义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权力，迫使它们放弃与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紧密合作。……以各种协定把与美国有联系的国家组成一个集团，并答应给欧洲国家以贷款，不过这些国家要付出代价，首先放弃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放弃政治上的独立。

一句话，日丹诺夫认为，马歇尔计划就是华盛顿拒绝给苏联提供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所寻求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这个计划表明美国的政策对卫星国的团结是个威胁，表明美国想要建立一道屏障，阻止苏联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扩大其影响。这么一来，斯大林动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盟国反对“奴役欧洲的计划”的真正动机倒看得清清楚楚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强调了落在法共和意共肩上的特殊任务：“它们必须高举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假如法共和意共能“起来领导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事业的力量，那么奴役欧洲的任何计划都是不能得逞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除了1943年那个解散共产国际

和标志着放弃为欧洲的灾难寻求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决议外，很少有什么文件象日丹诺夫的报告那样，如此明显地反映出世界革命斗争是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所说的目的和应该优先考虑的“战线”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斗争的形式问题，对待作为革命形式之一的武装斗争的态度问题上。对中国和希腊内战只字不提（只有两行谈越南解放战争），不仅是因为斯大林想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作出让步，而且也是因为要根据保持和平这个“战后时期的根本任务”来行事的缘故。日丹诺夫说，苏联“关心的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而“条件之一就是国外的和平环境”。日丹诺夫报告前不几天，维辛斯基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苏联政府认为，“在现在的局势下，任何战争都势必发展成为世界大战。”〔18〕因此，局部战争是“苏联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基本任务”的严重威胁。因此，希腊和中国进行的革命战争，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反帝斗争方式。它们有使苏联卷入另一次冲突的危险。日丹诺夫报告不提这种战争，希腊的战士没有从苏联得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援助而终于失败，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取得了胜利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异想不到的事，那么，他们的胜利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而且是不听斯大林劝告的结果，要是听了斯大林的劝告，他们就会同蒋介石和美国人妥协了。

应当保持和平，这无疑是经过六年战争之后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是严峻的现实很快就表明，苏联也许需要它所要求的和平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民则需要有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奴役的战争，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这是他们的“基本任务”，不管为此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至于说，任何局部战争必将发展成世界大战这一临时拚凑起来的教条，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事态发展会表明它是站不住脚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一点也不想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它们为了达到局部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装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不过如此而已。但是这个教条是有用的，可以用来为投降勾当和机会主义行径辩解。

斯大林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的三件法宝中的其他两件是“民族独立”和“民主”。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事业的力量”。日丹诺夫在痛骂那些不顾“民族尊严”为美国人效劳的欧洲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时，努力向欧洲的资产阶级说明美国的计划对它们利益的威胁。他对他们说，美国资本家假意支持你们去反对莫须有的共产主义威胁，实际上是试图接管欧洲的市场，把你们从殖民地赶出来。这说明存在着一种共产党应当充分利用的可能性，就是说，一部分理解到它的金钱利益与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的崇高理想之间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可能和共产党人一起来反对美国人的贪婪计划。这就是日丹诺夫分析的实质。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使第三件法宝——民主——不带过激的色彩。如果过激了，公开建议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会证实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也就恰好证明美国政策是正确的了。因此，斯大林的新路线又一次引人注目地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如同前一时期为了不打乱“大同盟”而把这一远景取消一样。

显而易见，斯大林依然坚持他当权以来所实行的战略的基本原则。他在1947年为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政治路线，仍把利用帝国主义内部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放在首位，而不把利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放在首位。既然欧洲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和对于美元前途的担心掩盖了前一种矛盾，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开这些矛盾。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击败赞成美国计划的中间派的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为此就得与前阶段的做法相反，鼓励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这条路线的战略目标是要与受到美国扩张威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重新建立民族团结，建立一个保卫和平与维护民族独立的“广泛的阵线”。这条路线自然不涉及卫星国的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下章将会谈到，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加快了，甚至采取了行政和镇压的手段，以及让完全服从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当权的方

法，来加速这一过程，以便使“反帝阵营”的这块“基地”成为铁板一块。

采取这个战略的用意是要击退美国的攻势，让苏联有时间在原子武器方面赶上美国，最终达到建立新的世界均势，迫使美国接受斯大林所寻求的大妥协的目的。宣布反攻本身可能就会促使美国人进行思考，从而迅速地改变政策，这种可能性也是考虑在内的。在这方面，日丹诺夫的报告颇具匠心，为的是要华盛顿看到紧握的拳头下那只伸出来的手。

很清楚，目的不是要攻击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而是比较温和的，即阻止资本主义的扩张，仔细琢磨这个报告，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报告不讨论殖民地革命问题，工业化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或美国的阶级斗争问题，原因就在这里。）接着，日丹诺夫暗示，专家们也一听就明白：在德国这种扩张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利益是不容的，在那里需要就优先承认苏联利益达成协议。至于别的地区，斯大林的发言人只是指出，有的为美国人统治（日本和拉丁美洲），有的他们想要统治（英、法、荷三国的殖民地，中国、希腊、土耳其等），根本不提苏联对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也毫不关心那里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例如，就拉丁美洲来说，日丹诺夫报告中藏的谜底，几个月后由莫洛托夫的声明和盘托出了。莫洛托夫在回答美国关于国际紧张局势是由苏联在东欧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一谴责时说：“大家知道，美国也在推行一种加强与邻国——例如加拿大、墨西哥以及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sup>(19)</sup>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彼此都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那就什么都好办”。

日丹诺夫不提希腊和中国的革命战争，等于以外交方式强调，苏联对美国在中东和远东的利益持赞同态度。它进一步暗示，1946年12月斯大林提出的“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sup>(20)</sup>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有个条件：美国要放弃统治欧洲的要求。日丹诺夫坚持，“在遵守互惠原则和已签订的协定的条件下，苏联与

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他接着说：“谁都知道，苏联一直忠于并将一如既往地忠于它所承担的义务。苏联一直表示愿意与人合作。”换句话说，根据雅尔塔、波茨坦等协议，苏联仍然可能与美国合作。接着日丹诺夫对一种说法作了重要的澄清。他说：

“苏联政府从来不反对利用外国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作为加速经济重建的一种手段”。苏联政府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这种贷款“不应成为债务国的重担，也不应导致债权国对债务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奴役。”换句话说，只要马歇尔计划经过修订，不组织敌视苏联的集团，也不破坏卫星体系的团结，那么，对这个计划来说，大门仍然是敞开的。

当时，亨利·华莱士（曾任罗斯福时期的副总统）周围的美国自由派完全懂得日丹诺夫报告中密码式的信息。他们力图使舆论界人士相信，应当接受斯大林合作的建议，但遭到可悲的失败。<sup>〔21〕</sup>美国统治阶级觉得它们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使世界接受 *Pax Americana*（美国强制下的和平），或者换个说法，以有利于它们的方式来改变战争造成的势力范围的划分了。

##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

日丹诺夫的报告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后者乍一看来，仿佛是1943年被埋葬的“红色拉撒路”<sup>\*</sup>的复活——在资产阶级各界人士看来，是对“自由人民”的威胁。（“杜鲁门主义”曾宣布过，美国出于利他主义，把保卫“自由人民”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把上述两件事看成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宣布进攻。帝国主义领导人既然拒绝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同他进行全面谈判，那就最好要使人们相信上述说法。要把全世界保守势力纠集起来由美国控制，“赤祸”倒是从意识形态方面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

其实，斯大林的新政策主要是防御性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加强

---

<sup>\*</sup>拉撒路——圣经上的一个人物，死后四天耶稣使之复活。——译者



苏联在中欧、东欧和远东已经取得的阵地，同时使反苏集团无法巩固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发挥其“支持”反帝阵营“基地”的作用，用日丹诺夫报告中的话来说，它们的任务是“领导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计划进行抵抗的运动”。这种新的“抵抗运动”只有一个纯属空想的战略目的，那就是创建一种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独立、抵御华盛顿谋求“霸权”野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这就使新政策带有一定程度的“进攻”色彩，它使用激烈的词句来谴责美国的政策及其社会民主党“走狗”，而这种词句通常是用来掩盖思想的贫乏的。（这使人想起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骂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日子。）此外，开始使用参加政府提供合作的时期几乎已被遗忘的斗争形式——罢工、示威，甚至与当局对抗。但是政策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并不仅仅由所使用的策略来决定，激烈的词句可以为任何政策服务，而更多的时候给任何政策都帮了倒忙。

西欧的罢工运动从1947年秋季开始日益高涨，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结束（之后，显然低落下去，但意大利除外，1950—55年是它的高峰时期）。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表明，面对雇主和国家的进攻，工人阶级采取防御行动了。工人阶级力图反对合理化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这些措施对五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是起了促进作用的）。<sup>〔22〕</sup>各国党鉴于又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主要努力在于动员群众反对为美国政策效劳的“第三种力量”的政府，就力图去领导而不象1945—47年那样去阻碍劳工斗争了。共产党力图使劳工斗争与“保卫和平与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反对马歇尔计划和禁止原子弹运动结合起来，但收效不大。

1947年秋，罢工浪潮席卷法国，参加的人数超过两百万。由于罢工运动发生在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发表决议之后，政府认为遇到了“共产党的阴谋”，因而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它动用了后备部队八千人，解散了它认为不可靠的保安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付工人阶级。在不少城市里，工人与镇压队伍发生冲突，结果四人死

亡，数百人受伤，好几千人被捕。

当然并没有什么共产党的阴谋；不过是认为自己仍然象三年前那样处于革命边缘的资产阶级的一场虚惊而已，不过是法国共产党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因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受到批评之后表现出感到痛苦而已。法共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莫斯科表示：只要苏联政策需要，它是能采取强硬路线的，即使法国的局势不宜于那样做也在所不计。它力图使罢工具有政治色彩，并迫使法国总工会领导违反其中社会党一派的意愿提出，运动的目的包括“反对马歇尔计划所体现的经济统治计划”和“反对在我国有帮凶的新的战争挑衅者”〔23〕的斗争。这些口号在罢工群众中引不起多大反应，在其他居民中更是如此。谁能相信不久前法共自己称之为法国的伟大同盟者的人，同苏联一起维护各国人民的和平与独立的战士，一夜之间竟会变成要来奴役法国的万恶的战争挑衅者呢？为什么伟大同盟者的美元就不能帮助法国千疮百孔的经济得到恢复呢？直到不久以前还把恢复法国资本主义当作工人阶级的第一项任务的，难道不正是法国共产党自己吗？

法共并没有做到使罢工具有政治色彩，反倒给莱昂·布吕姆提供了极好的论据，证明共产党自动服从苏联的政策，因而他要求各搞各的工会运动。〔24〕几个月后，工人力量总工会作为社会党的总工会建立起来了，拉走了五十万法国总工会的会员。12月9日，法国总工会在主要经济要求一项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命令复工。一年之后，矿工又举行罢工，政府采取了派军队占领煤田、大肆逮捕等同样的对付办法。政府如同1947年秋季那样，指控共产党听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命令，准备夺取政权，不过这次是由内政部长、社会党人朱尔·莫克出面。〔25〕指控法共夺取政权，虽然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但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以多列士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在苏联封锁柏林的高潮时刻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的情况下，给政府制造最大的困难，让美国人忐忑不安。矿工的罢工有经济上的理由，也给法共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而他们力图延

长罢工时间，甚至当许多工人开始赞成复工时，他们还力图僵持下去。<sup>〔26〕</sup>1944—45年时，怀着高度政治热情的工人群众是跟着他们的先进团体走的；当时无产阶级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多列士却号召矿工和其他工人不要动用自己的力量，而要跟资产阶级合作，进行经济重建工作。到1948年，群众对社会振兴已经失望，对政治采取消极态度，多列士倒反而用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讲过的话，对矿工们说：“现在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sup>〔27〕</sup>日丹诺夫说这话的时间是1947年，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完全变了。多列士重复这话的时间是1948年，这时政治形势越发倒退，矿工的罢工处于孤立状态便足以证明。1947—51年间，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利润在法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百分之三十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八，工资收入则由百分之四十七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三。雇主和国家的进攻之所以能得逞，根本原因不是工人阶级在这时期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是共产党在1944—45年无条件地实行斯大林的政策，过低估计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意大利共产党也服从通过日丹诺夫表达出来的斯大林的新政策，但不象法共那样机械。意共努力推动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但并不强制事情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也看到了政治潮流有利于右派，正如天主教民主党人在1948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的选票和绝大多数席位一事所表明的那样。此外，与法国党不同，意大利共产党人有社会党多数派同他们团结一致，虽然敌视共产党人的社会党少数派逐渐在得势。

1948年7月谋刺陶里亚蒂的事件立即激起了群众的反击：八百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使国家瘫痪了两天，给人的印象深刻。党内好几部分人提议把罢工转变为起义，但是党的领导——遵循陶里亚蒂失去知觉前的劝告——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冒险主义。他们也可能是对的，但是七月总罢工不由得使人回想起意共领导面临1943—45年那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不去利用的力量，该是多么的强

大。

与法共一样，意共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争取和平与禁止使用原子弹运动以及反对马歇尔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的运动上，但它还能采取一定的严谨态度来观察意大利的特殊问题，虽然仍保留前一段的改良主义观点。陶里亚蒂在早期——情报局谴责铁托之前——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想同情报局保持一段距离。1948年1月，他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提到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即使提到时也强调指出，共产党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欧洲各国民主运动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相同的。”他还说：“现在，我们在〔情报局中〕与其他党之间自愿的兄弟般的合作是一种协商性质。”

西欧共产主义的两个大党多少还经得住“冷战”的危险和屈从苏联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其它小党则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共产党在本国解放后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一下就丧失了。西班牙共产党受到佛朗哥专政的严重打击。这个政府在美国的公开保护下，加强了对整个工人阶级和民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希腊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国际援助、尤其是没有苏联援助——而美国人则大力支持王室政府——的情况下，被迫于1949年8月放弃武装斗争。拉美的党和非洲的一些党也受到严重的损失。

后面有一章还要回过头来分析“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撤退问题。在对这一阶段作出总的评价之前——这一阶段除了上面提到的挫折外，也包括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越南胜利的序幕——，我们将依次分析三方面的形势，其中包含着对于了解当时和后来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道路十分重要的事件、倾向和现象。这就是：苏南分裂，它对其他共产党的影响和卫星国的演变情况；中国革命的胜利；“冷战”期间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任务的著名的“和平斗争”。

## 注 释

〔1〕H·里普卡：《布拉格政变》，巴黎普隆书店，1949年，第33页及以下1页。1946年5月的选举，捷克各政党和西方政府都认为完全是正常的和自由的。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赢得捷克全国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八。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赢得百分之四十的选票。300名代表中，有115名共产党人，55名国家社会党人（贝奈斯），47名人民党人，36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余为各小党成员。1946年7月，新政府在哥特瓦尔德领导下组成。

议席分配的情况与力量的对比是不相适应的。解放时各地成立了地方和大区的新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叫做民族委员会，其中除了不同政党的代表外，还有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贝奈斯政府在布拉格成立以前，就已承认民族委员会是合法的机构。1946—47年，三个大区的民族委员会的主席是共产党人，163个县民族委员会中128个，11,512个地方民族委员会中6,350个是共产党员领导的。此外，共产党控制内政部、工人民兵、大部分军队以及部队领导人，它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H·里普卡的说法确切地表明了上述事实（选举和民族委员会的详细情况摘自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于1947年9月向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作的报告）。

〔2〕费伊托：《人民民主国家史》第107页，引自拉科西1952年发表在匈牙利共产党理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3〕同上，第108页。

〔4〕同上，第107页。“在匈牙利，苏联当局对待经济问题很苛刻，对待政治问题表现出开放和宽容。事情的发展过程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苏联当局认为匈牙利这个国家不在他们的安全区域之内，因而想证明他们愿意尊重雅尔塔协定的安排，虽然这种安排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行不通的”。

（106页）选举后，随着苏美关系恶化，事情很快起了变化。1946年12月，小私有党的领导人被指控为阴谋反对政府。该党在议会中占有百分之五十七的议席。当它的议会党团拒绝放弃总书记贝拉·科沃奇的议员豁免权时，苏联当局直接进行干涉，指控他“阴谋危害红军安全”，于1947年2月把他逮捕，参见同书第194页。

〔5〕斯大林：《和美国路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1日），载《斯大林文选》上册第73页。

〔6〕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27页。

〔7〕根据费伊托援引的估计，罗马尼亚已偿付给苏联赔款十亿美元，还将偿付九亿五千万美元。1946年匈牙利总产品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偿付赔款。有关赔款和建立联合公司问题参见费伊托著作第136—137页、154—157页。扬·马尔切夫斯基的《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与经济发展》（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8—232页）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8〕有关波捷泰亨的争论参见前引费伊托著作，第114页；有关匈牙利在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参见同书第116—117页、第127—128页。

〔9〕战争开始时，铁托这位领导人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本国领导党的工作和解放斗争，与莫斯科仅限于通过电台联系。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的态度。他过去的经历、他所参与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以及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是有影响的。从这方面来看，德迪耶尔所写的铁托传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虽然书中还有令人遗憾的“个人崇拜”的痕迹。

〔10〕1946年季米特洛夫出任政府首脑时说：“当前我们的任务不是实现社会主义或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是巩固议会民主”。（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6页所引）

〔11〕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在向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作报告时引用了这个材料。报告已收进情报局成立大会会议文件汇编（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西班牙文版，第185页）。

〔12〕季米特洛夫：《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8年12月19日），西班牙共产党“我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为《今日保加利亚》，参见该书第52页。

〔13〕《多列士全集》第23卷第133页。

〔14〕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80页。

〔15〕同上，第179页。

〔16〕同上，第1卷第4章。

〔17〕引自日丹诺夫报告的正式文本，这一报告与九国共产党的声明以及代表的报告汇编成《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一书出版（参见第五章注

〔52〕），以下引文都引自该报告，着重号是我加的。

〔18〕维辛斯基的发言稿采自法国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刊物《工人世界》1946年9月25日刊载的西班牙文本（着重号是我加的）。

〔19〕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电，1948年5月9日（见1948年5月11日《泰晤士报》）。

〔20〕参见本书第113页。

〔21〕5月13日苏联报纸刊登了亨利·华莱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华莱士认为要达成协议的重大问题。斯大林于5月17日发表一份由他签署的声明，作了答复。声明对华莱士的信大加赞扬，称之为最近以来力求“加强和平、使国际合作正常化、保证民主”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斯大林说，华莱士提出的纲领可以作为协议的基础。在华莱士倡议之前，美国国务院曾擅自采取措施，试探过苏联的意图。5月4日至19日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互换过照会，均指责对方应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这表明了它们之间分歧的程度。这次斯大林的声明和苏联的照会反应了莫斯科对达成一揽子协议的强烈愿望。这条注释所依据的有关文件刊登在1948年5月13、20、27日《我们的旗帜》上。

〔22〕参见《革命运动史》（思想出版社）第2部分第421页，注〔2〕。

〔23〕《法国总工会全国联合委员会决议》，1947年11月14日。

〔24〕参见法国社会党出版物《人民》，1947年12月24日。

〔25〕参见J·福韦《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212页。

〔26〕正式的《法国共产党史》（巴黎，1964年）明确承认党曾采取这一态度，而且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一部分罢工者想要结束这次运动。罢工渐渐成为少数人的事了，这就导致宗派主义的错误。坚持继续罢工，这使法国总工会的矿工遭到孤立，他们罢工八周之后才复工。（第51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7〕引文见前引福韦所著书，第2卷第212页。

## 第七章 南斯拉夫打破缺口

凡不信奉吾圣母——天主教会、不守教规者，均坚信异端邪说，力诱虔诚忠实之信徒背离神圣信仰。有鉴于此，可靠之防范手段乃是使国人避免与异教徒及可疑分子进行接触，根除其异端邪说，非此不能使吾国土避免发生亵渎神圣信仰和天主教会之严重危险。

吾王国及其属地之宗教法庭总庭长，征得吾辈与宗教法庭总委员会同意，兹决定：在新省份中一律设立审判异教徒之宗教法庭。

——费利佩二世

1569年1月25日

## 官僚警察专政在卫星国的建立

斯大林要求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彻底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并把那些对进入苏联轨道抱敌视态度的集团统统赶出政治舞台，这些集团或则与西方国家有联系，或则游移于两个“阵营”之间。这项任务在1947年年底和1948年一年中进展很快。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大难题，因为国家的控制权早已掌握在党的手中，而且苏军又在当地或附近驻扎。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有斯洛伐克，大的农民党已于1947年被迫停止活动。这些党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历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工具。然而，1945年以后，它们开始变成了旧的失势的寡头政治集团残余分子的庇护所。它们与西方有种种联系。要赶走这



些党，用民主的议会策略是不行的。既然共产党又不愿意试用新型的直接的革命民主的策略，那它们就只得采用“阴谋”的老伎俩了。因为有内务部的控制和苏联特务机关的有力援助，利用这些农民党的领导人与西方国家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这一点来指控他们密谋反对政权，就是轻而易举的了。正是通过这种办法，这些党内的主要政治人物都被逮捕，或被判长期囚禁，或被处决。其余的人则匆匆逃到国外去了。<sup>〔1〕</sup>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共产党在迅速走向一党垄断政权的过程中，最惊人的事件就是人们称之为“布拉格政变”的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水平高，工人阶级成了社会的主要力量。奇怪的是，各资产阶级政党团结一致的程度，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相比，却紧密得多。出现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在苏联缓冲地带的其它国家中，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也就是苏联的领导，是不可能同议会民主制度的真正运行协调一致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恰恰因为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的影响和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只要苏联没有与美国决裂，国内革命又被人为地限制在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协调一致是可能的。一旦第一个条件消失了，而且第二个条件也随之消失，那么出现制度的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资产阶级政党相信它们能在预定于1948年5月进行的议会选举中使这一危机转而对自己有利。共产党人自己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实际上将失去选票。<sup>〔2〕</sup>但是，捷克共产党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了措施。它在群众中加紧进行政治活动，并加强了它对国家警察系统的控制。（正如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一样，自1945年起，党就控制了内务部。）

2月20日，国家社会党（贝奈斯的党）、捷克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十二名部长提出辞呈，抗议在布拉格任命八名共产党人为警察局负责人。他们指望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能仿效他们，于是贝奈斯总统便可利用内阁危机，迫使共产党人在警察局的任命问题

上作出让步。可是，在为共产党和工会所动员起来的工人施加的压力下，社会党由于中间派的领导层接受了其左派的立场，让它的代表留在政府内。共产党向群众发出呼吁，以此来回敬资产阶级政党玩弄的花招。它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在工厂、街道和村庄都建立行动委员会，组织工人民兵，并随即由警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它到处组织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敦促贝奈斯总统组织一个“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哥特瓦尔德政府。它在全国逮捕了最有名的反共分子和反苏分子。它把它自己所控制的工会、青年组织和合作社以及其它群众组织与职业性组织引入民族阵线，从而扩大了民族阵线。

随着这一“扩大”（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历来极力反对的），共产党自信已绝对控制了民族阵线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通过一项政治纲领，主张对各政党进行清洗，并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军队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它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国防部长斯沃博达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社会民主党的司令部被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左翼社会党人所控制，它的领导前进了一步，同意配合共产党人实行其提出的解决办法。2月25日，贝奈斯让位，请求哥特瓦尔德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各资产阶级党的代表最多不过是装璜一下门面罢了。

事情的发展情况是清清楚楚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完全控制政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议会民主的作用，而是由于他们充分利用了议会之外的群众、警察和军队的力量。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受到保护，保证了行动的顺利进行。（为了使人们对苏联的“存在”不致产生怀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于危机前夕到达布拉格。）但是，哥特瓦尔德向议会介绍他的新内阁时，避而不谈事情真相，不是根据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说党是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直接声明工人有权利实现1945年“被耽搁的”革命，而是宣称“政府的调整 and 改组，是严格按照宪法的、民主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的”。<sup>(3)</sup>

这场骗局后来通过选举得到了批准。选举按计划在5月30日进

行，只是“稍稍”作了一点变动：仅有一张候选人名单，即民族阵线的候选人名单，当然是阵线的执委会事先准备好的，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共产党在执委会中占绝大多数。这张独一无二的名单得到了88.92%的选票。贝奈斯于6月6日辞职，14日哥特瓦尔德升任共和国总统。

后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捷克的骗局被用来作为可能通过和平与议会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范例。米高扬说：“共产党人不仅同接近他们的其它工人政党结成了联盟，而且同支持民族阵线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联盟，从而掌握了政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通过和平发展革命的方式赢得了胜利”。〔4〕

由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最终胜利，就意味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已开始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了，这当然仍是官方的观点。然而，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主义概念，要求由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来领导。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充其量不过是承认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农民政党在民族阵线里存在而已，这些党都经过了适当清洗，因而百依百顺，但毫无实权。采取这种办法，据说是能使共产党易于在小资产阶级中扩大影响。（经验表明，搞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诈术，只能骗自己，骗不了别人，有时连自己也骗不了。）教条主义不允许对社会民主党，即便是对它的左翼采用类似方法。对于社会民主党，解决的办法是强迫它们与共产党合并，当然是在它们进行适当清洗之后才能合并。

共产党情报局开会前不久，哥穆尔卡写了一篇论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的文章，他宣称，他反对用任何机械的、官僚主义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写道：

任何机械的统一都不能代替思想的统一。机械的统一意味着根本不考虑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去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不去弄清楚它们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就要求合并……我们十分清楚，

创建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一个思想渐趋一致的长期过程。<sup>〔5〕</sup>

当时，季米特洛夫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持同样观点。从社会党党内的情况来看，也毫无理由期望导致统一的这种“思想渐趋一致的过程”会是一个短暂的过程。1947年底，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左翼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何况左翼与共产党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党内纪律等等根本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严重分歧。他们尤其不能接受隶属于苏联党的地位。

然而，自1948年1月起，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仿佛都用魔杖点过一下似地，纷纷表达了与共产党合并的愿望：罗马尼亚人在1月、捷克人在4月、匈牙利人在6月、波兰和保加利亚人在12月。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了。1947年底，匈牙利社会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曾以占绝对多数的票否决了与共产党进行统一的建议；六个月之后，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却一致同意统一。1949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陶里亚蒂作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问题的报告。以他的报告为基础所作的决议中写道：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成立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统一的工会、统一的合作社、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以及其它各种团体。

陶里亚蒂解释说，这些“成就”没有以下条件是不可能取得的：

需要进行一场公开的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需要揭露他们，孤立他们，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且开除出社会党的队伍。这项任务由左翼社会党人在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援下完成了，虽然有时行动迟缓，不够坚决。<sup>〔5〕</sup>

陶里亚蒂没有进一步作详细说明，而且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文件中也没有详细报道过这场“坚决”斗争，或者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甚至开除出社会党所采取的措施。如果的

确实发生过公开的思想冲突，如果决议的确是深信有统一的必要的社会党人自愿通过的，那么，陶里亚蒂显然是不会放过机会来对如此重要的经验大讲特讲的。

然而，共产党人用以克服左翼社会党人行动迟缓和优柔寡断的“大力支援”的历史，却有待人们去撰写。资料可以到各国警察局档案中去找，因为——难道这还用说吗？——魔杖不是别的，而是把一切反对统一的人清除出社会党这种作法。这次清洗是通过镇压和恫吓进行的，其详情只有通过著名的社会党人被逮捕或被流放的案件才为人所知晓。<sup>[7]</sup>参加这次行动的左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有的顺应斯大林主义了，有的则不久就遭到监禁或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早期曾赢得人们的支持。因为它唤起了无产阶级群众至少是唤起了这些群众中一大部分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希望。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的不满、恐惧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这种“人民民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同“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不民主，甚至更不受人欢迎。这种形式之所以更不受人欢迎，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依附外国人的具体表现。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却又剥夺无产阶级真正参与自己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利的官厅和警察统治制度，到头来又为另一种无形的制度暗中控制着，这个制度的职能是维护苏联的防御地带，使之坚如磐石。

一旦使不信教的人变得无害于人之后，帝国的这些新的省份中最主要的危险就是离经叛道的行径了。这个时期宗教法庭的总庭长贝利亚开始行动起来，并招致一系列的恶果。清洗别人的人开始被清洗了。

## 离经叛道的革命

1948年6月28日，各人民民主国家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决议。第二天，《世界报》说，这条消息在各地起到了“不亚于一颗炸弹”的作用。早在前几个月，西方报刊就纷纷传说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存在分歧。（例如，《费加罗报》2月份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命令把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格罗查并排挂在橱窗里的铁托像统统取下来）。〔8〕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争执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甚至连当事人都没有料到。据共产党人看来，这些传闻显然无非是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之词。斯大林把这一争执（或者不如说把他对争执的看法）仅仅告诉了与苏联党和南斯拉夫党共同组成共产党情报局的其余七个党资格较老的领导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同一般人一样，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

在分析共产党情报局这一决议之前，不妨先根据现有资料，对危机出现之前发生的主要事情作一扼要的叙述。资料是不完全的，因为苏联档案至今仍对历史学家封锁，妨碍了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研究。〔9〕如前所说，〔10〕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政策和斯大林的战略之间发生过冲突。后来，尤其是1946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之后，南苏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然而，战争时期的严重分歧应看作是1948年危机的前兆，因为它们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有要求自治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同莫斯科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间应有关系的看法是很难协调的。如果国际主义的态度在莫斯科占了上风，自然伴随南斯拉夫要求自治的愿望而来的民族主义问题势必会逐渐消失。然而，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化了。自南斯拉夫解放到导致1948年关系破裂的危机爆发之前，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潜在的冲突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上都有所表现。这些冲突原来大都只有各党领导集团的成员知道，只是在危机激化阶段或双方关系破裂

之后才得以公诸于世。

1944年底，贝尔格莱德解放后，发生了许多苏联士兵使用暴力虐待老百姓的事件。反革命分子自然利用这些事件来反对新政权。革命群众，包括共产党员，对此不能理解，而且觉得更难理解的是，为什么罪犯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事情发展成重大的政治问题，致使铁托本人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向以科尔涅耶夫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提出。

将军当时的反应，就是把他们采取这个步骤说成是对红军的侮辱。在讨论中，一位南斯拉夫的领导人解释说，由于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没有干过这种暴行，人们开始在进行对比，这一事件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这使科尔涅耶夫暴跳如雷，认为这样谈问题，就意味着把红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提并论，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sup>〔11〕</sup>

以后几年中，斯大林曾多次当着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面提到这一事件。到1948年，这一事件竟成为他们反苏态度的“罪证之一”。<sup>〔12〕</sup>大多数的苏联军队虽然表现良好，但有些队伍在其它可以运用“征服权”的国家，最突出的是在匈牙利，当然还有德国，也同样行为不端。不过，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胆敢向苏军当局提出这个问题。

另一次重大事件（这一次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发生在1945年。该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不久，英、美部队进驻早已驻有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的里雅斯特港。华盛顿和伦敦递交给铁托一份最后通牒，命令他撤出的里雅斯特。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求苏军给以帮助，但落了空。5月底，铁托在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发表讲话。铁托在谈到西方报纸报道南斯拉夫对的里雅斯特提出领土要求是为了将其交给苏联时，坚定地表示：“我们不想隶属于任何人，不管人们怎么说或发表什么文章……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手里的零钱；我们不想同任何势力范围的政策有牵连。”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匆忙照会南斯拉夫领导

人，说苏联政府认为铁托这次讲话是“对苏联的敌视行为”，今后类似行为都将受到莫斯科的公开谴责。<sup>〔13〕</sup>

1945年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争端扩大到经济问题上。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以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茹约维奇和海布朗，后来兼任计划委员会主席）为代表的少数派，反映了苏联的观点。多数派则以铁托和卡德尔等人为首。前者考虑到国家缺乏资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同时也考虑到“苏联的最高利益”，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后者主张通过调动工人积极性，取得贷款和苏联技术援助，迅速实现工业化。<sup>〔14〕</sup>

但是，南斯拉夫却反对莫斯科所提出的某些形式的“经济援助”，特别反对办“合营公司”。从表面看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交谈中，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承认“合营公司是附庸国家，而不是与友好的独立国家进行合作的形式”。但是，在其它问题上，例如在苏联贷款的条件和两国贸易采用的固定价格等问题上，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有损于他们国民经济的发展。<sup>〔15〕</sup>

另一个在苏南危机中起很大作用的问题，是巴尔干和多瑙河联邦的问题。早在1944年，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为了打破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民族主义态度，曾经开始草拟一个巴尔干联邦的章程。他们在联邦的结构方面出现了分歧，而且英、美公开表示反对。斯大林对联邦原则上表示过同意，虽然事后证明，他事实上对此十分恼火。他乘美、英反对之机，要求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中断一切谈判。1947年谈判恢复。7月底，在两国领导人参加的布莱德会议上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之一是实现关税联盟）。这些协议实际上构成了联邦的基础。<sup>〔16〕</sup>不过，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还存在分歧：联邦是根据南斯拉夫人的意见，由八个平等的共和国组成呢（其中七个是组成南斯拉夫联邦的共和国，加上保加利亚），还是根据保加利亚人的意见，由两个国家组成（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后一种方案使得组成南斯拉夫联邦的七个共和国的地位低于



保加利亚共和国。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一次引起轰动的声明中，提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案，主张建立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即包括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加上希腊的邦联。（1947年12月，马尔科斯的革命政府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建立，季米特洛夫把希腊纳入他的计划，显然是以起义想必会成功的假设为依据的。）季米特洛夫宣称，这个问题“尚未在我们的会议上进行过讨论。”

当这个问题成熟的时候（这个问题必然会成熟），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人民和希腊人民——是啊，希腊人民——就会一道来解决它。正是他们将决定要采取什么形式——是成立联邦呢，还是成立邦联——，以及什么时候与如何去成立。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目前已开始在为这个问题制订一个解决办法了。<sup>〔17〕</sup>

此声明刊登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可是几天后（1月29日），该报发表了一篇半官方的评论，表明苏联领导对此是完全反对的：

鉴于其它国家报刊已经发表了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声明，《真理报》不得不发表这篇声明。但这并不等于说《真理报》编辑部同意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在上述国家间建立联邦或关税联盟的观点。相反，《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些国家毫无必要建立这种不大可靠的，也即人为的联邦、邦联或关税联盟。

斯大林在公开申斥这位除他本人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名望的人物的同时，急切地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召来，在2月10日举行了会议。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力图维护自己的主张。斯大林不允许进行任何讨论；他发号施令。他奚落季米特洛夫说：“不管你做什么，你讲起话来总是象街道妇女一样爱斗嘴。你想耸人听闻，仿佛你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似的。”针对着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的方案，他坚持应根据原保加利亚方案，立即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他指示，一旦这一方案付诸实现，新的联邦就应该把阿尔巴尼亚合并进来。次日，莫洛托夫召见卡德尔，交给他一份

文件要他签字，文件要求南斯拉夫保证在采取任何外交步骤之前与苏联政府磋商。<sup>〔18〕</sup>这次会见标志着向南斯拉夫进攻的开始。这种进攻起初是秘密进行的；它公开的第一个迹象是由《费加罗报》披露的：铁托的相片突然从布加勒斯特商店橱窗里消失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反对季米特洛夫-铁托方案，毋需进一步说明。这个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独立的联盟的主意，与斯大林的计划根本是背道而驰的。这里倒是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方案怎么竟能制定出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怎么能由季米特洛夫来公诸于世。现在材料还不足以明确答复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看来铁托、哥穆尔卡这样的老的共产党领导人，也赞成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一种邦联形式。<sup>〔19〕</sup>他们的态度表明，要求摆脱这位伟大的保护人取得自治权的运动，已在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中初露端倪。成立联邦的主意，无疑同那种认为有必要在向社会主义进军中寻求与苏联不同的新道路的思想有联系。这种主意早就系统地提出过了，而它的主要理论家（如果这里谈得上有什么理论发展的话）正是季米特洛夫本人。

在莫斯科召开的苏、保、南三国会议上，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的问题是同希腊问题连在一起提出来的。南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正竭尽全力坚决支持希腊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莫斯科会议前不久，阿尔巴尼亚政府曾要求南斯拉夫政府派两个师到希阿边界来。贝尔格莱德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通知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坚决反对这样做，并威胁说，贝尔格莱德和地拉那政府如不取消预定的行动，莫斯科就要公开反对了。斯大林在2月10日的会上直截了当地宣布，希腊的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南斯拉夫应该停止对希腊共产党人的援助。显然，由于美帝国主义向希腊提供了军援，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革命力量是不能取胜的，可是斯大林不愿卷入这一地区。（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把希腊包括在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计划之中，就等于公开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准备增加对希腊战士的援助。这是向华盛顿挑战，

而这种挑战是同斯大林的战略不相容的。

从南斯拉夫解放到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这段时期内，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暗中一直在进行着另一场最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由于其性质所决定，一直比其余的冲突都更为秘而不宣，但争执的基本问题恰恰是：南斯拉夫应当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殖民地。这场冲突是苏、南两国特工人员之间从1945年起就开始进行的一场地下战争。

苏联通过到处搜罗代理人，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中，在军队和警察中，在经济组织和外交人员中搜罗代理人，组织自己的特务网。南斯拉夫则竭力加以防范并设法监视和侦破苏联的这种特务网。这种事历来就有，但这次却头一回发生在两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发生在两个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党之间。

苏联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打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担心在行动中对自己人民和党的忠诚同对苏联的忠诚不能两全而产生的重重顾虑。他们忠于本国人民和党，不仅仅是出于思想意识和民族感情，而且也同四年解放战争流血牺牲分不开，而每个共产党人又把对苏联的忠诚看成是革命事业的最高表现形式。苏联的特工人员使用了这样的论据：“在最重要的领导人中间有敌人（这里他们举出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例子）；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既然如此，最好是依靠苏联那样更高一级的、更有经验的组织。”贝利亚的人一般都说铁托的好话，但又使人明白，他的下属中有需要提防的“可疑分子”。〔20〕

同类事件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也都发生过，不同的是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进行抵制。南斯拉夫领导人抵制了这种负责保证卫星国坚如磐石般地团结起来，围绕莫斯科思想意识与政策转的秘密体系。这无疑同克里姆林宫与南斯拉夫党之间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清楚地表明，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开

始全神贯注地来寻求一种使南斯拉夫人就范的方法。他根据政治形势，采取各种办法软硬兼施，时而提出警告和无理要求，时而又妥协让步。1946年，斯大林曾经私下夸奖铁托，同时又贬损季米特洛夫、多列士、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想以此来迎合他的虚荣心（真正的或设想的）。〔21〕日丹诺夫利用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所赢得的威望来纠正法国和意大利党的机会主义，好叫它们紧跟新的反美路线。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时，南斯拉夫党似乎对斯大林灌下来的政策转变跟得最紧，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转变使当时还是秘密的冲突公开化了。斯大林的反美策略旨在使华盛顿停止对那些他认为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地区和问题展开攻势，而同时又承认在其它地区和其它争端上美国利益居支配地位，以便有可能同美国商定一个全面的安排。巴尔干半岛南部即属其它地区之列。斯大林无意改变半岛的现状，即指承认美国对希腊的控制，拒绝南斯拉夫对的里雅斯特港、斯洛文尼亚的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以及漠视马其顿人的民族统一愿望。可是，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则是以反对这种现状为核心的，因此便有同华盛顿发生重大争执的危险，而且会把苏联卷进来。比起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醉心于参加政府和议会的机会主义来，南斯拉夫的“冒险主义”对斯大林的新战略的威胁更加严重，而且与日俱增。

可是这个问题看来还不是破裂的主要原因。根据可得到的情报判断，南斯拉夫人最终似乎是接受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要求的。破裂点恐怕倒是出在有关卫星国的事情上；南斯拉夫要求独立的态度与斯大林一体化计划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态度不仅挫败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打算，而且威胁到他的整个计划的成就。然而，在情报局会议之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22〕季米特洛夫以巴尔干与多瑙河联邦形式投出的那颗炸弹表明，这种传染病的危险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是多么严重。〔23〕

事情发展到了斯大林忍无可忍的地步，他的疑心病发作了。需要尽快消灭病毒，以防扩散。斯大林自信一贯正确，而且拥有绝对的

权力，这无疑对他下决心是起了作用的。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深信，要搞掉铁托，只需他抬抬小姆指就够了。他相信，如果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苏联与南斯拉夫、斯大林与铁托两者之间进行抉择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有片刻犹豫的。他的特工人员无疑向他提供了他愿意听的情报，增加了他的自信。

斯大林的小姆指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在2月底通知南斯拉夫，不要派遣原订于4月份派往莫斯科重订两国贸易协定的贸易代表团。这实际意味着断绝贸易关系，把南斯拉夫置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因为南斯拉夫所有的贸易都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南斯拉夫百分之九十的出口商品输往苏联，并从苏联进口石油这类必不可缺的原料。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3月1日召开了会议。铁托和卡德尔刚与斯大林会谈过从莫斯科归来，他们阐述了新形势的含义。中央委员会决定在一切领域抗住苏联的压力。事后发现，有几个中央委员是苏联特务机关网罗的代理人，他们立即把决定报告了苏联特务机关。

从此以后，这个小姆指的动作就更吓人了。3月18日，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照会铁托，苏联已决定撤回派去帮助南斯拉夫军队实行现代化的军事顾问和教官。次日，又宣布撤走文职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经济工作者等等）。莫斯科为它的第一个行动找理由说，苏联顾问和教官受到不友好的待遇，而它的第二个行动的借口是南斯拉夫方面不准这些民事专家从任何南斯拉夫公民那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情报”，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发布了一项指示，苏联专家要取得这类情报，只能向南共领导或有关部门索取。<sup>〔24〕</sup>铁托立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对莫斯科提出的这些理由表示惊讶。他写道，南斯拉夫对苏联顾问的行为“不仅是合乎礼貌的，而且是最殷勤的，兄弟式的”。之所以作出有关经济情报的决定，是因为过去我们各部的行政人员（不管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提文件要他

供情报……结果是很多人泄露了国家经济机密，这些机密可能，而且有时确实已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有象〔你们〕来照中所说的什么特别安排，〔规定〕我们的官员……未经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提供任何经济性质的情报……

信的结尾写道：

由此不能不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府并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采取这些措施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率地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出据你们看来不符合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事情……

至于苏联政府向另外一些人索取情报的问题，我们认为对待那类情报应有所保留，因为那类情报不一定总是本着客观而准确的精神，出于善意而提供的。

这封信使通信的措辞升级，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召开会议（6月下旬）并公布决议谴责南斯拉夫的异端行为（6月28日）。

斯大林3月27日给铁托复信。他把铁托的解释说成是“讲假话”，“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坚持苏联专家有权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任何方面的“情报”，并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一系列的新的指控。使这位苏联领导人大大为愤慨的第一点是，“苏联的代表……竟处于南斯拉夫保安人员的控制和监督之下……苏联的代表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要知道，苏联一向以允许外国共产党人不受监督地自由行动，并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情报而闻名，而他又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首脑。另一条指控是，“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散布“反苏的说法”，说什么“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蜕化了”，……“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猖獗”，……“苏联想在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征服其它党的工具”，……“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再是革命的了”。这类歪曲事实的说法使斯大林大为愤慨，主要还因为都是偷偷摸摸地散布的，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人

阻止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嘛。斯大林可是从不限制其它党的批评权利的，他说：

我们无条件地承认每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享有批评联共（布）的权利，正如联共（布）有权批评其它任何一个共产党那样。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切批评都是坦率的、诚恳的，而不是背地进行的和诽谤性的；如果被批评者被剥夺了一切反批评的可能……〔这种批评〕就是对联共（布）的诽谤，就是企图使联共（布）丧失威信。这就是企图推翻苏维埃制度。

但是“苏维埃制度”可以进行反击：

人们不禁想起托洛茨基，当他妄图向联共（布）宣战时，也是把蜕化、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罪名加在联共（布）头上。当然，他是在世界革命的左的词藻的掩饰下进行这一勾当的。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而且后来，当他的真面目暴露之后，索性公开加入了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是颇有教益的。

斯大林如此令人振奋地鼓舞南斯拉夫人行使批评的权利之后，紧接着就行使起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权利，批评南斯拉夫的内部事务和政策问题了。他对该党缺乏党内民主表现出极度的焦虑。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更糟糕的是，党的干部处于内务部长兰科维奇的监视之下。布尔什维克党内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因此，斯大林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党的政策的焦虑，主要是由下列两点引起的。第一，南斯拉夫党不同富农进行强有力的斗争，因而陷入了布哈林主义；第二，南斯拉夫党不是公开发挥领导作用，而是通过人民阵线来发挥这种作用。（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不同于其它国家的

人民阵线，它不是各政党的联盟，而是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具有革命纲领的群众运动。）

斯大林在信中集中攻击了吉拉斯、武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人，把他们叫做“形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分别掌管着报刊与宣传、军事、经济和内务等部门，换句话说，也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力图渗透的部门。如果铁托把这些“诽谤苏联”的“形迹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事情也许能暂时平息下来。这几位部长向铁托提出了辞呈，但铁托在共产国际内的多年工作，足以使他明白这种让步会带来什么结果。

4月12日，南共党中央开会研究斯大林的来信。除了事后被证实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理人的两名中央委员以外，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封措词强硬的复函，其中有下面一段话：“尽管我们谁都热爱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谁也都同样热爱我们自己的，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祖国，它的千千万万最进步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复函就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追述说，1946年，南斯拉夫政府通知过莫斯科，苏联政府要求给专家的工资过高（同南斯拉夫人的工资比较），南斯拉夫政府支付起来有困难；例如，一个苏联上校、中校军衔的专家，其收入相当于一个统帅军团的南斯拉夫将军收入的四倍，或联邦政府部长收入的三倍。中央委员会最后对这一点评论说：“……我们感到，这不仅是财政上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很难向我国人民交待。”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反对得就更加坚决了：

我们认为，正当我国向社会主义进军之际，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在我国网罗公民，从事情报活动，这是很不适当的。我们〔不能不〕把这件事理解为一项违反我国利益的举动。虽然我国领导人和国家保安机构就此提出过抗议……，明确表示过我们坚决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情……但这类事情仍是层出不穷……



我们有证据说明，某些苏联情报机关人员……散播对我们的领导人的怀疑，败坏他们的声誉，说他们不能胜任工作，甚至说他们是可疑分子。……说什么这是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这种举动的目的是破坏我国的内部团结，破坏对我国领导人的信任……败坏人民的士气……使国家领导人的威望遭受损害……我国是一个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国。这种活动〔不能〕认为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友好的表现。

我们决不能〔同意〕苏联情报机构在南斯拉夫国内〔发展〕情报组织网。为了同外国资本主义敌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如果……苏联情报人员想要在这方面获得什么情报或帮助，他们随时都能得到。<sup>(25)</sup>

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4月12日举行的会议，是斯大林第一个历史性的失败。一个主要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居然以压倒多数公然蔑视他的威胁和命令，这还是头一次。不仅是一个共产党，而且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的国家，居然违抗他的命令，并敢于对抗令人望而生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也是头一次。跟着来的是行动。兰科维奇的警官开始逮捕被查明充当苏联代理人的那些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同时，党的领导人把发生的事情秘密地告诉了最可靠的党员。南共老党员从托洛茨基事件中得到的教益，超出了斯大林的想象。然而，战斗仅仅才开始。

斯大林把情报局的机器开动起来了。他之所以建立情报局，主要就是要用它来干这种事情。他把他3月27日致南斯拉夫的信件抄送给各成员党，不附上南斯拉夫的复函，要求它们表态。没有必要让它们了解南斯拉夫人的论据；只要了解斯大林对这些论据的看法就够了。莫斯科警告它们说，表态的文件不得送给南斯拉夫人，只能送给斯大林。它们的复信没有公布过。但据南斯拉夫提供的消息说，这些复信大致都是一样，都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都要求南斯拉夫党改过自新。拉科西的复信特别使南斯拉夫人气愤。他们对匈

牙利法西斯部队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恐怖罪行记忆犹新。拉科西也多次私下向南共领导人抱怨过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指责苏联掠夺匈牙利并表现出有反犹倾向。保加利亚人的答复也没有多大不同，尽管根据南斯拉夫的报道，季米特洛夫曾经鼓励南斯拉夫人要站稳立场。<sup>〔26〕</sup>老练的“莱比锡之狮”由于受到他的思想意识的锻炼的影响，或许还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每当与斯大林的争执发展成为冲突时，都顺从地退却了。

斯大林的第二封信（对南斯拉夫4月13日信件的答复）是5月4日发出的。这封信标志着升级的新阶段。信中声称，“美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俨然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行事”，说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要人，几乎全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劊子手奈迪奇（南斯拉夫的卖国贼）的朋友和亲戚”。但是，这封信最使南斯拉夫人感到气愤的，是它企图贬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在解放自己国家和赢得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作用，把决定性的打击归功于苏联军队。斯大林的信中提到德国袭击铁托的指挥部以后的1944年5月时，写道：

正当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苏军急忙赶来……援救南斯拉夫人民，粉碎了德国占领军的抵抗，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共产党执政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这一次仍以他惯用的篡改历史的手法，歪曲事实，以便贬低南斯拉夫党，使情报局其它党起来反对它。可是，这就同苏联人自己四年前对1944年夏季事件的说法相矛盾。<sup>〔27〕</sup>这一段话是这样结尾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功绩和成就，比起南斯拉夫党的功绩和成就来，毫不逊色”。法共和意共比起南共来“成就较小”这一事实，被说成是1944年苏军不能象援助南斯拉夫那样援助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共产党的领导谦虚谨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却“自我吹嘘得使谁都震耳欲聋”。然后，斯大林把上述种种指控归纳起来，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指控，例如把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驻伦敦大使以及一大批其他的官员说成是英国

代理人（全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写到：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还应当考虑，由于他们坚持这种立场，他们就失去了要求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和其它援助的权利，因为苏联只能给自己的朋友提供援助。

斯大林在这封信中拒绝了南斯拉夫在上一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南斯拉夫在那封信里提出请苏联党派一个代表团来南斯拉夫，就地看一看，就会了解到实际情况并不象苏联所说的那样。可是斯大林提出，问题应提交情报局。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于5月9日召开了会议，以下述措词拒绝了这一建议：

我们并不回避任何原则问题上的批评。但我们感到，这一次，〔我们已经〕失去了平等的权利，因而不能同意你关于把问题提交共产党情报局的建议。九个党接到了你的第一封信，而事先我们却一无所知。这些党已通过决议表示了它们的立场。

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还审查了两个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成员茹约维奇和海布朗的案件，早已发现了他们是斯大林的代理人，会议作出了审判他们的决定。莫斯科方面发来了一封恫吓的电报，苏联人民委员部还准备用飞机将茹约维奇劫持到苏联去。苏联代理人动手得太晚了，茹约维奇已被捕入狱。5月19日，一位信使由克里姆林宫来到贝尔格莱德，再次要求南斯拉夫出席情报局的会议。中央委员会重新讨论了这件事，再度坚持拒绝出席会议。

南斯拉夫后来透露，除上述理由外，当时人们感到，代表团能否安全返回南斯拉夫是根本没有保障的。1937年的幽灵还在人们的脑际盘旋。那一年，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在苏联被处决。铁托也没有忘却，在那个时期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由于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遭到的下场。斯大林曾派莫洛托夫去基辅对他们进行说服。莫洛托夫没能使政治局成员改变他们的意见，于是他召开了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但是，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仍然支持政治局的立场。于是，斯大林把政治局成员召到莫斯科去磋商。他们一到莫斯科，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随即被枪决。从某种意义上说，铁托是斯大林三十年代恐怖的大清洗的幸存者，这倒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1948年会作出如此卓有远见的反抗行为。<sup>〔28〕</sup>

斯大林现在进一步施加各种压力，企图把南斯拉夫党押上情报局的法庭。在最后一封信中（5月22日），他指责南斯拉夫“破坏了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而且第一次使用了“叛变”的字眼。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坚持自己的立场。5月25日，它公开宣布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让所有的党员在听了有关事实之后，有机会发表他们对争论的看法。几乎各地方组织都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宣读了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通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按每二百名党员选出一名的比例，由民主选举产生。塔斯社记者应邀出席了贝尔格莱德党组织的会议。共产党情报局眼看已毫无希望使南斯拉夫人出席会议，于是就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由苏联提出来的决议，决议无非是综合了斯大林的信件中的批判观点而已。<sup>〔29〕</sup>据南斯拉夫报道，以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遭到一些代表团某种程度的反对，它们认为决议中谴责的措辞过于尖锐。为了打消它们的顾虑，日丹诺夫宣布：“我们掌握了情报，铁托是帝国主义的特务。”<sup>〔30〕</sup>

这一强加的罪名暂时未能写进共产党情报局决议；需要首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清扫场地，并把“罪证”提供出来。这就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基础上发动的思想恐怖战的任务了。而一年后对拉伊克审判，也是为了提供“罪证”，就象1937—38年的莫斯科审判是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充当世界资产阶级的间谍提供“罪证”一样。

决议一开头提到的倒是谴责的真正理由：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苏联的控制。当然，提出罪名的方式要足以激起每个善良的共产党员的义愤：“诽谤苏联军事专家，败坏红军的名声；迫害苏联民事专家；逼使他们适从一种特别的办事程序，从而把他们置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关监视之下并受到他们代理人的盯梢”；进行“从反

革命托洛茨基武库中检来的所谓联共（布）‘蜕化’的诽谤宣传”，等等。

决议的其余部分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党的莫须有的政治错误（它的反苏态度当然不只是错误，而是犯罪），企图以此证明，“反苏”是与政治上和理论上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相联的。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同该组织的其它成员的代表们一样，对他们的政策曾作过全面细致的阐述。当时，无论是苏联代表还是任何其它党的代表，都不会对南斯拉夫党作过一点批评；相反，南斯拉夫党被看作是革命党的楷模，正因为具有这一身份，它在讨论法共和意共的机会主义时，是以起诉人的姿态出现的。换句话说，1947年时，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党的政策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1948年时，情报局却断定，这个政策已经一点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味了，而是变成了民族主义的、布哈林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 和反苏的政策。

南斯拉夫党是情报局成员中唯一将反法西斯战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成功地结合起来的党。而如今，那些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走上了阶级调和道路的人，却指责南斯拉夫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情报局的决议认为斯大林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尖锐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谴责南斯拉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按照情报局的说法，南斯拉夫党对富农没有进行彻底的斗争。这种罪名在斯大林3月27日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南斯拉夫领导人无疑是受了这位正统理论的监护人批评的影响，才犯了错误，不仅立即宣布消灭富农，而且宣布消灭小商贩和小型的私营工业，到头来却只落得被情报局决议谴责为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

第二，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领导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学说。南斯拉夫党不是把抵抗运动的统一看作是在上面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而是把它看作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群众革命运动。除了希腊党外，它是欧洲采取这种政策的独一无二的

党。人民阵线是这一运动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形式，它的威望和影响增长了。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那些实际上是由党的领导制订的计划和政策，与其让共产党还不如让人民阵线向人民提出更为适宜。实际上，共产党员不仅通过他们在革命斗争期间获得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因为他们都是身居要职，首先是军队和警察方面的要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党的领导权丝毫没有丢失的危险，而斯大林却利用这些事实来谴责铁托及其同仁企图“取消”南斯拉夫共产党。

第三，情报局指责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党内建立了“官僚主义的统治”，致使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所有共产党采用的是同一个组织原则。例如，不管在那里，领导机构的选举，总是限定“选出”现任领导事先圈定的候选人。而情报局却企图让南斯拉夫党来对这种作法承担全部责任，并把这种作法说成是“可耻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这就是说，正如若干年后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那样，南斯拉夫党不过是建立了苏联党内早就建立起来的那套制度罢了。斯大林曾在一封信中责备南斯拉夫人战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一条在情报局决议中没有重提，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人已决定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无疑也是因为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了斯大林，苏联党已有十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而且毫无准备召开的迹象。（苏共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直到1952年底即第十八次大会后十四年才召开。）

南斯拉夫党远非民主的楷模，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由于领导人认识到，只有赢得党的基层和工人群众的支持，他们才能经受斯大林的打击。因而他们得救了，革命也得救了。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南斯拉夫革命非常彻底，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众所周知，在东欧其它国家，苏军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在南斯拉夫，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人民武装斗争。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在苏军到来以后才回到自己国家来的，而象哥穆尔卡、拉伊克和其余少数在自己国家战斗过的领导人，在解放时

立即受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的包围，以后降到了次要的地位。然而，铁托和他的同志们曾与抵抗战士们患难与共，因而彼此之间产生了信任。战争和革命造就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同样的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了他们。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当然也象其它国家的党员一样是异化了的党员；他们由于盲目崇拜贴着十月革命著名商标的思想商品而认识模糊。这是斯大林的主要法宝。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认识到，事实真相是医治大多数党员异化病症的唯一药方。要把问题原原本本地摆到广大党员群众面前，把斯大林的信件、情报局的决议、南斯拉夫的答复、特务机关的活动、单方面撕毁贸易协定及其它情况都摆出来。每个人都得有机会对这些言行进行比较。

情报局决议最后呼吁南斯拉夫党员和人民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斯大林及其同伙确信，铁托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文件对全国隐瞒起来，防止扩散。文件中断言，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走上了公然欺骗他们的党和人民的道路，把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所受到的批评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隐瞒”。早在这段话写出前几个星期，斯大林的来信就在南斯拉夫党的基层组织的会上宣读过了。情报局决议刚一公布，南斯拉夫党的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就将决议全文和南斯拉夫的答复印发了50万份。那一期的《战斗报》是6月30日刊印的。7月5日，杜克洛在《人道报》上写道：“南斯拉夫领导人未发表情报局决议一事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论点缺乏信心，害怕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南斯拉夫驻巴黎大使要求《人道报》编辑予以更正，但毫无结果。刚批评过南斯拉夫党缺乏“党内民主”的情报局成员党中，没有一个党公布了南斯拉夫党中央委员会对情报局决议的答复。也没有一个党把它登在自己的内部新闻简报上。

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认为，斯大林听了错误的汇报。尽管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情报资料都历历在目，可是，信奉斯大林教的人不是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能转向世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何况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教皇正处于荣誉的顶峰。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党员会议决

定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我们衷心地信赖您。我们相信您会尽您的一切努力来制止对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的不公正的谴责。”〔31〕

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制止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神话只有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切身体验才能消除；另一方面，他们还期望苏联领导人会在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反抗面前让步，因而或许能达成协议。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是抱着这种幻想，于7月21日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铁托一方面坚决重申党的立场，拒绝接受情报局的指责，一方面又说：“我们希望联共（布）的领导同志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在我国，向他们说明决议中一切不确实的地方。”〔32〕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方面坚决拒绝情报局的指控，另一方面又批准南共在同联共的争执解决之后，可以重新加入情报局。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之后（共产党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大会在为斯大林、苏联和铁托的欢呼声中闭幕。

斯大林却立即决定组织一次反铁托的政变来回敬南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物色到三个南斯拉夫将军，其中之一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发挥过作用而享有盛誉的总参谋长。但这三位将军未能说服其他军官同他们合作，后来又企图逃往苏联而未遂。总参谋长被南斯拉夫边防战士击毙，另外两个也很快就被逮捕。这一事件表明，尽管党和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支持铁托的政策，但斯大林仍能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中找到支持者：一些人是因为卖身投靠苏联特务机关了，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教育超过了对其它一切问题的考虑。

面对这种危险，南斯拉夫党回过头来采用了斯大林所使用的办法，即特务机关、警察与由国家控制的一切强制机构。早在代表大会上，铁托就曾号召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我党团结和我国人民团结的企图”，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号召提高警惕，进行清党。

不过，党的领导同时也给人民以机会来对比双方的言行。放肆诽谤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苏联电台广播没有受到干扰。斯大林的信件



大量印发。在报刊上，公开批驳对方的“论据”。斯大林的神话逐渐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心目中黯然失色，他们开始想起过去的沙皇来。历代沙皇都是用把南斯拉夫人从土耳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来掩饰他们在巴尔干的扩张计划的。苏联在宣传中大谈其俄国和塞尔维亚的不朽友谊，结果弄巧成拙，反而说明了莫斯科政策的历史延续性。同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接壤地带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驻扎在那些国家的苏军的频繁调动，也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人民逐渐认识到，象雪崩似的压过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谴责，原来隐藏着对他们以昂贵代价换来的民族独立的威胁。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使用武力，他的确切想法尚不得而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存在的国际紧张局势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苏联入侵南斯拉夫，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另一种入侵——这回是来自美国的入侵——而这可以说是美国当时对希腊的入侵的扩大化，这也就有发展成一场全面冲突的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此外，南斯拉夫人民军及其从事游击战斗的经验是不容忽视的。斯大林的谨慎从事无疑使南斯拉夫人较易于抵抗。同样可能的是，尽管斯大林在进行思想恐吓和搞政变方面都已初步失败，但他仍然相信，这个异教徒的国家已陷入风雨飘摇的绝境，不久就要垮台了。

斯大林的攻势也与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不谋而合。1948年头三个月中，美国飞机侵犯南斯拉夫领空二十一次。意大利竞选期间，同美国人有勾结的反动势力断言南斯拉夫在意大利边界附近设立了V<sub>1</sub>和V<sub>2</sub>火箭发射场，而集结部队准备进攻的里雅斯特港。美国、英国、法国利用了这形势，修订了对意大利和约中的一些条款，把的里雅斯特给了意大利。

可是，最为急转直下的还是经济形势。与苏联外贸关系中断，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贸易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停止提供技术援助和其它措施，使南斯拉夫处于要么寻求同西方国家和解，要么就会灭亡的境地。卡德尔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宣布南斯拉夫

党决心坚持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统一战线的路线，同时又质问这些国家：“难道你们打算看着我们遭受帝国主义压力不管吗？”逼它们公开表态。在情报局决议公布后不久召开的国际多瑙河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仍支持苏联代表，反对西方外交官。但是，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南斯拉夫要是不俯首听命，斯大林就真会任凭帝国主义去摆布南斯拉夫。同时，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这次猛烈的反南斯拉夫运动，宣布铁托准备同帝国主义作交易。这是一个狡猾的诡计：要么是南斯拉夫政权垮台，要么它就提供出“证据”来说明斯大林是正确的，铁托确实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早在1949年的头几个月里，各人民民主国家仿效苏联，实际上就与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南斯拉夫革命而今也被迫去做十月革命做过的事情了。那时候，十月革命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处境同样孤立，只好去与资本主义国家打通贸易关系，并寻求贷款和技术援助。为了说明这一政治方针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铁托使用的论据非常象当年布尔什维克使用过的论据。1949年7月10日铁托在普拉说：“我们出卖铜去换回机器的时候，并不出卖我们的良心，仅仅出卖了我们的铜……我们要用从西方得到的机器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很快就对南斯拉夫的呼吁给予同情的答复。他们并不需要使这个落后的小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所关心的，是南斯拉夫要能在俄国帝国主义面前坚持独立。在“冷战”高潮中，斯大林送给了它们一件礼物，给了它们一个“客观上的”盟国。某些西方评论家和政治家担心，“铁托主义”通过用实例来说明有可能搞一种“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从而会使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新的诱惑力，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明智的人士意识到，想要复辟旧制度的任何企图不仅会遭到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大多数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会对斯大林有利。反铁托的运动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莫斯科和情报局各党把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每一项贸易协定，获得的每一笔贷款都

说成是铁托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国家的又一个证据。情报局的决议不是早就宣布过，铁托的“反苏”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南斯拉夫丧失独立并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吗？

六年后，赫鲁晓夫在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表示忏悔的访问时，宣称：“我们参观了南斯拉夫的许多地区。我们与工人交谈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虽然由于与我国关系恶化而历尽艰辛，但它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在帝国主义阵营面前完全保持了它的独立性。”〔33〕

1949年夏季和秋季，苏南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苏联武装干涉的威胁迫在眉睫。苏联利用一起有关其特务机关征募的侨居南斯拉夫的白俄的案件作为借口。十月革命后，成千上万的白俄移居南斯拉夫。新政权建立后，他们中许多人立即宣布支持苏联，约六千人由莫斯科政府批准享有苏联公民权，贝利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招募了许多特务。1949年，兰科维奇的警察逮捕了其中一些人。莫斯科出面保护他们，多次向贝尔格莱德递交了威胁性的照会。8月18日最后一次照会，提出居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有自由表达其“民主观点”的权利，并把南斯拉夫政府企图加以制止的这种做法说成是法西斯的行为：

除了法西斯制度的国家以外，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表达民主观点当成犯罪行为。在南斯拉夫目前的形势下，表达民主观点成了非法逮捕和残酷惩罚那些批评南斯拉夫现存的法西斯制度的人的理由……欧洲只有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政府，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看成是犯法的文件。这两个政府是法西斯政府。由此可见，南斯拉夫政府是第三个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看成是犯法文件的政府，它认为散发乃至只是看过这一决议，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的充分根据。

（我们在前面说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印发了50万份决议，这些决议连同斯大林的信件，能在贝尔格莱德任何一家书店找到，但苏联政府对这一事实却视而不见。）照会否认情报局决议曾号召推翻

铁托的领导，宣称它仅仅是要求召开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会上撤换党的领导，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照会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召开代表大会并不是为了要对领导歌功颂德，而是要用批评的观点来分析现任领导，必要时用另外一批领导人来增补或更换它。在所有的有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这种更换领导的方式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正常的。”不用多说，只要看看苏联共产党是怎么行事的就够了！

关于虐待被捕的“苏联公民”一事，照会提到了三件事（想必是最严重的了）。第一件，有个犯人“一连数日被打、罚站数小时不许动，两天不许睡觉、不许吃饭和喝水”。第二件，一个犯人“连续六天未得到食物”，“审讯时被棍棒抽打腿部”。第三件，一个犯人“连续二十二天在夜间受审。叫他回答对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看法。犯人在受审中备受虐待，有几次曾被关进只能直立的小牢中。”斯大林出于人道主义的良心，对这些在苏联闻所未闻的作法，只能感到愤怒。“一个采取如此恐怖和残暴的手段的政权，能叫做人民民主政权吗？”苏联政府照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手段来虐待人民的政权，说它是法西斯的盖世太保政权，不是更恰当吗？”照会最后谈到，如南斯拉夫政府不按照苏联的要求办事，苏联政府“将被迫采取其它更有效的手段来捍卫南斯拉夫境内苏联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约束横行无忌的法西斯暴政的代理人。”〔34〕苏联政府提到的“其它有效的手段”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时期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彻底的经济封锁，诽谤运动似乎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显然，只剩下武装干涉了。西方报刊接连报道与南斯拉夫接壤的人民民主国家境内苏军调动的惊人消息，并不断刊载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半官方声明，宣称必要时它们也准备干预。铁托再次宣布，南斯拉夫已做好应付一切突然事变的准备。可是，苏联并没有进行武装干涉，倒是对拉伊克进行了审判，而且情报局又通过了一项反南斯拉夫的决议。不过，铁托“叛变”的新“罪证”在此之前就已经传播开了。

我们已经知道，1948年初，斯大林命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停止援助希腊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南斯拉夫党没有服从，但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使南斯拉夫党很难继续按照希腊战士的需要大规模地援助他们（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自情报局决议发表之日起，南斯拉夫便不得不使它的军队实际上处于戒备状态，一旦斯大林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即可随时投入战斗。情报局的决议对希腊党和游击队也发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许多积极分子，包括建立在北部山区的革命政府的领导人马尔科斯将军，不接受对南斯拉夫党的谴责。希腊党总书记萨哈里阿泽斯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大清洗。1948年底，党的总书记萨哈里阿泽斯又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希腊报刊事后承认，1948年秋季，尽管有美国的技术人员和军援，政府军队的情况仍每况愈下。在这一年中，革命军队多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绩。自1948年年底马尔科斯被撤职和党内进行了反南斯拉夫的清洗之后，内战的局势急转直下，变得对政府军有利了。希腊报刊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帕帕戈斯将军的军事才能。

至今还弄不清楚，内战中这种导致1949年8月革命军队最终失败的新的趋势，主要是美国加紧军事干涉的结果<sup>(35)</sup>呢（当时苏联显然仍然继续不提供援助），还是由上面提到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革命军队内部的分裂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是萨哈里阿泽斯执行了斯大林的特别指示，蓄意使武装斗争遭受失败。大概除了帕帕戈斯将军的“才能”以外，好象是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导致希腊革命遭到悲惨的结局的。

另一方面，十分清楚的是，仿佛反君主政府和反美的斗争还不够萨哈里阿泽斯领导的希腊共产党干似的，它开始公开宣传反对南斯拉夫党，并对它进行了一场秘密战争。它有可能是听从了情报局的指示，因为利用希腊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来加强反南斯拉夫的诽谤战，是有利于情报局的。<sup>(36)</sup>

1949年夏，当人民军队就要遭到最后失败的时候，保皇党人的军队开到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边境。大约在7月中旬，贝尔格

莱德政府宣布封锁边境，其理由是希腊保皇军多次侵入南斯拉夫领土。萨哈里阿泽斯控制的“自由希腊电台”立即谴责铁托帮助了政府军来进犯边界地区。反铁托战役获得了意外的成功：铁托卖身投靠美国人和希腊法西斯保皇分子；他在民主军队背后放冷枪！8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的一项公报，也声称封锁边境，并通知说，“为了保障安定，一切来自希腊的武装人员，无论是法西斯保皇分子还是民主主义者，都要解除武装”。这一行动出自为莫斯科所控制的政府，那就不是什么“背后放冷枪”，而不过是一种“保障安定”的措施罢了。法共一份杂志中的下述评论可以说代表了斯大林去世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看法：“如果不是铁托的背叛使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者在最后一瞬间取得军事胜利的话，那么杜鲁门政府在希腊就会象在中国那样一败涂地。”<sup>[37]</sup>斯大林去世后，铁托的“背叛”这一条象变戏法似的，从官方对希腊失败原因所作的解释中消失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方面：美国的干涉和萨哈里阿泽斯领导下的希腊共产党的错误。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责任还有待追究。

看来，封锁边境很可能不单纯是出于贝尔格莱德官方所宣布的考虑而采取的步骤。这一行动还起着另外两个作用：防止情报局指挥的武装部队入侵南斯拉夫领土（如同阿尔巴尼亚方面企图防止亲南斯拉夫分子入境一样），<sup>[38]</sup>和在苏联军事干涉的威胁越来越逼近的时候，向华盛顿作出缓和关系的姿态。在这方面，也象其它方面一样（如与希腊、土耳其签订巴尔干公约），如果铁托不把自己的灵魂与他本国的铜一齐出卖的话，他被迫至少要表现得非常灵活。

但是，斯大林给他留了选择余地吗？从某个方面看，南斯拉夫革命的局面比十月革命的局面更加紧张。十月革命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至少还可以依靠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然而，南斯拉夫革命面临的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俄国帝国主义和仍然受苏联“神话”蒙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包围，唯一能够采取的防御行动，

便是利用当时开始出现的资本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问题的核心是，同美国及其附属国暗中结盟和同工人阶级运动的改良派结盟，是否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相容。要么探索着走这条曲折的道路，要么就做斯大林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摆在南斯拉夫革命面前的回避不了的两难局面。

## 审 判

共产党情报局反南斯拉夫异端的宣传始于1948年的决议，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新“证据”而更加丰富了。根据这种宣传的说法，南斯拉夫的异端活动到1949年夏季为止，是这样进行的：第一阶段，铁托及其同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民族主义；他们一旦到了民族主义的斜坡上，就滑向一个反苏的新阶段，与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发生冲突（这就等于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党对待苏联的态度，就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最后就滚进帝国主义阵营，甚至开始变成法西斯分子了。他们的原罪显然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这一套宣传有其不利之处，因为从某种观点来看，把南斯拉夫领导人说成了爱国者、民族独立的英雄。这样宣传对“成熟的”共产党员来说，能起到很好的诽谤作用；但是，对人民民主国家中怀有反对苏联统治的民族情绪的非党群众或对这些国家中刚加入党的某些普通党员来说，则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

对拉伊克的审判是旨在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铁托及其同伙不仅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且从来也不是爱国主义者；从反希特勒战争时起，他们就不过是希特勒或英美特务的卑鄙的代理人，出卖了南斯拉夫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都是与忠于苏联的感情——苏联是这些国家民族独立的根本保证——紧密相联的。这是为拉伊克审判所“证实”了的。（莫斯科审判所提供的说托洛

茨基、布哈林等人是德国和日本的代理人的“证据”，也是旨在使他们在由于当时俄国面临德日侵略而爱国主义感情正日益高涨的大多数俄国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个事实，还不是人们所普遍注意到了的。）

拉斯洛·拉伊克是三十年代入党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当时他是个大学生。他曾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进行过战斗。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他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在抵抗运动中，他领导了处于地下活动的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内务部长。大约在共产国际公布反铁托的决议时，他任外交部长之职。

1945年6月15日，匈牙利共产党（更确切地说，匈牙利工人党）在公报中宣布开除拉伊克和另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索尼出党，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和托洛茨基的代理人”。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书。17日在布达佩斯的一个大会堂开始审判。审判是公开的，但会场容纳人数有限，因而发了入场券。有60名外国报界人士出席。《真理报》派了小说家鲍利斯·波列沃依参加。外交代表也可以出席审判。那精心安排的场面，十分顺利地展现出来，简直就是莫斯科审判的重演。所有的被告对被指控的罪行都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许多其它罪行。拉伊克被判处死刑，与三名同案犯一齐被绞死。出于对军人的尊重，两名军事领导人被特许由行刑队执行枪决。其余的被告被判长期监禁。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匈牙利官方承认，这完全是一场闹剧。给拉伊克“恢复了名誉”。30万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走上街头，为拉伊克举行国葬，并要求废除这种允许自称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代表的人将这种罪恶的闹剧搬上舞台的制度。不久，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制度，俄国出动了坦克。匈牙利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真正代理人企图利用工人和群众的暴动，这本是一樁可以预料到的事情。苏联人却以此作为借口。但是，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如同十二年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一样（那



里由于找不到同样的借口，他们只好无中生有捏造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是要防止各人民民主国家起来揭露它的政治罪行。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些审判的主要的内幕情况，特别是有关其主要组织者即苏联领导人和他们的特工人员的干预，尽管有少数几个侥幸活下来的受害者的揭露<sup>[39]</sup>，至今还不十分清楚。然而，这些审判的意义与政治动机，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对拉伊克的审判，检察官自己就把一切挑明了：

严格地说，这次审判不是对拉斯洛·拉伊克及其同谋的审判。是铁托及其仆从在受审……事情很清楚，匈牙利人民法庭在谴责拉斯洛·拉伊克一伙阴谋家时，也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谴责了南斯拉夫的叛徒，即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犯罪集团。这次审判在国际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正如费伊托在他所写的《人民民主国家史》中精辟地阐述的那样，“对拉伊克的审判只不过是代替了没有可能进行的贝尔格莱德审判而已。与其说拉伊克是个被告，不如说他是个证人，是铁托一案的主要证人。”<sup>[40]</sup>拉伊克是以描述自己生平开始“招供”的。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卑鄙可耻的家伙。早在1931年他刚刚入党的时候，就受霍尔蒂政权的警察局的雇用。后来他到西班牙去（在那里曾三次负伤），不是与法西斯作斗争，而是为盖世太保效劳。他在拘留着国际纵队成员的法国集中营里，在作为地下党领导人参加的匈牙利抵抗运动中，都充当了盖世太保的代理人。其余的被告也同样给自己脸上抹黑。

被告们在他们的间谍和密探者的罪名一经确立之后——这就使得他们所提供的证明对斯大林的法庭来说似乎是绝对可信的了——便开始指控南斯拉夫领导人，说在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他们所有的人是怎样被盖世太保、法国情报署或英、美间谍机关收买。按他们的描述，国际纵队就成了训练警察局代理人和间谍的场所，他们直接从法国集中营被派往东欧各国。在那些国家里，他们身为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为警察局在共产党员中收

买代理人 and 间谍。尤其是南斯拉夫的革命战争，在他们编造的情节中，就成了是由盖世太保的代理人组织和领导的了。匈牙利的抵抗运动也是如此。这些代理人都是很能干的，同时还能英、美警察和其他国家的警察效劳。德国一战败，这帮人自然就被美国在欧洲的间谍头目艾伦·杜勒斯搜罗起来了。布达佩斯审判没有提供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详情；它只含蓄地提到，根据“帝国主义的恶毒阴谋计划”，想必也在那些国家里安上了钉子。对明显地可以找到这类人的地方就稍许作了些暗示，什么国际纵队的成员、战前曾被流放到西方的共产党员、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士，等等。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保持联系的人是最大的嫌疑犯，他们的名字现在成了间谍分子的同义词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有谁不曾与南斯拉夫夫人发生过联系呢？

所有这一切都同样适用于西方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把审判拉伊克的方法加以推广，如法炮制，那么，势必得出结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大概也象人民民主国家各党的领导机关似的，充斥着警察特务而变了质。那么苏联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又怎样呢？与南共和其它各党中已暴露的和暗藏的间谍有过最广泛联系的，毕竟还是他们呵！

从这种假设出发，并且象审查拉伊克、铁托等人一样去审查东、西方许多共产党人的历史，那就很容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国际是由德国间谍机构创办的，——列宁不是乘坐神秘的车厢经过德国皇帝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可疑的旅行吗？——这也就可能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中一个一直令人百思不解的问题了：为什么共产国际早年是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盖世太保的老奸巨猾的代理人来领导的。后来在人民阵线时期，共产国际转而为英、法、美的情报机构服务也就能得到说明了，对苏联国家机构自然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不过，幸亏在布达佩斯审判所采用的方法背后，还有一种更加严谨而科学得多的方法：间谍或受训的间谍名单，是根据那位一贯正确的领袖的指示，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事

先拟定好的。这样，就不必担心纯粹的形式逻辑可能导致出来的危险结论了。只有选定了间谍之后，才搜集他们活动的“罪证”：接触、开会、牢狱生活（即与警察局联系）、与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交往（往往是在反法西斯联盟期间进行的，而这是有与资产阶级勾搭的确凿证据）、与英、美军事或外交使节的接触（在“大同盟”时期，哪个共产党领导人不会在一定情况下有过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呢？）、与帝国主义及其情报机构联系的最重要的证据，等等。一旦那位一贯正确的领袖在他的情报机构的协助下，确定了某个共产党员是间谍，搜集罪证（布达佩斯审判的起诉书把它叫作“无可辩驳的罪证”）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问题就在于要选择好对象。恰恰在这方面，情报机构有时就出差错。因为它们在这方面，也同其它方面的工作一样，都是按官厅主义的惯例办事的。譬如，一些志愿参加国际纵队的人曾被拉伊克说成是由盖世太保从法国集中营派往南斯拉夫的，实际他们从未在这些集中营囚禁过。其中一个叫武克曼诺维奇的则从未去过西班牙。使用这种事先选择间谍或候补间谍的方法，除了出过上述微不足道的官厅主义的错误外，倒可以根据要解决的政治和思想问题，按逻辑发展的要求在时期和地域方面规定出一个限度，使流行病精确地只在期望的地区和时间内发生。在这个时期中，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决定，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间谍流行病应当局限在卫星国内，尤其是那些不甘接受卫星国这一荣誉称号的国家之内。

匈牙利审判两个半月后，轮到保加利亚了。11月30日，检查官宣布了对“以特拉伊乔·科斯托夫为首的阴谋犯罪集团”的起诉书。科斯托夫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知名的老革命家，他与季米特洛夫共同创立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在一段时期内担任过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他是在三十年群众地下斗争活动和武装暴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最后身居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职务。然而，按照起诉书的说法，科斯托夫却是另外一种人。首先，象拉伊克和几乎所有成为间谍的人一样，科斯托夫是托洛茨基分子。起诉书上写道：

“他的一生经历中主要特点是两面三刀、图谋背叛和进行罪恶阴谋的活动来损害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最神圣的利益。”〔41〕据揭发，科斯托夫曾向共产国际的领导推荐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党的领导职务。（这是起诉书唯一的一件真实事实，当然也是最严重的指控。）

科斯托夫充当敌特没有拉伊克资格老，他到1942年才出卖自己。以后不久他转而投靠英国情报局，受命与铁托接触。科斯托夫与铁托达成协议，由南斯拉夫军队支持他来推翻保加利亚的人民政权。（拉伊克还供认他同铁托一起阴谋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政权，为此要借助南斯拉夫军队，由他们伪装成匈牙利人来进行干预，还要借助霍尔蒂的旧军警，他们将集结在英、美占领的奥地利地区。）这个阴谋计划还预定要逮捕和谋杀季米特洛夫。检察长提到的“事实”，就是这些“罪行”，另外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罪行”。

庄严的审讯仪式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索非亚人民军总司令部大厅公开进行。旁听席上有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必不可少的“工人代表”；这简直是布达佩斯那一场戏的重演。可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大家深感惊讶。科斯托夫把他在“预审”期间的招供都推翻了，并正式否认对他的全部指控。法庭庭长张皇失措，立即宣布休庭，以便让被告重温他的供词，仿佛这只不过是被告一时记不清了。然而，法庭重新开审时，科斯托夫仍坚决否认他的供述。保加利亚报刊对偏离了这一仪式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只字不提。塔斯社作了报道，说科斯托夫的行为是“猖狂的”。〔42〕

这位老革命家与布达佩斯的被告不一样，他在经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之后，还有力量使自己神志清醒，而且一直“猖狂”到底。到他最后陈词的时候，他仍坚决撤回自己原来的供词。然而，这一次演出的导演们事先有了防备。科斯托夫刚开始讲话，旁听席上就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喊声、嘘声，压住了他的声音。供外国记者使用的四国语言的同声传译系统，莫名其妙地中断了。

科斯托夫尽管极力申诉，说明自己无罪，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予以执行，然而他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审判留下了疑点。几天后疑点消除了：报刊公布了他临死之前写的一封信，声明收回他对供认的否认，而且承认他的全部罪行。据1956年给科斯托夫恢复名誉时揭露，这封信连同审判时提出的所有罪证和供词，全都是伪造的。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搜捕异端分子并对他们实行惩处，是与斯大林向南斯拉夫革命发动进攻同时发生的。在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极为密切的党组织书记兼内务部长多德耶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前就撤了职。他与党的其他一些著名领导人一起受到绝密的审讯，被判处死刑，并于1949年6月被处决。在罗马尼亚，1945年前一直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后又担任党内最高职务并兼任司法部长的巴特拉斯卡努，于1948年夏与其他著名的党员一起被捕。同年夏天，哥穆尔卡失去了波兰总书记的职务，被指控犯有民族主义、拒不迅速实行农业集体化、丧失警惕性、宽容知识分子，尤其是不能理解联共（布）的领导作用等罪行。<sup>〔43〕</sup>1949年1月，哥穆尔卡、斯皮哈尔斯基将军以及其他领导人被开除出党。捷克斯洛伐克在与斯大林开始向南斯拉夫人进攻同时发生的“布拉格政变”之后，在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领导下，立即开始清洗“铁托分子”和其他“右倾分子”，这次清洗进行了好几个月。

就这样，从情报局反对铁托的决议发表之后到对拉伊克进行审判为止的一年中，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中进行的清洗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只有上述几个案件是公开宣布的，因为涉及的是领导集团，被告人都是重要人物。成千上万的中层或基层的党员被撤职或被开除出党的情况，则根本没有公开报道，无疑也不会有内部报道，只有直接与每个案件有牵连的党员才会知道内情。大清洗是从拉伊克审判开始的。这次大清洗为一项政治和思想纲领作了最后的润色。这个纲领以后成为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采取行动的依据，同时也是强化反南斯拉夫运动的依据。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联的。

1949年11月下旬召开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会议有三项议事日程：“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sup>[44]</sup>苏斯洛夫和陶里亚蒂提出了前两项议程，下面有一章要谈这个问题。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提出了第三项议程。他一开头就说，情报局决议公布以来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布达佩斯审判，“完全证实了决议的正确性以及这一文件对世界革命运动的特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决议由于具有“高度的预见”和“科学的洞察力”，“成了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方向和活动中的历史性转折点”。它有助于各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忠诚于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乃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和准绳”。乔治乌—德治接着又说：“斯大林同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莫大的帮助。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提醒我们注意某些思想偏差和糊涂观念，并帮助我们成功地与之斗争。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挽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

1948年6月决议的理论价值、它的科学性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态度和活动方面的历史性转折点，就这样由一群所谓的间谍和警察代理人的供词进一步证实了。乔治乌—德治根据这些供词，而且仅仅根据这些供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谴责，荒谬绝伦地说什么他们在战争期间同时充当盖世太保和英、美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这种荒唐的说法居然被千百万共产党人盲目地接受。这一事实表明，当时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降低到了何等程度。乔治乌—德治的报告接着说：

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贝尔格莱德的法西斯暴徒们开始鸣冤叫屈，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唯一的用意，就是要尽量隐瞒他们见不得人的丑史及其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的事实。布达佩斯的审判，对铁托集团犹如晴天霹雳。

事实证明，这不是什么犯了严重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伙与警察机关和资产阶级谍报机关长期勾结的间谍、职业告密者和

奸细，处心积虑地执行着反革命、反苏、反共政策的问题。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早在1941年就由设在法国的集中营派往南斯拉夫的。

丘吉尔曾派他的儿子伦道夫带着特殊使命去见铁托。后来，这个老反动分子和苏联的死敌又亲自会见了铁托。早在那时，帝国主义分子就十分器重铁托和他那一帮人。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波皮沃达将军的揭发，使铁托、兰科维奇等人原形毕露：他们对纳粹侵略者和盖世太保妥协让步，而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卑鄙地出卖了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布达佩斯审讯中和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揭露出来的种种事实，都完全证明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亚戴、戈斯尼亚克、马斯拉里奇、贝布莱尔、姆拉佐维茨、武克曼诺维奇、科察·波波维奇、基德里奇、奈斯科维奇、兹拉蒂奇、韦莱比特等人，拉伊克、布兰科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巴特拉斯卡努以及他们的同谋，都是英、美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特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帮可耻的间谍和叛徒就在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为实现其统治世界的计划准备好基地。这帮特务和叛徒就象特洛伊木马那样被送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他们奉行其主子的命令，怀着罪恶的目的来窃取工人阶级执政国家中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镇压革命运动并复辟资产阶级的统治。

斯大林曾极其诡密地同丘吉尔商定瓜分南斯拉夫，如今却谴责起铁托来了，说铁托与这个“老反动分子和苏联的死敌”达成了秘密协议。斯大林不能原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没有听从他斯大林的指示，没有根据他的命令，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反而成功地执行了革命的政策。

报告断然宣称，南斯拉夫政权已成为法西斯政权，成为美国谍报机关在东南欧的指挥部，成为准备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发动战

爭的先遣部队，等等。报告结尾说：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旗帜，忠诚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各国人民保卫和平与爭取自由的斗争的主要堡垒苏联，忠诚于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忠诚于劳动人民的英明导师、各国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

由克里姆林宫的情报机构拼凑起来在布达佩斯审判时又加以复述的凶险的间谍故事，是借助于屡试不爽的拷打教学法使人死死记住的。这些故事成了用来“提高干部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的马列主义的教材”。乔治乌—德治引用共产党情报局杂志的话说，只有这样，“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随时随地抓住并打击敌人，不管敌人戴着什么假面具”。那位富有灵感的教育家十二年前组织类似的审判时，就已提供过这类教材，但新教材更是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辈特务分子，只不过拼凑了少数几个分裂的小组，很快就被发现和消灭了；至于帝国主义及其情报机关的地下活动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来，还有待历史来说明。在南斯拉夫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这些特务机构充分显示出了他们恶魔似的广大神通。他们居然能够在—个国家里组织和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以便日后时机一到，用它来颠覆其它由红军建立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从而为进行—场反苏战争和建立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准备条件。敌人的神通堪与各国人民领路人的天才相媲美。

情报局这次会议在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基础上通过的新决议，为各国共产党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个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凶手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

……情报局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



一，就是要尽量在自己队伍中提高革命警惕性，要识破并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管他们有什么幌子作掩护。

乔治乌—德治还针对“提高革命警惕性”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第一，

我们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整顿我们党的机构……在这方面的主要办法便是审查党员。这种办法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内已经实行过了，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要经常寻找行之有效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管理办法。要记住，敌人会千方百计利用拉伊克之流；利用党内和政府机关中每一个弱点和裂痕，利用心怀不满的人、民族主义分子和历史上有疑点的人。

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从不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的。

他们应当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毫不妥协的精神对待一切偏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现象……在科学、文艺、绘画、音乐以及电影界，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一切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倾向，对世界主义的宣传，都应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

情报局会议之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都按照会议所提出的看法和办法开展了大清洗，把许多著名领导人和大批普通党员和干部都卷了进来。我们对这次大规模行动了解得还很零碎，但已经知道的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清洗的规模非同寻常。<sup>〔45〕</sup>捷克共产党在“布拉格政变”时有130万党员，1948年底达200万以上。1954年时超不过140万了。波兰党1948年有140万党员，1952年为111万。罗马尼亚党员人数在1940年为100万，1951年减至70万。匈牙利党员人数1948年6月为120万，1951年2月减至85万。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党有50万党员，1951年降到30万以下。这些数字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清洗的规模，因为这一时期仍在吸收新党员。根据费伦茨·费伊托提供的材料，1948年至1952年间，这些党被清洗的党员总数约有250万。其中被监禁的约12万5千至25万。而被处决的

人数则不得而知。

受害者中有许多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三位总书记（科斯托夫、哥穆尔卡、斯兰斯基），一位主席（匈牙利的绍考希斯），几位副总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还有几十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大约一百名将军，等等。<sup>[46]</sup>匈牙利在拉伊克审判之后的两年中，被逮捕的有接替拉伊克任内务部长的亚诺什·卡达尔（现任党的总书记），继拉伊克任外交部长的久洛·考洛伊，解放后任总理办公厅国务秘书的洛雄齐以及其他著名的活动家。在卡达尔被捕后接任内务部长的雄多尔·佐尔德为避免被扣押于1951年自杀。（这时的内务部长是最危险的职位，他完全明白，既可能去审讯别人，又可能自己去受审。）罗马尼亚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瓦西里·卢卡（财政部长）和特奥哈里·乔盖斯库（内务部长）于1952年被捕。卢卡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年，外交部长、共产国际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安娜·鲍克被撤销党政一切领导职务，虽然未遭逮捕。

在波兰，上面已提到的哥穆尔卡1948年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职务，1949年1月被清除出政府部门。同年11月，他和另一位共产党老一辈的领导人克利斯科以及斯皮哈尔斯基将军等人同时被开除出党。1951年，一大批将军和军官以间谍和叛国罪受到审判。根据被告们的“揭发”，哥穆尔卡和斯皮哈尔斯基阴谋在波兰建立铁托式的政权并将西部领土归还德国。哥穆尔卡虽未被起诉，但未能幸免1950年至1956年的监狱生活。1948年捷克共产党在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的组织下，掀起了第一次清洗浪潮。情报局会议后又掀起了一次。斯兰斯基宣称，“这一次要比1948年激烈得多”。情况果真如此。这次清洗以撤销斯洛伐克党内的领导成员（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当时任斯洛伐克政府委员会议主席、现今清洗别人的胡萨克，教育部特派员诺沃麦斯基等人）开始，以斯兰斯基本人和捷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被清洗而告终，他们被控犯有叛国、进行间谍活动、从事破坏和与犹太复国主义同谋等罪。他们于1952年受审。

斯兰斯基和其他十名被告都是老共产党员，全被判处绞刑。<sup>〔47〕</sup>

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写了一本措词激烈的小册子，以宗教作比喻评论了马克思主义的退化及其蜕变成恬不知耻的行径辩护的思想体系。他援引了一个被人用圣马塞拉斯和圣彼得的遗物驱逐了的魔鬼的忏悔词：“我是撒旦的仆从和门徒。长期以来我是地狱大门的看守人，但是几年前，我跟十一名伙伴一道，开始蹂躏法兰克人的王国。我们受命破坏了大地为人们需要所生产的粮食、美酒和其它一切产品。”接着又评论说：“谁能识别不出这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妖魔’或者一个‘犹大式的铁托分子’的供词呢，什么都有了：出身微贱（地狱的大门，反动的丑史），突然被晋升到合格的破坏者的地位，无耻地服从撒旦即托洛茨基或铁托等的总部的命令，甚至连道德说教的意图也都有了。”<sup>〔48〕</sup>

中了邪的共产党员在上断头台或进监牢入地狱之前所背诵的供词，的确酷似中世纪驱邪咒语，同样具有解释和祓除自然灾害与社会祸害的双重作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尝试中出现的一切困难、使卫星国削弱的一切祸根，现在都可以用一帮恶魔的秘密活动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了。这帮恶魔就是拉伊克、科斯托夫、哥穆尔卡、巴特拉斯卡努、斯兰斯基等人，他们都是铁托这个犹大的仆从，而铁托本人又是杜鲁门这个魔鬼的仆从。苏联1936—38年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紧张局势，同样是用托洛茨基、布哈林这帮恶魔的活动来加以解释的。用斯兰斯基审判案的检察官的话说：

各位法官：

……〔这帮罪犯〕的道德面貌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们意识到了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揭发出的罪行使我们认识到了我党、我国和我国经济的许多部门中存在严重缺点的真正原因。他们象长着千万条触鬚的章鱼似的，缠住我们共和国的肌体，吸吮它的血液和骨髓。

……有一段时间内，他们歪曲我们党的正确政策，篡改报告与数字，伪造干部档案，欺骗以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为首

的党的领导，甚至胆敢欺骗总统本人。〔49〕

各案的检察官根据虚构的罪犯的虚构的罪名，揭示了过去和现在一切失败的真正原因，并要求对这些“人面妖魔”进行杀一儆百的惩处。他们最后的发言，而且甚至往往连这些“妖魔”自己的（不仅具有人面的，而且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的）供词，结束时都呼吁要加强以斯大林领导为中心的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他们号召为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和提高革命警惕性而斗争，号召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号召努力完成并超额完成生产指标。上面提到的那位检察官最后这样说：

这批阴谋家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我们仍在胜利地实现五年计划的目标，正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新的生活——奇迹般的生活。千百万工人的不懈努力使一小撮人的阴谋不能得逞。最近几天，法庭收到了几千封愤慨万分的来信。信中表达了我国工人决心尽快弥补这些帝国主义雇佣者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党必将更加提高警惕，更坚定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人和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周围。我们党正领导着人民奔向奇迹般的未来。〔50〕

由于魔鬼被戒除，中邪者被处以火刑，通向天堂的道路便展现在耶稣的驯服的羊群面前了。

帕帕约安努写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些审讯〕看成为政权本身进行的一种间接的‘魔术般的自我批评’，看成为历史对顽固地否认其本性的那种思想进行的惩罚呢？”〔51〕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呢？三十年代，苏维埃社会的真正运动，它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困境、社会的紧张局势、党内外无形的对立等方面反映出来了，而且发展到了再也无法掩饰的地步，甚至也不能再把它们说成是执行党的一贯正确的政策中犯了一些一般性错误了。于是，当局就不得不采取这种“魔术般的”解释。这是不能采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因为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先决条件，是不受妨碍的批评，是完全自由的讨论和百无禁忌的研究；而这种制度本

身就是这些条件的否定。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进行自我剖析，它就必须从否定自己入手。它也依靠不上它自己的思想，即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思想的作用是掩盖矛盾，而不是揭露矛盾；是为支持这种制度提供论据，而不是去批判这种制度；是掩饰真正的运动，而不是去反映这种运动并合理地去解释它。因而只得把这种制度的已经不能加以掩饰的种种弊端，说成是同制度的性质、结构和上层建筑格格不入的东西，是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的代理人带进来的。

十年后，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人民民主国家”，在下列问题上，即同南斯拉夫的争执，莫斯科与其卫星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卫星国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真正性质，这些因素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效果等等，都经不起用马克思主义来加以分析。它们也不能运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比起三十年代来，这种“马克思主义”恐怕更是专门用于进行辩护和辩解了。于是，只得又把“魔术般的”解释搬出来。历史的真正运动，再一次对官方主义者和他们恬不知耻的思想进行惩罚。几年之后，《秘密报告》的出笼以及其它一些事情，就使这种惩罚达到了荷马史诗般的巨大规模。

斯大林的“魔术”象旧的魔术一样，之所以能够迷惑人，就靠着把玩魔术的方法和技巧严守秘密。一旦机关败露，即使是部分败露，魔术就不灵了，人们就会产生反感。那些曾经把谎言和警察控制的社会当作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人，会产生信仰危机。可是有许多人仍死死抱住残存的一点旧信念不放，还有一些上当的新信徒，前来填补那些决心想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及终于放弃希望的人留下的空位。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吧。这里，我们只来讨论斯大林的“魔术”内在的机制。

阿瑟·伦敦的《审判》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异常有趣的材料，虽然伦敦并不总是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所提供的根据，不仅证实了并且阐明了众所周知而且已为有关当局部分承认的事情——

仅仅是部分承认而已，也就是说，既没有罪行又没有罪犯，只有审讯本身是一种罪行——而且表明，这些审讯实际上有着本书在前面指出来的目的。然而，我看，更加重要的是，《审判》一书彻底剖析了这些审判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它们是怎样策划和进行的。

一开始就是要制定一个反映出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的总纲要，就象一部电影脚本的草稿似的。然后来讨论，看哪些演员具备演主角的各种必要特征。例如，在布达佩斯审判中，十分重要的是，主要演员应与南斯拉夫领导人有过许多联系，积极从事过地下工作，被捕过，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等等。由于负责这一工作的部门能查阅党的档案，而档案里又有党的积极分子的详细经历，挑选主角就不成什么问题了。合适的人物一经选定，就开始教他们背诵自己的台词，为此除了进行屡试不爽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外，还要利用他们在党内锻炼的经历。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出这个候选人是否真正具备了所需的一切特征，是否把他的台词背熟了，是否会出乎意外地反驳导演令人信服的论据。就这样，挑选演员的问题逐步地解决了，脚本也写成了，而且还补充了一些草稿中所没有的新情节。因为那些被指派“为了党的利益”去扮演特务、密探、蜕化变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角色的人们一旦被脚本的布局所感染，也就成了这出闹剧的积极合作者。这是一部集体创作。共产党员刽子手导演和共产党员罪犯互相展开竞赛，力求把编造历史和伪造供词的工作干得尽善尽美。这件事进行得极为谨慎，以免留下含糊不清的词句。不要说“某月某日我与南斯拉夫某人接过头”，而要说得更为准确，要说“某月某日我与铁托的间谍某人接过头”。一旦供词按照“党所需要的”内容、措辞和细节编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供词背熟，不得稍出差错，不要忘记庭长会打断招供提出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问题的地方（这个问题被告和庭长也都要背熟），当然也不要忘记所要求的答话。最后，排演的剧就上演了，开庭审判了，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周密计划和组织的，都恰到好处。时间长短也都是安排好了的。象索非亚审判中科斯托夫和莫

斯科审判中克列斯京斯基出乎意料地造成的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场面，是极其罕见的。伦敦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审判的全过程，我们只能非常简略地谈个梗概。他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称之为“党的培养”的那种因素所起的作用。

没有必要在这里对这种“培养”的特征多作解释。每一个共产党员，确信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又具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态度。如果说，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反映出来，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sup>〔52〕</sup>的话，那么，一个世纪以后，他的接班人的座右铭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党偶然也犯了错误，那么，“宁愿犯错误也要同党一致，决不为保持正确而反对党”。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苏联是神圣的。忠诚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就等于斯大林），忠诚于苏联（苏联就等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被认为是一个优秀党员的基本特点。二十多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都是被这种祓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妖魔鬼怪”的“马克思主义”培养得象绵羊般的顺从。各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从不用批判精神来讨论上级指示的陋习，以及总是要求意见毫无分歧、思想统一的陈规，跟对斯大林和来自苏联的一切东西都盲目信任加在一起，竟如此主宰着共产党员的心灵而使之产生如此强烈的条件反射，以致于他们很容易上当，沦为“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的、贴着苏联标签的骗局的牺牲品。

谈到审判的技巧，还应当指出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它同样也是“党的培养”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自我批评”。正如批评和讨论丧失了原来的内容而沦为对领导的指示翻来覆去表示赞同和进行阐述一样，在共产党内普遍实行的“自我批评”，同自我批评的一般涵义也没有多少关系了。对集体的错误，尤其是领导集团的错误，有关的党员或机构一般都引躬自咎。他起到替罪羊的作用。1933年大灾难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成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替罪羊。1947年，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会上，便轮到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充当“大同盟”时期斯大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替罪羊了。法庭上的供词与各共产党及其党员习惯了的这种“自我批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或者某一具体的机构要为集体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而真正的问题则被掩饰起来或者遭到曲解，较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受到称颂。两者的差别在于“过错”的性质不同，而且，为了让人在受审时能进行“自我批评”，就得要动用刑具。要使共产党员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同意扮演特务、密探等角色，“党的培养”是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严刑拷打是促使人们作出这类至高无上的牺牲的好办法，而这种牺牲品是配得上供奉阿兹台克神祇的。党把共产党员“培养”得不仅能去扮演特务的角色，而且还能相信这些特务的供词，因为这些供词在语言、结构和文体方面，酷似日常的“自我批评”。人们被指派扮演这种角色而不演另一种角色，这完全看运气如何。阿瑟·伦敦的著作，用骇人听闻的实例说明，“党的培养”编造“供词”与共产党员接受这类“供词”的轻信态度二者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审判》一书象短暂的捷克之“春”时出现的其它文献一样，尽管没有提供什么证明文件，还是进一步证实了二十大以来已经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审批是直接由苏联专家们一手策划的。在某些案件中，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还亲临现场来进行干预。<sup>[53]</sup>正如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承认的，斯大林和贝利亚所控制的庞大的警察组织完全掌握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这一组织在各卫星国警察机构的协助下，还控制了这些国家。我们知道，这正是同南斯拉夫破裂的原因，因为铁托和他的同僚抵制在他们国内建立这样的机构。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审判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这种抵制，以便在这些国家进行更广泛的渗透。《秘密报告》对此只字不提，正好表明这种渗透的规模。如果把这一点也揭露出来，那么就会给继续控制着卫星国的苏联当头一棒。



1953年7月，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五年之久的大规模搜捕间谍的活动尚未结束，而头号人物刚刚去世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宣布，二号人物被揭露，他是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据苏联领导人给情报局各党的领导人送去的机密报告称，证明贝利亚也是间谍的决定性的证据是逮捕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搜出的一封给兰科维奇的信，信中要求兰科维奇帮助他同铁托接上头。<sup>〔54〕</sup>

在伟大的监护人的控制下，由“特务”贝利亚指挥的对“特务”以及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凶进行的大清洗，是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的革命元气消耗殆尽的政治进程的基本因素（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之一。这些政权丧失了早年所具有的生命力，沦为斯大林主义的呆板模式，把官僚主义推向极端，取消了一切自由权利，把谎言变成了法律，又把法律变成了闹剧。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经济分析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分析全系伪造，文化被禁锢在愚昧的“日丹诺夫主义”的框框之内。但是，这种主义宣称要与之斗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滋长，它宣称即将消灭的反苏情绪在抬头，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却信誉扫地。苏联政权演过的一出出戏又搬到人民民主国家来上演了，不过还得加上这些国家丧失民族独立的所有场景。横蛮无理地诽谤南斯拉夫的运动和把苏联的命令粗暴地强加给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使人们对马克思的设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将使各民族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的设想，产生了怀疑。

这一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战胜希特勒以后直到斯大林逝世前这年间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体制的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官僚统治机构力图用而今已经成为传统的思想压制和警察镇压的办法来克服这些矛盾；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膨胀到了人所共知的程度。随着斯大林这个阴险毒辣的老家伙的死去，克里姆林宫各集团间的内部矛盾增加，权力之争日益加剧。关于这方面的事态发展情况，以及从斯大林去世开始出现的危机，将要连同这位魔术大师的弟子们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精

心策划的危机一道，在本书下一卷中加以探讨。这些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在苏联至今仍起作用。那里的人民受了三十年神话和政治“指导”的麻醉，给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弄得动弹不得，多年来又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最希望得到的莫过于一点点物质享受了。因此，这种“制度”在苏联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而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显得十分脆弱。这些国家中的危机，使大的社会集团处于骚动状态，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阶级中尤其如此。危机暴露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在政治上的脆弱，因为这些集团不象苏联那样是经过长期有机的演化过程而形成的，它们面临着内部进步力量、旧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势力和苏联的强迫命令三重相互矛盾的压力。

## 西方共产党的反铁托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所组织的这场伟大的思想政治方面的镇压运动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刚一公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声称“听了陶里亚蒂和塞基亚同志关于最近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毫无保留地赞成情报局的决议。”与此同时，法国党的政治局也作了类似的声明。两党的统治机构根据历来的做法，根本不与普通党员或中层官员商量，就作出了这种重大的决定。不过它们起码还可以装出一付根据事实进行判断的样子来，因为它们是从自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代表那里了解到情况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党的统治机构则根本没有参与这一事件，正如它们没有参与筹建情报局以及该组织所通过的政策“讨论”一样。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它们是从报刊上了解到的，而它们也都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不要求进一步解释或等待作出解释，就同样“毫无保留地”赞成对那些不久前还被说成是模范革命者的人进行谴责。它们对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二个决议也都作出了同样

的反应，该决议声称南斯拉夫党落到了“特务”和“暗杀者”手中，南斯拉夫革命已沦为法西斯运动。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也无条件地赞成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进行的大清洗，赞成历次审讯的裁决，赞成对数百名以长期参加革命活动而著称的共产党员的处决、监禁和政治上的排斥。在它们看来，这些人变成帝国主义和“法西斯魔鬼”的“特务”和“看家狗”是世界上最合情合理的事。

五年多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大力开展公开的和党内的运动，反对南斯拉夫异端分子和支持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搜捕异端分子，三十年代反托洛茨基的运动与这次运动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们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也起了特别不光彩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通过1936—39年的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赢得的威望，如今却用来促使人们相信对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西班牙的国土上与西班牙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并肩战斗的人们所进行的诽谤。西班牙共产党官方发言人声称：“铁托牌的特务假充朋友，混在来自各国捍卫西班牙自由事业的战士之中，帮助刽子手佛朗哥，从背后向西班牙人民捅刀子。后来，这批特务在法国集中营里继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几千名西班牙共和战士丧生。希特勒分子利用可耻的铁托特务，才得以搜捕和谋害许多最英勇的西班牙战士。”〔55〕

每个共产党都为克里姆林宫的战役提供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切身的经验比谁都更能理解苏南冲突的症结，可是就连他们也采取了一致的步骤。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编已经看到，毛抵制苏联领导人比铁托还早几年。斯大林象对南斯拉夫人一样，企图把屈从于资产阶级势力、屈从于他自己想要同美帝国主义达成长期妥协的需要的民族团结政策，强加给中国领导人。正象南斯拉夫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应归于它的领导人不服从斯大林。然而，正是这些领导人在1949年把南斯拉夫人说成是“卖国贼”和“叛徒”；他们宣称，如果他们走铁托的道路，“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将会象南斯拉夫那样，

“使自己国家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56〕

不过，中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态度，比起其它共产党，特别是比起欧洲各党的态度来，到底是温和一些，也慎重一些。当然，就是欧洲各党的态度也不一样。“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赢得反铁托运动的荣誉的，无疑是法国共产党。1950年6月，法共一位领导人为了概括这方面的活动，并号召加强这一运动，这样写道：

我们的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发表有关南斯拉夫形势的报道和评论。然而，这个工作往往流于形式、过于仓促而缺乏条理性……发表的文章的质量，而不仅是数量，应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报刊应把加强反铁托运动当作头等重要的目标。〔57〕

为配合报刊上的运动，还出版了大批小册子，其中一本题为《南斯拉夫处于铁托恐怖之中》。法共不仅仅限于宣传。它还组织过反对给铁托运送“武器装备”的“群众斗争”：

菲热克反对为铁托制造螺旋桨和尼斯港反对运送据悉要运给铁托的V<sub>2</sub>火箭发射架的行动，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一行动应当扩大到全国，特别是应扩大到正在为铁托制造大批电器设备定货的格勒诺布尔这样的地区。〔58〕

法共还组织了一次反对南斯拉夫旅游事业的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有自尊心的青年工人，真正进步的学生，法国的民主青年，都不要到南斯拉夫去度假！”法共也反对南斯拉夫在法国举办的美术展览：

不论是在巴黎展出南斯拉夫中世纪艺术品，还是上映南斯拉夫影片，都应该是共产党人与和平拥护者以适当的方式来揭露那种貌似艺术宣传的政策的机会，这种宣传表面是不偏不倚的、公正无私的，其实是旨在影响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并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们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和容易轻信的态度。

（法共号召“和平拥护者”站在反对战争贩子铁托的立场上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经过科学证实的事实和经过法院判决的犯罪行为（如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蜕

变为法西斯主义，拉伊克、科斯托夫之流的特务分子的罪行）。他以权威口吻声称，法国知识分子竟然看不出南斯拉夫中世纪艺术品展览会隐藏着罪恶的、反苏的、帝国主义的意图，他们对他们的轻信和幼稚感到十分惊讶：“人们不禁要为有些法国知识分子的幼稚而脸红，他们无疑借口展出是纯艺术而容忍并支持这类荒诞的骗局。”〔59〕甚至连南斯拉夫的体育运动也是宣传铁托异端的危险工具，幸亏共产党报刊在体育领域里证实了自己在评论上的坚定性，于是党的领导人便把这种作法当作在文化事业方面应遵循的路线：“我们党的报刊对南斯拉夫体育比赛所持的坚定立场，是在文化领域里应该怎样工作的楷模”。〔60〕

1951年6月，艾蒂安·法戎在法共政治杂志上概述了自1948年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形势的发展，以及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中要吸取的教训。文章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远见和法西斯铁托集团的罪行》，其中有下面这样的段落：

就国内形势而言，铁托集团已经完全取消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便于完全复辟资本主义，去年政府将国营经济部门（不过，因为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敌人手中，这一经济部门已不再是人民的财产了）“分散经营”。企业的管理委托给所谓的“工人委员会”，由于南斯拉夫经济处于大灾难形势下，这些委员会主要依赖私人资本……在南斯拉夫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是非常厉害的……在有些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患有结核病……到处是血腥的镇压，对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自己国家独立事业的共产党员的镇压尤其残酷。他们成千上万地被监禁，被折磨致死，或被秘密杀害……贝尔格莱德政府已经完全出卖了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独立，共和国现在已沦为服务于美国百万富翁的殖民地和基地……早在1949年，通过匈牙利对拉伊克的审判和保加利亚对科斯托夫的审判，人们便能看清南斯拉夫统治集团过去的真面目；审判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可耻的特务，许多年前便同华盛顿和伦敦情报机关勾搭上了。这些

无耻之徒接受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搞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新制度的阴谋，在当地叛徒的配合下，在这些国家准备反革命政变，以便将它们变成向苏联进攻的基地，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的—部分。情报局决议大大有助于把这种阴谋活动消灭在襁褓之中。这一阴谋计划的规模之广，最近通过揭发克莱门蒂斯及其帮凶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活动，得到了说明。<sup>〔61〕</sup>

法国共产党反“法西斯铁托集团”和支持审判活动的这一小部分实例，使人们能大致了解其它西方国家共产党进行的类似活动。然而，正如上面所说，这种活动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厉害。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反铁托主义运动就远不及法共搞的那么凶，调子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现在回顾起来，意共反对铁托主义的行动，可以说没有法共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强烈的热情和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1951年意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仅仅偶尔提到了这个问题。陶里亚蒂的态度最鲜明，其他的发言几乎就很少提到铁托主义的问题。<sup>〔62〕</sup>无疑可以认为，这种作法反映了意共不同于另一西方大党的典型特征——而且以后还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反映了国内政策的需要，尤其是同社会党人保持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法共已经彻底孤立了，所以在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大多数共产党，尤其是欧洲和美洲各党所处的地位都是这样。由于西方各党完全充当了克里姆林宫的愚民政策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它们更加孤立了。在“大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年代，它们由于同“斯大林麦卡锡主义”有瓜葛，在许多民主和进步工人心目中就失去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权威。把南斯拉夫说成是美帝主要基地之一，其目的是掩盖斯大林在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阵营”边界的政策造成的一触即发的形势。从此以后，连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也都成了谎言了。

尽管这些党表面上坚如磐石，尽管它们的党员轻易地相信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哥穆尔卡等人的“叛国罪”，尽管它们在组织上具有上面分析过的特征，但是，即使在这些党内，许多党员

头脑中也渐渐地产生了疑团。这一点，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已开始有所反映，不过是隐隐约约的，而且也是歪曲的反映。多列士在法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宣称，“党员和党组织对警察进行渗透的企图要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还差得远”。

工人天性坦率，他们对阶级敌人为刺探情报和寻衅挑拨采取的卑劣手法是想象不到的。许多同志表现得轻信而幼稚，告密者就借此来实现其可耻的任务。尽管如此，对叛徒拉伊克和科斯托夫的审讯表明，这些特务和他们的领导人铁托早就为英、美情报机关所雇用了……难道我们能够相信，现在的政府和他们的美国老板们不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代理人暗地里塞到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中来吗？难道我们看不见他们在利用铁托的分支机构和托洛茨基派别集团吗？〔63〕

艾蒂安·法戎根据总书记的这种想法，说明了应采取的行动：

每当党内发现一个铁托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暗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公开地进行大规模政治解释运动来加以打击。有的人可能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对此我们应当密切注意；他们是在耍两面派，敌人的代理人都已学会这一套了。〔64〕

处理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哥穆尔卡等人的事例，可以作为在党内查明警察渗透活动的范例。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可以理解，针对这种威胁必须开展斗争，那就是要把怀疑或异议的痕迹，特别是对斯大林政策的任何一点怀疑统统都消除。正如法共一家知识分子杂志所指出的，发生在铁托和其他“特务”身上的事情表明，“只要一个共产党员对苏联的无条件的忠诚一开始表示怀疑，他就必然要叛变了。”〔65〕

在这种思想恐怖、“间谍热”和警察挑衅的气氛中，凡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事产生怀疑的共产党人，往往宁愿保持沉默，而不愿落到与特务和挑衅者的代理人为伍的地步。甚至现在开始的或前一阶段已开始的内部讨论，本来与铁托问题毫不相干，如

今也都被说成是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大阴谋”的一部分，而且是由斯大林卓有远见的警惕性所发现的。例如，在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至1949年间，在西共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南斯拉夫的法西斯铁托集团的事件、匈牙利对拉伊克及其帮凶的审判，以及保加利亚对科斯托夫的起诉都表明，英、美情报机构在我们战争期间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的代理人偷偷塞进各共产党内；这些事件表明，英、美情报机构接收了盖世太保从落入他们手中的懦夫、逃兵、叛党分子里搜罗的代理人。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情况。党对成了敌人代理人的蒙松、特里利亚等人的经历是很熟悉的。敌人利用他们有一段时期起过作用，赢得了“抵抗战士”和“英雄”的桂冠的特殊情况。他们驱使这些人打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有一段时间他们也确实在法国、北非、甚至在西班牙爬上了党组织的领导职位。如果党和党的领导对这些叛徒手软，如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撤掉他们的职务，事态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那他们就会成为西班牙的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为核心的一批代理人，更早一些加泰罗尼亚的统一社会党中德尔巴里奥、塞拉·帕米埃斯、维克多·科洛梅尔、塞雷尔之流，就是如此。党和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清洗能加强党组织，毫不犹豫地清除了这些渣滓。如果他们允许这些腐化堕落分子留在党内，如果他们同这些人妥协……那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是由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原则指引，同共产党和工人党阵线、同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斯大林站在一起，还是跟着佛朗哥匪帮和盎格鲁撒克逊间谍机构去干冒险的勾当？答案是明确的：党清洗了拉伊克和科斯托夫之流，清洗了敌人的代理人，变得更坚强了，更团结了。最后把叛徒科莫雷拉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是在这方面采取的又一步骤。我们党这样做，是忠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教导和榜样的。〔66〕



尽管从没有公开说过，后来还是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系列的“案件”中，没有一起是叛国通敌案。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中只有一个，即恩里克·卡斯特罗，许多年之后转而支持佛朗哥。有政治分歧、争夺领导权的内部斗争或个人腐化的问题，但既没有特务，也没有警探，至少没有提出有人做这种事的罪证来。蒙松和另外一些没有提到的象基尼奥内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抵抗战士的声誉并不是敌人编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他们的实际工作赢得的，尽管他们在工作中既取得了成就，又犯过错误。

很少有几个共产党没有在自己的队伍中发现铁托分子、反苏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或警探。虽然这些党不能同执政党一样组织审判，但是，它们做到了资本主义具体条件所能允许做的一切。最惊人的案件莫过于安德烈·马尔蒂和夏尔·狄戎的案件了，这是1952年底震撼法国党的一个事件。他们两人都是法共政治局委员，而且两人都由于法国水兵为支持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黑海举行的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在西班牙内战中所发挥的作用，赢得了威望。狄戎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军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两人都被指控犯了“严重罪行”，罪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他们“曾对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同志的斯大林式的政治领导表示过怀疑”，曾组成了一个宗派集团，阴谋反对多列士，而这位领导人除保障党具有许多优点外，还保障了“党无条件地、始终不渝地追随苏联”。<sup>〔67〕</sup>据指责他们说，“他们的观点与铁托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曾表现出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危险迹象，这自然使他们象铁托那样滑向同一个泥坑。在马尔蒂对苏联的“不可容忍的怀疑”的迹象中间，就提到了他在1949年访问莫斯科时，“居然对社会主义国家保安机关表示怀疑”。<sup>〔68〕</sup>由于老马尔蒂拒不“坦白”，政治局断定他是警察密探，于是他便被当作密探开除出党。狄戎被降为一般成员，政治上受到排斥。

除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外，法共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例，如马塞尔·普雷南教授事件。他由于怀疑李森科生物学理论

而被指控犯有反苏罪。包括马塞尔·普雷南和其他著名的抵抗运动老战士在内的一批党员，当时已开始与斯大林的做法发生冲突。他们编写的《法共党史》，对党内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

对诽谤性的指责的恐惧，使党员趋于沉默。免职、审判和任意开除党员，引起许多同志的怀疑。不论是谁，只要产生了怀疑，这便是他受长期精神折磨的开端。他就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不管他怎么做，也不能免遭灾祸。如果他同意按求作彻底的自我批评，那他就为别人对他的谴责提供材料。如果他不肯就莫须有的罪名责骂自己，那么他的“抗拒自我批评”就证明他坚持自觉的反共分子的立场。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调查委员会”对指控的罪行进行“调查”，直至使用酷刑和处死，而〔在法国〕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则罗织“罪名”，陷害被指控的党员，直至使他声名狼藉，再把他开除出党。<sup>〔69〕</sup>

在法国，和在其它国家一样，许多党员悄悄离开了党，而另一些人把疑虑闷在心头，留在党内。这些疑虑不久也得到戏剧性的证实。然而，总起来说，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采取公开表示不同意和退党的步骤。<sup>〔70〕</sup>

非党左翼知识分子不赞成这些共产党和苏联的方针，简直是普遍的现象。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里，欧洲各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斯大林式的审讯事件的再度出现，引起了意外的反应。正当日丹诺夫主义、审判和对南斯拉夫的造谣中伤运动达到高潮时，有关苏联的集中营的头一篇报道问世了。这就完全可以使任何一个不戴政党的有色眼镜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产生怀疑：一个能产生并保存这种现象的制度的政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凯斯特写的《零与无穷大》一书的法文版发行了40余万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征兆。<sup>〔71〕</sup>

产生于三十年代、战争期间和战后加剧了的对斯大林的崇拜，1948年后开始具有崇拜神的气氛，这就为这段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与中世纪教会之间的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作了最后的润色。乔治乌

一德治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报告  
的结尾部分，是说明这个问题最好不过的例子。这是在斯大林七十诞  
辰（1949年12月）前夕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作的报告，其中  
对这位救世主的狂热的歌颂，可以与对敌人的强烈的诅咒相媲美。

（我们已引用过报告中有关“斯大林同志以自己的天才和洞察力挽  
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那一段。）一批一批的礼品从世界各个  
角落送到克里姆林宫。在这样一个隆重的时刻，莫洛托夫和马林科  
夫的文章历述了这位引路人一生的经历、不朽的功勋和著作后，  
写道：

因此，我国工人才这样无限地信任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  
导，他们才如此强烈地信赖他的灵感，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的工  
人才如此衷心地爱戴他……苏联各族人民和全世界的亿万人民  
怀着感激的心情仰望着斯大林同志。进步人类把斯大林同志看  
作是自己的引路人和敬爱的导师。他们信心满怀，因为他们知  
道，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sup>〔72〕</sup>

“当我们刚满心喜悦地庆祝过斯大林七十诞辰时，那些心中对  
这位领袖和朋友毫无感情的人，难道配称是共产党员吗？”多列士  
在法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讲的这番话，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  
声。<sup>〔73〕</sup>在这些年里数不清的颂词中间，对党内普遍存在的偏执态  
度概括得最好的，要算是刊登在《法兰西文学》上的尖锐批评毕加  
索的斯大林肖像画的文章了：

这幅画哪一点表现出了斯大林同志任何一张照片上都可以  
看到的仁慈和对人类的爱？……〔它〕根本没有描绘出代表斯大  
林性格的聪明才智和兄弟情谊……〔它〕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我们  
对自己敬爱的朋友、我们大家的父亲、我们最热爱的人的深厚  
感情，他的去世令我们难以置信……斯大林不朽的脸庞上最明  
显地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崇高和慈祥的表情，肖像画岂只是  
没有反映出来而已……我们亲爱的斯大林的其它画像上如此清  
晰可见的容光焕发、音容笑貌、聪明才智，一句话，人类的美

德，表现在哪里？……毕加索有在共产党人和我们党的朋友中散布误解和混乱的危险。〔74〕

批评的实质是：对于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说，本来什么都一直看得清楚的。而十分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天才画家竟会这样态度不恭，用这样的方法来散布混乱。

几天之后，一篇优秀党员在正常情况下都不会相信的报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毕加索画得很平凡的这张脸庞上转移开来。苏联内务部4月4日的声明宣布给几个月前被指控阴谋反对苏维埃制度而遭逮捕的主要医学专家平反，并予以释放。这个案件是1月13日报道的。《真理报》说，这些曾几次获得列宁勋章的苏联医学界主要代表曾经供认：他们不仅不去尽力照顾日丹诺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而且还蓄意通过看病投药来谋害他们。后来他们又准备谋害斯大林和几位军队领导人。他们大多数是犹太人，供认自己是给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情报机关工作。〔75〕现在看来，这些全是谎言。4月4日的声明中说，他们的供词是“违反法律”，屈打成招的。原来只有少数人，特别是少数共产党员医生，不大相信医生在工作过程中进行暗害的说法，而大多数共产党员是又一次相信确有这种阴谋的。既然《真理报》说了话，那就是真理嘛。苏联法院这一公理正义的化身也宣布了这樁事嘛。况且，五年来又不断发生阴谋活动，这种事也就习以为常了。如果这么多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优秀党员只不过是“人面妖怪”的话，怎么不会有“带听诊器的人面妖怪”呢？共产党员不能相信的倒是4月4日的声明；这个声明似乎比毕加索的画像引起的混乱更大。苏维埃政权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承认，与那么多其它案件类似的一件阴谋案竟然是一出闹剧，而且第一次承认采用过拷打；第一次承认苏联的治安保卫机关的重要头目制造了所谓的阴谋，用拷打的方法进行逼供。突然间，仿佛一切都给搅乱了。

死者的接班人为了要澄清事实，特别是考虑到许多阴谋案件和审判可能有必要“一笔勾销”，需要找到一头地位高的替罪羊。作为第一步，没有比秘密警察的最高领导人更合适的人选了。随着揭

出来新的阿泽夫，〔76〕什么都看得清楚了，西欧共产主义的指导党的政治局就宣称：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与撕下了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假面具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完全团结一致的。苏共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业作出了又一伟大的贡献。法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表示赞同和祝贺：

（1）由于它戳穿了贝利亚妄图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最终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2）由于它防止了妄图破坏苏联农业的巩固和发展，削弱集体农庄，从而制造苏联食品供应困难的罪恶活动；

（3）由于它使这个帝国主义代理人未能破坏苏联人民的友谊——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帝国主义寄希望于他们的代理人贝利亚，只是枉费心机。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光荣的、空前团结和坚强的苏联共产党——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榜样——领导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进。〔77〕

然而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却开始在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意识中扎下了根。南斯拉夫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中打开的缺口渐渐地扩大了。

## 注 释

〔1〕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194页。

〔2〕同上，第209页。亦可见1968年2月23日《世界报》上登载的昂贝·布苏格洛亚的文章，《捷克斯洛伐克是怎样由议会制度变为人民民主制的》。

〔3〕哥特瓦尔德1948年3月10日在国民制宪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我们的旗帜》，西班牙文本，1948年第25期第247页）。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巴黎，《共产主义手册》，1956年，第260页。

07 7 WORLD IS A GARDEN | THE GARDEN | 10.17.10

〔17〕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23页（译文略有改动——作者）。

〔18〕这段关于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会议的描述，见《铁托谈话录》第324—333页。据南斯拉夫人看，斯大林逼他们立即根据保加利亚的方案建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联邦，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破坏南斯拉夫联邦刚刚取得的团结的方法（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32页）。早些时候，斯大林怂恿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但与此同时，苏联特工人员却在阿尔巴尼亚策划反对南斯拉夫的阴谋（同上，第320、313页）。

〔19〕斯大林本人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人开会时透露，波兰领导人对季米特洛夫——铁托方案很赞赏（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26页）。

〔20〕这段引文摘自南斯拉夫1951年出版的《蓝皮书》，书中有许多苏联特务机关活动的罪证。

〔21〕在一次为南斯拉夫领导人设的午宴上，斯大林说陶里亚蒂是个理论家，写得一手好文章，但领导不了一个国家。多列士也有严重弱点：“当需要吓唬人的时候，甚至不咬人的狗也会露出牙齿来。然而多列士连这点也做不到。”“热情之花”振作不起来，她“不能在困难的时刻领导党”。然后，斯大林对铁托说：“铁托应多加保重，万勿发生意外。我活不了太久了，但是他要为欧洲活下去。”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加里宁逝世了。举行葬礼那天，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人象其余的外宾一样，被安排在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站立的主台的左边。“忽然间，在仪式刚刚开始时，斯大林邀请铁托过来，同政治局站在一起。他是唯一享受这种荣誉的人。所有其余的外宾都仍然站在左边的台上”（《铁托谈话录》第282—283、285页，译文经过删节——作者）。

〔22〕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25—226页。

〔23〕见本书第188—189页和本章注〔18〕。

〔24〕这些情节和下面的材料，引自本章注释〔9〕中提到的斯大林和铁托的通信。

〔25〕在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兰科维奇作了关于苏联特务机关活动的报告。许多苏联人所雇用的代理人，是十月革命后移居南斯拉夫的俄国流亡者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是白俄。

〔26〕4月19日，季米特洛夫率保加利亚代表团去布拉格，途经贝尔格莱德。吉拉斯前去迎接他，季米特洛夫乘机悄悄对他说，“要坚强！”当时

双方商定，季米特洛夫返程时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在此期间，出了保加利亚表示支持苏联的复信。南保会谈未能举行。（见前引吉拉斯所著书，第360页）。

〔27〕1944年5月，德国人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企图消灭铁托的指挥部。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险些落入一支伞兵部队手中，但设法逃脱了。德国人的这次行动失败了，游击队司令部保住了他们的档案和发报机。德国的进攻决不是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军队发生危机引起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侵略者妄图改变形势而进行的绝望挣扎。《真理报》6月4日发表评论说：“企图夺取铁托元帅的指挥部的阴谋失败了，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德国的进攻由于南斯拉夫军队的英勇抵抗而被击退……凯塞林在意大利需要援军……德国人本想调走他们在南斯拉夫作战的几个师，但铁托元帅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南斯拉夫战线牵制了大批德军，使援助凯塞林的计划不能得逞”。

〔28〕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66页。

〔29〕下面是决议的主要部分。参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

####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

一、情报局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最近在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种不正确的路线，一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情报局批准了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即主动揭露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正确的政策，尤其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的不正确的政策。

二、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布）执行着一种不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执行了一种诬蔑苏联军事专家和诽谤苏联的可耻的政策。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文职专家设立了一种专门的机构，使他们处于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监视之下，并不断受到盯梢。苏联共产党（布）驻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一些官方代表，都受到了南斯拉夫国家保安机关的这种盯梢和监视。

这些事实以及同类的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已采取了不是共产党员所应有的立场，开始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并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态度来对付苏联。正是由于这种反苏



的立场，从反革命托洛茨基武库中捡来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布）蜕化、苏联“蜕化”的诽谤宣传，才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得到散布。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者的这种反苏立场，认为这种立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它只是适合民族主义的立场。

三、在对内政策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成分在他们国内的增长，从而否认阶级斗争在农村中的加剧。这种否认是从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象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熄灭，如象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后者曾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四、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政纲，并且不把它自己溶解在非党群众之中。……

然而，在南斯拉夫，认为国内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南斯拉夫的领导者缩小了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正在重复着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在非党的群众组织之中。所有这一切，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存在着取消派的倾向。

五、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在党内造成的官僚主义的统治，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致命的危险。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党员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党内对错误措施的最轻微的批评都受到野蛮的压制，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共产党内不能容许这种可耻的，完全是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

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不但不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采取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道路，反而由于害上了极端野心、骄横和自大的毛病，以挑战和敌视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批评。他们走上了一概否认自己错误的反党的道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对待自己的错误所应持的

态度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最近，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其它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错误之后，南斯拉夫领导者企图颁布若干新的左的法令。……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斯拉夫领导机关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都是笼络人心的，在目前条件下不能实行的，因此，它们只能玷污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这就是情报局为什么把这类冒险主义的手段，看作是卑鄙的手段和一种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的原因。

七、〔这一条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

八、鉴于上述事实，情报局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3月到5月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信件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估计，对南斯拉夫党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的批评以及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一致得出结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者，由于他们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反苏的观点，由于他们的整个态度和他们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已使他们自己处于和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地位，走上了脱离反帝国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斥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种反党的政策和反党的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南斯拉夫的领导者显然是不了解，或者可能装作不了解：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导致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这些健全分子的任务在于迫使他们目前的领导者公开地、诚实地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统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阵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目前的领导者证明不能做到这点，那末，这些健全分子的任务就是要撤换他们，并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

〔30〕见前引德迪耶尔所著书，第370页。苏联人从未否认过这些报道。

这是出席会议的某个人告诉南斯拉夫人的。反铁托运动的作法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

〔31〕参见德迫耶尔所著书，第373页。

〔32〕约·布·铁托，《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南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贝尔格莱德，1948年，第136页。

〔33〕赫鲁晓夫1955年6月3日在索菲亚的讲话，《真理报》1955年7月4日。

〔34〕这一段是由1949年8月25日《工人世界》上发表的苏联照会全文的西班牙文本译成英文的。此处引用的几段文字，是照会中对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的“苏联公民”受虐待情况的全部描述。可想而知，如果描述偏了的话，那也只能是把情况说得更严重。与阿图尔·伦敦、索尔仁尼琴、金斯伯格等人关于贝利亚的警察手段的描述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份苏联政府文件的可耻态度。

〔35〕据《纽约明星报》报道，1949年上半年给予希腊的军援有152架飞机、7千枚炸弹、1万辆军用卡车、3,840门大炮和迫击炮、2亿8千万发子弹（齐西斯·佐格拉福斯《希腊内战的教训》一文中所引，见布拉格《国际评论》1964年第2期）。

〔36〕《神灵》月刊1950年第2期上刊登了J·—M·多梅纳克的文章。文中叙述了他于1949年8月15至20日与逃到马其顿的南斯拉夫一方的希腊游击队员的谈话。据这些游击队员说，1948年10月马尔科斯被撤职一事，事先并未同游击队员商量。只有人数多的单位的领导人接到通知。直到两个月后（1948年12月），希腊党才举行了一次会议。后来对游击队员说马尔科斯患了病。他因“机会主义”而被革职的消息是逐渐传开的。萨哈里阿泽斯接替马尔科斯的职务后人民军队的士气便低落了。给人的印象是，萨哈里阿泽斯的使命就是结束武装斗争。

反“铁托分子”的斗争进行得非常广泛。参加游击队进行战斗的马其顿籍的希腊人（约18,000人），因被怀疑同情与南斯拉夫联邦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大马其顿主义，都从重要指挥岗位上撤了下来。萨哈里阿泽斯命令，中断游击队占领的希腊领土与南斯拉夫之间的一切联系。一位前线部队军官告诉多梅纳克，1949年4月间他接到萨哈里阿泽斯总指挥部发来的电报，命令他向每一个试图跨越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国境的人开枪射击。据说，

萨哈里阿泽斯1949年春就下令封锁了边界。

J·—M·多梅纳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害怕在希腊产生新的铁托主义，并认为希腊的内战是危险而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苏联领导人因此命令亲苏的希腊共产党人拒绝接受南斯拉夫的任何援助，从而结束内战。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一箭双雕。他们既可借此向西方国家的外长表示善意，又可以在其它共产党和世界舆论面前谴责铁托的“背叛行为”。

〔37〕皮埃尔·阿尔布伊：《希腊与民主政治》，《思想》双月刊，1950年第29期第61页。

〔38〕约有25,000名希腊抵抗战士逃往南斯拉夫。其余许多人（没有具体数字）逃往阿尔巴尼亚。完全有理由设想，南斯拉夫方面采取了行动以对付来自情报局支持者方面的威胁。

〔39〕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现存的仅仅揭露了部分情况的材料，主要有阿图尔·伦敦的《审判》（伦敦，麦克唐纳出版社，1970年）、欧仁·罗伯尔的《布拉格审判》（巴黎，斯托克出版社，1969年）和捷克短暂的新闻自由时期的一些报道。关于拉伊克的审判，有萨瓦留斯·樊尚（即贝拉·斯札兹）的《自愿上绞刑台的人们》（巴黎，朱利亚尔出版社，1963年）。关于拉伊克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兰皮书《拉伊克及其同谋者在人民法庭上》（巴黎，法国出版商联合会，1949年）。关于科斯托夫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对特莱乔·科斯托夫及其同伙的审判》，（索菲亚，1949年）。关于斯兰斯基审判的官方说法，见《对以鲁道夫·斯兰斯基为首的叛国集团领导人的审判》（布拉格，奥比斯出版社，1953年）。

〔40〕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54页。

〔41〕引自1949年12月8日《工人世界》发表的起诉书西班牙译文。

〔42〕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262页。

〔43〕《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引自1948年9月9日《工人世界》发表的西班牙文本决议全文。

〔44〕有关这次会议事项的所有引文，都出自注〔6〕中提到的小册子，《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

〔45〕数字是约数。资料来自费伊托与拉齐什所写的论欧洲共产党的著作。这两位历史学家引用的都是共产党的官方资料。

〔46〕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46—247页。据《文学书翰》提供

的数字，捷克斯洛伐克被拘捕者达 3 万人（《世界报》1968年 3 月 31 日）。

〔47〕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 1 卷第 5 部分第 3—6 章，提供了各次审判与大清洗的具体数字。

〔48〕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冷意识》，巴黎，波韦尔出版社，1967年，第141页。

〔49〕前引阿·伦敦所著书，第294—295页，第303页（略有改动——作者）。

〔50〕同上，第304页（略有改动——作者）。

〔51〕见前引帕帕约安努所著书，第140页。

〔52〕“怀疑一切”这句座右铭是马克思 1865 年对她女儿提出的一些问题作的回答之一。见《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1956年。

〔53〕注〔39〕已经提到，尽管《审判》一书和其它第一手报道提供了证据和材料，但苏联特务机构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进行干涉的重要情况还是弄不清楚。阿·伦敦根据他自己受审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的材料，曾经设法弄清侦察工作是苏联官员领导的。例如，他引用了阿洛伊斯·萨麦茨 1950 年平反后对他透露的材料。萨麦茨曾是国际纵队的队员，一度与“苏联顾问”是合作的。苏联顾问于 1948 年秋拉伊克审判后来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说，我国一定存在着什么阴谋反对我国政府的组织，并说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已渗透到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

“根据他们给我们的指示，我们逮捕了那些由于他们的职业或交往‘可能’一贯反对政府的人。事后我们才寻找证据。

“有一个叫波利索夫的苏联顾问，命令我在侦讯后将被告签过字的每一份报告都给他一份副本。当我指出党的总书记已经收到了这类报告的副本时，他对我严加申斥，不许我对他的指示提出疑问。

“我同其他苏联顾问也打过交道，特别是利哈切和斯米尔诺。他们搜集每一个人，特别是地位高的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的有损于他们名誉的材料。”（第79页）

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从事侦讯的警察，有时说漏了嘴，说出了他们上级的情况。例如，“象拉狄克那样的人坚持了三个月，到头来什么都供认了。你对抗了四个月。你以为还能拖更长的时间吗？”（第145页）。阿·伦敦很正确地作出推论道，只有苏联官员才能告诉这位捷克警察有关拉狄克对“侦讯”的对抗。阿·伦敦的书中还可找到关于这方面的其它参考资料。

捷克之“春”时期，布拉格报刊披露，米高扬在对斯兰斯基审讯的某些阶段曾亲自进行干预。

在波兰，苏联的干涉尤其无耻。在哥穆尔卡、斯皮哈尔斯基将军和波兰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被开除党籍（1949年11月）的同时，波兰政府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任命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波兰籍，但在俄国受教育，说波兰话带有很重的俄语口音）担任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周围全是苏联专家。他开始大规模地清洗波兰军队，终于导致1951年8月对一些将军和其他军官进行审讯。审讯前夕，莫洛托夫偕同朱可夫元帅到达华沙，发表演说号召深入开展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和铁托分子”（见前引费伊托所著书，第1卷第266页）。

〔54〕见意大利共产党一位前官员朱利奥·塞尼卡写的书《陶里亚蒂与斯大林》（米兰，苏加尔出版社，1961年）。塞尼卡披露了1953年7月12—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意大利党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皮埃特罗·塞基亚。苏联人说贝利亚在打算向西方让步方向走得太远，他想要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把它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拿出在逮捕他时在他身上搜出的一封信，作为他充当了帝国主义特务机构代理人的最后的证据。这表明，贝利亚叛国的“罪证”，也就是他本人用来把各人民民主国家成千成万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或判处死刑的“罪证”。

〔55〕伊格纳西奥·加利西奥：《与铁托主义进行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职责》，在《我们的旗帜》1950年第4期第176页。引用西班牙、法国、中国共产党及其它党领导人有关这方面的讲话，并不意味着这些党在总的反铁托运动中表现突出。他们对这件事应负的责任属一般性质，选择一段引语只是因其有代表性而已。

〔56〕刘少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北京，解放社编，1949年，第38页。

〔57〕乔治·科尼奥：《提高反铁托集团斗争的警觉》，《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6月第47页。

〔58〕同上，第48页。1948年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南斯拉夫在建立V<sub>2</sub>火箭发射架的假消息，后来共产党报刊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59〕同上，第49页。

〔60〕同上，第50页。

[61] 《共产主义手册》1951年第6期，第657—659页。

[62] 《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54年。书中包括代表大会上近50篇讲话。

[63] 《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第5期，第29页。

[64] 同上，1951年第6期第66页。

[65] 《新评论》1951年第25期第19页。

[66] 《工人世界》1949年12月8日。蒙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在法国和在西班牙的组织的领导人。战争后期他被佛朗哥警察逮捕，在狱中度过许多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后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以私人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承认对他的指责是错误的，但从未给他公开恢复名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前总书记科莫雷拉的朋友们为了纪念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对政治、社会、民族发展史的贡献》（巴黎，1969年）。

[67]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文件》，1952年10月3日，载《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第10期，第953页。安德烈·马尔蒂写了一本书，书中揭露政治局对他进行的诽谤性指责是谎言，并为他的政治主张辩护（《马尔蒂事件》，巴黎，德里夫出版社，1955年）。

[68] 《法国共产党（统一）党史》，第3卷第98—100页。

[69] 同上，第63—64页。

[70] 见戴维·考特：《共产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伦敦，多伊奇公司，1964年。在第175—187页上，考特叙述了法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非党左翼知识界在反铁托主义和审判期间的反应。

[71] 前引考特所著书，第186页。

[72] 《真理报》1949年12月21日。

[73] 《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5月第24页。

[74] 《法兰西文学》1953年3月24日。

[75] 1月13日通告中提到九位著名医生的姓名。其中有维诺格拉多夫。他是同布哈林案件中与“暗杀”高尔基、彼什科夫、古比雪夫等人一事有牵连的医学专家。五位医生供认，他们通过犹太组织“联络处”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三位医生供认是情报机关的代理人。不久后，莉迪娅·蒂玛舒克医生由于协助揭发杀人犯间谍医生而荣获勋章。苏联报刊将她捧为民族英雄。4

月4日的通告中提到十三个人的名字，其中六人在1月13日的名单中没有。1月份名单中提到的而4月份名单中又消失的两个人的命运不得而知。可能他们已被拷打致死，或者他们和蒂玛舒克医生一样，是贝利亚的代理人。

各国研究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夏皮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沃尔夫冈·伦纳德）研究了这件事，认为斯大林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一直准备着进行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莫洛托夫的妻子因与医生的诉讼案有关而被捕，并被驱逐出莫斯科。米高扬的两个儿子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人人自危，而斯大林本人却提防着每一个人。医生案件原来可能是“领导党”最上层进行残酷斗争的第一阶段。斯大林一死，斗争出乎意料地发生了转折（当时情况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著名的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会见过他。梅农说这位独裁者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狼头，并告诉客人说，俄国农民非常熟悉他们的老劲敌狼的习性，知道怎样杀死它们，但是狼也知道吃人。见皮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第460—462页。

[76] 梅耶尔·阿泽夫是受沙皇警察局雇用的破坏分子，他当了四年俄国恐怖分子的头子（1904—07年）。警察局使大部分阴谋事件在最后一刻得到了防止，但也让其中几件发生，以便在公众舆论面前证明他们严惩革命者是正当的。1953年1月，一位法国共产党作家利用这个历史事件来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并不出人意外（《思想》双月刊1953年第46期）。

[77]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8—9期第25页。



## 第八章 东方接替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

——毛泽东 1938年

1947年12月，正当东西欧的共产党进入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消沉时期，而资本主义在西欧开始重新活跃时，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委员会作了下述讲话：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数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1）

1947年下半年中国内战中出现的这个转折点，的确是一个历史

性事件。从这个转折点开始，革命军队克敌制胜，所向披靡，直到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而当西方工人阶级的运动错过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大危机所提供的罕有机会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错误道路的时刻，一支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农民军队，势如破竹地进入了北京、上海、南京和广州。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在东亚的这些桥头堡落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反帝的农民革命手中。这个革命的意图，更确切地说，在1949年10月取得革命胜利，夺取了政权的党的目的，就是要使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以前，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亚洲各国的社会必然都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修正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提出“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之下”，亚洲各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

现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对这个观点作首次试验。<sup>〔2〕</sup>它对于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帮助，决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未能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中取得政权，并且也未作出丝毫努力去阻止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而进行的干涉。另一方面，当时存在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苏联战胜纳粹德国是造成使中国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国际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苏联的军事力量，不仅由于它在打败日本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且由于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干涉中国是个很大的牵制。<sup>〔3〕</sup>

可是，在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在现在开始的这个时期中，要从苏联得到帮助一定是困难重重的。斯大林对敢于保持自主性和独创性的革命发动的“冷战”，再加上他用来控制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迫使它们成为一个模式的做法，都向新中国尖锐地表明，克里姆林宫可能迫使它在不作仆从就作敌人这两种角色中进行选择。

毛及其亲密的同行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抉择，还没有足够的情报给予明确的回答。可是毛集团确有与莫斯科打交道的经验（类似铁托及其同行在解放战争中的经验，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南斯拉夫人的

经验更多），这种经验一定有助于他们了解苏南争端。朝着相同方向发展的中国党的领导集团的思想风格和政治活动，也有某些特色。这些特色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特点中产生的，并且是从毛取得党的领袖地位时起被精心培育起来的。在本书第一编中已谈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事情，这里不需要重复了，但我们将非常简略地研究一下与此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后期的某些情况。

## 中国革命与“大同盟”

在本书第一编的结束部分（第262页），我们引述了毛在1943年的讲话，根据这个讲话来看，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对中国党的内部问题没作进一步的干涉。我们认为，1935年以来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以及苏联在那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三者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并不排除重大的分歧。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是紧跟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的，而中国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则不是这样。在毛主义的领导看来，采取这一策略要以进行长期的斗争为先决条件，以保证革命力量在与国民党的暂时联盟中占优势。莫斯科的态度就不是这样。1937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规定苏方提供军事物资和军事专家的援助，<sup>〔4〕</sup>苏联政府主要是希望蒋介石把军队专用于抗日，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但在蒋看来，共产党是主要敌人，正如他在有一个场合说的：“日本不过是皮肤之患，共产党乃心腹之患。”<sup>〔5〕</sup>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没有宣布的内战，只有毛作出根本的让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并将他的军队改编为蒋军，才能结束。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利用象王明这样一些毫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政策的党的老战士来迫使毛接受的路线。<sup>〔6〕</sup>在德国入侵苏联以后，这种压力就变得更加直接了。

1941年4月，莫斯科放弃了它以前与中国政府结盟的政策，而同日本缔结前面已提到过的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党对这个行动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因为这一行动把它置于与欧洲一些共产党在苏德条约以后相类似的处境。日本人由于签订了4月条约，就更易巩固和扩大他们在中国已经赢得的地盘，特别是也因此而解除了占领中国北部地区的日军所受的压力，可以被调去打共产党的一些主要根据地了。<sup>(7)</sup>不用说，斯大林决定与日本签订这个条约，并没有与中共领导人商量。根据目前能得到的资料看，在上述时期（1937—1940年）他并未给他们提供过军援，而对国民党倒确实提供了援助。<sup>(8)</sup>但是，当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而看来日本也会不顾条约发动进攻时，斯大林这才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动用全部军队出击比他们强得多的日本军队。他要求他们努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团结，实际上是作出让步（以便国民党也能集中他们的兵力来抵抗占领者）。苏联党的官方刊物《共产党人》最近证实了这一点：

当希特勒的军队在德苏战线上取得暂时胜利之际，我们党曾建议〔中共和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去拖住日军，使之不能进攻苏联，但是，毛及其宗派分子公然置这个建议于不顾……当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最大限度地加快对法西斯作战时，许多事实都表明了毛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只要回忆如下的事实便够了：1941年至1942年间，用于打日本人的人民军的兵力大大减少了。1943年1月，苏联驻延安的记者报道说，一切部队都得到了命令：不参加对日作战，一旦与日军遭遇就撤退。它们的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就与敌人达成停战协定。<sup>(9)</sup>

《共产党人》这种歪曲事实的、实际上是诽谤的说法，暴露出毛与斯大林的战略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冲突。

毛认识到日本人在武器和军队正规化方面的绝对优势，向来避免出动人民军打正规战。他大规模地使用早在江西时期就行之有效的、而且已发展成为一套理论的游击战策略。西方最敏锐的观察家

之一说：

共产党军队作战是极其分散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抱有政治目的，要尽可能地扩大活动地区与人民建立联系；另外的原因是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比日本人的要差得多。他们的游击战比起江西的战役来，离正规战更远；他们以小部队进行活动，从未超过一个团的兵力。〔10〕

这种作战方法与在日本占领的各省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有密切的联系。总之，毛在运用他于1938年提出的“持久战”理论。他并不排除在后期发展为运动战，他说：

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11〕

广岛事件以后日本突然垮台了，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出现这个阶段。但是毛提出这个战略，并不光是想到了抗日战争，他从长期着眼，看到必然要继续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武装斗争（这种斗争在抗日阶段几乎没有停止过）。他的计划是要为一场可能发生的内战积聚力量，而不是过早地损失这支力量。换句话说，毛的战略的最终目标，不限于民族的解放，还包括社会革命。这两个方面的紧密结合，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这是人所共知的。

毛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在许多方面都与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相对抗。只要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危险还存在，也就是说，大约一直到1943年，这个争论主要都是作为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出现的。就象《共产党人》现在所承认的那样。毛要保存实力，准备用于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而斯大林却想要毛和蒋把他们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投入抗日。美国人对此也同样感兴趣，因为这多少能减轻他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负担。

蒋也要保存国民党军队，以便将来不可避免地同共产党人算帐。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蒋曾希望日本人会帮助他消灭共产党人。

蒋利用当时人民军是在国民政府的正式领导之下的有利条件，派人民军去攻打入侵的主力部队。<sup>〔12〕</sup>毛不上这个圈套，他当时不服从蒋，就象他后来不服从斯大林一样。如果他在1941到1943年间向斯大林的要求让步，那么革命军队就会大部分消耗掉，日本一投降，中国共产党人就只能听任国民党和美国人摆布了。必须记住，当时形势的一个根本之点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从苏联得到任何军事援助。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日军加强作战，但是他却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来改善他们在武器方面的可悲劣势。<sup>〔13〕</sup>

从更全面的政治角度看，毛的战略是与克里姆林宫的长期目标相冲突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抱负——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取胜——根本不符合斯大林要在划分“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同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达成协议的宿愿。即使从最乐观的观点来看，要在亚洲划分这种“利益范围”，只有在中国建立这样一种政权才有可能：在这个政权中，共产党人接受蒋介石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控制。因此，斯大林一直对中共领导施加压力，要他们与国民党达成这样一种妥协。同时，他也支持美国的政策，美国要蒋介石放弃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对中共作出某些让步，以便把共产党并入到国民党政权中去。

1944年秋，罗斯福派赫尔利将军到蒋那里去当大使。赫尔利在上任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与莫洛托夫一起研究了中国的形势。他根据这次会晤，曾设法使中国的独裁者“相信”下列几点：“（1）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2）俄国不愿意在中国发生党派纷争和内战；（3）俄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融洽的关系”。<sup>〔14〕</sup>斯大林在4月15日与赫尔利的谈话以及1945年5月28日与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宣称，苏联希望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重新统一。霍普金斯曾向杜鲁门报告说：斯大林答应“他将尽力促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得到重新统一”，并且还说，“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有足够的力量统一中国”。<sup>〔15〕</sup>（1944年6月，斯大林曾对哈里曼说过：“共产党

人，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事实上并非共产党，就象人造黄油不是真黄油一样。”）〔16〕

美国政治家所引述的斯大林及其助手们的这些讲话，如果没有其他事实以及斯大林的“大同盟”政策的总方针作为佐证，也许可以认为是一种狡猾的外交手腕。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它的条款，以及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定，苏联又重新获得了沙俄从中国侵占的、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基地与租借地。蒋政府强烈地拒绝过俄国人的这些要求（当时，西方几个大国正相继放弃它们从前在中国的租界，中国也在此时获得了大国的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只是在斯大林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后才作了让步。

这至少是某些历史学家的看法。〔17〕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日本投降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证实，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举例说，解放了满洲的苏军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他们本来能提供的必不可少的帮助。他们不是把该地区的工业设备——中国最大型的工业设备——移交给中共，而是由军队拆卸以后作为战利品运往俄国。苏联当局不让中共接管满洲的主要铁路枢纽与工业中心沈阳及其他城市，却与蒋达成了一个协议，把这些城市移交给蒋的军队。他们完全可以把人民军的部队先于国民党部队运送到北京和华北其他城市，但他们不这样做，结果国民党人由美国的船只和飞机运送，得以到那些地方去站住了脚。

另一方面，苏军当局并不阻止人民军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满洲向农村地区扩展，甚至也不阻止他们接管长春与哈尔滨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是（这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厚礼）苏军司令部把满洲日军的一部分武器移交给了毛的军队。〔18〕（如果采取另外的做法，就是说，把绝大部分的日本武器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一部分，那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来说，干出这种事来就真是未免太不象话了。）

换句话说，斯大林把一只手伸给毛，另一只手伸给蒋，同时又促

使他们互相妥协。他同意承认蒋是中国的首脑，并给了蒋某些帮助让他在华北建立统治，但坚持蒋必须让共产党人参加他的政府。

（就在中苏条约签订后不久，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的联合压力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商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的问题。）斯大林使毛在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有了一点改善，但又压他向国民党作出让步作回报。

## 革命战争还是“全国统一”？

关于斯大林对毛施加压力的情报，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来源，就我们所知，莫斯科对这个说法从未加以否认。这在前一章中已提到，这里要再详细复述一下。根据1948年2月卡德尔所说，斯大林曾对他和季米特洛夫说过下面这一段话：

……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一起讨论了中国的形势。我们曾直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该力求与蒋介石妥协，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了苏联同志的看法，但一回到中国，却又完全另搞一套。他们集合兵力，组织军队，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要打败蒋介石的军队。就中国问题来说，我们承认我们错了。<sup>〔19〕</sup>

毛与蒋的谈判于1945年9月开始，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当谈判正进行时，蒋命令其军队进攻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而毛则命令他的部队反击，消灭来犯者。<sup>〔20〕</sup>到1945年秋天，内战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了。苏联与美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硬要把“全国统一”的解决办法塞给中国的两支互相对峙的武装力量。在1945年12月的外长会议上，“三巨头”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全国统一的政府领导的、以把民主分子广泛结合到该政府的一切机构中去与结束国内混乱为基础的、统一和民主的中国”。<sup>〔21〕</sup>国民党与中共的谈判在形势更加逼人情况下又重新开始了。1946年1月召开



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停止军事行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那些决议表面上是符合“三巨头”协议的条款的，但实际上只是掩盖了蒋准备重新进攻革命力量和共产党人准备对反革命势力实行有效抵抗的事实。与此同时，在华盛顿鼓吹给中国独裁者增加援助的人得势，他们想使蒋能通过武力来巩固地位。到1946年夏天，尽管作过几次新的努力来进行谈判，但内战已经遍及全国，而且日益加剧，直到国民党全部崩溃。

1946年7月，蒋介石重新发动进攻。那时他的军队在正规军的数量和武器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有五百架飞机，大部分由美国人驾驶，而人民军直到胜利都没有飞机。蒋的军队得到数千美国官员和顾问的援助，并得到华盛顿在财政上十分慷慨的支援。在一年中，即直到1947年夏季为止，国民党看起来似乎是节节胜利，实际上他们占领的是人民军根据行之有效的战略而不予防守的一些城市。他们拉长了自己的运输线，而把力量分散在对他们持敌意的、充满了革命骚动的地区。人民军只是在对他们有明显优势的地方才进行战斗。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扩大和巩固了新的政权。在这些地区，土地革命已自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他们包围城市，切断交通线，把国民党的一些地区孤立起来。同时，共产党人在敌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加强地下活动，争取持怀疑态度的人，并利用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内部的矛盾。

力量的对比很快就变得对共产党人有利了。从1947年夏到1948年夏，人民军在满洲、华北和华中逐步转为进攻。毛在他的“持久战”理论中所预见到的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阶段开始了。在1948年秋季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人民军解放了满洲，俘获了数十万俘虏，并夺得大量战争物资。武器和正规军的优势转到了革命军队一边（尽管没有飞机）。1949年1月，人民军进入北京。春天，它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和上海。秋天到达广州。到年底，整个中国大陆除少数在不久以后解放的边远地区外，都处在新的革命政权的控制之下了。

对中国内战发生于1947年夏季的这个转折，以及革命军队在一年中从满洲到广州的快速和胜利的进攻，不能单纯以共产党人在二十五年革命战争经验中得到的军事和政治战略方面的经验来解释，也不能只以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革命战斗精神、纪律、自我牺牲精神和有效的作战方法来解释。当然，没有这些因素，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光说这些，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回答，特别是不能解释反攻的速度问题。

所有对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作过研究的人，都把国民党内部的腐朽、无能和腐败视为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外，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一个。他在1947年2月担任国务卿以前，曾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使他能从内部了解蒋政权。1947年，在一次部长们的会议上，他预言它会垮台。1948年2月，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在中央政府目前这种混乱、腐败、没有效率和无能的情况下”，中国的问题“简直是无法解决的”。〔22〕

但是，蒋政权的无能及其垮台，只不过是中国社会“革命化”的加深这一更深刻的现实的反映。由人民军和中国共产党组织、计划并使之实现的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广泛的、自发的和普遍存在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在经过了国内战争、农民和工人的暴动、革命游击战争以及日本入侵与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三十年以后，这个革命已在人民思想中扎下了根，并严重摧毁了各种传统的结构。

日本的入侵，对一切自称能解决这个处于变动中的中国的问题的政治势力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国民党在1925—27年间暴露了自己是土地革命的敌人以后，在1937—45年间又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组织全国的抵抗。它多次直接或间接地与敌人合作，从而使自己信誉扫地。在另一方面，共产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就已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而闻名，在抗日战争中，它是一个捍卫民族独立的政党，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和社会集团都转到了共产党一边，或者要求同它结成真正的联盟。日

本投降时，要是不存在与该国的根本现实无关的一系列因素的话，蒋介石政府是不可能在大部分国土上建立政权的。这些因素包括：美日协定规定的日军只能向蒋的军队投降，由美国的船只和飞机把孤立西南一隅的蒋军运往华中和华北；蒋政府的国际地位（“三巨头”承认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革命力量进行斗争的地位，以及苏军为履行这个条约在北方和满洲的所作所为；最后就是美国政府及时积极提供供给蒋介石的各种援助。

国民党政权确实是被人为地恢复起来强加给一个国家的。当时这个国家所要求的国内和平，激进的社会改革和真正的民族独立，恰恰就是这个政权想要扼杀的东西。从摆脱日本的奴役时起，国民党就表明它自己是一个打内战的党，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敌人，是新的外国（即美国）统治的工具。只有两种情况可能使国民党把政权巩固一段时间：要么用军事力量打垮共产党；要么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投降，甘心“合并”到国民党政权中去，解散自己的军队，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并且实际上放弃他们的革命纲领。从国民党的观点来看，前面提到的那个谈判是一种策略手腕，进行谈判是为了赢得时间部署兵力来实现第一种解决办法，同时试探实现第二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如果中共领导人屈服于斯大林的要求，第二种办法就可能实现。共产党就会再次成为国民党的俘虏，就象在1925—27年时那样，那个时期的悲剧也就随时都可能重演。如果说，在西欧实行“民族团结”，终于导致共产党的部长被撵走，共产党被孤立，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实行同样类型的“民族团结”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对共产党人的一次新的大屠杀。

毛和他的同事们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这反映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文件中。不论是在日本投降前夕还是投降以后，毛没有抱任何幻想；他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并使党对此有所准备。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他在向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內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內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23〕

他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部分，谈到了关于1927年的教训，他说：

1944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1945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他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沒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24〕

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他对大会的闭幕词：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25〕

就在九月谈判以后，毛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谈判还是必要的。同意去谈就“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26〕

## 中国“铁托主义”的幽灵

毛主义者尚未透露那几年党内斗争的历史。从目前已有的文件

看，象我们已经援引的1946年4月的文件，<sup>〔27〕</sup>反映出中共党的某些有影响的领导人，曾支持斯大林强迫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即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他们认为，从克里姆林宫寻求与美国妥协的时候起，革命战争就注定要失败。斯大林对中共领导施加的压力，看来起码持续到1946年底或1947年初。1946年12月，斯大林对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与美国实行一致的政策”。<sup>〔28〕</sup>苏联与西欧共产党的报纸，在1945年和1946年期间，几乎不发表任何关于中国人民军队以及解放区的革命变化等情况的消息。他们只限于一般地谴责美国“反动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把这种支持说成是实现“民族团结”政策的主要障碍。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也只是在谈到这种干涉时才提到中国，而不提国内战争的革命内容，也不提出国际无产阶级如何支援中国革命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被邀请当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很明显，就象铁托在解放战争期间执行的政策那样，毛的政策已经跟斯大林的政策对不上号了。1949年毛的路线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只能使斯大林焦虑不安。同铁托闹翻还记忆犹新啊。

已经发生的事变，岂止是用事实证明了毛的战略正确而已。斯大林想必因此而更加深感不安。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一个大国中取得胜利。这个党在精神、意识形态及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方面都与苏联党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独创性及其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党。党的领导十多年来，在同莫斯科正统的潜在冲突中，精心培育这些特点，尽管大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同时因出于礼貌，也不得不对斯大林及其思想必恭必敬，奉若神明。上面提到的《共产党人》那篇文章表明，莫斯科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1941年到1945年在延安组织的、分若干阶段进行的“整风运动”的。这个“运动”包括研究和讨论一系列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目的是教育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

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毛说：“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29〕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都经历了这次学习，这是在党内传播毛的思想并使党员团结在毛的领导之下的一种方法。毛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风细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等等，都被奉为是适合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些名词开始听说了。现在，《共产党人》杂志揭露说，当时王明等人由于“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而受到批判。

这次思想运动——尽管它有反教条主义的意图，但可以看作是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开始——在中国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刘少奇所作的《论党》的报告中有下面这段话：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30〕

（真是如此具有“特点”，确实，这种语言要写进任何其他共产党章程都会是不可思议的），报告还接着说：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

……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及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新发展的力量和独创性被着重加以强调说：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

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从这几段话中看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正如一切伟大的革命那样，中国革命在产生自己的理论的过程中，对某些新思想教条化的盲目崇拜同时也开始了，如同过去对列宁主义的一些做法一样。我们不准备分析这些引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很难期望斯大林会接受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原则或毛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中国革命是在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正统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正如它的实践过程是对“大同盟”政策的挑战一样。这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挑战，因为正如刘少奇的报告所说的，这种新的理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进一步发展”，“它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从1945年以来，中共就开始宣称，它的思想和经验是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榜样。它开始以继承苏联党的事业的面貌出现了。

当1949年的胜利日益明显时，特别是在这一年中，一系列经过周密考虑的文章出现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这些文章引用了毛著作中对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作用和榜样表示敬意的段落，而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革命发展特殊论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其中一篇文章说：

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同的。人们只能说这种发展在速度和特定形式上有差别。在这个意义上

说，东方的人民民主就其基本要点来说，与西方是相同的。……

殖民地民族斗争的整个进程，民主力量在东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有力地证实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学说的正确，并证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的胜利。<sup>〔31〕</sup>

按苏联这位理论家的看法，根本就不存在毛的思想。另一篇文章说：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对党制订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根据对中国形势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特点，英明地预示了它的进程并指出了它能取胜的条件。<sup>〔32〕</sup>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世界工联在北京举行会议，中国的发言人之一刘少奇，坚决捍卫毛主义的地位：

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sup>〔33〕</sup>

刊登在世界工联刊物上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总结，把有些亚洲共产党人表示愿意仿效中国榜样的发言删去了。

显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正如在小小的南斯拉夫所进行的革命一样，包含着出现异端邪说的危险。就在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已掌握在一伙“间谍和暗杀者”手中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这不仅是十月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体系受到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面临着亚洲出现铁托主义的恶梦。它的危险性，是巴尔干的铁托主义无法与之相比的。某些西方观察家看到这场恶梦有可能变成现实，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马上就会出现。<sup>〔34〕</sup>共产党情报局的各个党也认为必须制止这种“推测”。例如，法共的刊物在1950年3月写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内，我



们可以相信，帝国主义对出现‘中国铁托主义’所抱的希望是注定会变成极度的失望的”。〔35〕

## 中 苏 同 盟

这场恶梦在几年之内是被排除了。国际形势对毛和斯大林都有很大压力，迫使他们搞好关系。“冷战”正达高潮。毛不知道美国对被打败的、现逃亡在台湾的蒋介石的支持将走得有多远，但无论如何美帝国主义是对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在斯大林这方面，他需要加强他在国际方面的力量。1949年4月签订了大西洋公约。5月，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对西柏林的封锁。日本正在变成与苏联远东相对峙的美国军事基地。尽管那年7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是美国在这方面显然占优势，正如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占优势一样。从1949年12月开始到1950年2月结束的毛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三年中这是新的同盟的有力纽带。

除了这些国际条件，别的因素当然也起部分作用。两党之间的关系尚未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受到考验。（就同南斯拉夫的情况一样，战争期间产生的分歧本身并未导致苏南关系的破裂；而是在新的南斯拉夫国家诞生以后，因为实践证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方法与南斯拉夫主权不相容，两国关系才变得敌对起来。）毛也许会这样想，对待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亿人口和刚刚显示了自己的战斗力的数百万军队的国家，斯大林会比对待东欧那些小国更加慎重。

此外，中国在经历了二十五年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之后，经济已完全崩溃。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对他们的迫切需要是会给予援助的。他们面临大量没有想到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各个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作用、以及对新政权的性质提出了全面的看法，但建立这样一个政权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认为它已经在苏联建国的榜样和经验中找到了解决办法。毛

在胜利前夕谈到这些问题时说：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sup>〔36〕</sup>

这个讲话是一种真诚的信念呢，还是着眼于新阶段而作的一篇外交声明？毛始终以极其巧妙的手腕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冲突。在反对中共党内主张无条件接受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与观点的人和倾向的同时，又承认并公开赞扬苏联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sup>〔37〕</sup>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对苏联的内部问题或斯大林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策，作过哪怕是最轻的批评。（根据现有关于他的生平的材料来看，毛对这些问题的消息是不灵通的，正如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的问题消息不灵通一样。）

在1949年前后表现出来的毛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的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基础，比现在某些热心捍卫毛主义的独创性的人所能承认的，要广得多。分歧的主要方面是关于革命战争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在破坏阶段的战略、方式和方法问题，而到必需着手处理建设阶段的问题时，这些分歧自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发展，这些分歧就具有国际范围的重要性了。

尽管如此，朝鲜战争和中国的内部问题，使斯大林的正统与毛关于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的理论之间存在的分歧，一度处于第二位。对于国内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毛的指示向苏联党学习。当经验——正如1925至1927年间在革命策略方面发生的情形一样——告诉学生：他们的老师在帮助他们从事新政权的

建设方面同样不能胜任时，他们就不再向苏联学习了。

如果说在1949年，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促使毛尽可能地与斯大林达成了谅解，那末，斯大林也必须记住，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外，还有同南斯拉夫的争端。根据许多理由可以推测，斯大林完全有理由避免与中共发生同样的争吵，中国党的伟大胜利，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中享有巨大威望。实际上，斯大林是想要利用这种威望。共产党情报局和各国共产党的宣传，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他的观点、战略、忠告和指导的结果。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每一个阶段，斯大林都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给他们指出问题，帮他们纠正错误，指出应当避免的危险和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949年时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经过1927年的大镇压，已无法参加革命斗争。中共党内的工人比例在1949年时不到百分之三，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出身于知识分子。<sup>〔38〕</sup>根据共产党情报局的说法，无产阶级已经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了。斯大林创造了奇迹。）这篇文章接着还说：

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特点所作的分析就是中共据以制订其计划、战略和战术的根据……斯大林科学地预见到了国民党在1927年的背叛……斯大林根据中国情况发展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加强中国党的影响，也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忠告……斯大林保护了中国革命，使之免受托洛茨基主义之害……中共正因为学习和吸收了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革命和革命战争走向胜利。<sup>〔39〕</sup>

这样一些说法对中国领导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但暂时他们却似乎没有受到干扰。在这个时期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无数极其粗暴的侮辱，而且是以若无其事的态度忍受了那些侮辱。我们对于直到斯大林逝世时的中苏关系问题先不作详细的分析，这里要提到的是，1950年条约附件规定，满洲铁路归还中国政府的时间将推迟

到1952年，除非苏日和约在这期间签订。苏军撤出在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也推迟到同一日期，大连问题被搁在一边，要到签订和约以后再行研究。中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就是让它继续处于苏联控制之下。<sup>〔40〕</sup>中国人在新疆被迫同意建立两个曾被南斯拉夫夫人所拒绝的那种合营公司。1954年，毛要求把这些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立即全部转交给中国。<sup>〔41〕</sup>

关于经济贷款，中国领导人曾计算需要20亿至30亿美元。他们从莫斯科得到了为期五年每年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这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比苏联政府在不久前借给波兰的还少一些。<sup>〔42〕</sup>至于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则发生了象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工资要比他们的中国同事高得多。在人民的经济水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的简朴风气这样一种特定情况下，不难想象这种形势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影响。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是和官方宣传的关于“中苏友好”的陈词滥调相矛盾的。但是，在1956年秋发生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前，中国对这种田园诗般的美景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怀疑的话。1956年12月，毛说：

斯大林……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sup>〔43〕</sup>

但是对斯大林（以及统治着苏联的官厅）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特别是1949—1953年这一段所作的干涉，毛主义者在当时或以后都未作出客观的、以文件为根据的历史分析。能对此作出解释的理由也许是，这样一分析，就得对毛本人的活动的某些方面作批判性的研究，可是在继续坚持对他个人和他的思想的崇拜的条件下，要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老实说，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对目前与苏联党的争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sup>〔44〕</sup>

在中国的条件下，要在政治上统一国家并建成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比1917年时的俄国规模更大的官厅化过程。毫无疑问，引进苏

联的模式就只会党、国家、经济和思想各个方面促进和加速这个过程。鉴于中国问题极端复杂，要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客观上就要求开展有广大群众和知识界的积极分子参加的、经常性的自由的讨论和研究，甚至可以批判苏联过去的做法。可是中国党并没有这样做，却教条主义地把苏联的模式当作唯一可能采用的模式而采用了。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对斯大林的服从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期间积累的大量经验及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训，无法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的财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同中国人有传统联系的越共和东南亚的一些共产党团体就并非如此。但总的来说，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以苏联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的。这种观点提出的一般说法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设计师，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无非是运用他的思想和指示。一切都包括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了，如：对中国现实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关于革命的过程，以及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和策略，等等。中国在这些年中的经验，与其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倒不如说有利于加强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并颂扬它的创始人。中共所取得的胜利还被当作是对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安慰，并一度掩盖了欧洲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后果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天的无能。另外，炫耀“中苏友好”和称颂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对共产党情报局关于苏南争端说法，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支持。这等于是说与毛的关系当然不成问题，因为他是一个毫不动摇地忠于苏联的国际主义者，而是否忠于苏联又是检验是否忠于国际主义的试金石。他不象铁托那个犹太。这证明争端中的过错不在斯大林。共产党员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尽管如此，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中共服从莫斯科，远不如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服从得那样绝对。斯大林在对毛的做法上比较慎重，因为毛有实力作后盾，这种实力是靠红军当权的东欧

共产党领导人所沒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以后，中国“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这无论是对克里姆林宫还是西方各国政府，都强有力地表明，共产主义的中国已躋于世界强国之列了。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的继承者们认识到，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望这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有必要作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他们又想利用这点在这个大独裁者之死所造成的微妙形势下加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他们大量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提高了中国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第一次授予毛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称号。<sup>〔45〕</sup>

但种种事件很快就表明，莫斯科只承认北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位很不错的老二，——即使如此，也还要以北京甘当莫斯科的应声虫、在任何方面都对苏联正统深信不疑为条件。门徒们在一定程度上再次经历了老师于1945—47年间对铁托施展过的手腕，其后果也相似，只不过是中國规模的罢了。俄国人由于坚持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激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就象它以前激起了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一样。“中国的铁托主义”的恶梦终于成为惊人的现实。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到以后再讨论。

中国革命是继1917年开始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威武雄壮的第三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遭受的第一个重大的失败。它及时地推动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鼓舞下，这一斗争在目前尚未结束的这段时期内，接替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而担任了革命行动的主角。但是有人说，在中国革命以后，世界革命的过程将是“世界农村”（不发达地区）包围“世界城市”（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这种说法无非是把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毫无道理地普遍化，也是把上面提到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加以引申来推测未来，说在革命行动中，“东方”已取代“西方”充当了主角。沒有根据预言这是领导地位的最后一次改变。相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有些不明显的迹象表明，西方无产阶级——一种与马克思

和列宁所熟悉的无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既从事体力劳动也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又可能在历史舞台上起主要作用。也不要忘记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是“新的”）也必然会起自己的作用。世界革命的进程还会发生许多意料不到的事和多次的人事变动。

##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1188页。

〔2〕按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新民主主义”是国民党政权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中间阶段，这个阶段尽管还存在私人资本主义成份，但不能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956年9月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辑，北京，1956年，第19页）。

〔3〕紧接着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以后，苏联向日本的宣战以及对满洲的日军发动进攻，必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尽管如此，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胜利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一个约束，但另一方面，斯大林想利用从这些胜利中得到的实力和威望迫使中共向国民党投降，以便为他与美国达成一揽子协议铺平道路。

〔4〕根据吉耶尔马著《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49年）》，伦敦梅休因公司，1972年，第305页所说，苏联派了由切尔巴切夫将军率领的300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其中包括苏联伊5和伊16飞机及飞行员。

〔5〕引文见安德烈·方丹著《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1917—1950年》，第369页。

〔6〕王明在毛取代他的地位以前，实际上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被毛取代后，回到莫斯科，直到1938年初才离莫斯科去延安。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毛的政策，提出应向国民党作更大的让步，党的军队应全部并入国民党军队中去，并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等等。

他认为只有国民党有能力领导抗日战争。换句话说，他的政治立场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和抵抗运动时期的欧洲的那些共产党——南斯拉夫除外——很相似：在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见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9—51页。又见前引吉耶尔马所著书，第204页，第366—367页，注〔3〕。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刊物《共产党人》在当前中苏争论最激烈时证实，王明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由于捍卫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观点而受到攻击。（见1968年6月号文章《中共党史中的若干问题》）

〔7〕毛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关于这一时期的问题时说：“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2页。）

〔8〕现有的中共文件中没有提到关于苏联在这一时期或抗日战争后期的军事援助问题。毫无疑问，如果有过这种援助的话，苏联人在注释〔6〕中提到的《共产党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就一定会用来作为援助的例证。

〔9〕《共产党人》1968年6月号第93—108页。

〔10〕吉耶尔马的这一说法（见注〔4〕所引书，第330页），有非常详细的文件作根据，与中共官方的提法是一致的。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1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建立的军事组织，其体制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它包括以师、团、连队为基础建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享有很大的作战主动权，不限制在某一特定地区。还有地方武装，它只在日占区的一个特定地区活动。还有民兵这种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它们配备的一般都是很原始的武器装备，都以地方为基地。中共七大（1945年春天）时，正式的人民军队的总人数为91万人，民兵222万人。那时解放区的总人口为9500万人。毛一直在那里建立指挥部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是日占区以外的地方，它只是解放区的一小部分。最大部分的解放区，建立在从名义上说是为侵略者或国民党政权所控制的各省之内。

〔12〕见前引胡乔木所著书，第47页。

〔13〕为了补充注〔8〕所说的情况，还可以指出，毛在讲话和文章中曾多次强调没有受过外援。例如，在其选集第4卷中，特别是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同上，第1070页）说：“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自己



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的伪军”。

（“伪军”是指中国的那些“卖国贼”。）

〔14〕见美国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1949年，第73页。

〔15〕见注〔5〕所引方丹书，第375页。（霍普金斯是杜鲁门的外交事务首席顾问）。

〔16〕见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40页。

〔17〕见注〔5〕所引方丹书，第375页。

〔18〕1945年8月10日，人民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放下武器。几乎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对这一号召置若罔闻，它们只服从“盟军最高统帅部”——英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命令指示他们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在交接权力期间，要负责维持秩序。结果，日本军事装备大部分都由蒋介石的军队收缴去了。此外，美国人还送了足够装备39个师的最新式的武器。这个资料引自注〔4〕所引吉耶尔马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一书，第378页，他还说，以前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曾拥有如此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据粗略估计，1945年底，蒋介石拥有199个师。另外，他还有500架飞机。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从未有过任何作战飞机。

关于苏联人从满洲运走的工业设备，据美国一个委员会的估计，未拆迁时价值为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重新安装需花费二十亿美元。吉耶尔马说，苏联的行动“说明俄国人想把经济合作强加于未来占有这个地区的当局，这一地区对西伯利亚的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第379页）

关于苏联人本来可以移交给人民军队或者可让人民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城市的问题，吉耶尔马指出，“要是共产党占领了这些地区的大城市——只就华北来说，就有北京、天津、青岛、太原和张家口——那就会给他们一张好牌，有利于他们反对政府，并会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骚乱”。（第376页）但是中苏协定“明确承认……南京政府对满洲的主权”。（第379页）吉耶尔马还说，“俄国人原来打算在1945年10月至11月从满洲撤走，使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放手行动，但国民党政府尚未部署好重新全部占领这个地区的计划，请求苏军缓撤，苏联人同意推迟到次年四月撤退。”（第380页）换句话说，在蒋介石部队乘美国船只和飞机到达以前，苏联军队保护了满洲的城市，使

之不落入中共之手。

〔19〕德迪耶尔引用的话，见前引《铁托谈话录》一书，第331页。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开会时，借口起义必遭失败，想迫使南斯拉夫停止援助希腊的起义。实质上他的路线就是，“我可以承认我在中国问题上有错误，所以你们也应当承认你们在希腊问题上有错误。”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斯大林想暗示——也希望美国人能了解——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政策毫无关系。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00页。

〔21〕引自《工人世界》1946年1月号，它重复了苏联报纸上的观点。当然，应该以“三巨头”所共同商量的这个目标作为背景情况，去看马歇尔的赴华使命。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自然有其不同的目的，但它们都赞成“全国统一”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虽然仍会使它们因扩大各自的影响而斗争，但不致发生内战，引起国际纠纷。

〔22〕引文见前引方丹所著书，第38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0页。斯科比将军是1944年击溃希腊抵抗运动的英国远征军司令。

〔24〕同上，第3卷第1021页。

〔25〕同上，第3卷第1051页。

〔26〕同上，第4卷第1103、1105页。毛在向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共在日本投降前夕的政策作了阐述。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解释为要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这个政府包括支持党所制订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各党各派。这个纲领规定齐头并进地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措施（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进行的土地改革等）与毛称之为“社会主义成份”的其他措施，即在经济中建立国有成份（主要靠把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收归国有）以及合作社成份。这些措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纲领规定，国家应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换言之，实际上这是说，国家应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这样一种联合政府和纲领，国民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即使该党党内确实有一些可能支持这种思想的进步分子。

在日本投降后开始的谈判过程中，毛作了一些让步，最重要的让步是规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中尽管中共有很多代表参加，但比起国民党来是少数。实际上，这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让步。毛在关于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

以及解放区革命政权的领导等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国民党领导人当然无法接受。这就是造成破裂必不可免的原因。

〔27〕见以上第五章注〔174〕以及有关正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材料，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干涉。

〔28〕见以上第五章注〔172〕。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了学生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这一事件为反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政治思想运动定了名，这个运动延续了很多年，在示威以后就有了更为激进的特征和更广泛的基础。

〔30〕这里的几段引文见刘少奇所著《论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4—29页。

〔31〕引自E·朱可夫所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与殖民地斗争问题”一文，载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49年第9期，摘录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第265—267页。

〔32〕见1949年莫斯科出版的《殖民体系的危机》一书中格·弗·阿斯塔费耶夫文章“从半殖民地到人民民主国家”。摘录见前引《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第267—269页。

〔33〕《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5页。

〔34〕例如，见罗伯特·吉扬1949年12月20日—28日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组总题为“红旗下的中国”的文章。

〔35〕马里于斯·马尼安，《共产主义手册》，1950年3月，第57页。

〔36〕“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

〔37〕在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与斯大林的政策分歧对苏联的利益没有太严重的影响，这一情况有助于毛施展其策略技巧。日本投降以后，如果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中雅尔塔精神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的分歧就可能成为敌对性质的。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毛与斯大林之间的尖锐分歧因而有所缓和。

〔38〕这一材料引自苏共高级党校所用教材：《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3卷第250页。

[39] 引自注 [35] 中提到的文章《斯大林的政策在中国的胜利》。

[40]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 (1917—1967)》，莫斯科，1967年，第131—134页。承认外蒙的“独立”，是由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互换照会记录在案的。

[41] F·费伊托《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巴黎普隆书店，1964年，第93页，从S·比亚勒所写《我选择真理》一文（载《东欧》，1956年7月）中引了下面一段话：“在1955年7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当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时，米高扬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这位老外交部长的观点。当时他引了毛泽东于1954年北京会谈（赫鲁晓夫、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期间所说的话；毛严厉批评合营公司，称它们是‘苏联干涉中国经济生活的一种形式’。米高扬谈到，当他听说在国外的苏联专家的傲慢行为时感到羞耻”。

[42]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35—136页。同给波兰的贷款所作的比较，见前引《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一书第73页。

[43]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44] 在林彪向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以及文化革命的其他许多材料中，都把刘少奇作为斯大林罪过的替罪羊，不仅是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6—1949年）时期，而且在夺得政权到斯大林逝世这段时期都是如此。不管这些被说成是刘少奇的政治立场的东西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除非刘少奇能有公开为他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些材料都是无法接受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政治立场与斯大林在这几个时期强加于中共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点是合适的，即在林彪的报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的指责，说他是敌人的代理人，工人阶级的内奸，以及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指责，在各方面都很相似。

[45] 前引《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一书第88—89页。

## 第九章 新的世界均势

### “和平战士”

在第六章分析日丹诺夫的报告时已讲得很清楚，斯大林在1947年强加于西方共产党的新“总路线”，并没有改正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推行他以前的机会主义。它使那些共产党修改它们的政策，以适应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扩张主义作出的反应。社会主义的目标再次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从前，为了组成反对希特勒的大同盟，它们被推入一个阵营；现在，为了克里姆林宫正在企图建立的反美战线，它们又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克里姆林宫企图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把一个全世界的布局规划强加给白宫，以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

这个新路线的基本策略思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扩张主义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用日丹诺夫的话说，就是团结“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力量”，动员所有“和平的支持者”，来对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新路线的主要目标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使美国领导人清醒过来，并迫使他们回到雅尔塔的政策上来。这将使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得以恢复1947年前所奉行的民族团结的政策，通过和平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前面已论述过的原因，在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方面成效不大，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前是如此。除了共产党和少数知识分子以外，很少有人响应“保卫民族尊严和独立”这一口号。“维护和平的斗争”是新路线唯一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部分，但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宣传而已。柏林危机（1948年6月—1949年5月）是“冷战”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第一件。它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明显地增加了。1949年4月，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条约，接着在当年9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向其盟国提供价值15亿美元的军火的提案。

9月25日，塔斯社的公报证实了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几天之前杜鲁门第一个宣布了此事——并透露苏联从1947年就已拥有原子弹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49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认为，鉴于苏联面临帝国主义“直接侵略”的危险，“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位于其他一切任务之上。

仅次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任务的，是进行反对南斯拉夫的“冷战”。这两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认为，铁托主义是美国侵苏准备的主要基础之一。

“和平运动”的组织工作开始于1948年。当年8月，“世界知识分子争取和平代表大会”在波兰举行。11月，举行了法国“保卫和平战士”全国代表大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许多国家又多次召开了同样性质的会议。1949年，从4月20日至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和平战士”世界代表大会，<sup>(1)</sup>72个国家出席了这次大会。据大会文件说，当时已有6亿有组织的“和平战士”了。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惊人的数字包括了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和平战士”。在这些国家里，只要是人，都有资格成为这支堂堂的和平新军的成员。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保卫和平战士”大致上仅仅是共产党员和他们控制下的一些群众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和文化组织）的成员。

科学文化界一些显要的非党人士的参加，和为了宣传而虚报的无法核实的数字，可能会给不知内情的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一运动已超出通常受共产党影响的政治和社会范围。实际上并非如此；共产党的领导层非常了解这一点。除个别例外，城镇、地区、工厂及其他地方的“和平委员会”，都是由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组成的。

“和平战士”的主要活动是为大量文件征集签名。这些文件向

舆论界以及政府、议会、联合国等机构呼吁：禁止核武器，进行全面裁军，反对北大西洋联盟和重新武装德国，以及支持苏联在外交上作出的一系列努力（在这方面行动的一致性，使人一看就清楚谁是这支管弦乐队的指挥）。签名是这些和平战士的主要武器。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常委会，决定发出禁止原子弹的呼吁，并为此征集签名。结果，共征集到79个国家的5亿人的签名。其中包括“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所有的成年人以及2亿2千3百万中国人的签名”。〔2〕也就是说，11个国家的4亿人口签了名，同他们在选举中对唯一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一样，迅速而一致的程度给人深刻的印象。另外69个国家\*有1亿人签名，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有3100万人（法国为1400万，意大利为1700万）。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签名人数则下降到了令人失望的程度：美国200万，西德200万，英国100万，等等。〔3〕即使这些签名全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很天真的假设——结果也并不引人注目。应该指出，正式公布的签名人数比“和平战士”的人数少1亿人。而据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说，这些“和平战士”不仅存在，而且是有组织的。尽管如此，这次签名运动还是被其发起者称为是一次“真正的普遍的公民投票。”〔4〕

就在“和平战士”们竭尽全力为斯德哥尔摩呼吁征集签名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一个对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其中除了关于禁止原子弹，全面裁军等口号外，又加上了停止朝鲜战争的呼吁。众所周知，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对朝鲜的干涉就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当时联合国处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并得到其他成员国部队的支持。但是，第二次“和平战士”世界代表大会依然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它“负起它崇高的责任来，为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

\* 原文如此。11个国家加上69个国家应为80个国家，但前面提到的是79个国家。——译者

益而维护与巩固持久的和平”。〔5〕与此同时，中国“志愿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到12月底，美军和这支远征军的其他部队已濒于全线崩溃的边缘。可是，在核讹诈面前，斯大林的目标——这一次中国和朝鲜也同意了——不是在朝鲜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是在*Status quo*（维持现状）即保持朝鲜分裂的基础上消除敌对状态。共产主义运动不论通过和平运动，还是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都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解决办法而施加压力而已。朝鲜停火的目的，是要加快实现斯大林所追求的国际协议。1951年2月，这个目标也指导着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上成立）的行动。当时，理事会发出呼吁，要求为“五大国”之间签订“和平协议”而征集签名，并组织了为支持这一建议所需的征集签名的运动。（这一建议不久即为苏联政府所接受。）多亏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成年人口”的增长，这次的签名总人数达到了6亿。

五年中间（1948—1952），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只能争取”的战斗口号下，各国与世界和平大会、和平会议，为和平而召开的各种会议和联欢会，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请愿书和决议，以及成亿的签名（每次都是这些人），不断接踵而来，要通过签名来赢得和平。这支征集签名的世界大军，在永远正确的和平舵手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画家比洛波尔斯基的一幅画把这位舵手在这次十字军远征中的历史作用永久地记录下来：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屹立着斯大林巨大的身軀，一手握笔，一手擎着斯德哥尔摩呼吁书，以此为人类指明通向巩固和持久和平的道路，即征集签名运动的道路。〔6〕

斯大林把“和平运动”的目的归结为下面一段话：

当前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为保持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斗争中来。因此，这一运动不追求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它把自己的行动仅限于民主主义的目标。在这一方面，当前的保卫和平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运动是不同的。那次运动是为了



设法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sup>〔7〕</sup>

各国党接受斯大林的路线，无条件地支持苏联的外交活动，实际上就专门从事典型的和平主义运动了。这一运动不仅排除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还排除了反帝的目标。例如拉丁美洲的主要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反对在和平运动中明确地讨论民族独立的问题。<sup>〔8〕</sup>在这方面，他们把苏斯洛夫制订的法规付诸实施了（日丹诺夫死后，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国际共运的组织工作）。苏斯洛夫在1949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说：“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斗争中须尽一切可能以保证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于目前的这一最高任务。”<sup>〔9〕</sup>

又如在法国党内，这种服从反映在1950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安全纲领”中。其中不仅没提出用社会主义代替现存制度，也没有把它做为一个长远的目标提出，而且连1947年以前一直都很明确的国有化计划和其他民主改革也被抛弃了。法共号召建立一个“和平统一战线”，以吸收“持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爱国人士”。<sup>〔10〕</sup>

在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宣称“和平问题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他说：

如果组成一个新政府，大幅度地改变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使意大利停止承担那些将必然导致战争的义务的话，那么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目前最强大的反对党——共产党——愿意在议会中和社会上放弃反对党的地位。

陶里亚蒂强调这种解决办法在国内将得到有利结果，他说“这将缓和不同的政治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紧张局面”，并使“民族团结”的政策有可能得到恢复。这位意共领袖说：“尽管政治形势改变了，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向全国提出的政策的基本内容依然是可行的。”与多列士不同，陶里亚蒂倒不回避社会主义的远景问题，

但他提到这一问题，仅仅是为了强调他建议走的那条道路“将会逐步地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因此，“意共提出对一个奉行和平政策的政府放弃反对党地位这一点，并不违背”党的社会主义目标。陶里亚蒂还说：

讲得更明确更具体一些，我认为，我们所设想的并同我国福利密切相连的、保卫和平而又改造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就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宪法。<sup>〔11〕</sup>

这就是说，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巨头”向工人运动提供的唯一政策，就是回到1944—1945年时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曾使欧洲资本主义得以恢复，并屈从于美国的垄断集团，共产党却因此而遭到孤立。

此外，欧洲共产党奉行的这一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战略，是极不现实的。鉴于各国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的深度是如此之深，他们当中根本不会有人理睬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的甜言蜜语。这些呼声到头来是没有人响应的。这种不现实的战略，起因于斯大林对这一阶段帝国主义之间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作的错误估计。实际上，欧洲资本主义——也包括改良主义政策——的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对美国的依赖联系在一起。而任何反对美国控制的有效斗争，必然是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和平主义的——它在客观上不可能是别的。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反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想法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戴高乐主义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在世界各地煽动反对美国政策的作法是苏联外交的需要，由于这一外交活动的目的，即互相承认势力范围，是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实行革命政策相抵触的，于是欧洲共产党唯一可行的政策只能是它们实际上执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式和方法上则是宗派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冒险主义的。这一点反映出这一政策缺乏现实性。

如上所述，和平运动已沦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派生的各种运动

的保护色。其他集团不可能真正加入这个运动。原因很简单：这个运动必须严格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每一个变动。在这个运动范围内，提出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目标都是同当时苏联的外交目标相抵触的，而社会主义取代现存制度似乎已不是“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唯一真正的基础了。另一方面，对铁托主义表示同情或保持中立，也是与“和平战士”的身份不相容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的审判，是证明确实存在帝国主义反苏阴谋的主要证据之一。真正的“和平战士”要象所有共产党人那样，必须相信这一点。社会民主党被“揭露”了——不是由于它们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而是由于它们与美国政策合作——，“揭露”时使用的语言使人们想起了揭露“社会法西斯主义”时所用的语言。

经济罢工被竭力涂上政治色彩。可是经济罢工不是根据本国状况制订的总的社会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而是围绕着全面裁军、禁止原子弹等口号进行的。

签名运动收效甚微，和平主义政策的作用又不大。这些情况使各国共产党有时走向另一极端，在基本政治条件不具备时进行街头暴力活动。法共组织的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访问巴黎的示威就是一例。示威的结果只是证明，法共是孤立的，工人并不响应这种抽象的反美运动。<sup>〔12〕</sup>另一方面，法共又不努力去组织任何规模的反对法国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的群众运动。

存在着侵略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一条是苏联领导人为他们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进行辩解的主要理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也是由此而来，因为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冲突，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苏斯洛夫在向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做的报告中就是这么说的：“北大西洋集团计划要对东欧民主国家，首先是对苏联，进行公然的侵略”。<sup>〔13〕</sup>他讲话的整个基调，暗示这一危险已迫在眉睫。按苏斯洛夫的说法，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准备”。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又着重渲染了这一耸人听闻的论调。多列士在1950年4月举行的法共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上说：“和平前途已危在旦夕了。”

但是，苏斯洛夫在这次讲话中对各种力量对比所作的分析，恰恰没有证明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是正确的。如果苏斯洛夫的分析是可信的话，那么当时“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是最糟糕不过了。他说：

“在美国和欧洲，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正在形成。”每个人，“甚至是马歇尔计划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吹鼓手”也不得不承认马歇尔计划失败了。“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苏联正式公布从1947年就掌握了原子弹一事，“在帝国主义阵营和战争贩子中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惊慌”，并且“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是美、英两国之间的对抗”，越来越尖锐了。“华尔街和伦敦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冒险外交政策”，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核外交的垮台，马歇尔计划的失败，帝国主义在东南欧和中欧颠覆阴谋的破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崩溃”，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失败的一小部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蓬勃发展。“苏联经济正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稳步发展”，苏联农业也在“稳步前进”。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中，正在取得“重大胜利”；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取得“巨大胜利”。（苏斯洛夫这里提到的中国人民胜利的重大意义，是他报告中少有的客观事实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一大胜利，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又一失败”。“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到处都在发展，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有组织的和平战士达六亿人”，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了正义阵营的增强和邪恶阵营的削弱。所以，结论就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和平阵营，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并将继续向这一方向改变。”

苏斯洛夫只字未提力量对比的另一个因素。这一因素比他所提到的那些因素具有更直接的作用，也更现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苏

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用不着军事专家，一般人就都知道，如果战争爆发，斯大林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直捣西欧。1949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前几星期），多列士在回答一位“同志”的很适时的问题时，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那位“同志”问：“如果苏军占领了巴黎，法共将怎么办？”多列士回答的大意是，法国工人将热烈欢迎他们。几天之后，有人问陶里亚蒂涉及意大利的类似问题，他的回答和多列士的一样。<sup>〔14〕</sup>

当然，这段不寻常的插曲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主要不是在于那些回答，而是在于问题本身，它如此肯定地谈到了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出现的局面。（从1951年到1952年，西方报刊发表了在“苏联进攻”时北约组织指挥部计划的详情。所有的计划都预计到北约会很快丢失法国。<sup>〔15〕</sup>1955年，赫鲁晓夫向美国记者透露，1950年苏联就已取得了对西方的优势。）<sup>〔16〕</sup>

苏斯洛夫对形势的这一根本方面只字不提。即使如此，他对力量对比所作的分析仍不能不使人怀疑美国及其盟友究竟可不可能向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直接侵略”。为消除这一怀疑，苏斯洛夫提出下述论点：

从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断削弱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战争危险正在消失的结论。这一结论是根本错误的，是十分有害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地位越削弱，它们就越疯狂，它们进行军事冒险的危险也就越大。

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使得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阵营会又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sup>〔17〕</sup>

“历史的经验”虽然极为丰富，这次却难以借鉴。历史上苏联遭受的两次直接侵略，并不能证明苏斯洛夫的论点，而正好相反。1918年，属于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处于绝境，而1941年纳粹帝国主义则是在征服了全欧洲并认为他们已是天下无敌时，才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继承了足够的历史

“经验”，因而“歇斯底里”不致成为他们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必须想个办法来证明存在着帝国主义阵营“直接侵略”苏联的严重威胁。根据克里姆林宫理论家的说法，这个阵营已陷于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之中，其政策不断遭到失败。此外，他们失去了核垄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且在常规武器方面明显落后。在这些国家还有公众舆论。至少人们对上次大战记忆犹新，绝不愿意又被拖入一场世界性大屠杀。

## “冷战”中的僵持

美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真正计划，并不是向苏联这一引人注目的军事强国发动冒险的进攻，而是把它的统治扩展到整个“自由世界”，巩固西欧，尤其是德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使它在经济、政治及军事上依赖美国。美国在地中海地区也采取类似的行动，加紧对拉丁美洲的剥削，向其盟国的殖民地渗透并遏制在苏联境外的革命运动。换句话说，美国想充当国际警察和剥削者。

具体地说，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日丹诺夫所谓的“帝国主义阵营”。当然，与此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削弱敌对“阵营”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在其卫星国实行的政策，帮了中央情报局的大忙。）但是，华盛顿的全球战略与莫斯科的一样，也包括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妥协。

归根到底，问题在于：如果双方对力量对比不能得出一个现实的因而也是相近的估计的话，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原子弹的问世带来了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上的革命，而且还因为世界各地在政治上发生了大动荡。“冷战”实际上是为了更准确地摸清敌方力量及其部署情况而进行的试探。在美国，要求把原子弹投到苏联神经中枢去的鲁莽将军和政客是有人在的，但这并不是官方的政策。制订和执行官方政策的人，清楚地了解苏联、中国及欧洲人民民主国

家所拥有的雄厚军事力量。据他们看来，原子弹是一种“遏制”工具，不仅可以用来防止苏联领导人对西方的地盘发动直接进攻（每个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理论和实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主要的是用来阻止他们把共产主义运动——苏联领导人是这一运动的真正控制者——引向革命的方向，使他们无法鼓动和援助各地的革命运动。希腊就是原子弹发挥其“遏制”作用的最明显、最臭名昭著的例证。当然它不是唯一的例证。

更广泛地说，“维护和平斗争”的整个政策，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于维护和平这一中心任务的政策，是受核讹诈支配的。同样，美国的全部政策是受一种需要，即不惜任何代价以防止与苏联集团的军事力量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需要所支配的。

“冷战”中最严重的两次“试探”是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这两次“试探”给全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世界又一次濒临大冲突的边缘。事实上，这两次事件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坚决要保住各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争得的地盘，无意通过反对对方的战争来改变这种局面。美国采取了一些步骤，想把西德并入大西洋公约这一政治、军事集团，斯大林便对西柏林进行封锁作为回敬。格雷将军建议用军队护送运输车队，开出一条通道来，但华盛顿决定不采取任何可能挑起新战争的措施。美国仅把自己的活动限于用著名的空运向柏林提供食品。苏联当局对此未采取任何阻挠措施。开始，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向西柏林提供食品不可能持久。可是几个月后，当他们看出这个办法的成效时，他们就愿意坐下来谈判了。封锁于1949年5月结束。<sup>〔18〕</sup>这次对“欧洲战线”力量对比进行的“试探”以僵局而告终。

“冷战”中的第二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大冲突是朝鲜战争。至今也不能肯定战争是谁挑起的。<sup>〔19〕</sup>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已撤出朝鲜一年多，只留下了顾问和指导小组。但是情况很清楚，华盛顿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李承晚反动政权，而莫斯科在北方的革命

政权中有最终的发言权。如果战争真是北方发动的——现有材料证明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这一决定从民族和革命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有道理的。人民军闪电般神速地打到了半岛的最南端，也暴露了美国支持的政府的软弱无能。即使假定在分界线上的第一个挑衅行动是南方干的，北方的迅速和大规模的反击，以及它所开展的攻势，也都清楚地证明，用武力解放南方的决定早已做出，而且，为此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没有莫斯科的同意与合作，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说明相反情况的确切材料，最可能的假设是，斯大林利用朝鲜革命力量要统一国家的合法要求，来试探美国在远东的力量和意图。很可能他想试探一下，美国官方所作的不把南朝鲜划入其“防御范围”这一声明是否真实。<sup>〔20〕</sup>

但是，当华盛顿决定干涉并使联合国也站在南朝鲜一边时，克里姆林宫马上采取了谨慎的立场。苏联人对主要被美国军舰和飞机击败的北方军队，甚至未提供空中援助。几乎可以肯定，毛的政府是与莫斯科进行了磋商之后，才发表声明：只要麦克阿瑟的军队不跨过“三八”线，它是不会进行干涉的。这等于提议用恢复*Status quo*（原状）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但这时轮到华盛顿决定来试探苏联的力量和意图了。它强迫联合国表决同意继续向朝中边界发动攻势。中国“志愿军”的干预再次把战事推向“三八”线以南，使虚张声势的麦克阿瑟的军队处于灾难的边缘。麦克阿瑟建议向满洲投原子弹，而苏联声明，如果美国那样干，苏军将进行干预。华盛顿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尽管他在美国人心目中是太平洋战争的英雄。莫斯科则连空军支援也没向中国步兵提供；因为中国有了空军支援就可以把帝国主义军队赶到大海里去。帝国主义的军队就这样得以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了“三八”线。

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好几年后才签订了停战协定。在那段时间里，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想打赢的这场奇怪的战争，一直在继续进行。总而言之，两个集团在“亚洲战线”对力量对比进行的试探和在“欧洲战线”一样，以僵持而告终。它的代价



极高，伤亡几达二百万人，其中约一百万朝鲜人，一百万中国人。

在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这段时间里，两个超级大国对对方的实力和意图，以及对已经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新的力量均势，有了清楚的了解。首先存在着军事上的均势。美国人明白，氢弹的发展虽增强了他们的“遏制”力量，但他们已失去原子弹的垄断地位，而且苏联人显然很快也会拥有氢弹。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了国际舞台，大大加强了苏联集团在常规军队方面的优势。再就是存在政治上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视为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是保险的。两个欧洲，两个德国，没有迫在眉睫的革命危险威胁欧洲资本主义。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失败”，欧洲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苏联控制的卫星国里，所有反苏力量似乎都已被粉碎。反对南斯拉夫的“冷战”已告失败，莫斯科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外别无他策。殖民地世界正处于变乱蜂起之中，但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还没有形成直接的对抗。

谈判的时刻到了。1952年，斯大林宣布战争的危險已经减弱，各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见将会是有益的。<sup>〔21〕</sup>9月份他又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要大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因此战争更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爆发。<sup>〔22〕</sup>12月，他对和美国新政府进行对话这一主张表示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刚当选为总统）。<sup>〔23〕</sup>“冷战”正在被“和平共处”所代替。斯大林之死和美国总统的更换，加快了它的步伐。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于此。然而不能否认，斯大林的去世给苏联领导人带来的严重问题，对苏联在1953年后改变其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这种改变，按历来做法，又导致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作出类似的变化。

## 对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评价

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

受到批评。跟往常一样，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展开活跃的讨论。但是在党的文件上，在领导人讲话和历史性评论中，开始出现批评。从一本权威的苏联著作中引述的下面这段话，可以概括这一批评：

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中很快就出现了消极的倾向。在斯大林对和平、战争与革命，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等问题所持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下，一些党坚持僵化的战略，在领导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领导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时地犯错误。武断专横的政策和与之相连的个人崇拜，违背了在共产党之间关系上的马列主义原则，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害。它阻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从而使共产党脱离了工人群众。<sup>〔24〕</sup>

虽然这一段批评所表明理论和政治观点远不及本书所作的分析，<sup>〔25〕</sup>但公开说明这一点本身就已经表明，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使大多数共产党受到影响的那种倒退程度了。

1947年后，本书第一章论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发展，除了个别例外，已变成普遍衰落。主要的例外，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另外一个例外是越南共产党的民族革命战争。越共除了得到中共的帮助外，没有其他直接的帮助。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只有意大利共产党能够维持其党员数量和影响。除了这三个例子外，要在这一时期找到一个没有衰落的共产党是很困难的。西方共产主义的另一大党失去了将近一半党员。在卫星国掌权的共产党经过这段时期之后大大削弱了，1956年的危机即将证明这一点。就是苏联也受到了影响。

战后，人们内心对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因而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冷漠态度。即使在中国，党在胜利后几年中的发展，与胜利前相比，也显著减慢了。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败是明摆着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现象却被官厅专政的国家，和对真实发展情况不作报道的欺骗宣传所掩盖着，这种

情况一直继续到二十大。

工业化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真正进展，掩盖了日益增长的矛盾和问题。总之，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全面的世界范围的衰落。今天回头看，才能看清楚这一衰落的真正意义。它并不是一时的危机现象，而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衰落的开端。根本的原因可以从这个党的历史中找到，但在这一时期——如同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一样——却有其特殊的形式。

在政治上，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阵营”外部所受的挫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新的妄想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指挥下的反动势力的攻势造成的。实际上，这一攻势之所以可能，并在各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最终都可以用各国党前一阶段实行的向英美联盟和“反法西斯”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来加以解释。这个政策使群众在战胜法西斯的群众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热情减弱了，从内部破坏了共产党还保存着的革命活动能力。迷信选举和议会，幻想“大同盟”永世长存，换句话说，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走进行阶级合作的道路，解除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武装，使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年代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成员失去了斗志。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进攻（1944年、1945年至1947年是隐蔽的，之后则为公开的）极少进行反抗，而把活动仅限于日常的经济斗争。

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里，在这方面比社会民主党更能起主要作用的，只有法共和意共两个党。因而它们还能设法保持其在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影响；尽管前面谈到过，法共失去了很多党员。这两个党表明自己已不是革命的政党了，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表明自己在工人阶级为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是有用的。

在所有其它“先进国家”里，共产党与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的工会相比，又成了没有力量的、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了。即使在西德，改组过的共产党也不过是其遥远的过去的一个影子。<sup>〔26〕</sup>在美国，共产党在白劳德被开除后（为数众多的激进派离

开了共产党)，人数减少到最低点，在绝大多数工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成了麦卡锡主义镇压的牺牲品。在西班牙，人民遭受了1939年的惨败，再加上失败之后的恐怖镇压，以及受到“民主国家”又一次“背叛的打击”，已灰心丧气，致使共产党无法在他们中间找到很多支持和追随者，从而不得不结束游击战争。希腊共产党的悲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赘述了。

1947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寡头政府签订了里约热内卢条约，在拉丁美洲展开了反共总攻势。受“大同盟”政策影响的大多数共产党（其中特别是受白劳德路线影响的几个党），实际上在前几年就已放弃了一切反帝斗争；现在被迫转入地下，无力组织有效的反抗。几乎所有的党都经历了使它们在政治上更加虚弱的内部危机。<sup>〔27〕</sup>在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产党受到中国经验的影响，但还未能转为己用。它们在沒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进行武装斗争。此外，在前一段时期执行的追随本国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得它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武装斗争被打垮，他们只得撤到边远地区长期去坚持游击战争了。印度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被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大大削弱了。前一时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党变成了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几个左派宗派主义集团则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别，也没有从中国的经验中看到农民群众的革命潜力。<sup>〔28〕</sup>日本共产党也同样被内部的争斗所削弱，而且还成了美国占领军在朝鲜战争时所采取的镇压措施的牺牲品。

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共产党内部组织的特点是官厅集权主义的增长和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在反对铁托主义名义下进行的第二次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第一次是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标准的作法是进行党内清洗。除了党的基层组织，所有的党的领导机构也都发生过危机。党内的政治活动，与过去相比，更成为一套例行公事，致使党在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时吸收的新思想被窒息了。这个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化”的指

导方针和第一次一模一样——迫使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而成为铁板一块。正如南斯拉夫异端所表明的，这个一致在当时受到了由于战争和第三国际的解散而日益增长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共产党情报局起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作用。

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所用的手段，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现象发展的程度，无疑表明了抛弃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一种信仰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情况已到了极点。但是，这与个人崇拜实际上所起的遏制离心倾向的作用也有关系。与此同时，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搞个人崇拜，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它保证了各国共产党能磐石般地团结在一个忠于斯大林的领导人周围。但它又隐约地表现了——有时是无意地，有时又不是完全无意地——民族和民族主义对崇拜苏联作出的反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体现了对莫斯科领导权的根深蒂固的崇拜。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遭到谴责后，这种对莫斯科领导权的崇拜却继续了下来，戏剧性人物尼基塔就是这种崇拜的化身。）

在本书293页引述的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作出的批评中，承认了“武断专横的政策……阻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就情报局时期典型的毫无“创造性发展”的情况来说，这里用“阻碍”一词，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在这方面，倒也不能说情况越来越糟，只是原来的局面丝毫未变。但是这种局面所造成的后果，却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在这一时期，战争使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现象还在继续发展，而且出现了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诸如：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受殖民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反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的斗争等问题，但却抱着过去的教条和陈词滥调不放。不作调查研究，不认真讨论，也没有新的思想，至多不过是把原来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货色稍加打

扮，使之重新出笼。在党组织内部不许任何人提出哪怕是最温和的改革建议。即便侥幸出现一个建议（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二十年统一思想的结果，共产党员的思想僵化了），它也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只有那位伟大的理论家，才被认为有能力——也有权力——提出新思想。（东欧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由于稍稍触犯了这一戒律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50年，那位伟大的理论家，成了语言学的权威，同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1952年，他又着手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作了诊断。

斯大林最后这些理论著作在理论上言之无物，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对此浪费笔墨。只须指出一点：斯大林在新形势下运用的世界革命模式，是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从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成这一前提出发，斯大林认为，即使世界其他地区（“社会主义阵营”以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在苏联一国范围内也完全可以建成共产主义。<sup>〔29〕</sup>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斯大林认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sup>〔30〕</sup>对苏贸易就会满足它们的所有需要。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正在迅速走向坟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想用‘马歇尔计划’，侵略战争，军备竞赛，工业军事化来解脱这些困难情况。但这很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斯大林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将逐步扩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是扩大而会缩小。……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这将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战争，而战争却越来越不容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

之间爆发了。

在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发展，和在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中的资本主义的日益衰退，最终将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因此，为了保证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列强——象苏斯洛夫说的那样，在其日趋虚弱的情况下忽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从而阻止其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因此，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持“稳定和持久”的和平，而为达到这一目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必须有“稳定和持久”的妥协。

按这样的逻辑推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应当降到次要位置，尤其是要服从于不危害世界和平这一崇高任务。最主要的是各国共产党要团结所有和平的支持者，建立一道反对美国对苏联的任何战争企图的防线，并团结所有主张民族独立的人，以加深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要去宣传那些不能为资产阶级中的爱国阶层、民主阶层及和平人士所接受的国内的社会、政治目标，从而实现这两项任务便不致发生困难。斯大林在对共产党提出他的最后建议时（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的发言），不提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进行斗争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他对与会的西欧共产党领导人说：“如果你想成为爱国者和你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就必须高举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与和平的旗帜。”〔31〕社会主义的旗帜则被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

## 注 释

〔1〕这次代表大会分两处进行。由于法国当局不给签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在布拉格举行会议，其他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

〔2〕《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3卷第456页。

〔3〕《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13卷第458页。

〔4〕同上,第41卷第28页。

〔5〕同上,第13卷第456页。

〔6〕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3卷第454页与455页插图。

〔7〕见《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98—599页。

〔8〕见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3年6月5日)刊登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文章。

〔9〕M·苏斯洛夫:“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1949年11月下旬在匈牙利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莫斯科,1950年,第21页。

〔10〕《共产主义手册》第5期(1950年5月)第49—50页,53页。

〔11〕《意大利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罗马,1954年,第21—22页,32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2〕见福韦著《法国共产党史》第2卷第242—243页。

〔13〕苏斯洛夫:“保卫和平……”,第32页。其他几处引自第51、52、43和47页。

〔14〕见《新评论杂志》第50期(1953年)第131页。陶里亚蒂讲话和著作根据俄文版,莫斯科,1965年,第1集第560页。

〔15〕见《思想》第44期(1952年9—10月)第4页。

〔16〕1965年2月18日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引美国记者W·R·哈斯特, J·金斯伯里·史密斯和F·康尼夫在1955年2月5日对赫鲁晓夫进行的采访。这份共产党情报局杂志援引赫鲁晓夫的话说:“苏联不想损害它在反希特勒斗争中的盟国。”众所周知,五年以前,美国的动员程度不如现在高。如果苏联想要进攻西方,那么,那些认为应在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的人认为,它在那时就发动进攻了。

〔17〕这个“理论”和斯大林的“理论”是有联系的。斯大林的理论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进展,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些理论完全没有科学价值,却有实用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理论被用来并将被继续用来为许多反动行径——,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官僚和独裁(或是现在的官僚和无领导能力的)政权的人们等等——进行辩解。这个理论过去(及现在),被用来搅混这一政权中进步和保守力量之间



的斗争，把前者称为“反社会主义”力量而把后者称为“社会主义”力量。苏斯洛夫的理论（实际是斯大林的，因为苏斯洛夫只不过是个传声筒。）在五十年代被用来为斯大林强加于其他共产党的路线，为抛弃社会主义的斗争，为反对铁托的运动，为那些审判等等而进行辩解。（在1968年，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又被端了出来，为侵略捷克的行径进行辩解，）就象以前为（派遣）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进行辩解一样。

〔18〕见方丹：《冷战史：从十月革命到朝鲜战争史》，第359—365页。

〔19〕见方丹：《从朝鲜战争到目前的冷战史》，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70年，第9—10页。费伊托：《中国与苏联，领导权的结束》，第77页。

〔20〕方丹：《从朝鲜战争到目前的冷战史》第9—10页。

〔21〕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50页。

〔22〕同上，第593页。

〔23〕同上，第655页。

〔24〕《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3卷，莫斯科，1966年，第592页。应该记住，这一著作本书已多次引用，它是苏共高级党校的教科书，因而具有官方正统理论的特殊权威。

〔25〕这是用二十大提出的战争可以避免，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贫穷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作用以及团结社会民主党人等理论教条来谴责斯大林的理论教条。新老教条——它们的方法论同出一源，即功利主义和随机应变——都为同一个战略目标服务，即与美帝国主义实行稳定而持久的妥协，以巩固“和平共处”，即共产党情报局的和平运动所提出的“稳定而持久的和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上面引述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严厉谴责共产党情报局以前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说它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另外，在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上，同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一样，斯大林被用作替罪羊来承担以前的政策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就象“个人崇拜”成了解释各种错误的法宝一样。这样，就不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系的本质中所包含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了。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继续推行与过去没有多大不同的政策和方法了。

〔26〕下面是共产党情报局时期西欧共产党发展的一些详细情况。

### 意大利共产党

1947：党员1,889,505人 1946：在议会选举中得19%的选票。

1952：党员2,093,540人 1953：得22.7%选票。

### 法国共产党

1946：发出党证1,034,000个，804,229名党员。

1954：发出506,250个党证。

(1946年以后，法共只公布党中央向基层组织颁发的党证数，而不是党员实际拿到的党证数。按1946年两者之间差距，估计1954年党员不超过40万人是适当的。)

1946：在议会选举中获28.6%的选票。

1956：在议会选举中获25%的选票。

1947：这一年，在1100万份日报发行总额中，党的报纸发行量为277万份。(这一年，法共有30多种省级日报和周报)

1952年：党报发行量降到90万份(法共失去了许多省级报刊，《人道报》的发行量也减少了。)而法国各种日报的发行总量仍为1100万份。

### 欧洲合法的小共产党

|     | 党员人数                       | 议会选举中得票数的%            |
|-----|----------------------------|-----------------------|
| 奥地利 | 150,000(1948) 28,000(1951) | 1945: 5.4 1953: 5.4   |
| 比利时 | 100,000(1945) 14,000(1954) | 1946: 12.7 1954: 3.5  |
| 丹麦  | 75,000 (1945) 21,000(1953) | 1945: 12.5 1953: 4.3  |
| 芬兰  | 150,000(1946) 50,000(1952) | 1945: 23.5 1951: 21.6 |
| 英国  | 47,513 (1944) 34,801(1953) | 1945: 0.4 1955: 0.1   |
| 荷兰  | 53,000 (1946) 16,000(1955) | 1946: 10.5 1952: 6.2  |
| 挪威  | 45,000 (1945) 13,000(1953) | 1945: 11.9 1953: 5.1  |
| 瑞典  | 48,000 (1946) 28,000(1953) | 1944: 10.3 1952: 4.3  |
| 瑞士  | 13,500 (1945) 8,000(1953)  | 1947: 5.1 1951: 2.7   |
| 西德  | 无统计数字                      | 1949: 5.7 1953: 2.2   |

(上述情况大部分摘自布朗科·拉齐什著《欧洲的共产党》。关于法国党报的情况摘自安妮·克里格尔著《法国共产党人》。)

[27] 按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拉丁美洲所有的共产党在1947年共有党

员50万人。（《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史》第3卷第385页）。1964年，党员总数不超过30万人。（波诺马廖夫著《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莫斯科，第359页。）按上述资料来源，1956年以后拉美党有了很大发展。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共产党情报局时期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衰退是多么严重了。

在那一时期，拉美各党内部发生危机。1953年，智利共产党开除了雷诺索“小集团”。他们被指责为散布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1955年，乌拉圭共产党开除了其总书记戈麦斯·奇里沃，指责他是民族主义者。委内瑞拉共产党开除了前总书记富恩·马约尔为首的“小集团”。1952年，哥伦比亚共产党为反对一个被指责为犯有左倾错误的集团采取了措施。

最严重的是阿根廷共产党内的危机。阿共当时在科多维亚的领导下，一向以积极仿效欧洲共产党著称。这一模仿使阿共把庇隆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并要求组成人民阵线来反对它。阿共领导最优秀成员胡安·何塞·雷亚尔批判了这一政策，并建议实行新的战略，即与庇隆主义内的反帝力量结成同盟，因为这一力量在大多数工人中具有影响。胡安·何塞·雷亚尔和其他一些党员被开除了。科多维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无耻的诽谤。

就在这时（1948年），由于自由党领导人盖坦被暗杀，哥伦比亚爆发内战。哥伦比亚共产党积极地参加了内战，内战于1958年才结束。

以后我要另写一本书，详细地研究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及其历史发展。

〔28〕在那些年中，南亚和东南亚的共产党在武装斗争问题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派别斗争。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是鼓励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反帝阶层结成同盟，又总保持着对革命力量的领导及其独立性。由于美国反殖民主义宣传的战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斯大林在“冷战”初期的政策使这些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不同的宗派。此外，毛的武装斗争的战略从来都是以在策略上小心谨慎为特征的，并注意不过早地进行起义。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中受中国革命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左翼力量，在发动武装斗争时却不一定总是那么谨慎。他们不经过充分的准备就发动武装斗争。他们还不加分析地打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

〔29〕1946年，斯大林第一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国之内，尤其是在象苏联这样的国家里建成”的观点。（1946年9月17日《星期日泰

晤士报》所刊登的采访讲话。)

[30]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952年，第27页，在这一页上他还说：“这种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象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

[31] 原文如此。参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53页，——译者。

## 结 束 语

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行动取得不同于他们所计划完成的结果，不同于他们的直接认识与希望得到的结果。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同时也产生了隐藏于其中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与不在他们打算之内的某种事物。

黑格尔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进入没落阶段，进入总危机阶段。我们将在这部著作的后两卷中研究这一问题：第二卷研究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中苏关系破裂这段时期，第三卷研究现阶段。我们将从全面分析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矛盾入手来开始研究这个阶段，因为正是由于这位超凡的伟大领袖的逝世，这些矛盾才得以爆发，第一次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种骚动的震波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权里，在“阵营”外的各国共产党里，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冲破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堤防。潜在的冲突和离心倾向表现出来了。神话和教条被粉碎了。人们的心里产生了疑问，甚至痛苦。局部的和外围的危机，同苏联中心的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危机。

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在历史上是从其外围开始的，我们认为第一卷不必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权的演变作全面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危机首先表现为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地世界都遭到了失败；其次，表现为四十年代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力量以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后来，又表现为同南斯拉夫的破裂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蜕化（这种蜕化在使人震惊的审判中反映出来）。同时，斯大林政权通过无情摧毁阻挡它的一切障碍，

不管是富农的反动顽抗，还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反抗，在苏联境内巩固和加强了。这个作为一种不仅历史上完全没有过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预见到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由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加以利用的基础上，这个阶级是以那些能够在一个满目疮痍、啼饥号寒的国家里担当最有用和最紧迫的任务的人，即组织和管理经济的人员为基础逐渐形成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主观上认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已成为完全不受劳动群众监督和控制的利用生产资料的真正受益者，并且逐渐在主观上也具有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各种特点。

这个诞生在1917年的苏维埃民主的废墟之上的政权，证明它能够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摆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并以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业化。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四十年代末，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已经同生产力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冲突。在这种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的政治制度里，独裁者不是世袭的，而革命的条件又不成熟，于是各集团之间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便成为解决继承问题的唯一方法。这一斗争具有众所周知的残酷无情的特点，这不能全拿个人野心来解释。斗争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上面提到的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而且同苏联国内、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其他冲突和紧张状态交织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种情况下争权斗争的辩证法本身的产物。尽管报告里有故意编造的谎言，但它是对这一制度的本质的无情揭露。一直为共产党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叛徒”的诽谤的东西，现在由新上任的总书记正式证实是事实了。原来，“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权长时期以来不在劳动人民手里，也不在自称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而是在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无处不在的警察机构为之效劳的独裁者手里，他的主要统治方法是在政治上进

行罪恶的勾当和对群众施行思想控制。原来，反对南斯拉夫革命这次不光彩的运动是斯大林和他的警察机构一手策划的，象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所进行的那些审判一样。由此可以推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政权也不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或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甚至也不在本国的独裁者手里，而是掌握在新的俄国独裁者及其秘密警察手里。原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政策不仅不是由参加运动的各党所决定，而且也不是由“领导党”所决定的，因为“领导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由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他的助手们所任意操纵的。而他们自己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秘密警察所控制。

《秘密报告》承认，或者至少可以从《秘密报告》中推论出如下关键性的事实：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政党、思想意识、政策、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秘密警察掌握着最后决定权。斯大林既是最高领袖，又是这一庞大警察机构的牺牲品。

原来苏维埃政权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表现，而是通过它的自我宣扬和它的表面现象，影响着以它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把它的教条和模式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屈从于它国内的政策，是因为在世界革命者的心目中，它是第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并在工业化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同旧的沙皇制度比较起来是真正的解放。在一段时期，这种真正的解放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于这一政权使“马克思主义”适应这一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欺骗性理论）掩盖着人的异化、压迫和剥削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先进”的资本主义下的旧形式更为退步。历史的运动再一次表现出比最清醒的理论预见所设想的过程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

对苏维埃制度的演变，对它的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的这种看法，贯穿在前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在历史上最初的种种表现的分析中。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曾经试图说明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及使运动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几个主要因素，即相信苏维埃制度

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党的模式来仿效，把它的思想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真理，奉为每个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使共产国际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从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等等。

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贝利亚受到谴责，秘密警察的工作方式开始被揭露，柏林工人举行起义，为南斯拉夫“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都爆发了十月事件，斯大林帝国主义对别国人民起义第一次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苏维埃制度就越来越不象以前那样只看表面，而是看实质了。苏联把斯大林作为替罪羊，用“个人崇拜”解释他的专制政治，又用他的专制解释对他的“个人崇拜”，硬说《秘密报告》里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影响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质”，也不影响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质，这种新的理论上的辩解尽管很不高明，居然使许多共产党员感到满意，这就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思想脱离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地步。同时，另一些共产党人认为，这些说法是共产主义运动头一次进行的自我批评，虽然做得还不够，毕竟能为运动的复兴开辟道路。但是，新的现实是不可抗拒的，它所拥有的摧毁教条和神话的巨大力量不是任何主观设置的障碍可以阻挡得住的。以前，各国共产党的挫折、失败和无能，如果无法用“客观因素”来解释的话，总被解释为它们学习苏联模式方面有缺点，“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与苏共理想的理论水平相比理论水平低等等。现在慢慢有了这样的想法：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有弱点，恰恰是因为它们学苏联学得太象了。

这样，苏联共产党的危机就变成了反映每个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的第二卷一开头就要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矛盾进行全面分析，一直分析到苏共二十大，这次大会在历史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总危机的先兆。

现在，我们提几点看法来结束本卷。我们认为，这几点对于全



面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历史根源，了解这一危机在共产国际期间以及从共产国际解散到斯大林去世这十年中的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1. 如第二章《理论危机》所示，共产国际的成立，它的政治纲领，它的组织原则，它的战略和策略观点，都受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态发展，随即否定了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成熟程度以及当时革命发展趋势的假设。以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种否定显示出列宁有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模式有漏洞，其中的假定是错误的。这清楚地表明，对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现在已经成为客观的必要了。

但是，聚集于共产国际周围的力量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有限度地承认这种客观必要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的失败被看成是暂时的事情，而且主要归因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叛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见不论是正统的经典提法还是列宁的解释，都并不因此就被否定。与此同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关键地区边缘的一个落后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国家中革命所取得的初步胜利，则被说成是对经过列宁解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绝对证明，达到了最高限度的科学精确性。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切实可行的模式，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又是所有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样板，只需使之同它们各自的国情结合就行了。而且甚至这种结合，也只部分地取决于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享有最后决定权。总之，俄国革命理论成了全世界所有地区的革命理论，只需要稍许作些调整就行了。

共产国际由于掌握了这种“普遍真理”，就以“布尔什维克的不妥协精神”来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其他倾向和派别。它不仅把它们拒之于门外，而且极力使得同它们进行合作或讨论都不可能。随着国际性内战的幻影逐步消失，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逐步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内部的内战气氛就逐步产生

了。共产国际本来可以在俄国革命者与西方工人运动活动家之间促进经验和思想的富有成效的交流。但是，它却成了一道屏障，把改良主义倾向隔绝在外，这是很不利的，因为这些倾向掌握了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同这些群众保持联系，才谈得上对改良主义进行扎扎实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不仅如此，这道屏障还把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类型的革命倾向，甚至一些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子的倾向，例如卢森堡主义，意大利的“新秩序派”，以及其他一些在社会民主党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倾向也隔绝在外。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和以布尔什维克党作党的模式的批评是富有远见的；她警告说坚持要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模式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给运动带来严重后果，她不幸而言中了。但是，她的批评和警告，如同她关于在德国形势下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以及葛兰西最初的理论著作一样，都要么 en bloc（整个地）被抛弃了，要么被束之高阁。

结果，历史的真正的运动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提出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更加糟糕的是，人们甚至一直不承认有这些问题。令人眼花缭乱的十月革命，有助于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理论危机。对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自然流露的热情，使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或者大大减弱了自己批判的能力，例外的情况极少。在共产国际内部，特别是在有关党的性质与接受俄国领导的问题上，新正统的确立却并非没有遭到反抗。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特别是列宁享有威望，由于这“世界党”的组织制度把特殊的权力赋予其领导机构，这种反抗也就比较容易地被克服了。列宁一逝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很快蜕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没有过先例的教条主义，成了一种异己思想，代表了在斯大林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

2. 对资本主义的一成不变的看法，是这种新的正统思想的基础之一。它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灾难性危机，基本上是一种经济主

义的观点。

二十年代，共产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都还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和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刺激着苏联的理论家们去进行重要的讨论和研究。对殖民地问题也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了研讨，尽管自由的程度差一些。显然，这两方面尤其是第一方面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象对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样，研讨一直进行着，直到斯大林强制推行使得思想僵化的思想统一时才停止下来。但是，就资本主义问题而言，那就甚至没有经过这个富有创造性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发现都已经由马克思作出了，至于垄断和帝国主义，重要发现则已经由列宁作出了。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一种倾向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就是用经济主义和“灾变论”的观点对马克思的遗产和列宁的分析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对生产力的发展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这种制度的经济机制在较短期间内就注定要崩溃，从而引起革命，而且革命很可能是由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和分析似乎假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能逾越的结构上的极限。例如，他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但是，从总体来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不容许人们用经济主义和“灾变论”来加以解释的。然而，在第二国际时期，早期的考茨基正统派与左派的理论，都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这样的解释。

列宁的分析尽管在某些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沒有完全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例如，列宁把帝国主义说成是寄生的、腐朽的、衰亡的资本主义时，特别是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概括为“垂死的资本主义”时〔2〕，难道他不是继承了马克思似乎预言过的思想，认为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经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极限吗？帝国主义战争只不过是这一事

实以“灾变”形式表现出来而已。难道不正是列宁的这种理论观点使他认为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甚至认为世界革命已经随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吗？列宁在这段时期的许许多多说法，特别是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列宁参加了这几次代表大会或者认可了大会的活动），都证实了这种看法。第四次代表大会重申了第三次大会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描述，对这种描述它作了如下简略介绍：

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断定：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后，不仅同现代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资本主义处于衰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sup>〔3〕</sup>

前三次代表大会都作出过这种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判断。第一次大会极其明确地提到：

统治阶级已完全不能继续操纵各国人民的命运……金融资本已不能重建毁坏了的经济……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恢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总危机影响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不仅不可能恢复自由竞争，而且不可能恢复托拉斯、卡特尔等的统治。

第二次大会断言：“欧洲即将崩溃，而且整个世界也将随之而崩溃。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无法挽救的。”<sup>〔4〕</sup>按照第三次大会的说法，“生产力发展的曲线即将从目前的虚假的最高点往下降。发展只是短暂的，而且带有投机的性质。”如果真有可能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那也是“在采取使经济枯竭和野蛮残暴的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与这种情况相比，欧洲目前的情况可以视为处于幸福的高峰……更高的生活水准同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状况是根本不相容的。”<sup>〔5〕</sup>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而且在又一次摇摇晃晃地走向世界战争。列宁的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同这一制度继续存在

下去完全不相容的地步。就是这个阶段赋与“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

当然，在列宁的著作中能够找到似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说法。只要无产阶级还不能给资产阶级以*coup de grâce*（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就总能找到生路；资本主义的腐朽并不意味着某一个经济部门或者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就不能发展了，虽然在其他的经济部门或者其他的国家生产已不能发展。这种波动可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解释。但是，在列宁看来，这种矛盾是最明显不过的了。所有这些波动都在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出现的最后阶段发生，而且不管怎样波动，基本矛盾都只会激化。因此，第三次大会就说：

无疑，当今时代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虽有暂时的上升，但总的趋势总是趋于下降的，而革命的曲线则虽有某些波动，总的趋势一直是上升的……这种升降起落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临终时期将一直存在，如同在它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一直存在那样。〔6〕

1924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世界经济形势所作的决议，依然坚持说危机仍在继续，表现为资本主义大国慢性的工业危机与遍及全世界的农业危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战后的危机，正在进入繁荣阶段。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7〕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全会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有发展，但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中有如下的段落：

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1914—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肇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业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壳已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不能容忍的桎梏……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接近于最后崩溃。〔8〕

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去分析的。很多作者赞扬共产国

际预卜了这次危机。但是，事实上共产国际自成立以来所作的经济分析，很少有不预言大规模的危机已迫在眉睫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种预言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对1929年的预言虽然言中，却并没有引出积极的政治效果来，因为它仍有严重错误，把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看成是宣布过多次而且等了许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危机”了，这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产物。这种错误思想加上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有关的其他因素，使共产国际在这段时期采取了一条极左路线，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低估了法西斯的危险，对社会民主党采取愚蠢的宗派主义政策（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社会法西斯”），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中国共产党（早先则是要中共追随蒋介石），以及在西班牙革命初期（1930—33）采取荒谬的政策

前述列宁思想中经济主义的与“灾变论”的因素，由于其革命理论包含的内容广泛而不显突出，政治因素、党和阶级斗争在他的革命理论中间显然总是居于第一位的。他采取辩证的方法研究问题，总是根据对具体情况进行的具体分析，随时纠正自己的看法来适应政治行动的要求，因而那些因素受到了控制（尽管列宁的某些重要特征，包含着有损于他的辩证方法的倾向）。对此我将在以后进行讨论。当列宁主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套理论教条与实践准则的时候，它的每一部分就开始独立存在，而不再被看成是辩证统一体的一个部分了。经济主义的与“灾变论”的因素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被说得仿佛是超越阶级斗争的，它们成了不可避免地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力量”。尤其是在运用利润率递减的“规律”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贫困化的“规律”时，就完全不顾马克思曾经指出要予以注意的相反的倾向。在共产国际的分析中，到处套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作论证。它既可以用来“证明”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又可以用来充分解释某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阶段），或另一国家的停滞。它在什么时刻都可用来挑选出“最薄弱的环节”，指出

新战争的危險，预卜敌人的联盟。

在纳粹胜利之前，这种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观点，在理论方面（“理论”的贬义）一直执行着使共产国际的基本战略前提同实际形势一致起来的任务。按照这一前提，世界革命即将重新得到发展。

但是，实际的形势却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明显地缓和了，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有惊人的发展，共产国际的成员和影响的急剧下降，都反映出这一点。按照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看法，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可以解释成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一现象的下面，“经济规律”的运动依旧在把资本主义无情地推向“最后危机”的边缘。这就加强了对俄国革命前途的信心，说明了共产国际存在的必要。共产国际这个极端集中的半军事化的世界党，原是准备领导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战争的。

3. 可以预料，建立在经济主义与“灾变论”之上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所固有的机械的方法论，对共产国际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所进行的讨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其所以无力影响象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无产阶级，这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共产国际为什么对另一个关键地区德国的具有决定性的无产阶级力量没有吸引力，尽管它在德国已经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而德国资本主义经过1918年的失败与革命风暴的袭击又很衰弱。换句话说，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适合他们需要的行动方式与组织方式，其根源就在这里。

这种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看法，也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产国际把法西斯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不治之症的表现，是它的“垂死”挣扎，把新政也看成是企图克服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矛盾的另一种徒劳的尝试。如前所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这种看法引出了一条实行多年的极左宗派主义路线，而在此之后，又在理论上美化了在人民阵线时期开始实行、到“大同盟”时期达到了顶峰的

阶级合作路线。经济灾难即将到来的理论，支配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到斯大林统治的结束，而且此后也没有消失。1952年斯大林的“经济论著”，是想赋予这种看法以理论形式的又一次尝试。

这些理论要点，构成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永久不变的主要特征。首先，它们赋予争取满足“基本”经济需要的斗争以重大意义。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纲中的下述段落，概括了这种斗争的意义：

目前时期的之所以具有革命性质，本质上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不相容的，因此，为争取满足最起码的需要的斗争，就具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性质〔9〕

尽管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多次转弯子，这种看法却一直是它的行动的一个策略原则。共产国际把“争取满足最起码的需要的斗争”看成不仅是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统一发展过程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崩溃的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斗争还能缩小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影响。这可用下述论点来加以证明：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阶段，资本家连工人的“最起码的”经济要求也不能答应的话，那么，改良主义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明显的代理人，客观上也就不可能鼓励或者领导任何真正的争取满足经济要求的斗争了。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以前一直是经济斗争的主要受益者，而参加共产国际的成员则甚至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代里还在大大减少。〔10〕只有法国党在采用人民阵线政策之后，捷克党在一个短时期里，意大利党在1945年之后，在这方面同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竞争能稍有进展，而且这也是在它们自己采取改良主义的观点之后才作到的。但是，这个经验并不证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经济斗争对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无关紧要。这只是表明，这个斗争并不如经济主义的“灾变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仅完全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相容，而且



甚至是一种促使它的技术与结构得到发展与改善的重要力量。要超过这个限度，那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的政治觉悟，而这单靠争取满足“最起码的要求”的斗争是不能达到的，因为这一斗争的胜利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改良主义的幻想。经济斗争要取得另一种结果，就得成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和思想斗争之所以必要，因为某些或新或旧的矛盾与问题，随着争取“一片面包”的斗争逐渐丧失原来的尖锐性而日益在群众当中变得重要起来。主要从经济角度把资本主义视为处于“垂死阶段”的看法，却使人们对这种问题估计不足。这些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自从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工人组织合法存在、使罢工合法化、实行普选等等的时候开始，工人群众就把这种民主视为他们斗争的果实。过去乃至现在都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运用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无论在思想和政治方面还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中，它又是改良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要消除这种影响，不能只是抽象地谴责这种民主是形式民主了事，而要切实地为争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真正民主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不仅低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采取了抽象的、否定的态度。它在纲领上把资产阶级民主同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民主进行对比。但是，它所推崇的这种独特的模式，很难激起在改良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中与社会民主党中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的热情，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又一直在——当然不总是抱着赞同的态度——告诉他们有关“苏维埃民主”的发展情况。西方的工人群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工会的军事化，（既对资产阶级，也对无产阶级）取消政治自由权利，以及等级森严的实行泰罗制的生产组织，反而代表一种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优越的民主形式，后者至少还给了工人某些合法的机会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变路线之前，只要认为某个具体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总是立即就号召建立

“苏维埃”。但是，这种抽象的行政命令式的建议，同受到传统经验限制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毫无联系，因而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次收到过具体的效果。要使行动取得效果，就得采取一种不同的政治战略，就得在群众斗争的各个领域内，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与工会内，经常努力去发扬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党自己在联系群众与制定政策的方式上，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就得成为这种新型民主的体现者。

然而，对共产国际来说，由于它的理论和组织基础，由于它狭隘地拒绝了欧洲的经验，拒绝了欧洲那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过程中趋向于大大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运动，上述那种政治战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出于保卫苏联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需要，采取了保卫民主的立场，可惜保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才得以同工人群众重新建立联系，而且很少的几个党因此而成了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党。然而，后来在“大同盟”的格局下得到加强和发展的新改良主义倾向也发轫于此。

上述把资本主义看成为处于“垂死阶段”的观点以及按此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解释，也成了听任各党滑向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主义与合法主义的借口。现在是这样来论证的：资本主义要存在下去，就不能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也同保卫群众切身的经济利益一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制度的灭亡。

4. 二十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正统观念由于加进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得到“丰富”。这个学说与经济主义的“灾变论”观点异曲同工，就是要使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增强信念，尽管实际上它是斯大林派怀疑后者的一种表现。这种怀疑表现在斯大林力图使俄国革命不依赖于世界革命这种理论，尽管它“到头来”还保留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观点。

这个理论宣称，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发生革命，俄国也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但这种革命仍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俄国

“完全的社会主义”免受任何外来的攻击，为它的安全提供最后的保证。共产国际的文件，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同对世界革命的期待结合了起来（到1934年转弯子之后，文件中才不提这种期待了）。可是，这个新的因素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的某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在此只是概括地谈谈几点主要的修正：

1) 斯大林的学说假定社会主义能够在—个单独的地区内完全建成，而不—定非得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不可。这种假定同马克思认为十分重要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假定（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是有矛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宣称甚至共产主义也可以在苏联建成。这两者都是抽象的判断，缺乏任何严肃的理论基础，而是以—种权威的方式强加于人的。相反，据认为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建成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实际证据，证明的恰恰是马克思的论点。但是，我们将不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除了在第二章中作过的研讨之外，斯大林在这方面的修正将在第二卷中去谈。

2) 马克思和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重大进展。据他们看来，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各种类型的革命，可能十分重要，有助于这一体系的关键地区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只有革命在关键地区获得了最后胜利，才能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必需的经济与政治条件。（有关外围地区的革命在世界革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完整的理论，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与第一批殖民地革命的经验首次提出来的，但是马克思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

列宁逝世之前，对俄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一直是这么分析的，也就是说，不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革命结合起来，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建成—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苏联的任务就是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尽力对上述

无产阶级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它们去取得政权。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战略思想产生了根本改变。按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说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火车头……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的主要因素”。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成了决定世界革命进程的“新的基本矛盾”。换句话说，就象波诺马廖夫最近说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是它“最重要的国际任务”。〔11〕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进行推翻它的革命斗争，而是保卫苏维埃国家，使它免遭一切外来的攻击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

3)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从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国的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完全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的利益与需要的力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红军初期宣誓效忠于国际。）实际上，如本书分析的过程中所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苏联的领导人，而且尽管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具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思想，理论还是逐渐脱离了实际。但是，列宁看到了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同他的全部国际主义思想相抵触的关系有其内在的危险；这从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大会上，他批评关于国际的任务的决议“太俄国化”了。

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从属关系不仅在实践中加强了，而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给它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旦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被规定为世界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一旦保卫这一目标免受外来威胁成了国际的首要任务，国际的活动就自然理应由直接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来掌握了。

4) 整个说来，斯大林的修正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比起它处于经济主义的“灾变论”影响之下来，宿命论的色彩

甚至更加浓厚了。按照这种新观点看来，如果说“垂死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生产力长期有较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生产力又能无限制地增长，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那么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不能进行革命，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刻，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的。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象成熟的果子一样，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树上掉落下来。

5. 一方面，这种既乐观而又虚幻的看法成了共产国际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对待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种不同的、同时也非常现实的想法，不知不觉地产生了。

马克思（还有列宁）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布局、先进的生产力的性质以及国际关系体制的现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同其他同类型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殊死的斗争。这种预测无疑是具有充足的理由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1918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难道协约国会甘心只对它进行规模类似于对俄国革命进行的那种干涉吗？难道它们不会最大限度地动员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摧垮那次革命？布尔什维克起初对俄国革命的命运就是这样看的，而协约国的干涉似乎也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在他们打败本国反革命与外国干涉之后，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局面，他们最初对此是有些怀疑和惊讶的，而上述看法就是这种反应的根源。这种看法也是他们对随时可能发生规模大得多的新干涉的担心的根源。国际工人阶级的动员与其他的政治因素，只是这种干涉未能实现的部分原因。沙皇俄国在世界经济中远不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重要，这才无疑是真正的原因。资本主义机制失掉了这个“部件”，完全可以运行无阻，而且从这里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因为从此就有机会来同初登世界舞台的新的巨大的国家企业进行贸易。

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一个在国境之外“煽动”

社会主义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政治与物质援助，而且通过建立一种在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解放方面真正取得进步的社会制度，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榜样，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列宁以及他的同志们不相信同资本主义世界可能长期共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据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首先是全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指出过，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引起了看法的根本改变。这个理论使得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双方不能共存的因素，有可能消除，因为它断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再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了。当然，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苏联领导就得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退到实行“民族社会主义”。而且这种“民族社会主义”还必须不再成为上面提到的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榜样。

国际资产阶级根据苏维埃国家及其政策的演变来改变它对苏联的态度。苏联的工业化不仅不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甚至还可以为它开辟财源。此外，破坏苏维埃民主与限制工人的政治与工会权利，给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提供了很好的论据，它们可以用来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乃至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身，在大多数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随着这个演变过程确立下来，随着苏联对西方大部分工人运动越来越不成其为鼓舞人心的榜样，资产阶级政客和理论家们就集中全力去促使苏联领导人放弃其在国外鼓动革命的权利。1927年年终，布哈林模仿张伯伦说出下面的话，把国际资产阶级的口吻学得维妙维肖：“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同你们做生意，可是请你们把共产国际收起来行吗？”<sup>〔12〕</sup>

希特勒上台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拒绝国际资产阶级的这一要求。新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斯大林派在内部争权的斗争中，在完成其主要经济目标、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斗争中，需要以世界革命的理论来作幌子。另外，只要同受凡尔赛条约

拖累的德国暗中结盟的关系还存在，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边界是比较安全的，虽然他们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叫嚷存在着侵略的威胁。因此，他们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动力，而共产国际则是其主要工具。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对世界革命的提法，是世界革命理论经过修正后的最条理化也最教条化的表述。根据这种理论去进行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与殖民地世界都是完全行不通的。它在中国造成了灾难，在德国最后也造成了灾难，但至少使神圣的火种继续在燃烧。这些年代是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国际的英雄的、极端宗派主义的年代。

1934年是历史性的转变关头。在苏联，这是大恐怖的年代，它巩固了斯大林的独裁政权，新的统治阶级也就随之而形成了。在国外，结盟的对象变换了。面临希特勒的威胁，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成了苏联的潜在的盟友。1935年签订了法苏条约，这是苏维埃国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军事条约。缔结新的联盟需要作出让步，而按斯大林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来看，他不仅限于作出策略上的让步。他越走越远，不惜损害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把需要作出的牺牲——以及不需要作出的牺牲——全部奉献在已经同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合为一体的“苏联利益”的祭坛之上。第一步，是把世界革命的理论搁置起来。第六次代表大会庄严宣布过的纲领，为一个反法西斯、和平、民主的一般纲领所代替。（不再指明是哪一种类型的民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再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动力，而是成了世界民主的动力与和平的最后保障。“民主”欧洲成了苏联潜在的盟友，再也没有比这时候在欧洲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更不合时宜的了。

因此，当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在西班牙爆发而且似乎还在法国酝酿着的时候，共产国际就一直设法把西班牙革命拉向后退，把它纳入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并且堵塞法国革命得以实现的任何可能。反法西斯与防止战争威胁的斗争在1936年时有可能转上革命的方向，而上述作法就是甚至不加探索就摒弃了这种可能的转变。苏

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象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伟大运动一样，限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新方向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考虑过解散共产国际，但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协助执行新的人民阵线政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向改良主义的大转变。它的革命威望还可以用来掩饰这种放弃革命的作法，用来控制主观上还没有放弃革命的力量。就斯大林集团来说，放弃革命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但就共产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与组织者来说，还不是这样。

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可笑地把而今内容已丧失殆尽的旧法宝捧了出来，而这只不过是能起到掩饰斯大林想同纳粹德国达成永久性协议的目的的作用而已。经过这一段短暂插曲之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放弃共产主义运动原来的革命目标的作法，在“大同盟”的年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解散共产国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标志。共产国际之所以被解散，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由于它已经不适于组织和领导国际革命斗争了，尽管实际上它是这样。这是1943年决议所提出的理由，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对革命已经是没有兴趣了。共产国际之所以被解散，并不是由于这是打败德国的必要条件，而是由于这是斯大林的国家及其资本主义盟国瓜分世界的必要条件。解散它，不是为了使各共产党便于在各自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活动，而是为了使它们便于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进行改良主义的活动。解散它，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处于危机之中，而是因为它尽管出现了危机，但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根据一些其权威性无可怀疑的文件证明，从斯大林同其他两个大国开始谈判时起，除开几个当时已经开始反对莫斯科的领导的党之外，各国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就是由斯大林抱定的把欧洲和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宗旨决定的。各国共产党这就必须预先就放弃把反法西斯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尝试，而这种做法本身就决定了各国党的政策不是鼓励而是阻挠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它们对于联盟的看法，对于新的反法西斯政权的性质以及建立这种政权的途径的看法，都倾向于把最先进的抵抗力量置于反法西斯的民



族资产阶级与苏联的“英勇的盟友”的政治与思想控制之下。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斯大林一再妥协并且把他的总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在南斯拉夫与希腊毕竟已成事实，而且在法国与意大利也有可能发生。到了希特勒的军队无可挽回地崩溃的最后阶段，欧洲的军事优势明确地转到了苏军方面。抵抗运动的左翼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吸引了绝大部分无产阶级与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苏军在欧洲居于优势与抵抗运动的左翼占据统治地位，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至少有可能在工人阶级与左翼小资产阶级势力领导下建立先进的反法西斯基地的条件。

当这种机会真正来到时——这可能是遍及欧洲的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从莫斯科发出并且几乎得到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支持的指示，是要完全放弃这种机会，遏制运动的发展，并以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来期待“三巨头”可能作出的决议；这些指示巩固了英美在西南欧的权力，承认了戴高乐派在法国与天主教民主党人在意大利的权力。而例如在希腊，当革命的发展超出可能性的范围而成为现实时，斯大林就毫不犹豫地听任英国去进行武装干涉来打垮起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对丘吉尔作出了人所共知的妥协，而且还压希共领导投降）。

结果，在欧洲，变反法西斯战争为革命，只在南斯拉夫得到了实现。南共领导从一开始就将此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一直顶住莫斯科的压力按照这个政策行事。这种转变也在苏军占领的国家发生了，因为在这些国家废除旧制度，是建立苏联国防屏障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类革命却使民族独立得而复失，而且政权并没有交给人民，甚至也没有交给共产党——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大都居于极少的地位——，而是交给了顺从莫斯科的一小撮人。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党的路线，同样也要适应“大同盟”的政策。拉丁美洲各国党必须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印共必须同英帝国主义合作。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如果毛派领导集团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学法国或意大利的样，采取了同蒋介石实行“民族团结”

的政策的话，那就不会有中国革命了。

苏联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一个超级大国，把它的战略边界推进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这是不可改变的现状而加以尊重。苏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这种新的现状，寻找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作出全球性安排的途径，就成了它的国际政策的主要目标。“冷战”只不过是寻求过程中由于美帝妄图掌握世界领导权而造成一个危险阶段而已。它并不表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反帝和革命的转变。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也是如此，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便于控制卫星国，便于动员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白宫施加压力的工具，使它接受克里姆林宫所寻求的妥协。

在东方，伟大的中国革命开辟了第三世界反抗的时代，而在西方，如果说社会主义一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通行的话，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只停留在理论上，被推到遥远而靠不住的将来去了。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竞赛”，成了使社会主义到来的决定性因素，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是注定要获得胜利的桂冠的。革命成了一种扰乱安宁的，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前景了；主要的任务，是保持Pax Sovieto-Americana（苏美强制下的和平）。在理论方面，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一套死板的教条和陈旧的公式；在政治方面，它变成了一种具有改良主义内容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这样，到斯大林统治的末期，共产主义运动在抛弃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抛弃革命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起老的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来前进了一大步，可以把上世纪末伯恩斯坦的说法接过来了：“社会民主党应该有勇气摆脱过去的说法，自觉地表现出它的真实面貌——一个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

但是，现在出现的改良主义，具有一些不同于老的改良主义的重要特征。首先，它的出现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必须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一事来决定的，是由共产国际因此而必须担负的保卫苏联的任务来决定的。在人民阵线时期，这个任务的要求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按照斯大林领导集团对保卫苏联

的看法来看，这个斗争对苏联的盟国或者潜在的盟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得构成威胁。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必须按阶级合作的精神去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这种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然存在，因为即令是在“冷战”时期，争取同美国及其仆从国就长期的安排达成协议，仍然是斯大林的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主要特征同每个国家国内新改良主义政策的要求越来越发生矛盾。

其次，各国党现在开始从事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如同前一阶段“超级革命”的政策一样，靠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战后，就是“数国或社会主义阵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靠着斯大林去世之前一直保持着的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观点，依然能同社会主义的前景协调起来。以后，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心，因《秘密报告》、对“审判”的揭发、匈牙利起义、波兰十月事件等等而受到了致命打击。资本主义处于生产力发展的最后极限的图景，也因欧洲、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而受到严重破坏。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由于其理论基础遭到如此严重的震撼，现在就开始去寻求一种接近于传统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了。

第三，新改良主义在其所声称要追求的社会样板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改良主义，这种样板依旧是斯大林的俄国社会。因此，任何同共产党结盟的团体，所有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到来作出了贡献的人们，都作为不同于共产党的派别、集团或政党，在为自己挖掘坟墓。人民阵线时期的莫斯科审判，战后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成了使可能的同路人经常却步不前的事件。在斯大林时期，这是各国党的新路线最容易遭到非议的方面。二十大以后越来越看得清楚，不抛弃斯大林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新改良主义的政策就会是没有出路的。

新改良主义不同于老的改良主义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作为它的中流砥柱的党属另一种类型。当开始转向新改良主义时，共产国际各支部通过“布尔什维克化”和一次次清洗，在思想上与组织上

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此第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党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它们“成熟”的表现。这使得它们能够走上新路而不致发生严重的问题，能“同化”抵抗运动时期与解放时期入党的新党员。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使得这种新改良主义在某些方面更得以通行无阻，再加上思想上的清一色，就使得要为争取一条革命路线而进行党内斗争，比在社会民主党内更加困难了。但是，共产党的这些特点，特别是思想上的清一色和没有党内民主，也同新路线所包含的联盟政策发生矛盾。

总之，在本书所研究的时期中已经看得见而以后又向前推进了的“共产主义”新改良主义的发展，具有向传统的改良主义靠拢的特征。这种倾向是最能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标志之一。

6. 第二章已经试图阐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客观出发点是这样一个情况：共产国际成立时，同列宁所设想的相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国际却是按要在这种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去进行革命设计出来的。（必须指出，这里“客观条件”一词包括这一时期西方无产阶级的一般觉悟水平；不包括这一点，这个词就只有经济方面的涵义了。还须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社会的革命处于“不发达状态”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这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显著的总危机现象，尽管给群众带来了莫大的苦难，却只是很轻微地影响了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这是已为经验所证明的事实。）设想共产国际应当是立即对世界资本主义展开进攻的总部和先头部队，但它面临的却是一个与此大不相同的任务，即在沒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革命政策方面来。从逻辑上讲，执行这个任务，国际需要彻底改组，但如上所述，这一点甚至沒有考虑过。要解释这个情况，只提总结第一点中指出的因素，即十月革命的崇高威望，是不够的。我们应当首先从列宁关于党的观点以及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之间的不同点谈起。

马克思的著作中沒有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但是他

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同他首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在第一国际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统一体。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看法，是他把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的必然发展。据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超凡的领袖，阴谋集团，政党——能够代替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成熟”。共产主义革命要么将由工人阶级来进行，要么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注定的地位迫使它进行阶级斗争，也只有通过这一斗争的实践，它才能成熟起来。斗争的经验告诉无产者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团结一致。它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并且逐步把他们从一群单个的人，从“自在的阶级”，改造成意识到他们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对抗的“自为的阶级”。

“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并且“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sup>〔13〕</sup>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阐明的理论，有助于促进这种意识的觉醒，但并不是产生这种意识的原因。据马克思看来，是革命行动创造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又反过来推动革命行动，并使它明确起来。同一活动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点中所阐明的那种辩证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亲身感受到了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努力失败之后革命精神的衰退，并且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他深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其“成熟”的过程并非直线发展，相反是充满了矛盾，其间有进有退，有希望有失望，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生的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在进行斗争。但是，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性质的影响，这个过程终将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成熟起来。正如他1860年所指出的，他认为这个过程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过程。而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指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在现代社会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sup>〔14〕</sup>的党，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自我活动”所采取的（政治、文化、工会等）一切形式。换句话说，马克思把无产阶级

组成革命政党看成是组成为阶级，而不是组成一个不同于阶级的实体，当然更不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实体。这种观点不能按通常的涵义说成是“自发倾向”，因为虽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客观地位，决定了这个过程是自发产生的，但是阶级意识势必因其本身的性质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决定了阶级意识行将越来越对以后的阶段起决定作用，并且通过把以后的阶段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规定得越来越明确，而赋予这些阶段以有组织的性质。

据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党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象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形式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的部分而暂时的表现——用他的话来说是“插曲”。<sup>〔15〕</sup>马克思把工会的任务看得很重要——尽管他也尖锐地批评工会的“经济主义”倾向——，而他多次对工人阶级的政党表示过保留意见。1869年他写道：“所有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只能一时激起工人群众的热忱，而工会则永远赢得群众的支持。只有工会才能形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给资本的权力设下障碍”。<sup>〔16〕</sup>这种评论和其他类似的评论，并不包含低估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的意思——马克思一直都在号召工会使它们的活动具有政治性并考虑政权问题。马克思不过是提醒人们不要使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同明显的政治方面脱离开来，他提醒人们要反对政治集团的一种自然的倾向，即脱离开自己的阶级，而按照自己集团的观点和利益来领导阶级，塑造阶级。

马克思在作为一个战斗员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曾经有几次同这种倾向作斗争。1850年，他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一些盟员，他们“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专心于“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马克思继续尖刻地写道，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sup>〔17〕</sup>1873年，他批评巴枯宁分子认为自己是“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自己任命自己为“总参谋部”，通过阴谋和独裁手

段，把“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的”、“耶苏会”那种“perinde ac cadaver（你要象死尸一样）”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强加于国际〔18〕。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德国社会党领导集团中开始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抨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19〕。

还能举出好些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任何“左的”或者“右的”集团企图取代真正的工人运动，把政策或者理论强加给运动。马克思从来不把共产党人的活动，也就是同意他的理论观点的人的活动，看成是象列宁所说的，处于工人阶级之外，享有领导特权的党的活动。《共产党宣言》宣称：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不是“特殊政党”，而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是其“最坚决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0〕

当然，这种理论方面“优越的地方”，这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地位，本身就有可能、甚至倾向于脱离整个阶级，有可能同共产党人不是一个“特殊政党”、不按“宗派原则”来塑造运动这第一项原则相抵触。提出共产党人具有这种“优越”地位的理论，要求进行一定水平的科学研究，而这是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所做不到的；除极少的例外，这只能由统治阶级中的与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提出。因此，上述危险就更加大了。这是使“科学”有可能对无产阶级运动实行控制的根源，而理论家作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垄断真正的控制权。正是为了

防止出现这种危险，马克思才坚持要有真正民主的党组织，领导人要由党员选举并经常予以监督，而且要对任何崇拜权威或者领袖的作法进行斗争。马克思在同巴枯宁分子的论战中，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具有独裁的内部结构与官方正统理论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他主张应容许国际及其各支部内存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维护在报刊、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充分的辩论自由。<sup>〔21〕</sup>与此同时，他反对在科学研究中强加任何“党的”准则<sup>〔22〕</sup>。科学不能把它的结论强加给工人阶级运动，而具体体现工人阶级运动的各机构也不能作为权威凌驾于科学之上。

总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是极为开放、灵活而可以变通的，也是民主的，不过这是就民主的最不正式却又最为激进的意义来说的。这种观点在某一具体时刻的具体表现，应该是由“按大历史意义来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来决定的。据马克思看来，阶级才是在历史活动中与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代替阶级来起这种作用；它应该是阶级的工具并在阶级的掌握之下。每当党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协会还是第一国际——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同阶级的现实的运动发生矛盾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建议取消它。政党不是列宁所认为的那种阶级的“领导者”；它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解（其本身必须按实际运动的发展而经常校正）与无产阶级的自主行动之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协调者。它的任务不是把阶级的领导权接过来，而是帮助阶级自己去进行领导。罗莎·卢森堡在同列宁辩论时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她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人为地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起来的；它就是工人阶级的实际的运动”。<sup>〔23〕</sup>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工人运动内部的发展似乎与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发展成为革命阶级的过程是相抵触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表现出它还有大大改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的能力。反资本主义的觉悟以往的那种发展势



头似乎是消失了，或者甚至反转过来，让一种和解与改良主义的精神取代了，这种精神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传播开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既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又是这种倾向的泉源。它崇拜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说放弃革命是有道理的。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此的反应就是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把这种理论说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来源。考茨基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24〕这种说法按字面上去理解，是同马克思的观点不一致的。（意味深长的是，考茨基并没有引一段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这种说法。鉴于这个问题以及他提出这一说法的那一段文字是很关键的，如果真有那么一段话，那考茨基是一定会引用的。）“按照字面上去理解”这一限定语是需要的，因为读一读其中有这两句的那一大段话，可以看出来考茨基用“社会主义意识”这个词，是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同义词来用的。列宁在《怎么办？》中把考茨基的含混的说法接过来。他自己的立论本来就概念混乱，加上他还把考茨基的这种说法作为他的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的基础，这就更加糟糕了。

列宁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不仅是由于他写《怎么办？》时把考茨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及其传播的历史，以及列宁制订有关党的理论时的政治形势，也都推动他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获得立足点，而且在“民意派”失败之后正在寻找新道路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许多皈依的信徒（民意派是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经过1896年的罢工首次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的运动）。正象前一时期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农民是他们的群众基础一样，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象1843年的青年马克思——，把迟迟发展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制造出来的工人，看成是他们的新哲学的“物质的武器”。他们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当中

去，因为阶级斗争的实践甚至连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意识也来不及唤醒。据列宁看来，这种经验证实了考茨基的理论。列宁甚至强调了这个理论的唯心主义的背景，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25〕

另外，按照列宁对政治和社会形势的看法——一种不久便为1905年革命事件所证实的看法——，革命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便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为“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强烈主张的“自发性的崇拜”，据他看来简直就是犯罪。列宁还深信他掌握了打开俄国革命之门的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对偏离了他心目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哪怕只一毫米的任何意见，都那么猛烈而不容情地进行攻击。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倾向于极其重视理论和组织的作用，而对自发性的任何迁就则一律予以谴责。

据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因为阶级斗争本身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26〕

列宁对于指责他那派“竟把自己的纲领拿来与运动对立，把自己的纲领当做翱翔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精神”的人，回答说：“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成为不仅翱翔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精神’吗？”〔27〕列宁说，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行将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创造并带给工人阶级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二者之间斗争的结果来决定，而后者资格老，又是国家和统治阶级的许多工具之一，因而力量强大。这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得到的一种思想，但是大不相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工人

阶级运动是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而无产阶级是思想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对马克思说来，理论在斗争中也起作用，但起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形成革命觉悟的作用，而不是去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活动这一真正的动力。

与此相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产阶级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斗争争夺的对象。即使它达到了也是一种起作用的力量的程度，它还是倾向于“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列宁也认为需要有一种有力的工具，能使革命理论的武器保持锋利用来既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也反对为工人阶级运动自发地分泌出来的思想，从而扭转这种自发倾向。这是要把著名的列宁主义箴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党”付诸实施的工具。《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这句话联系上下文来看，确切内容是：革命运动必须建立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护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事先创造出来的理论、原则、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上。列宁心目中的党，就是这种有力的工具。列宁为了对付对自发性的崇拜，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的传播者、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革命的决定性的工具的概念。

如果说，列宁对党的看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党应该是在阶级的外面产生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传播者——是从考茨基那里借用来的，那么，他的组织原则就是部分地根据他所钦佩的“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引申出来的。这是一个来源；还有，我们行将看到，就是来源于德国。据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人有“建立象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种良好的组织或者建立更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28〕列宁的确仿效了这个榜样，但是对此又加以改进了。他的中心人物也是职业革命家，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也象七十年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列宁坚持认为有必要使受了教育的先进工人脱产，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但这收效甚微，就领导集团来说尤其如此。（在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有一名工

人中委。) 鉴于党对进入领导集团所要求的理论水平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平均文化水平, 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党的一般组织结构, 同样是以七十年代民粹派的一套组织作蓝本的。列宁采用普列汉诺夫的分析, 描绘那种组织说: “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 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 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29〕列宁建议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具有同样的组织形式: 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机关, 而在它周围并隶属于它的是“非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整个组织必须是高度集中、等级森严和纪律良好的。列宁为了不让人们对他所设想的那种组织发生任何疑问, 使用了军事语言: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我们的计划策略……是主张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的”。这个“军队”的任务是“正确地包围敌人的堡垒”并准备进攻; 当进攻的时刻来到, 这支军队应该“不被群众所扰乱, 而走在群众前面, 领导群众。”〔30〕

在组织原则方面, 列宁所设想的那种组织很象他所描绘的敌人的组织, 即“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的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31〕。政治警察是敌人的组织的一个主要工具, 列宁认为工人群众是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有效的斗争的, 因为“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 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 需要有职业革命家”……其所受的专门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32〕

这种态度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 列宁想把渗透着沙皇政治制度的官僚专制原则移植到党组织中来。在本世纪初年俄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 这种印象如此强烈, 以致其中的许多人——从普列汉诺夫到托洛茨基——都就此同列宁直接进行过论战。但是, 列宁基于他对社会民主党既没有中央领导又没有计划、马马虎虎地工作的那段时期所作的分析, 能够以颠扑不破的论据来作出答复。他很容易说明, 在沙皇警察统治下, 党内是不可能实行民主的, 而他所主张的那种组织, 倒的确是很适合在沙皇制度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某些具体要求的。由非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附属组织支持的职业革命家的组

织，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用来把列宁所制订的政治方针带到自发运动中去，带到不定型的工人组织中去、带到学生运动和农民中间去，并且使这“一片混乱”初步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种有效的工具还能够使整个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服从掌握着理论和意识、具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的党的领导。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列宁尽管遭到一些重要人物反对，但仍得到了一大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

除此以外，列宁具有革命天才和对具体形势进行详尽分析的能力，因而当1905年的革命表明群众的自发的运动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投到资产阶级的羽翼下去”，而能够表现出巨大的革命首创精神时，他对《怎么办？》中的准则和思想作出修改。列宁在他1905年和以后的著作中，都强调这种首创精神的重大意义。1905年11月，列宁甚至说“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sup>〔33〕</sup>（但是，这种语言在以后就少见了，而列宁也没有去更正他认为自发的运动只能产生工联意识并趋向于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观点）。随着革命从政府方面争得有限的政治自由，列宁提出要对党的内部组织实行一定的民主化，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通过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决议的实际效果受到了政治形势很大的限制。

把这种修改看成是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和这段时期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党的观点的根本修正，那是错误的。党与阶级之间的基本的关系依然没有变。党仍旧应理解为考茨基所赋予而列宁从未反对过的那种意义上的理论真理与意识的掌握者。没有从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意义来说的党的领导，阶级就不成其为革命的阶级；只有党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了阶级并从政治上教育了它，它才可能成为革命的阶级。是由党来控制阶级，而不是由阶级来控制党；每当阶级偏离了党为它所规定的道路时，党就来代替阶级，即使阶级不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党也总是阶级的真正的代表。换句话说，党处于无产阶级之外这种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变。就党取得统治权来说，党是处于阶级之外的。领导权不是从阶

级本身取得，而是从一种在阶级之外提出来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党同阶级联系的方式，也说明它是处于阶级之外的，一些通常的说法就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党要变得不可战胜，就得“依靠”阶级，同阶级“建立联系”，把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等等。列宁坚持必须把党和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特别是工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也反映了党处于阶级之外的性质。区别产生于从属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都必须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接受党的权力。据列宁看来，苏维埃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权力机构。换句话说，党是革命中起作用的中心力量，阶级的活动充其量也不过是第二位的。

其次，党的组织概念的基本因素也没有变。按照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来说，“集中”总是先于“民主”的（斯大林的蜕化则在于他完全取消了民主），因为集中是同列宁认为对领导机关必不可少的非常权力，同过分强调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稳定性与他们的权力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领袖人物因此就能够——大都在正常的情况下——制约基层与下级机关行使“民主权利”了。列宁对那些使得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予他们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的“蛊惑人心的人”表示愤慨，并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来作论据：

德国人的政治认识和政治经验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sup>〔34〕</sup>

直到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叛变”为止，列宁总是赞扬它的组织的领导具有权威并能保持稳定。

列宁并不认为他的关于组织的观点，实质上反映了俄国的特殊情况，尽管他的观点确实受这些情况的影响，它的某些特色基本上就是由于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而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又追随考茨

基，说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与修正主义之间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可以归结为“拿官仔主义和民主主义 Versus（相比）”这个公式（“官仔主义”在这里指的是基于党员有分工地从事党的各种不同的活动的集中的、等级制的、职业化地组织起来的组织。）

拿官仔主义和民主主义 Versus，这也就是拿集中制和自治制相比，也就是拿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原则 Versus。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想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sup>〔35〕</sup>

罗莎·卢森堡专门对这种把修正主义（理论上与政治上的）和民主主义（组织方面的）混为一谈的观点，进行过批评。这位俄国以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优秀的代表进行的这类批评，无疑忠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

归根到底，列宁所主张的党的结构和工作方式，只不过是把党视为从外部支配阶级的力量的这种看法在组织问题上的体现而已。这种结构和工作方式，是一种手段，使党——事实上是领导集团——不仅在制订具体的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方面，而且在制订出正统的理论方面，都享有独立性并保持决定权。因此，党光有自己的、不同于阶级组织的组织还是不够的，因为那种组织不得不同群众发生联系，从而必将受到外界的影响。此外，党组织还必须对“自发”思想有所戒备。为此，决定权必须集中于一个很小而又特别“坚强”的核心手中，而在这个核心中，这种权力又要集中在一位领袖的手上，因为只有他，才能使这个核心紧密地团结起来。早在1904年，托洛茨基就很好地总结出了对党的这种看法的逻辑：党会代替阶级，中央委员会代替党，而领袖又会代替中央委员会。<sup>〔36〕</sup>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得列宁的党的理论成了经典学说，而德国斯巴达克派与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的失败，又使接近

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与葛兰西的思想失去了威信。共产国际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它所具有的超国家的性质，加重了它与同样是按列宁主义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党的关系中处于各党之外的特点。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机构（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和教导员网等），对每个成员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说来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支部的职业革命家，必须效忠于中央机构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得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来，更是大大地脱离了本国的工人阶级。

共产国际各支部建立的方式也加强了这种倾向。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本国革命运动的特点而建立的，它具有自主的政治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基础，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则多少是脱离了本国的革命传统和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同俄国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决裂，是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同西方的机会主义决裂，采取的却是对成员加入提出《二十一条》作为标志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方式。

力图在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各个新党之所以碰到特大的困难，在多数情况下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说它们终于存在下来，而某几个党党员数量还不少，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能够吸引最激进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因为它们分享了十月革命的威望，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支援。但是，后面的这两个因素也助长了每个支部对设立在莫斯科的操纵机构的依赖性，因为它控制着财政大权，并声称忠于它也就是忠于十月革命。

此外，共产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认为其理论权威比起1903年布尔什维克派来，更加不成问题，因为这种权威是为1917年的伟大胜利所证实了的。世界的现实的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不接受他们的思想，事态的发展进程又驳斥了列宁有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熟程度的理论模式，但这都动摇不了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对历史进行科学解释的钥匙的信念，据他们看来，事态的发展进程，只不过是暂时表面上偏离了理论预测而已，而共产国



际的战略、内部结构与工作规程，却是按这种理论预测来设计的。没有必要来改造这个新机构；恰恰相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组织结构坚持下来，坚持到不久的将来，世界革命就定会以理论预示过的形式重新前进。因此，一切争取从莫斯科中心取得某种程度的政治与组织独立的运动——在初期，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运动——，都受到了“以布尔什维克不妥协精神”进行的抵制。关于世界革命的新的正统观点要求保持“世界党”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形式又反过来为新的正统观点提供了理想的保障，使它免受外界当时的公开敌对态度的影响。这样，列宁的党的模式中所固有的那种党处于阶级之外的性质、党取代阶级的倾向、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等级制等，就越来越得到了强调。结果，共产国际就越来越跟现实世界脱节了。

7. 共产国际中争取自主的各集团，很自然地把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斯大林的派别看做同盟者。反对派宣布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尊重“列宁主义准则”，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等。因此，列宁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反对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反对派的斗争，很自然地是同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各种离心倾向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排除而是恰恰需要同某一方建立暂时的联盟，来挫败在一定时期出现的最危险的倾向。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左”反“右”的斗争，并不总是同国际的某个支部的反“左”反“右”的斗争恰好合拍。所谓的“左”和“右”掩盖了斗争的真正性质；斗争虽然往往与既定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其实只是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集中过程与离心倾向之间的冲突的表现而已。赢得自主，是制订出任何对现实可能发生影响的政策——不管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政策——的必要前提。莫斯科命令实行的政策，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政策：它既不是革命的又不是改良的，而是抽象的、不起作用的政策。

而这却正是“布尔什维克化”一词的涵义。后来，争取自主的努力终于被压服了，这就确保共产国际完全从属于斯大林派，而一

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又从思想上对此进行了辩解。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更加尖锐了。（本书）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一章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用以为解散辩解的论点，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国际是遇上了“民族因素”而告失败的。但是，这种承认只涉及共产国际的组织方面，而对于这种组织方面的特征原是列宁关于世界党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从这种概念产生的共产国际与“民族因素”之间的矛盾随着共产国际成为斯大林的国家的百依百顺的工具而更加明显地趋于尖锐的问题，却竭力避免谈及。

主张取消共产国际的人们以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运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为理由，来维护他们不赞成有任何形式的国际革命组织的主张。但是，共产国际的经验其实并不说明民族需要与体现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之间，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存在矛盾。这说明，遭受失败的只是共产国际的形式，即从外部强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从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的需要的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失败证实：必须承认国际革命运动的多样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自然而然地在（理论、政治、组织）各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想法，是非常恰当的。

共产国际沦为一个异化了的、起异化作用的机构，一个为在苏维埃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机构，是通过不断清除在国际内部引起冲突的集团、思想与人物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却不能把国际早期的所有党员都“重新教育过来”，这就是它的党员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同化不了的党员要么被开除出党，要么自动脱党。新党员入党时环境更加闭塞，也更能受到同化，但他们当中也还免不了有人要被淘汰。这就是共产国际所有机构的成员更迭频繁大起大落的原因。

1921年至1928年间，共产国际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党员，这就是说，几经折腾之后，早期的党员绝大部分脱离了国际或者被开除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国党的领导人。以后吸收的党员中能够留

下来的，就是那种在思想的异化方面以及对教条与领袖的坚信不疑方面的功夫都是“炉火纯青”的人物（他们还几乎都具有坚决的牺牲与好斗的精神）。临到转向反法西斯斗争时，共产国际已经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宗派”的一切特征了。马克思本人的描述，指的是宣扬互助论的蒲鲁东分子、拉萨尔分子和巴枯宁分子，他把他们叫做“企图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来表现自己”<sup>〔37〕</sup>的宗派。然而，在国际内部，这些特征明显得多；共产国际的内部组织在维护教条，崇拜权威与机械的纪律，以及热中于保密等方面，都大大前进了。

就是这个宗派吸收并且教育了在反法西斯的年代里涌入国际的年青人，他们象以往入党的人一样，把国际看成是十月革命的旗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这批新党员加入国际时，对法西斯满怀仇恨，对新社会满腔热忱，而随着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新社会似乎正在古老俄国的废墟上逐渐建成。这些新共产党员的特征，除开敌视法西斯之外，还表现为他们对凡贴有苏联标签的事物都毫无批判精神，忽视理论——因为所有重要问题都由“上面”解决了——，忽视象党的行话所说的“实践”。而那些对理论有兴趣的人，从斯大林的著作获得基本的营养。谁都是通过斯大林的著作来学习列宁的思想的。马克思则落到后面老远，排到第三位去了。在抵抗运动、解放、“民族团结”、“冷战”的年代里，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层干部和许多领导人都出自这一代人。这是了解共产国际解散后多数共产党的态度要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三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完全接受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官方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斯大林的大恐怖阶段，恰好也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新宪法的时期，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态度。斯大林宣称，新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sup>〔38〕</sup>就在大恐怖席卷苏联社会的时刻，斯大林仍把那个社会描绘成自由的处所，它的公民享有“言

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讯秘密……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全民主化”。

所有这些自由权利都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们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来使之名存实亡。按照斯大林的宣传，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消灭布尔什维克老一辈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事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正如历史所揭示的，所有革命都有叛徒。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出的（象斯大林分子的科学术语所说的），“魔鬼”“法西斯走狗”与“外国侦探机关”的代理人数量最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十月革命的英雄一旦成了“人民公敌”，用斯大林本人的话来说，也就变成“白卫侏儒小丑”和“蜚蜮”了<sup>〔39〕</sup>。据世界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职业诽谤家、资产阶级或者法西斯代理人，才会对斯大林的说法产生疑问。不仅是共产党人这么看，就是虽不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方面但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广大工人和反法西斯群众，也是这么看的。难道社会主义能同托洛茨基分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所谴责的那些弥天大谎和滔天罪行相容吗？共产党人豈止是相信斯大林对历次审判的说法而已，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基本部分。由于有了斯大林这位天才领袖，由于有了他那可靠的警惕性和智慧，工人阶级运动才得以理解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新现象——阶级敌人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不惜采取种种万恶的手段——，从而丰富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冷战的年代里重又出现了这种现象，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同样变成了新的“魔鬼”和帝国主义所有侦探机关的代理人。用上述思想造就的共产党人训练有素，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现象，而且还能就此向在对希特勒胜利的热潮中入党的新党员作“解说工作”。

斯大林分子的党其所以对一代代的革命者具有使之异化的巨大力量，奥秘在于它体现了一个大神话。这个神话产生于十月革命这一本世纪无与伦比地激起了无产阶级群众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希望与

幻想的事件。据说，苏联正在建立第一个不是人剥削人的、而是真正的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另一神话也就随之而来，说什么斯大林分子的党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旗手。因此，尽管斯大林分子的党的危机首先在共产国际然后在各国党内早已暴露出来（本书对其过程作过分析），但是，只有捅破了神话，危机才会进入决定性阶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赫鲁晓夫的报告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总危机阶段，这将是下一卷要研讨的主题。

## 注 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

〔2〕《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8〕《1922年11月7日至12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与提纲》，伦敦，英国共产党编，第23—24页。

〔4〕《1919—1923年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提纲与决议》，巴黎，1969年，第19、20、25、31、74页。

〔5〕《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伦敦，英国共产党编，第81、90、91页。参见注〔4〕引用书第87、91、94页。

〔6〕同注〔5〕英共所编书，第95—96页。

〔7〕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65年，第2卷，第114页。

〔8〕同注〔7〕，第2卷第472，481页。

〔9〕同注〔4〕，第100页。

〔10〕除苏联之外，共产国际的成员1928年为445,300人，1931年降为318,176人。见本书第3章。

〔11〕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说法，见第2章注〔56〕。波诺马廖夫的话，系从1969年2月份《国际新闻评论》上纪念共产国际周年的文章中引出。

〔12〕见第2章注〔7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8、481页，这种思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了。《宣言》在描述了无产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的过程之后接着说：“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共产党宣言》第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16] 科斯塔斯·帕帕约思鲁：《马克思主义者》第223页所引马克思致哈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没有收进这封信，理由是这信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所篡改了（见中文版第16卷第8681页）。但是，并没有关于马克思曾经否认登载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这信是他写的记录。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1—3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5—38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1962年，第19卷第1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6—37页。

[21] 见本书上册108—109页上的引语。

[22] 1884年8月11日，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明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态度：“您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8页）。

[23] 罗莎·卢森堡：《集中与民主》，载《马克思主义与专政》的小册子，巴黎，1948年，第21页。

[24] 列宁在《怎么办？》中所引，载《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页。

[25] 《列宁全集》第5卷第34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6] 同上，第352页。

[27] 同上，第364页。

[28] 同上，第444—445页。

[29] 同上，第7卷第245页。

[30] 同上，第5卷第487、482、483页。



[31] 《列宁全集》第5卷第460页。

[32] 同上，第420，436页。

[33] 同上，第10卷第13页。

[34] 同上，第5卷第433、432页。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用不同的话讲了同样的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7卷第360页）。

[35] 同上，第7卷第391页。

[36] 参见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巴黎，1970年，第121页。

[37] 引文见米克尔·洛伊：《青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巴黎马伯乐书店，1970年，第175页。

[3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39] 同上。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